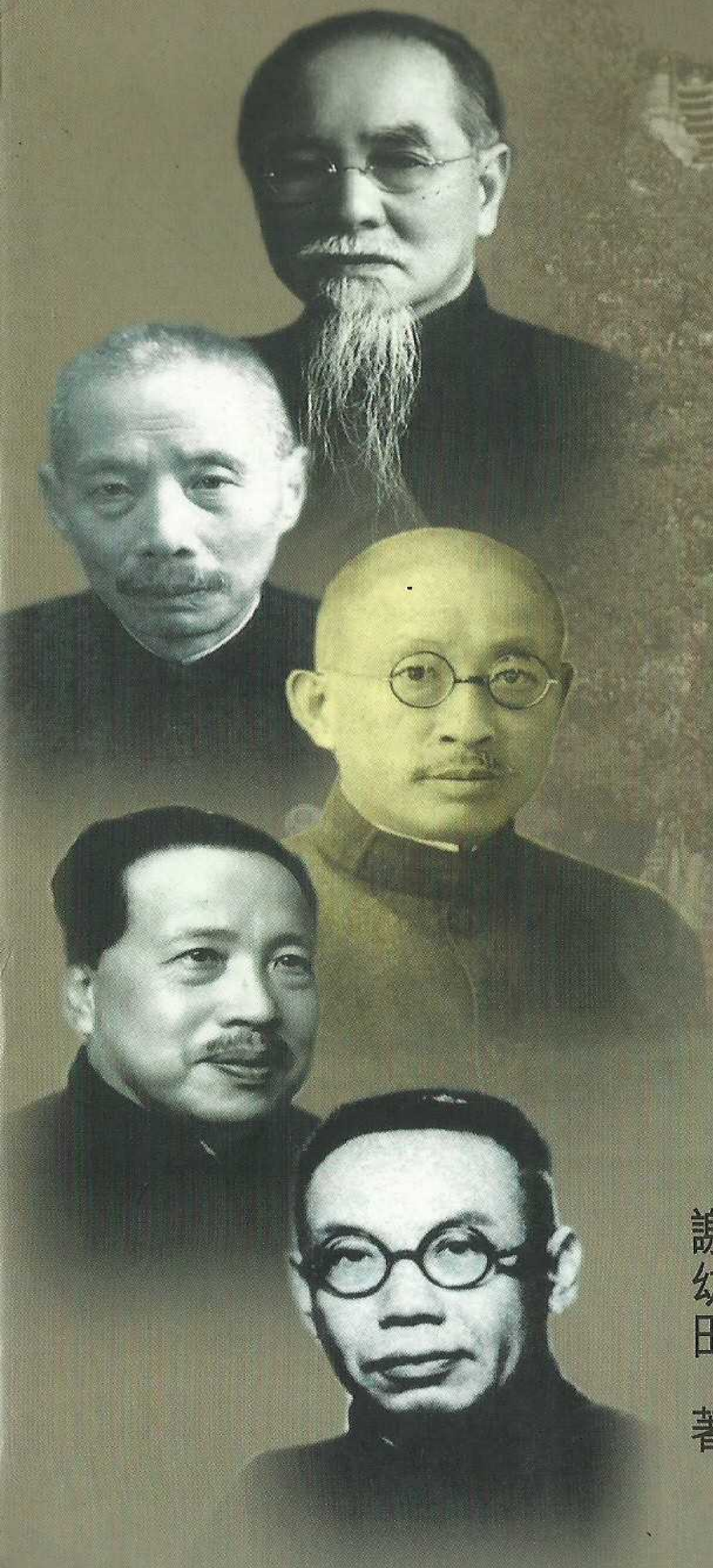


聯俄容共與西山會議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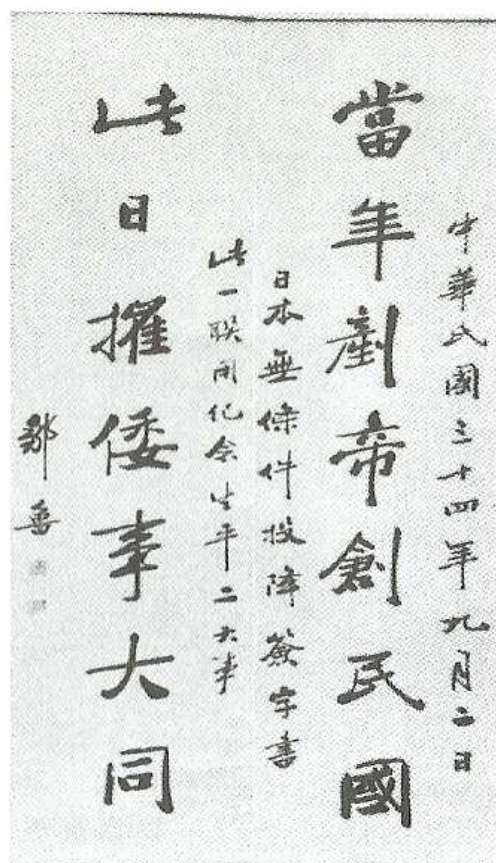
中國反左防左運動的歷史根源

謝幼田 著





鄒魯（左）、居正（中）、李文範（右）攝於陽明山居公館前。



鄒魯抗戰勝利書聯



民國十四年，鄒魯（左）與謝持在北京。

愛竹不鋤當路笋
惜花猶護壓頭枝

林森

林森書法

聯俄容共與西山會議

中國反左防左運動的歷史根源

十五、西山會議的準備

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稱西山會議）原定並不在北京西山舉行，會議地點的一變再變，說明了當時反共的國民黨人所處的艱難形勢；籌備的開始，已經有了反共的國民黨人意見的不一致，這為後來蘇俄的維經斯基和中共加以利用的可能。

根據鄒魯和居正的記述，會議最初是在廣州召開的。鄒魯在《黨統問題》一文中說：「廖仲愷被刺案發生，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同志處理一切，鮑羅廷以為有機可乘，遂要求汪、許、蔣拿辦胡漢民、鄧澤如、謝持、鄒魯等，及同志軍師旅長十餘人，……數次脅迫，最後以去就爭，卒因許同志不允捕拿執監委員，只捕拿其餘同志及軍師旅長十餘人，或殺或禁，又終恐胡、鄧、謝、鄒安然進行第四次全體會議也，遂驅逐胡漢民於莫斯科，用政府名義派林森、鄒魯赴北京為北上外交代表，迫令謝持離粵，電阻各地赴粵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之執監委員。如是中央執監擬在廣州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以解決共產黨者，至是為共產黨利用本黨同志藉題壓迫，不能開矣。第四次全體執行委員會既被壓迫不能在廣州開會，而原在廣州之委員，又已被迫離去廣州，於是主張解決共產黨之執監，乃集上海，謀易地開會。於是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遂開會於北京西山總理靈前，所以表示愛黨精誠，及中心之悲痛於總理在天之靈。」①這是之所以在北京西山舉行會議的梗概。

邵元沖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的日記記載，在當日，他與從廣州來上海的鄒魯「共談粵事暨此後對於黨務補救辦法」。又約謝持至孫科處商談，在功德林飯館與鄒魯、謝持共進晚餐（鄒魯、林森於前

一日到達上海)；二十六日「午前與子超、慧生、海濱討論黨務補救辦法，決由三人分別北上邀各執行委員及監察委員來滬籌商辦法。午間會餐於功德林。」這則日記證明，鄒魯、林森、謝持北上，不是像通常的史家所說，是北上去籌備第四次全體會議，而是北上去邀請各個執監委員南下商討辦法。邵元沖的這一天的日記，還透露出張靜江的意見不同，這反共陣營的並不引人注意的分歧，在後來卻關係到西山會議的組織方面的成敗。邵記載道：「又偕汝為、果夫訪靜江，談粵局內部糾紛之情況。靜江極抱不安，謂欲親至粵，共謀消泯意見及切實聯合之辦法。汝為謂稍緩再商。汝為來余寓一行，並邀楚僧來一談。」張靜江與新的軍權人物蔣介石的關係衆所週知，與戴傳賢、葉楚傖、邵元沖的關係也非比一般，他的不同意見導致後來參加西山會議諸公在蘇俄——中共的利誘下的分裂。

從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起，謝持的日記(未刊)和邵元沖的日記②(以下引用不另加註釋)，記錄了在北京、上海兩地分別籌備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情況。

謝持九月二十八日的日記記載，他在這一天與若干中央執監委員磋商以後，立即乘車赴北京，全文如下：「昨夜決定赴北京，遂函達可亭。下午子超、海濱、哲生、理明、元沖集議我家，有頃林煥廷亦至，晚十時離家，鍾夫人送我巷門外，唯恐吾不經風塵者。大女送我至車站，夜寒無睡處。」於九月三十日到達北京。

十月一日，中央執行委員石青陽來「道粵事黨事」；

十月二日往訪剛剛卸職不久的前廣東省長和大本營秘書長楊庶堪、石青陽和中央執行委員石瑛，晚上又和石瑛會面，認為石瑛「所慮是也」。是些甚麼顧慮，沒有記錄；

十月三日北方重要人物「于右任來」，次日又記「右任來談，終所見不相遠也」。「不相遠」大概是有分歧，有共同點之謂。謝持的日記顯示他很重視與于右任的會談，因為他在十月十一日再訪于右

任，十月二十一日，于右任邀請吃飯：「右任邀飲什刹海會賢堂，登樓入座，海光溶溶，然豁心目也。」會談似乎是輕鬆的。但是于右任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列名汪兆銘的反對西山會議的感電，他的意見是甚麼呢？根據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口述歷史訪問記錄，鄧家彥敘述于右任在政治上是汪兆銘的夥伴。邵元沖在十一月十一日，即西山會議諸人與汪兆銘——中共的對立已經分明的時候，記載于右任的觀點是：「又偕楚儉至右任處徵詢其意見。渠對黨務謂樂於討論，但主張以不妨礙廣東之政治及軍事，以聞海濱來京以後，頗主張推倒國民政府及黨軍等，認爲自毀基礎，不樂贊同。余等謂，此次滬上來之同人，亦同此主張，蓋唯有將黨之基礎穩固以後，始能進而議及政治及軍事，絕無現在併作一談，含混做去之理。右任謂，若此則彼亦甚樂參加討論云云爾。」這與謝持「不相遠」的記載一致，即偏向汪和中共，但不是「鐵桿」。所以他被中共控制的廣州第二次代表大會選作中央委員，甚至在武漢的紅色政權時期，在爲對付蔣介石的國民黨的二屆三中全會上，他仍然高踞國民政府委員的座位，但他從來沒有作過常委。在國民黨危亡的關鍵時代，第一屆的中央執行委員中跟隨汪兆銘者，不過兩三位而已。于右任在其中，但是跟得不緊。

謝持在十月六日從北京出發，到張家口訪問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李烈鈞，偕行者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北京民治主義同志會的負責人傅汝林。李烈鈞在上一年以大本營參謀長身份隨孫先生北上，因爲李烈鈞與發動首都政變的馮玉祥有舊，欲以三民主義游說馮。孫先生去世以後，李烈鈞就留在馮部，繼續做馮的工作，以便軍閥出身的馮部能夠真正加入國民革命行列。謝持到達張家口以後當天就上門拜訪，八日與李烈鈞會商，謝持記載「略有結果」，立即返北京。李烈鈞雖然後來沒有參加西山會議，但是致電贊成。這大概是「略有結果」的含義。謝持在十月九日致函給上海的孫科、葉楚儉等人，「言協和所見」。李烈鈞搬遷入北京西山以後，謝持在十月十五日「赴西山再訪協和」。謝持曾經在改組以前

較長時間擔任孫先生的總統府秘書長，與各方面都有比較好的關係，而且又有一定的份量，所以他先到北京聯絡各方是恰當的。

林森、鄒魯於十月十四日到達北京，各項工作就更好地緊鑼密鼓地進行了。現在根據中共中央委員、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主持人于樹德給廣州中央的告狀材料，看看這時的準備活動：「本黨監察委員謝持，自離粵來京，對於廣東黨務及政治措施，即有許多不滿意之表示，並向本黨在京要人作破壞廣東政府之鼓吹。而廣東代表團來北京後，本部曾作大規模的歡迎，以為彼等定將廣東政府真相宣佈於北方群眾之前，而打消一般之懷疑於謝之謠言。不料彼等到京後，總代表林森、秘書鄒魯等，不但不為國民政府有利的宣傳，且作與謝持等如一鼻孔出氣之反宣傳。林森同志在三千餘人歡迎會上，公然說『無論北政府、南政府一概都是不可靠的……』等等荒謬言論。」③當時的對立在此顯示，已經非常尖銳了。

為了將會議前的歷史真面貌再現，以下十月下旬的謝持日記、邵元沖日記中的有關西山會議的記載，和于樹德向廣州中央委員會的報告，按照發生事件的日子排列，看一看在西山會議準備期間，國共間的激烈衝突。

十月十九日：

謝持日記，「集北京中央委員會之志於黨者商黨事。」

二十一日：

于樹德報告：「鄒林兩同志來執行部聲言限本執行部兩日內召集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而又不以何事相告。……」

二十二日：

謝持日記：「子超、海濱約午後三時集商於竹竿巷，過時而同志之集者寥寥也。」（按：竹竿巷為

林森駐地。）

二十四日：

謝持日記：「上午赴翠花胡同八號，略生氣，遂覺不支。」（按：翠花胡同八號是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所在地，由中共中央委員于樹德主持。）

二十五日：

謝持日記：「上午赴翠花胡同談話會，雖決定來日召集執行部中央委員會，而事實必有難者，隨至大中公學。……夜海濱、子超來商。」

邵元冲日記：「接哲生、楚儉一電，煥廷一函。」

于樹德報告：「是日于樹德同志以赴天安門國民大會，未能出席。乃是日上午十點鐘時，謝持、傅汝霖、鄒魯、林森、石衡卿、茅祖權諸同志率領四、五十人，盡係同志俱樂部及民治主義同志會分子，到本執行部，一面派人將大門把守，一面派人把持電話，入內翻箱倒櫃，牆角、廁所等處搜查，一若強盜入室，誠不知是何用心。……是日鄒、謝、林等聯名發出通告，定於次日召集北京中央執行委員正式會議。」

二十六日：

謝持日記：「早起訪石衡卿，頗使我失望。赴翠花胡同，于樹德忽鎖大門，語言無禮，會遂未成。……遂赴子超處商議。遂分電滬執行部楚儉，宣佈黨事經過，是日也，吾等與共產黨分離之開始也。晚偕子超、海濱覓衡卿、溥泉簽字。」這封由林森、張繼、謝持、石瑛、鄒魯、茅祖權、傅汝霖簽字的寢電（十月二十六日）說：「時局突變，國事黨事亟待討論。森等於箇（二十一）日聯函請京部通知在京中央委員開會，京部不理。漾（二十三）日赴部促常務委員發通知，又允而不發。數日赴部則職員皆避去，森

等乃函約徑(二十五)日在部談話，到時只一書記在部。談話會決定在本(二十六)日開委員會會議，因印章由秘書保管，乃由森等聯名通知。本日森等到會，于樹德已預集多人，森、(謝)持兩人入門，魯因事暫出，樹德忽將大門鎖閉，魯及後到者皆不能入。一面肆行醜詆，反誣森等掠物，破壞黨務。似此把持，無法開會。除將實情電告同志外並請中央執行監察各委員即集中張家口開全體會議，解決一切黨與國之命運。」(轉引自李雲漢著《從容共到清黨》)這封電報顯示，由於中共黨員的滋擾，在北京的中央委員開會已經不可能，而改變初衷，在張家口開全體會議。

邵元沖日記：「覆哲生、楚儉一電。舊曆重陽。接哲生等電，促至滬會商黨務，因覆其明日起程，因稍檢理行具。」

于樹德報告：「本部常務委員于樹德候其開會，至九時頃，同志俱樂部民治主義同志會三五成群，來本執行部。問其何事，則答云開非常會議。問其何人所召集，則云不知。令其簽名，則皆簽一假名，或不肯簽名。迨至十時頃，謝、林、鄒相隨而至，已達二三十人，大半皆持鐵手杖，其勢汹汹，大有用武之勢。適是日有許多黨員來本執行部集齊，預備出發新華門示威，彼二三十人始不敢動手……。按鄒、林等身為本黨中央執行委員，又為廣東外交代表團政府代表，來京後既不為政府宣傳，已為失職辱命。而況更作反宣傳，其應受若何之懲罰乎？謝持身為本黨監察委員，又為國民政府監察院長，對於失職辱命之鄒、林代表，不但不加聞問，且更藉彼等來京之便，以遂其掠奪北京執行部之陰謀，真所謂喪心病狂者矣。」國民黨的衆多委員要在國民黨的執行部開會，受到中共中央委員的阻擾，反而被于樹德說成是「喪心病狂」。

二十七日：

謝持日記：「青陽來說明不簽字電報。」

邵元沖日記：「午前離寧，乘十一日車赴滬。……晚與楚儉商黨務。」

二十八日：

謝持日記：「孟碩召飲。」

邵元沖日記：「午後訪汝爲、果夫、煥廷。又晤陳耀恒君，言新自美國歸，赴第二次代表大會者。

晚在哲生處晚餐，兼與理明、楚儉等談黨務。」

于樹德向廣州報告，「聯合通訊社」消息：「大意謂謝持等聯合北京同志俱樂部及民治主義同志會，欲強佔共產黨所把持之北京執行部，以共產黨早有準備，此種計劃，乃歸失敗，只大罵共產派而返云云。」

二十九日：

邵元沖日記：「三時頃至蘆隱寓問疾，兼少談黨務。又與煥廷訪楚儉。晚餐於小有天園菜館。晚訪藕舫及馬伯援，皆不值。至《民國日報》社與楚儉談，以京中同志主張在張家口開會，而此間定期則爲十一月八日，恐時促，乃定明晨歸南京一行。」

三十日：

謝持日記：「修正海濱稿以寄精衛諸人也。昨夜海濱來同與臨川談話。」

三十一日：

謝持日記：「得覺生開封牋。」

邵元沖日記：「電季陶，詢到滬及赴京否？函楚儉。覆孫文主義長函。……晚東南大學學生……來，談組織南京孫文主義學會及南京市黨部事。」

以上日記和報告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最初並不存在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打算，甚至上海的中央要人要在北京的中央執監委員到上海開會；之後是舉行北京執行部中央委員的會議，甚至在會上可能只是提出當前急迫的問題，而並未打算國共完全分家。由於中共黨員于樹德拒絕和阻擾這一切，在北京執行部引起了激烈衝突，而不得不有另外的打算。謝持在二十六日的日記首次記載：「赴子超處商議，分電滬部宣佈黨事經過。是日也，吾等與共產黨分離開始之日也。」當日才有林森、鄒魯、謝持尋找石瑛、張繼簽字，給廣州中央發出公開信的重大行動，即決定拋開共產黨單獨開會。

不可能藉北京執行部開會的另一理由，是北京執行部的共產黨員當然反對之外，國民黨的執行委員也沒有一個反對中共，甚至是很親共的。丁維汾在中共控制的廣州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報告北京執行部的情況說：「兄弟還有一事要向各位說明的，是北京執行部執行委員，原為李大釗、于樹德、恩克巴圖、王法勤、丁維汾五人。這五人都是和西山會議沒有關係的。主持西山會議的人雖然用過許多方法要拉我們進去，但我們到底以為這是破壞黨紀，沒有商量之餘地。于樹德、李大釗兩同志更堅決反對。他們初時原來想用北京執行部召集會議的，後來見得運動我們無效，才有西山會議。」④

二、石青陽在黨內的資歷本來不高，可能是孫先生爲了聯絡西南軍人而讓他當上中央委員。他不簽字表現了他的猶豫，他後來只參加了西山會議初期的活動；鄧家彥一直堅決反共，但是因爲公開懷疑孫先生遺囑的真實性而受到處置。他請謝持吃飯當然與會議有關，邵元沖在西山會議開會前的十一月十六日日記就記載鄧家彥要求出席會議被拒絕。

三、日記中提到給廣州中央的信函，這長篇信函被收入在《林公子超遺集》，也收入《鄒魯文存》中，今根據《謝持日記》，是鄒魯作品無疑。這是具有不同意見的中央執監委員們，第一次集體向廣州的汪兆銘等陳詞，其中包含着若干的基本觀點，現摘要如下：

第一部份是陳述中國國民黨過去只有意見的不同，而從未分裂，如今在鮑羅廷——中共的挑撥離間之下，才出現分裂，文字間充滿痛切深沉之語：「吾黨成立數十年，其中分子不無離異落後，然大多數莫不一心一德，努力革命，以故雖無嚴密組織之黨員，尚能屢仆屢起，造成民國。討袁、護法、北伐、討賊諸役，無或退餒。乃自前年共產同志加入以來，黨中机捏，無日或寧。直至今日，殺機盡露，迫逐之事，層見疊出。凡此多數十年革命僅存之同志，何以共產黨員未加入本黨以前，悉能相安，不見離異。此中挑撥離間，實爲不可掩之事實。」這雖然是一封政治性的函件而訴之以理，卻處處動跟隨孫先生長期奮鬥之情，妄圖打動在國民黨內有一定歷史的汪兆銘和蔣介石。廣州雖然有中央委員譚延闓，但是譚曾經是立憲黨人，曾經參與殺害湖南的同盟會都督焦大鋒和副都督，篡奪都督位置；二次革命時，又阻礙湖南反對袁世凱的活動；之後任省長，實際是獨霸一方的軍閥。跟隨廣州的孫先生後雖然有一定的功勞，然而時間不長，無歷史可言，並且總是投機取巧而已。所以該函件只是提到汪、蔣的歷史而望打動之：「改組以來，機關爲共產同志把持，凡非共產之同志，則欲插足而不能。即間藉一二非共產同志以爲點綴，以必出種種手段以執之，俾無以自展。……且彼輩之用心，非僅欲破壞吾團體而已，直欲毀滅吾黨之歷史，破壞同志之感情。以展堂與精衛、汝爲與介石，皆數十年生死患難之交，可竟使之破裂不可收拾。雙十節竟公然改警告節，醜詆吾黨創造之歷史，吾黨稍有心肝者，能無痛哭流涕乎？」如果無私利在其中，這理情皆茂、事實俱在的函件，定會被深深打動。

然後，以大量的事實揭出蘇俄——中共藉聯俄容共之機行篡權之實：「在今日中國，非吾黨主義革命不可。在國民革命戰上，非團結全國革命分子一致進行不可。不圖此願非特不可達，而彼輩乃敢於如彼之橫姿妄行，復利用吾黨聯俄政策，挾俄以自亂，既藉國際以壓迫中央執行委員會及政治機關，又藉黨部以壓迫民衆，近月以來，更不堪問。黨權不在最高黨部之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權不在最高政治機關之

國民政府，而悉集中於政治委員會；鮑爾丁（按：即鮑羅廷）乃以政治委員會顧問之資格，操縱其間。而鮑爾丁所有措施，復先決於其共產黨，以故黨務、政務之重要者，共產黨中之小學生莫不先知，而吾黨中之重要委員，則冥然無所聞也。與其謂共產黨同志加入吾黨，毋寧謂吾黨阿屬於共產黨之為真實。……再過一年，恐青天白日之旗化為紅色矣。」可是事實證明汪兆銘之流讀到這些文件，無動於衷，因為鮑羅廷——中共的所作所為都是他支持的結果，而汪的黨政大權的獲得，也是鮑羅廷——中共支持的結果。國民黨遇到出賣黨的人來當黨的領袖，當然是大難臨頭。此時離孫先生逝世還不到一年。

在舉出大量鮑羅廷專權的事實以後，將筆鋒轉向蘇俄的帝國主義行徑，不僅僅揭露蘇俄繼承沙皇的侵略衣鉢，紅色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下於白色帝國主義，還指出蘇俄在中國提倡階級鬥爭，給中國帶來慘痛的歷史：「袁世凱借款二萬五千萬大款，予人以鹽務稽核，吾黨猶謚之為賣國，今俄人之助我甚少，所攫至大，設有人以賣國責吾黨，吾黨何辭以對？……彼固謂以平等待我矣，然中東路之不公平，甚於俄皇時；租界領事裁判權等雖然已捨去，然而以日本對朝鮮方法而攫我蒙古，大小輕重之間，不可同日而語。徒以貌為平等之故，遂使素以愛國自號之吾黨，亦禁若寒蟬。……實而言之，共產黨『有己無人』，日以『階級鬥爭』相號召，資產階級固認為敵矣，而同是工人，非彼黨者，彼又號為資產階級之走狗。……故一翻蘇俄之歷史，無非慘殺異黨之歷史，今則向吾黨慘殺矣。夫人類本非性善，中國向來之革命，以仁義相號召；歐美近世革命，以平等、自由、博愛、人道相號召，尚未免於殺戮恐怖，況以階級鬥爭為號召者，欲人類不供其犧牲者幾何？故共產黨階級鬥爭之號召，實人類前途之大憂。固不僅吾黨國而已。總理謂『馬克思只可以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不能說是一社會心理學家』，實即在此。」⑤這一段對蘇俄稱呼為帝國主義，是歷史文件的第一次，以後幾十年蘇俄在中國的侵略行徑，完全證實了這一判斷的正確性和重要性；這一段對階級鬥爭的批判也同樣強有力，對階級鬥爭可能給中華

民族帶來慘殺惡果的憂心，也被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澤東時代所證實。毛澤東時代整死、餓死的人以數千萬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據官方統計，光是受衝擊的人就有一億兩千萬之多。西山會議的諸位元老早在中共建立的第四年，就對階級鬥爭可能的惡果發出了警告。這警告雖然再三再四地重複，急功近利的中國知識分子終於還是聽不進去，而是隨魔鬼到地獄去尋找天堂，最終以幾千萬人的生命來證明了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不適合人類。代價何其大也！

寄出了給汪兆銘等廣州領導人的函件，鄒魯、林森、謝持在十一月二日晚登車赴包頭，馮玉祥在那裏。中共中央委員于樹德十一月三日立即給廣東中央的告密報告：「最近又聞林森……等同志，對各地黨部及同志發表通電攻擊北京執行部，並定期在張家口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解決黨事云云。……況以北京之大，何處不能召集會議，而必在張家口召集，究竟是何用心？諸望中央指示辦法為要。」⑥掌握有軍事力量的馮玉祥如果在黨內有資歷的元老結合，當然會使得中共和廣州緊張。但是根據鄒魯的《共產黨破壞國民黨及國家真相（再告孚木）》的文章，卻斷然否定了在張家口開會的傳聞：「至於說第四次全體會議如何求馮煥章在張家口開會，馮煥章如何不允，實則我雖見過馮煥章，並且是同子超、慧生一齊與煥章會面，卻沒有向他談黨事，更沒有向他商量在張家口開會的事。」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根據謝持的日記，鄒魯、林森、謝持在十一月二日晚七時二十分從北京出發，於三日晚九時抵達包頭。無人來車站迎接，當晚宿車中。次日：「上午八時許，煥章督辦以車來迎，遂往訪之。督辦處在城東里許，新築之茅茨也。煥章樸質而過於沉深，與之言，但見其讚嘆而已，不能得其意之所在。」這是唯一的一段與馮玉祥的直接接觸的記載。馮玉祥「樸質而過於沉深」，讓人摸不着頭腦，「不能得其意之所在」。鄒魯等過去誰都沒有見過馮玉祥，故這次專門訪問有試探性質，結果發現馮玉祥除了空的「讚嘆」以外，一無所有。鄒魯等人一定就沒有繼續往下談，所謂「在張家口開會」的具體問題之類，

自然就不曾提起。次日早上八時，登車「東行還京」。鄒魯等人當然不清楚，那時候蘇俄已經看中了馮玉祥，決定全面給馮以援助，以便為蘇俄的國家利益服務。

蘇俄中央檔案第一七一號文件記載，在八月二十九日的中央政治局的有關會議上，「決定：根據加拉罕同志的最新報告，馮玉祥全面展開政治工作，現正組建有七百名學員的黃埔式學校同意照我們意願任命參謀長，看來輸送全部物資，已無障礙。在加拉罕同志到達前，為了不間斷輸送庫倫的儲備物資，先運去三千支步槍和子彈。」⑦（以下同出一書者皆不另註釋）

在九月二十四日的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的第十一次會議上，決定：「P. 責成革命軍事委員會，再次研究如何加強馮玉祥和廣州的空軍問題。……e. 責成軍事委員會，研究可否供應馮玉祥化學戰裝備和為其建化學工廠問題。……g. ……(6) 責成外交人民委員部尋求妥善辦法，要求馮玉祥和其他將領為撥予的物資提供明確的債務保證。」

給了錢，當然就要受錢者聽命。在斯大林主持的九月二十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決定：「促使馮玉祥支持上海工會。」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有關人員給斯大林的報告的附屬表格中記載，已經撥出如下物資給馮玉祥：步槍三萬支（按：給廣州的步槍才一萬五千支），步槍子彈三萬八千六百發，機槍及其附件一百七十二，三英寸火炮及其附件五十四，上述火炮炮彈四萬四千，……飛機十，馬匹三千，馬鞍三千，這樣多的物資，是要馮為蘇俄服務。

馮玉祥雖然依靠蘇俄，蘇俄也欲培養他作為在中國的强有力的代理人，但是馮並非全心全意。後來張作霖從蘇俄駐北京大使館搜得的文件中，說明蘇俄對馮始終有懷疑和顧慮。（見《革命文獻》第十五輯，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出版）于樹德在國民黨廣州「一大」的《北方政治狀況報告》中，舉出許多事實

說明，馮玉祥對於蘇俄——中共在他的軍隊中的組織和宣傳方面滲入並不熱心，態度一貫曖昧，是否是受了西山諸人的影響，從而警惕蘇俄援助後面的奪權，不得而知。

鄒魯、林森、謝持三個人無功而返，有一個非常戲劇化的原因，這在蘇共中央檔案解密以後，才剛剛揭曉。即他們三人抵達張家口的差不多同時，正好是由蘇共中央高級代表團和廣州國民黨中央代表團正在與馮玉祥舉行軍事政治會議，第一九九號文件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負責人魏金斯基的報告，該報告一開頭就是：「今天（按：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發此電報，意在向你們通報，由馮玉祥建議在張家口召開的軍事、政治會議的成果。會議參加者有：國民黨軍方面的兩位將軍，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的三名代表，還有我們兩人。這次會議，一方面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政治委員會，對馮玉祥及其近時最近擴大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國民黨軍同奉張衝突不可避免，軍事形勢一觸即發使然。馮玉祥還是首次召集這樣的會議，顯然很重視它，因為無論是徐謙（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委員，馮玉祥顧問）還是劉驥（國民黨參謀長），都提出了具體而又急待解決的問題，他們毫不諱言，把所有棘手的問題和矛盾都擺了出來。值得注意的是，馮玉祥是把我作為我們機構的代表而正式提出邀請的。不言而喻，這次會議是極為保密的，除馮玉祥和委員會的人外，誰也不知道任何消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一九九號文件）保密的確是成功的，保了大半個世紀。知道了這次會議，對於馮玉祥的態度就不足為奇了。

馮玉祥在軍閥圈子中就一直以「倒戈將軍」著稱，他也曾加以辯解，可是在辯解以後一年多，他乘汪兆銘武漢清黨，又背叛扶植他起來的蘇俄——中共，然後再隨利益而改變其政治態度。西山會議的元老欲以道義打動他，當然是枉然，他重在具體利益所在而不在道義。企圖聯絡馮的意圖還沒有表達出來，就無功而返北京，這正是西山會議沒有軍事強人的勢力支持，而只有救黨主張的特點的開始。

現在從邵元沖的日記，反映在上海的另外一頭的會議準備情況。十月三十一日：「電季陶，詢到滬

及赴京否？函楚儉。覆孫文主義學會長函。」十一月一日：「晚接滬電，知季陶、玄廬均已抵滬，促予速赴滬共商，乃定明日行。」十一月二日：午後八時頃抵滬，寓大東旅館。旋探得季陶等均在汝爲寓會談，乃同至彼，見季陶、劍侯、理明、哲生、楚儉等均在，因討論京中開議辦法，議案分爲黨務、政治、軍事、宣傳等各種，先討論大綱，再及其他細目。」三日：六時頃至汝爲處，晚再會議，到會人數同昨，對於議案有更詳細之討論。」四日：這批中央委員再討論之，並於六日登輪船北上。

由中央執行委員林森、石瑛、居正、石青陽、鄒魯、戴季陶、邵元沖、葉楚儉，和監察委員張繼、謝持、吳敬恒，候補監察委員茅祖權、傅汝林署名，在十一月十六日發出銑電：「決定於本月梗（二十三日）日在總理靈前開正式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這就是召集西山會議的正式通知。

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共有二十四人，胡漢民在國外，熊克武被扣，楊希閔已經被除名（由中共黨員林祖涵遞補）並且因爲會議主題是解決蘇俄——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控制問題，所以中共黨籍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林祖涵自然排除在外，中央執行委員一共還有十八名。那時在北京的反共中央執行委員有林森、鄒魯、石瑛、石青陽，監察委員有吳敬恒、張繼、謝持，如今上海上了中央委員戴傳賢、葉楚儉、邵元沖（遞補張靜江，因病）、沈定一（遞補廖仲愷）、覃振，加上暗中支持會議的李烈鈞，會議人數已經基本成型。並且他們北上的時候已經將會議的有關議題帶上，所以謝持在他們到達以後的當天日記記載：「季陶、理明、元沖、玄廬、楚儉到北京，晤談極愉快。」

到達北京的五位中央執行委員，加上北京原來的四位中央執行委員，共九個中央執行委員，佔十八名的一半。居正列名以後，就佔多數了。居正開始並未出席，只是列名，《梅川譜傷》記載其事：「開封轉來電報，要余至北京開會。不應。折回上海，訪許汝爲司令，告以子超、海濱、季陶、楚儉、元沖均到北京種種原因，始知廣州政變，……促余前往，余答以去姑不去，名可具名，汝爲即電北京。」以

居正長期作爲孫先生重要助手的資歷，他的署名很重要。這段記述也說明了並未出席的許崇智，在西山會議籌備過程中的重要性。邵元沖日記也記載一些重要會議的舉行，都是在許崇智的家中。

戴傳賢後來在西山被同志俱樂部的人打了以後，曾經有文章談到西山會議舉行的前因後果：「共產黨爲世界之一種特殊的新組織，自組織言，實爲軍國主義與社會主義之混合體，其組織至嚴密，而手段亦至殘酷，徵之俄國歷史，已可概見。凡一政治團體，無不欲以自力統一者，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一有特殊的歷史性的人群，與一有特殊組織力之黨派，團體相互間及分子相互作用，當然顯出極大之鴻溝。……於是國民黨旗下，反共產的革命派，與分共的非革命派，以及三民主義之正統派，及特別偏趨於民權主義或民族主義之各派，不得已各組團體，而成一極糾紛之局。……月前國民黨之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鄒魯等到京，因京執行部于樹德，糾眾拒絕林森等在京部開會。於是林森等聯合在京之執行委員，電請各地執行委員，到張家口開執行委員會。滬執行部葉楚傖、邵元沖、沈定一、戴季陶等，鑒於一年餘來之糾紛，非求一正當之解決不可，適此時又爲中山先生北上一週年紀念，因決定應召而往，兼藉此時，往視西山陵寢。到京後，適北方戰雲密布，政爭劇烈，葉氏等因主張即在西山靈前會議，因此處完全可以避卻一切時局之關係也。」⑧

這些元老級的中央執監委員，雖然已經被強力脅迫，不能在根據地廣州開會，可是仍然堅持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來解決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問題，解決蘇俄對中國的新的侵略問題。他們是因爲執着於黨內的民主理念？還是因爲缺乏搞陰謀詭計的書生意氣？總之，在人員到達、議題定下以後，預備會議就緊接着舉行了。

註釋：

- ① 《鄒魯文存·黨統問題》第九六至九七頁，鄒魯著，北華印刷局出版，中華民國十九年，北平。
- ② 《邵元沖日記》。
- ③ 《中華民國史實紀要》第六一四至六一五頁。
- ④ 《中國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南京。
- ⑤ 「鄒魯文存」。
- ⑥ 《中華民國史實紀要》第五九七至六〇〇頁。
- ⑦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
- ⑧ 《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出版。

十六、預備會議中的紛擾

在反國民黨人中，意見並不一致。有着馮自由、鄧家彥等不顧策略、不顧後果的絕對反共派；也有着吳敬恒、戴傳賢等的溫和反共派（這些人是越來越反共，後來超過任何一派，主張開殺戒，是蔣介石上海清黨的謀士）；也有着堅決主張從國民黨中清除中共黨員，解僱蘇俄顧問，懲戒汪兆銘，但是仍然將蘇俄——中共作為北伐中的盟友，汪兆銘也只停止黨籍半年，在二者之間的國民黨人。

在中央執監委員會正式開幕以前，一共開了四次預備會，也稱為談話會。預備會期間出現了嚴重的紛擾，幾乎影響到會議的成敗。

十一月十五日開第一次談話會，謝持日記記載：「稚暉來，開第一次談話會。」邵元沖日記記載：「午後開談話會，列席者余及稚暉、子超、海濱、理鳴、季陶、楚儉、劍侯、慧生、詠薰、沐波諸人。又溥泉來，以齒疾未癒，少坐即去。座間討論籌備開會手續，並督促各委員速來，兼討論議案大體，六時頃散會。」這次並沒有任何特殊的事情發生，但是吳敬恒和張繼參加會議，使會議加強了影響。

十一月十六日開第二次談話會，謝持日記記載：「開第二次談話會。晚返京晤稚暉、石曾。」邵元沖日記記載：「午後在旅社繼續開籌備會，決定本月二十三日，在總理靈前開全體會議並通電召集。又石青陽、傅沐波謂鄧孟碩要求出席，眾謂鄧因詆毀總理遺囑問題，業已除名，在此時萬難再認其有候補委員資格而許其出席，因予否決。晚與傅沐波談北京青年狀況，又與季陶、劍侯等猜詩謎並作函。」這一天否決了鄧家彥的開會要求，而有後來的大紛擾。次日紛擾已經開始：「午後有馮自由及鄧孟碩派來

之江偉藩等六七人來旅社，意圖滋擾，余拒不見，由劍侯訓斥而去。」本來都是反對蘇俄——中共的國民黨人，馮自由和鄧家彥也都因此被除名，當然有怨氣。但是在舉行會議前的很關鍵的時候沒有能夠傾聽他們的意見，不能夠團結起來。不僅如此，日記中反映邵元沖、沈定一還粗暴地對待他們，而訓斥者才是剛剛脫離中共不久的中共創黨人之——的沈定一。而參加會議者也有戴傳賢，戴雖然已經是傑出的反共理論家，但是他是最早翻譯蘇共領袖之一的考茨基的著作，與陳獨秀一起創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中共創始人的陳公博和周佛海都曾記載戴參與了中共建黨的初期籌備活動。由此可以想像被開除、被訓斥者回去以後的激怒的情景。這就埋下了後面的紛擾。這次談話會吳敬恒沒有參加，他的最密切的夥伴之一的李石曾身在北京，竟然也沒有參加。這也可以顯示吳敬恒參加談話會的勉強。

反共黨員之間的分裂，始於孫先生去世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的時候，因為修改選舉法問題，居正、謝持等已經與戴傳賢等的欲走中間道路的中央委員之間爭吵，不歡而散。爲了顧及分裂的大局，居正、謝持等都沒有出席在廣州續開的第三次全會。由戴傳賢主導的這次會議，竟然通過了有利於共產黨在國民黨內橫行的選舉法，還明確地處置了馮自由、江偉藩等反共黨員；戴傳賢曾經津津樂道之作是，採取不左不右、不偏不倚的中道，忘記了所謂左派後面有着外力蘇俄，蘇俄進行擴張的國家利益，使得國民黨與中共的調和不可能進行。因此保持聯俄容共政策的決議對中共有利，蘇俄——中共以繼承孫先生遺志爲藉口，繼續進一步擴大其篡奪權力的陰謀。試看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二五年五月《民國日報》上正式發表的《對時局之重要宣言》中說：「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唯蘇俄始克當此稱。去歲本黨對於中俄協定已表示此意見，蘇俄一方取消歷來中俄間所締結之不平等條約，重定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一方扶助中國民眾從事於廢除一切不平等之運動……。」從這會議開始，被趕出國民黨的馮自由等人對實際包庇蘇俄——中共的戴傳賢等，意見就加深了。如今戴傳賢等人步馮自由

等的後塵也來反對蘇俄——中共，卻對因此原因被開除出黨的人繼續排斥，當然就會引起馮自由等人的堅決反對。更何況戴傳賢是中共的前身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的創始人之一，而沈定一雖然曾經是老國民黨人，但是才從中共組織退出不到一年，於是，一切就對着他們而來了。

十一月十八日謝持的有關日記：「上午開談話會定大綱。」邵元沖記載：「午前九時至十二時會議，討論定現在之談話會爲第四次全體會議之籌備會，並準備應提出之提案等。」這次會議由吳敬恒任會議主席，是會議擴大參加者的一成就。

十一月十九日的謝持日記：「上午十一時頃，多人來旅社叢毆戴季陶、玄廬，且挾之馳赴北京，遂終日擾擾矣。偕楚儉、元沖返北京營救戴、沈，四時聞戴沈已安全返香山，我與楚沖又返西山。季陶、玄廬言今日之事，十有八九皆真爲黨者，搗亂者不過十一。遂決定不與計較矣。」

當天的長篇邵元沖日記摘要如下：「十時後聞外間來多人求見季陶、劍侯，余初不甚理會之。嗣聞前庭喧聲甚厲，乃趨出觀之，見江偉藩率兇徒二十餘人，持手杖等正在指揮攢擊季陶，劍侯時已爲兇徒等掖上汽車，季陶抱樹痛哭，衆仍欲掖之使去。余勃然憤，因趨前引季陶入室，兇徒等乃以一部份追季陶，一部份則圍毆余……，兇徒乃挾季陶、劍侯登汽車（凡三輛）電馳而去。余顧同舍者只慧生在，因與商援救季陶、劍侯辦法。……已而楚儉及傅沐波歸，共籌無計，因偕楚儉、慧生入城，……正徬徨間，接鄒海濱電話謂，據香雲旅社電話，季陶、劍侯已返旅社云云。聞之疑喜參半，乃亟偕楚儉、慧生歸，晤季陶、劍侯，見傷情尚不甚劇。又據分述謂，彼等上車以後，江偉藩、王亞樵等已力表歉沈，作種種之解釋，旋進城至菜市胡同四十七號同志俱樂部，該處徒衆，對於處置季陶等問題所見各歧，或主拘禁，或主釋放，爭辯甚喧，卒之主釋放者勝利，乃決送季陶等歸。季陶謂，今日之事，已爲衆所注目，宜撰一新聞登報，表明誤會乃宜。衆因請季陶草一宣言表示對共產黨之態度，復由王亞樵等送季陶、劍

侯歸寓云云。余等因謂，若明日報紙能照季陶所草之新聞登載，則可證彼輩已有覺悟，否則，前途尚未可樂觀。……」參與其事的王亞樵，就是後來全國聞名的暗殺專家，使得蔣介石和戴笠長期頭疼不已。

參與其事而居幕後的鄧家彥在幾十年後說：「一日，安徽退伍軍人王亞樵，率眾趕往會場，打邵元冲耳光，復綁戴季陶。事後王等來與余商量，余頗不以為然，且囑彼等從速釋放戴季陶。從此西山會議派多對余銜恨，彼等誤信此舉為余所指使者。其中居正、石青陽對余尚無甚惡感，林森亦能諒解。而戴季陶恨余最切，葉楚傖等對余也始終不諒。」②第二天謝持的日記記載有關鄧家彥如下：「午後我應青陽之召，還京與孟碩談話，孟碩為人及其見解，殊使我失望也。」謝持沒有記述具體使他失望的為人之道和見解，但是幾十年以後鄧家彥對謝持等西山會議人物，不忘記大加撻伐：「西山會議為謝持所發動。謝持為該派中之頭腦最糊塗者，彼竟表示：『反對赤化是應該的，反共則不可。共產主義為一種學術思想，可以研究。』彼竟不知，『赤』與『共』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總理在世之日，亦曾責罵謝持之低能。此次大約得到廣州第一軍方面之金錢方面的支持，便以此拉攏戴季陶、石青陽等窮困潦倒之黨人，在西山總理靈前開會。（蔣公率領第一軍在粵從未顯然反共，但從事戒備而已。）聞其在開會時嘗以手指左方曰：『左的在這邊』，又一指右方曰：『右的在這邊』。可見其立場矣。西山會議雖然標榜反共，可是是非不明，敵我不分，且傾軋爭鬭，自壞長城。林森有言：『余與孟碩私交雖篤，但余同意謝持之主張。』」③鄧家彥因為謝持反對共產主義赤化中國，但是可以研究的主張是「糊塗」和「低能」，可是如果不能研究清楚又怎能有力反對呢？而且他說從第一軍軍長蔣介石處得到贊助，是毫無根據的，蔣介石與戴季陶從來極為親密，哪裏需要通過開會來轉彎給錢呢？一切歷史記錄都說明蔣介石不可能給錢；西山會議是否如他說是「是非不明」等一錢不值，歷史已經有公斷。反共的鄧家彥，當年組織人員來痛打和綁架戴傳賢、沈定一，破壞西山會議的舉行，在幾十年以後又如此談話，讓人不明白其

中原因。幸好邵元沖的日記記載了他被西山會議諸人拒絕他參加的事情，又有謝持的日記對他見解和爲人的評價，才找到原因所在。

戴傳賢緊接着發表了針對此事件的《國民黨中反動劇之一幕》，敘述了他所經歷的過程：「十九日午前十時，忽然有數十人各攜手杖手棍，分乘汽車三輛，到西山香雲旅行社戴等寓所，戴氏及沈劍侯兩氏出見，數十暴客，始則棍棒齊下，將戴沈兩氏兇毆，滿身皆傷，然後擁上汽車，攜至城內菜市口胡同三十七號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同志俱樂部者，今春馮自由彭養光等所發起，以反共爲號召而發起之一團體也。……今年春間，馮氏四方造謠，謂戴氏爲共產黨……。關於沈定一氏之態度，彼於被擄之中，曾發表一文，述其態度。某君云，沈氏在事實上，早已完全脫離中國共產黨，其所以脫離之原因，由於三點。一則因爲沈氏主張以移民政策，解決中國之人口問題。二因彼反對單純之階級鬥爭。三因彼贊成戴氏所主張國民黨重要職員，不得跨黨之意見，且在社會關係及政治的地位上，沈氏亦絕無與共產黨合作之可能。此次馮自由輩，利用社會公眾之無知，藉沈氏曾爲共產黨發起人之一，事肆其反宣傳，計雖甚巧，而真正之事實，究不能終掩。」④

第二天，戴傳賢夫婦及沈定一、葉楚傖、邵元沖等先後離開西山進城居住。據邵元沖日記：「見各報載昨日之事，仍多藉口共產，肆行詆毀，因知彼兇徒，實故意張大其辭以博當局之聽聞，以邀寵及報酬者。季陶恐此後危險愈多，乃決定明日赴津。」會議還沒有開始，一場反共黨人之間的衝突，就把好不容易形成的集會給打散了。戴傳賢、邵元沖、葉楚傖三人從此再也没有回到西山參加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正式會議，爲後來蘇俄大使館把他們拉過去埋下伏筆。

戴傳賢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即西山會議正式開始的那一天在天津登輪船南下，在十二月十三日發表從此不過問政治的《解除政治職責電》，「聲明不再任政治黨務責任，且不再從事政治的行動及言

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九七八頁）問題在於這封「不再從事政治的行爲及言論」的電報主要是發給廣州執委會和上海執行部，這本身就是對於中共和汪兆銘控制的中央的直接承認，而否定另立中央的剛剛才開始的西山會議，這本身也是一次鮮明的政治的行動。在同一天，發表宣言解釋他爲甚麼要「解除政治職責」？他沒有一辭一句譴責中共和汪兆銘的不當（與他三個多月以來的政治主張和在北京的主張不同），又回到他的「不左右傾」的中道，聲言作不到這點，對政治就無能爲力。在同一天，又發出了給他的摯友蔣介石的那封「不左右傾」的長信，蔣介石那時候是汪兆銘——中共的廣州中央的主要支持者。信中說北上參加西山會議，「除完全爲朋友之情誼所動外，不能發現一必要」，並且敘述了他的政治觀點，以及在北京挨打的經過：「及至前月初，子超、海濱以京部糾紛爲動機，發電召集第四次全體會議，滬上同志又再四相促。弟當時曾明言曰，我之北行，除完全爲朋友之情誼所動外，不能發現一必要。及到京後，弟與楚傖、元冲、劍侯數次訪問稚暉先生，弟以此次之會議如與其有成，必須以稚暉先生之意爲從違，且以之爲中心，故決定絕對不發表意見。及預備會議稚暉到會後，細述其意見數小時，弟等四人皆決定以此爲意見爲標準。稚暉所主張，對精衛爲勸告，而勿爲彈劾；對共產黨之同志，宜邀守常等爲切實之協商，而勿使爲片面分裂之行動，弟等四人皆承認之矣。而其翌日，遂發生一大橫逆，突來數十人，不問皂白，痛毆弟與劍侯至大創，又挾至同志俱樂部相威逼，其原因爲何不得知。然事出之後，所謂同志者，竟無一人來相慰問，以此前後因果相追尋，則他人之視弟等何如，亦可得而知。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非有極端右傾者之卑劣的暗殺行爲，不能造出精衛之極端左傾政策；非有精衛之極端左傾宣言，不能造出此極端之右傾行動。欲固執一中庸正道，固執於兩者之間，使此有數十年歷史之黨，不至完全化爲反革命，或化爲共產黨，以維持此過渡時代之中國，如我之所主張者，斯誠爲至愚，乃至愚不可及。」⑤

合。

但是，也許因昔日的條件限制，有的著作中把戴季陶作爲西山會議的發起者和領導者，與事實不合。

根據邵元沖日記，林森、鄒魯在九月二十三日到達上海時，到月底謝持、鄒魯、林森等離開上海，戴傳賢都不在上海：做出由林森、鄒魯、謝持上北京籌備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決定，戴不在場，邵元沖日記記載：「午前與子超、慧生、海濱討論黨務補救辦法，決由三人分別北上邀各執行委員及監察委員來滬籌商辦法。」謝持離開上海的當天，據邵元沖日記：「三時頃至慧生寓，與子超、海濱、慧生、理鳴、楚儉、哲生會議黨事。」仍然沒有戴傳賢。謝持日記中有關黨務的幾次協商也都沒有戴。直到謝持已經起程赴北京的次日，即九月二十九日邵元沖日記記載：「接玄廬函，謂將赴湖州約季陶來。」過了一月，即十月三十一日，在南京的邵元沖「電季陶，詢到滬及赴京否？」證明這時候戴仍然在湖州，到了西山會議舉行的當月一日，邵元沖「晚接滬電，知季陶、玄廬均已抵滬，促余速赴滬共商，乃定明晨行。」到二月二日，才有記載戴傳賢參與商量黨務，六日，戴傳賢就與邵元沖等登輪船赴京了。所以發起西山會議的人中沒有戴傳賢，他自述只是出於朋友之情而赴北京被動地參加西山會議的說法是真實的。戴傳賢在西山會議剛剛閉幕不久，即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的《對鄧演達報告的聲明》中，非常明確地說明他不曾參加西山會議的籌備工作：「關於西山會議的發起，本不是我的發起，我接到召集電的時候，並不是很高興去。但是看見黨中這一種左右傾現象，一則也要求一個方法來解決，二則對於許多朋友的感情上，實在卻下不去，所以不得已到北京去走一趟。」戴傳賢參與發起西山會議的說法見於許多重要書籍和文件，又見於重要的工具書《中華民國史實紀要》。如前所述，戴傳賢在理論上對共產主義的批判是強有力的，對孫文主義的闡發是有創造性的，但是在具體政治活動中，從孫先生在世時候的「彈劾共產黨案」，到西山會議的舉行，以及和蘇俄——中共的種種正面對抗中，如他自述，他始終站

在調和立場，甚至做出有些有利於中共的事情。

戴傳賢給蔣介石的信中所敘述的吳敬恒的溫和觀點，基本是過去的調和觀點的變形。邵元沖到北京參加西山會議以前的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記，那時候廣州的政變剛剛發生，「張靜江抱極不安，謂欲親至粵謀消泯意見及切實進行之法。」張靜江與蔣介石的關係是眾所週知的，現在蔣介石是廣州政變的主要發動者之一，張靜江不像其他國民黨人表現出憤慨，而是複雜的「極不安」，不是反對，而是「消泯」、「調和」。而張靜江若干年以來，從來與吳敬恒、蔡元培、李石曾政治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在政治上從來反對蘇俄——中共的吳敬恒，卻在北京主張溫和，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給蔣介石的信件中，戴傳賢懷疑同志俱樂部的人辱罵他，是因為頭一天吳敬恒的溫和發言，挨打以後「所謂同志者，竟無一人來相慰問」，然後「以此前因後果相追尋」得出了結論。這一說也被史學家所廣為採納。但是也「根據前因後果相追尋」，為甚麼不去打作長篇發言的吳敬恒，而要綁架毆打附和者戴和沈呢？並且根據邵元沖和謝持的日記，參與營救的有葉楚傖、邵元沖、謝持（當時只有他們三人在旅館），鄒魯也有電話報告情況，哪裏是無人慰問呢？並且戴、沈事後都說「十之八九皆真為黨者所為」，但是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卻懷疑是吳敬恒的溫和的發言引起，暗示是參與會議者聯合同志俱樂部的陰謀了。根據邵元沖的日記，很可能是開會之前的十六日，鄧家彥的要求出席會議被拒；十七日馮自由、鄧家彥派來的江偉藩的六、七人被沈定一訓斥，邵元沖也拒絕接見，而引起同志俱樂部的報復。報復對象是有弱點的、曾經與中共有瓜葛的戴、沈二人。

戴傳賢因為他的幾篇長文章開罪於中共，被中共打入「五鬼之一」，因而在政治上被逼入反共陣營。但是他在給蔣介石的信中關於左右派的沒有是非的互相激盪說，與事實是不符合的。當時的政治問題是蘇俄通過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中共）在中國以反對帝國主義為名侵略中國，在中國破壞社會根基而

大搞階級鬥爭，並且乘孫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而控制國民黨的黨權而引起。這不是國民黨內簡單的政治上的左右兩種觀點的不同。但是戴在一切事實都已經很明白以後，仍然在這裏將所謂左右派都對等加以譴責，固守所謂「中庸」，實際上這是他在政治上長期的搖擺不定的繼續。戴認為他的中庸如果不能够實行的話，就只有「反革命」和「共產黨」兩途，按照這說法，蔣介石的上海「四·一二」清黨之後，也就在「反革命」的路途上了，而且戴從此終身為「反革命」了。

暫時溫和反共的國民黨人中分成兩批：一批是在法國的時候就以信仰無政府主義出名，常常聲言不做官，以國民黨的「清客」（胡漢民語，見《革命過程中的幾件史實》）自居的張靜江、吳敬恒、蔡元培、李石曾等國民黨元老組成。他們後來在汪—蔣—中共聯合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全部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他們也是蔣介石上台以後，老國民黨人中唯一支持蔣介石的群體；一批是曾經欲走中間道路的戴傳賢、葉楚傖、邵元沖等，他們後來經過蘇俄大使館談話以後，竟轉而支持中共和汪兆銘主持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或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擔任其它要職。他們全部都是江蘇人或浙江人，也許不自覺地形成一個無形的小集團。戴傳賢祖籍浙江湖州，祖父是筆客，入川落戶成都北面的廣漢縣，故戴生長在四川。但結識了蔣介石、張靜江等浙江人以後，戴以浙江人自居，平日講浙江話。

關於吳敬恒等所謂國民黨的「清客」，他們以無政府主義而附和三民主義。吳敬恒說：「庶幾乎急急廣傳無政府主義，使知世界之人民，不久將有大同革命，而國界且將消滅，故共和政治，已止為不得已之過渡物，斷不容世界尚有皇帝。蓋無政府黨欲毀滅世界之政府，因而尚未能確定其日期。……於是推倒滿洲政府固當毫無遲回，即建設共和民政，自必目為平常矣。所以欲堅決國民黨之責任心者，莫若革命黨皆播無政府主義。」他們以當時的社會影響擁護孫先生，對孫先生的革命事業有相當的幫助，特別是張靜江，曾經有將財產變賣送給孫先生的事跡，已經傳為佳話。但是，因為他們很少直接參與非常

艱難的孫先生的事業，沒有參加黨務運作，所以他們並不常常和孫先生保持一致。陳炯明叛變以後，公開譴責孫先生而為陳炯明說話的，就有他們。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因為蔡元培和北洋政府的關係密切，有代表反對他擔任黨的職務，後來由孫先生親自出面，使得蔡元培當上候補監察委員。孫科曾經說道：「我們跟總理在廣東奮鬥時，何曾見過這些人的蹤跡。有之，就是吳稚暉為替陳炯明說項而來粵，李、蔡曾到廣州一逛，張靜江雖然曾在廣州做過事，但不過為蔣氏的工具罷了。」⑦他們缺乏在國民黨中長期奮鬥的經驗，缺乏在廣州的革命營壘中感受鮑羅廷——中共擴張而被排擠的滋味，更沒有經歷政變中受到的壓迫和危險，這就使得他們對廣州被鮑羅廷——中共把持的局面，缺少切膚之痛的感情，使得他們對於鮑羅廷——中共在中國的企圖缺乏必要的認識；使得他們對於汪兆銘在孫先生去世以後，已經變成一個為了追逐權力而不擇手段、哪怕從根本上損害國民黨利益的行徑，仍然居於旁觀者的立場；最重要的是，與他們最親密的蔣介石正在廣州平步青雲。這大概是他們想要調和的原因。

戴傳賢等四人在二十日離開西山以後，二十一日談話會改在鄒魯、林森的駐地竹竿巷舉行，據謝持日記：「談話會未成」。推測是吳敬恒等未到會，因為邵元沖日記記載：「午後楚儉來，因同訪吳稚暉，徵詢其對開會之意見。彼謂開會與否及開會能成與否，比較上均為小事，主要者，仍在吾人之能團結舊同志及自動地負責奮鬥，乃有可望云云，談時許別。」所以邵、葉都沒有出席在竹竿巷的談話會。但是邵元沖和葉楚儉仍然參加了二十二日在商品陳列所的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為二十三日的第四次全體會議做好了準備。邵元沖日記記載：「午前楚儉、劍侯、海濱、慧生來談，並同至商品陳列所會談明日第四屆全體會議在香山開會事，又以明日或有兇徒等來繼續肆擾，乃定於清晨八時即前往行禮，禮畢即至青陽寓開會，其主要議題為（一）與共產黨實行分離，（二）遷移中央黨部至上海，（三）糾正政治委員會權限，（四）修改選舉法等。三時頃散。」謝持的這一天日記很簡略：「集會於商品陳列所，午後赴香山。」

大概爲了防止同志俱樂部的人騷擾，大家都到香山居住，以便第二天一早就在孫先生靈前舉行開幕典禮。

邵元沖覺得議題已經定下，大家共同負責，會議已經流於形式，無到會必要，決定在開幕的當天離京赴天津；葉楚傖則參加了開幕典禮，根據《清黨實錄》的會議錄，葉楚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第二次會議擔任記錄，他當在月底離開，因爲從十二月一日的第三次會議起，他再也沒有參加，他後來的信件中說，他接受了吳敬恒的勸告。謝持二十一日日記記載：「竹竿巷談話會未成，訪稚暉。」謝持這次訪問吳敬恒肯定碰了壁，因爲在十八日作爲預備會議的主持人的吳，不僅僅從此沒有參加正式會議，而且在一切文電宣言中，都沒有署名。與那時還沒有抵達北京的居正完全相反，居正在第一個文件中署名，而且立即參加了各項文件的制訂。

這裏有一個問題。根據《清黨實錄·會議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時間：十一月二十一日。地點：西山碧雲寺。出席人：茅祖權、葉楚傖、居正、張繼、戴季陶、石瑛、沈定一、邵元沖、鄒魯、林森、覃振、石青陽、謝持、傅汝霖」。會上通過了十四項議案。但是對照謝持、邵元沖的日記，由於十九日的紛擾，二十日「季陶恐此後危險愈大」，就與邵、葉、沈等先後進城，所以不存在二十一日他們在西山碧雲寺開會的事情，並且居正那時還沒有抵達北京。並且第一次會議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舉行的，而不是二十一日。爲甚麼會有這一系列「錯誤」呢？離開了的三個人和居正都同意在各項文件中署名，所以故意將二十三日的第一次會議日期在《會議錄》中寫成二十一日，因爲離開西山碧雲寺的人那時仍然在北京，都寫成「出席者」，以顯示陣容的强大。這可能是居正等編輯《會議錄》的一片苦心。

他們的離開，博得汪—蔣—中共的歡迎，後來汪兆銘在廣州的「二大」上報告說：「戴季陶同志到京後，發覺了鄒魯等想推翻國民政府的陰謀，及遇着馮自由、江維藩那班人的搗亂，故第二天就離京回

上海，其餘邵元衝同志等也陸續南下。……戴季陶同志他就跑回上海，不久就寫了一封信給吳稚暉先生表示懺悔，並辭了一切黨的團體和職務，現在痛苦非常，甚至哲生同志去看他的時候，他對哲生同志說，『你們還當我是一個人嗎？』就是葉楚傖，他在給信人家的時候，說《民國日報》做極反動文章的時候，他並不在報館而回家去的，所以不知道。」⑧這其中還說明，吳敬恒雖然主持了西山會議的談話會，私下又表示「中間」的調和立場，實際上和廣州通氣，所以戴傳賢給他的私人信件汪兆銘也知道。另外，西山會議的籌款人、孫中山先生還在世時，就在廣州市長任內進行反共的孫科，也是如此。在經過干擾以後，三個人前後離開了北京。中國國民黨第一屆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在干擾中，在十一月二十三日拉開了帷幕。

註釋：

- ①上海《民國日報》，五月二十九日。
- ②《鄧家彥先生訪問記錄》第七二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台北。
- ③同上，第二一頁。
- ④《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九七七頁。
- ⑤同上，第九八五頁。
- ⑥《吳稚暉先生選集》下冊第二二七頁，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出版，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台北。
- ⑦《討蔣言論初集》第三七頁，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非常會議編印，中華民國二十年，廣州。
- ⑧《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第九八頁、一〇四頁，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印行，中華民國十五年。

十七、幾個主要文件

中國國民黨第一屆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是黨的會議，其一切宗旨就是爲了恢復國民黨自身以孫文主義爲基礎的生命力，恢復最高權力機構中央委員會的職能，恢復中國國民黨對於國民革命的當然領導。爲此，就必須清除以聯俄容共爲名，而奪取國民革命領導權力的中國共產黨出國民黨，就必須解僱蘇俄顧問鮑羅廷的職務，就必須開除與鮑羅廷——中共狼狽爲奸的汪兆銘出黨，就必須重建真正以三民主義爲指導思想的中國國民黨。這次會議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開幕，到一九二六年的一月四日結束（中間因北京戰局影響而曾休會），一共制訂和通過了十四個議案以及若干附件，制訂和發表了幾個通電、宣言、告同志書和駁斥汪兆銘等函電。若以內容來劃分，可以分爲四個方面，但是各個方面之間緊密有機相連：

第一方面：以《取消共產派在本黨之黨籍案》爲中心，包括以下文件：《開除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之共產派譚平山等案》、《總理逝世後關於反對共產派被開除者應分別恢復黨籍案》、《中國國民黨宣言——取消共產派在本黨黨籍》、《爲取消共產派在本黨的黨籍告同志書》。

第二方面：爲清除俄國人對最高權力機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霸佔，包括以下文件：《顧問鮑羅廷解僱案》、《決定本黨此後對於俄國之態度案》、《取消政治委員會案》。

第三方面：開除與鮑羅廷——中共沆瀣一氣的汪兆銘，包括如下文件：《開除汪精衛黨籍案》、《附開除汪精衛黨籍案之判決書》、《通電否認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一六次之三項決議案》。

第四方面：恢復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能，並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包括如下文件：《修正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法》、《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日期及地點案》、《發登記證條例》、《發給海外各級黨部黨證手續案》、《中央執行委員會暫移上海案》、《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各級執行部議決緊要事件相互關係之規定案》、《規定預算原則》、《規定指導員職權案》、《補助各級黨部經費條例》。

關於第一方面：根據《清黨實錄·會議錄》^①，在十二月二日的第四次會議決定：「發表《取消共產派在本黨之黨籍案》，並電達上海執行部及國內外各級黨部，《取消共產派在本黨之黨籍案》今日公佈。」《取消共產派在本黨之黨籍案》全文如下：「本黨總理允許共產黨分子之加入，謂其能以個人資格而信仰本黨主義，在國民革命進程中努力於本黨主義之宣傳與工作也。共產黨員於當時亦屢次聲明係以個人資格加入，為本黨主義而奮鬥，非以共產黨黨團加入而於本黨中別起作用。乃兩年以來，凡共產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在本黨中一切言論工作，皆係受共產黨機關決議與指揮，完全為共產黨之黨團作用。本黨黨部及黨員曾與再三以愛誠之意糾正之勸告之，冀其勿負加入之初衷，終無效果且益發展其不利本黨之行爲，此皆有文字事實可證。在共產黨忠於共產主義，原無足責，然既加入本黨，則其於本黨主義與本黨黨務，本應盡忠實之努力，此乃黨中紀律與夫為黨員者之德性義務責任等絕對不容寬假之事。今共產黨員則一切不顧，唯彼黨之是謀，本黨有維持本黨發達之義務，自不容黨中有黨。為此決議將共產黨員加入本黨者，一律促其退出本黨，庶兩黨黨員之旗幟，劃然分明，各為其黨之主義而奮鬥，此革命黨人應有之特性也。蓋與其勉強合之而使兩革命團體因內部問題而決裂鬥爭，致妨礙國民革命之發展，何若分之使各得專意於革命工作，且於國民革命進程中遇有共同之點，得以妥商合作之為愈也。此種決議，完全出於善意，非僅圖鞏固本黨已也，實為免除兩革命團體因內部問題相消其革命力，而求

國民革命之得到成功。」由於蔣介石、吳敬恒等後來領導的上海「四·一二」武裝清黨，是以殺戮共產黨人開始的，從此以後國共間的戰爭就沒有真正停止過；並且西山會議的元老們主持的上海中央黨部也在那時被蔣介石命令查封，所以對於西山會議以上的和平分共原則，以及諸多史實，從來或篡改，或隱瞞。讀一讀這著名的文件的原文，可以知道，取消共產派的黨籍是由於共產黨之非，取消措施是不得已的，文字間充溢着分後各得其所，以便共同北伐的善意。

根據這決議案，在同一天通過了《中國國民黨宣言——取消共產派在本黨黨籍》。該宣言的基本精神相同於決議案，但是進一步強調「中俄之歷史不同，社會之狀況亦異，國民革命與階級革命，勢不並行」，這歷史文化和主義的差別，加之中共在國民黨中的所為，使得兩黨宜分不宜合，即「實理勢所不得不分，而情誼未始不可合也」。

以上兩個文件在會議開幕的第一天通過，到十二月二日才正式發表（據謝持日記）。而在發表的同一天，會議通過了《開除中央執行委員之共產派譚平山等案》，指名將佔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的人開除，他們是「中央執行委員譚平山、李大釗、于樹德、林祖涵及候補中央委員毛澤東、韓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張國燾」。

可是由於鮑羅廷——中共和汪兆銘對於西山會議的一系列溫和的勸告和善意的和平分手的建議，採取激烈的反應，所以在會議閉幕的時候發表的《為取消共產派在本黨的黨籍告同志書》，不僅僅在道理上有着更系統、更周全、更深刻的說明，而且在語氣上也更嚴厲。這篇大約有九千字的文字分爲五個部份：

一、從國共兩黨的基本理論上區分：「孫先生為要實現三民主義革命，當然是全國民眾的革命——不是階級革命，或其他非全民的革命，那末本黨不容黨員有違背本黨的主張而鼓吹階級革命，更不容共

產黨利用本黨的招牌來鼓吹階級革命，是可以斷然決定的。同志們，須要知道單就中國共產黨人在本黨污蔑挑撥的事來說，已屬不能准其長久混雜在本黨裏頭，況又利用本黨的招牌來鼓吹他們的階級革命，又陰謀破壞本黨，所以本黨取消他們在本黨的黨籍是絲毫無可遲疑的。……孫先生在演講民生主義的時候，曾經不厭其詳地把自己的民生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分析得清清楚楚，兩個主義的出發點不同，兩個主義實現的方法尤其是不同。……如果有人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來當孫先生的民生主義，我們應當向他們分析得清清楚楚，以免把民生主義的精髓反埋沒了，並且影響到本黨的基礎上，這是三民主義的信徒當肩負起的責任。同志們，如有人在本黨力求實現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的進程中，來鼓吹中國的階級革命，或其他非全民的革命，我們應當向他勸告以致警告，因為三民主義是救中國的唯一主義，國民革命是實現三民主義的唯一的方法。若是一方做國民革命的工作，一方又做階級革命的工作，不但中國現狀底下做階級革命的工作是無病而自灸，並且大大地引起社會的擾亂，阻礙國民革命的進程。我們為促成三民主義的實現起見，也要肩負起這種重任。」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建立他的共產主義王國以後，一再地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並且要「天天講，年年講，月月講」。大搞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白骨成山，幾千萬人成了冤鬼。再對照一下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對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最早進行的批判，就應當肯定這份文件的歷史價值。

二、揭露共產黨分化國民黨的做法：引用了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議完全違背當初的保證，在國民黨內的「左派」中擴大中共的組織，拆國民黨的台，因此用了將國民黨分成左右派的伎倆：「他們所謂左派的，只是一班出賣中華民國和出賣本黨的國賊黨賊，可是從他們口裏發生了一『國民黨左派』的名稱，便使同志們自相猜疑，有的深怕受了右派的嫌疑，多少要幫他們點忙，他們便大得其計；若不墮入他們懷中的，他們便說是右派反革命派，以此中傷同志們，失去覺悟民眾的好感，切斷本

黨向民衆間去的路脈，達到他們脫胎換骨——化本黨爲共產黨的目的，這是何等的陰險呀！」一個政黨之內，總是會有個人野心家，對於形勢發展的看法總有不同，也有一時的糊塗者。因此，站在鮑羅廷的權威立場，進行分化利用完全是可能的。從事實講，鮑羅廷——中共運用左右派的伎倆分化國民黨是成功的。汪兆銘一開始就知道中共加入國民黨，類似孫悟空鑽入國民黨的「肚子」裏，但是他的野心，使得他緊緊地依附於鮑，不惜從根本上損害國民黨。

接着引用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原始文件，揭露中共壟斷中國的農工運動：「本黨因歷史的關係，對於社會是主張改良的。現在中國的勞動階級，雖則也有解決生活的問題，但是屬於一般政治的。如果實現本黨民生主義，這種問題自然解決。共產黨因爲掩護他們的唯一祖國——蘇維埃俄羅斯以自計，要將中國的勞動階級，引到階級鬥爭裏面去；又因爲勞動者是國民中的大多數，大多數國民歸向本黨，他們便失去了在中國的立足點。所以本黨關於勞動方面的工作，如非共產黨員包辦的，共產黨必定千方百計地破壞，甚至殘殺我們同志而不惜，武漢工人遭軍閥殘殺，由於他們告密，便是確實的事證。總之，共產黨不於本黨得大多數民衆的力量，是他們顯然的心理。」

這份全面敘述這次全體會議各個基本內容的《告同志書》，是深知中共的勞工政策者。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石，是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其中對商品的價值解釋，又是基石的基石，認爲其包含必要勞動的多少，決定商品的價值，根本忽略市場因素在商品中的作用。這樣，就製造出著名的剩餘價值說，即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因此，爲工人造反有理製造了口實。還進一步製造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的說法。因此，中共在建黨以後的各次決議中，主張在勞工運動中絕對地排除國民黨，完全壟斷之，以便所有農民、工人成爲其奪取政權的基本力量。這一段非常明白地指出了中共的這一陰謀，並且這一段還以大量的中共文件加以證實。之後歸結道：「同志們：看了他們這種決議案，可以完

全瞭解『左派』、『中派』、『右派』的名稱，是共產黨有意找出來爲他們的宣傳作用。共產黨處處要叫佔國民大多數的農民、工人，只接近他們的黨，而不使本黨接近。同志們：真實三民主義的同志們，看了這種真實的憑據，想來都要『怒髮衝冠』、『目眦盡張』了。本黨還容得這種陰險惡劣的共產黨，盤據本黨中，使本黨的生命發生影響麼？」

在指出「現在國民政府中的參謀團主任、航空局局長、交通總監、艦隊總監、外交部顧問、兵工顧問，以及各軍訓練，全是俄人，軍政大權實已完全在俄人掌握之中」以後，更以五條實例證實蘇俄顧問鮑羅廷等俄國人操縱一切，重複說明「取消共產黨在本黨黨籍」的必要。

《告同志書》用一段又一段的事實，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必須清除共產派出國民黨以後，在結尾部提出根本更改聯俄政策的意見，因爲蘇俄並不是平等待我之民族，而是一個新型的帝國主義：「在國際互以平等相待的國家，當然和他攜手，但是所謂攜手並不是賣身投靠式的，是以平等地位相互協助。如果蘇俄以平等待我，那末本黨當然遵照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若是蘇俄採用帝國主義的手段，那當然也是本黨的敵人。同志們：無論與舊式帝國主義國家或新式的帝國主義聯合的，都是賣身投靠式的聯合，都是軍閥反革命的舉動，本黨本孫先生四十年革命的精神，願獨立地奮鬥，斷不學賣身投靠式的與新舊帝國主義的聯合。」斯大林後來曾經大肆侵略歐洲的許多鄰國，佔領他們的大片土地，但是最早侵略的對象卻是中國。不僅僅在一九二二年派兵佔領外蒙古，還依靠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篡奪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妄圖全面控制中國。這裏大概是第一次被稱作帝國主義國家。

《告同志書》的最後一段，表現出中華民國的這些開國元老們對中國前途的深切憂慮，他們對於共產主義可能危害中國發出了洪鐘般的最早的警告：「同志們，最後要和大家說的，本黨取消共產黨在本

黨的黨籍，是要貫徹以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的宗旨。同志們：如果於共產派脫離本黨以後，不努力投奔革命前程，共產黨和其他本黨的敵人，終得斬斷本黨的生命。同志們：要緊緊記着、時時提醒這驚心動魄的話，方才可以達到革命成功的目的，方才可以慰總理在天之靈。同志們：起來！起來！努力！努力！打倒任何屬性的帝國主義！打倒軍閥！領袖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的確，共產黨在脫離國民黨以後，走向農村，以土地為誘餌，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幾千年來的社會文化根基，危害中國無窮，危害社會無窮，「終得斬斷了本黨生命」。可是，那時發出的「驚心動魄的話」，被後來圖私利的國民黨領導人故意淹沒。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在《傳記文學》說：「《宣言》中所指出的各點，後三十年（按：唐文寫於一九六〇年，指《為取消共產派在本黨黨籍告同志書》）國共關係的發展，亦均不出其所料。國民黨爾後所有的反共宣傳家、理論家，亦未能跳出他們的窠臼。」「『西山會議派』實在是中國國民黨中以反共為號召而組織的第一個『派系』。其組成分子中的領袖人物，可以說是集早期國民黨人才之大成；他們所以號召的理論體系，說是『孫文主義』的正宗，也不算過譽。照常理來推測，西山派在近四十年來的中國政壇上，尤其是在國民黨的反共鬥爭中，似應發揮高度的領導作用。孰知它自始至終一直被黨中的當權派說成是『反動集團』。」①自孫先生去世以後，中國國民黨在幾十年裏長期擔任領導的，是汪兆銘和蔣介石。他們都是依靠鮑羅廷——中共的支持起家，中共也靠他們的支持，才從幾百個人的小黨極為迅速地發展成為席捲全國的大黨。他們對這一段歷史是諱莫如深的。雖然在「九一八」抗戰爆發以後，元老們都開始被尊崇，但是這段歷史就按照當權者的需要書寫，只留下一筆是非顛倒的糊塗賬；西山會議的有關文獻（當然是中國近代史上極為重要的事件，中共的許多史料都以反面教材收入），在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撰的好幾十卷的《革命文獻》中，一字不收，為的是掩蓋真相，逃避將中國共產黨扶植起來的歷史責任。

根據《清黨實錄·會議錄》，在十二月九日的第十一次會議上，由居正提出了因為反對共產黨而被開除國民黨黨籍的人，應該恢復黨籍：「居正委員提議，總理逝世以後，本黨同志中，凡因反對共產黨而不忠於本黨而被開除黨籍者，應分別查明原案，如開除之原因無其它關係或妨礙黨務進行之行為，又被開除後，無違反本黨主義之行為，則宜恢復其黨籍案。」可惜這提案稍稍遲了一點。如果開會前與馮自由等有很好地溝通，就沒有會前的紛擾，戴傳賢等就不會離開，吳敬恒也會繼續參加會議，而他們，與廣州的軍事強人蔣介石有着深厚的歷史關係，西山會議會取得更大的成功。

二、解除俄國人對國民黨中央的霸佔。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竟然被一個外國人操縱霸佔，這是非常不正常而又可悲的事情，居正在《清黨實錄序》中很感慨地說：「黨而至于清，亦事之至不祥者也！愚曾經歷同盟會、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乃至中國國民黨，在黨之失敗或成功期間，分子不免有出入，我黨本主義為號召，以主義為依歸，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從未有以清黨聞。」將共產派開除，將顧問鮑羅廷解僱，是同一個問題的兩方面。

《顧問鮑羅廷解僱案》全文如下：「本黨總理在日，最後之決定權操之總理，即有十百客卿，皆權權自我。總理既逝，政治顧問鮑羅廷竟挾其出席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政治委員會，又利用政治委員會而駕馭中央執行委員會，違背本黨之組織，為之崩亂。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負本黨最高職責，今於取消共產派在本黨黨籍及取消政治委員會兩案決議後，不能容許非本黨信徒之客卿鮑羅廷仍在本黨服務。為此特議決解僱鮑羅廷在本黨之一切職務。」

這裏指出，鮑挾持諮詢機關政治委員會，再利用政治委員會駕馭中央執行委員會，從而篡奪大權的。所以在解僱鮑的同時，通過了《取消政治委員會案》，全文如下：「政治委員會係中央執行委員會所附設一種政治上建議機關也。總理逝世後，第三次全體會議開於廣州時，決議緊急事件該會議決後，

得以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再求追認。其無資格例外與緊急事件，不能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明甚。乃近來政治委員會非緊急事件輒用中央名義發表，甚至關於黨部之事，亦擅自議決，中央執行委員會如其收發機關。而政治上之事，自國民政府以及市政府，事無大小，必須同列議事日程，經其核准，方得實施。凡此違紀越權之事，實與總理成立該會之旨及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完全違背。爲此決議取消政治委員會。此後黨務之決定權，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並指導督促國民政府一切政治上之設施。庶黨政得在軌道上發展，民主集權制的建設，始有完成之日。」

在國民黨的黨內清除共產黨，還要恢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能，恢復這職能就一定要取消政治委員會和解僱鮑羅廷，這是斬斷蘇俄帝國主義對國民黨黨權的直接控制。唐德剛在《傳記文學》上論述這一意義時說道：「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中央政治委員會決議廢除大元帥制，成立國民政府，並選汪精衛爲主席。此決議之通過以及立刻付諸施行之經過，不特中央執行委員會不知其事，連中央常務委員會亦不知其事。成立國民政府是何等重要的大事，而中常會竟被完全抹煞，則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黨中的地位也可以想見了。所以在西山會議中所通過的七條議案，除去鮑分共之外，還要『開除汪兆銘黨籍』和『取消政治委員會』。事實上西山會議活動的主旨不在前者而在後者。他們反對的不止是『廣州中央』容共政策；主要還是反對違背『民主集權制』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這一『制度』，並運用這一機構而擠掉胡『代帥』，卒至身兼『國民政府』、『中政會』、『軍委會』三個『主席』的獨裁者汪精衛。如果汪精衛被趕下台，中政會被取消，中央委員會恢復了黨章上所給予的權力，則『分共』也好，『容共』也好，都不成其爲問題。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傳統的說法，是過分強調西山會議的反共性，而忽略了西山會議派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權力這一回事。所以可以說汪是破壞國民黨內『民主集權制』的始作俑者；而『西山會議』則是在黨內集權而不民主的鬥爭中，被擠掉的一群優秀的領袖。」應當說，開除中

共，解僱鮑羅廷是原則，原則樹立以後，才有組織上的措施，這是結束聯俄容共政策的有機的兩個部份。

三、很自然，蘇俄和中共的盟友和走卒汪兆銘，受到了停止黨籍六個月的處分。根據《清黨實錄·議事錄》，十二月四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的討論事項的第一項是：「中央監察委員會來函，報告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彈劾案。審查完畢，請予解職除名處分案。」根據同日的謝持日記：「議事，中央監察委員會開會，決議除精衛黨籍。」《開除汪精衛黨籍案》只有簡短兩條，全部包括在該決議案的附件之中。以下是附件《開除汪精衛黨籍案之判決書》全文：

案據本黨各級黨部暨各地黨員提出彈劾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案共十一件，經中央監察委員會詳細審查後，議決應予汪委員以解職除名之懲戒。函達本會，當經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判決處分：一、開除汪精衛黨籍六個月。二、汪精衛開除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不得在本黨執政地方之政府機關服務。

汪精衛違反總理容納共產黨歸化本黨之意，與俄人鮑羅廷朋比為奸，擾亂本黨組織，破壞本黨紀律，以致客卿專政，共產黨入攬大權，其事實原委如下：

(一)本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為總理載在總章。總理逝世，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凡稱『總理』不得加『先』字或『故』字，以明總理全部遺教即總理，並杜黨魁之爭。汪精衛在言論上必稱『先總理』，實屬故違決議。

(二)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內之政治委員會臨馭中央執行委員會，予鮑羅廷以操縱本黨中央之權，並操縱國民政府。

(三)廖委員仲愷被戕後，聽鮑羅廷之唆使，放逐中央執行委員胡同志漢民，迫走中央監察委

員謝同志持。

(四)違反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之決議，對段祺瑞、唐繼堯、楊希閔、吳佩孚等各軍閥領袖起妥協運動，且挾鮑羅廷之指使以自重。

(五)共產派之中央候補委員毛澤東派在滬任事，十八個月中請假十四個月，赴湖南各地爲發展共產黨之運動，而汪精衛反任爲中央宣傳部長。

(六)共產黨分別本黨黨員爲左右派，藉施其引拒之術，以挑撥本黨同志之閱牆。因此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爲防止右傾左傾，發有訓令。汪精衛竟順從共產黨人譚平山之指揮，倡言『要革命者向左去』，且師滿清『寧贈朋友』之口吻，公然倡言『寧以國民黨贈共產黨』。

(七)運用陰謀，破壞忠於黨國之軍隊。

(八)凡爲共產派或接近共產派者則擢用之，而抑壓純粹忠於本黨之同志，並縱江蘇省黨部公然通令全省黨員讀陳獨秀、瞿秋白所著之違反本黨主義之《嚮導叢書》，而禁止戴委員季陶所著闡揚本黨主義之著作。

(九)因廣東大學之青年不受共產黨化，汪精衛擅違校章，更易校長。

綜上列各件，汪精衛罪淫叛黨，行同賣國，當處嚴刑，但本黨秉總理與人爲善之誠，決定開除汪精衛黨籍六個月，予以自新，爲此判決如左。

汪兆銘在辛亥革命以前，曾經和黃復生一起有炸滿清攝政王的壯舉，被捕以後，名滿全國。但是在後來反對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艱難奮鬥中，很少出力，也不曾加入中華革命黨。從改組開始，由於大多數老黨人持反對或消極態度，汪一反常態，以最積極態度參與其事，贏得了孫先生的信任；孫先生去世

以後，如以上判決書所指出的，與鮑羅廷——中共狼狽爲奸，以出賣國民黨的利益，以引導國民革命進入左的歧途，而得到他們的支持，並且爬上了最高的權位。以上的處置，言之有據，但是卻不能夠真正地開除他。汪兆銘於是憑藉手中的權力，繼續進一步損害國民黨。可以說，從孫先生逝世到汪兆銘投降日本人做漢奸爲止，沒有一個人像他那樣，一再地嚴重地損傷中國國民黨。

四、開除了共產派，解僱了鮑羅廷，取消了政治委員會，停止了汪兆銘的黨籍六個月以後，自然會有重建中國國民黨的議案，其核心在於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而首要在於中國國民黨黨員的重新登記和選舉新法的制訂。

《發登記證條例》很周詳，第一條是：「自取消共產派在本黨黨籍後，以前黨證，一律作廢。」重新登記和發放黨證的措施，顯然針對中共，不讓中共黨員再有機會進入國民黨。並且在申請登記書上說明，「本人不組織任何政黨，不加入任何政黨」，仍然是限制跨黨黨員的出現。「登記證每千號編一字，以《千字文》編定」，非常詳盡和嚴格。

《修正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法》的第一條的（丙）如下：「取消本黨黨籍的共產派人，不得與於選舉。」第二條的（丙）規定：「總理指派出席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代表，除身故及開除黨籍者外，一律出席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不足三人之省份，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指派之。」以上兩條都是不讓中共黨員出席會議的特別規定。本來，一個政黨，集體在另外一個政治理念不同政黨內去參加選舉，在任何國家都會是荒唐的事情。但是在那時，中共黨員利用個人身份加入後，實際集體從事黨團活動，搞垮對方。不讓中共黨員參加選舉，卻必須作特別的規定，可見那時是非顛倒的程度。

在具體的組織方面，只有《中央執行委員會暫移上海案》是執行了的，全文如下：「查中央執行委員會爲本黨最高黨部，其駐在地點，自應擇於對於黨務進行最有關係之處，以便指揮促進，不宜囿於一

隅。總理在時，對於最高黨部之駐粵駐滬，皆因需要而決。現在吾黨主義漸有由南而北之趨勢，而北方之民衆，及青年軍人，自總理北上以後，亦漸爲本黨主義所感化，則吾黨於此時努力北方黨務工作，實爲因勢利導而足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若是能將最高黨部移至北京，則觀聽一新，收效必尤速且大。但目前北京政局未定，當政者之行動，尚與本黨政策相反，本黨最高黨部，卒然移至北京，或不免有搖撼之虞。則目前第一步亦應將中央執行委員會移至上海，就地指揮。本會議爲發展北方黨務及應事實上需要起見，特決議即將中央執行委員會移駐上海，一俟機會成熟，即移北京。」

根據《清黨實錄》，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先行返滬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做出決定，撤銷原中共黨員譚代英的職權，接收環龍路四十四號上海執行部爲中央黨部駐滬辦事處，並且在十三日發出通告宣佈：「所有各部部长業經分別委定，應即克日到部視事，所有上海執行部一切職權及案卷概應同時移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屬各部接管，俾得統一進行。」在十二月十四日發佈第一號，正式公佈了各部部长人選。

但是，參加西山會議，組建上海執行部的邵元沖、葉楚傖，特別是參與發起西山會議，擔任籌款的孫科，在蘇俄駐上海總領事親自出面引誘下，竟然在駐滬常務委員鄒魯、居正、謝持到達上海以前，起程到鮑羅廷——汪兆銘所主持的廣州，去向他們剛剛親自大力反對過的中央報到了。

註釋：

①本章絕大部份的原始資料，都來自居正編輯出版的《清黨實錄》和《邵元沖日記》，因爲前面已經註明這兩份資料的出處，故本節都不另外加註釋。

十八、與廣州中央交鋒

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西山舉行的時候，被鮑羅廷——汪兆銘所支配的廣州中央，在剛剛奪得軍權的蔣介石的支持下，立即發出一系列文電，展開一系列活動，與西山會議交鋒。

早在會議開始以前的十月底，參加西山會議的諸君，就給廣州發出了動之以情、述之以理的信件。其中舉出的蘇俄鮑羅廷——中共篡奪國民領導權，在中國大搞共產主義的事實，是沒有辦法反駁的。尤其是鄒魯陸續以《告孚木》和《再告孚木》為題，以當事人所知道的大量事實，第一次詳盡揭露了鮑羅廷——中共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權力的篡奪，以及汪兆銘的勾結出賣行為。所以在西山會議開始以後，雖然與廣州中央有多次函電交鋒，廣州反對西山會議的重點，從來都避開鮑羅廷——中共對國民黨領導機關的篡奪，避開汪兆銘對國民黨的出賣和勾結的具體問題，而將重點放在西山會議的「合法性」上面；所謂「合法性」最初指開會地點、時間，經過西山會議的反駁以後，汪兆銘後來轉向參加會議的中央執行委員不足「多數」，仍然不合法的問題。而西山會議除了繼續以事實揭露汪兆銘的出賣以外，也轉向「合法性」上面駁斥。而蔣介石則陸續發表一個關於聯俄容共政策的講話，一個正面對抗西山會議的告同志書。這些談話在內容上雖然沒有新意，不可能反駁西山會議舉出的許多事實，但是其重大意義在於，國民黨中唯一的勢力人物站到了鮑羅廷——汪兆銘的後面。

十一月十六日，林森等致電廣州，告以將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決定；二十日，汪

兆銘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其實廣州除了具有中共黨籍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以外，只有純粹國民黨兩名中央執行委員，即汪兆銘和譚延闓）覆電北京，聲稱不能在廣州以外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語氣相當不友善，用了「可恥」的謾罵字眼。全文如下：

「北京東城翠花胡同第八號轉于右任、李大釗、王法勤、丁惟汾、于樹德、恩克巴圖諸同志鑒：本日接林森、覃振、石瑛、居正、石青陽、邵元沖、鄒魯、戴季陶、葉楚傖、沈定一、張繼、謝持、吳敬恒、茅祖權、傅汝霖等銑電，致廣州汪精衛、譚組安、熊錦帆、譚平山、林祖涵、鄧澤如諸同志，稱已於銑日決定梗日在碧雲寺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等語，茲嚴駁於下：一、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只能在廣州開會，已經決議在前，並已經定期開會，何得違反決議；二、此舉顯然未得北京執行部之同意；三、熊克武已因通敵被捕，聽候審訊，何得通電請其來京，公然違反中央決議及政府命令。以上三點，以中央委員而舉動若此，實為可恥。唯有背簽之事，已成習慣，望北京執行部同志切實查明，如係背簽，請覆電聲明，其主動者，應施行懲戒。中央執行委員會啟。」①

針對廣州中央電（按：為節省篇幅，對以鮑羅廷——中共和汪兆銘控制的中央，暫時以「廣州中央」代稱；對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而形成的中央，現在以「西山會議」，繼之以「上海中央」代稱），西山會議發表《通電辨正前廣州執行委員會冬、賀兩電》：「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執行部並轉廣州及海內外各級黨部鑒：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之召集開會，本不受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拘束，現在本全體會議，業於漾（十一月二十三日）日在總理靈前集會，並查照前例，電致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停止行使職權在案。所有前廣州執行委員會冬電，限制本會開會地點等決議，當然無效。又接粵電稱，決定本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廣州開第四次全體委員會，明年元旦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等語。現在全體會議，已決議修改選舉法、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日期，應俟本會決定，另行電告。至

十二月十四日開廣州第四屆全體會議一節，本會議正在開議中，應無容議。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敬。」②廣州只有兩位純粹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參加北京碧雲寺集會的十名中央執行委員早就已經宣佈停止其職權，當然不會聽從廣州中央的命令冬、哥兩電的命令。甚至對於哥電中的三個論點，也不屑於駁斥。會議正忙着繼續揭露廣州的根本不是之處，至於在宣傳上面極為重要的法理依據，沒有加以注意。

幾天以後（十一月二十七日），汪兆銘聯合包括共產黨員的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共十四人，在廣州《民國日報》發表感電，再次重申西山會議所謂不合法的理由，全文如下：「民國日報鑒，並轉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各位同志鈞鑒：近接北京中央執行委員林森等銑電，主張在北京西山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已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覆電嚴駁。蓋就法理而言，既經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議決，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須在廣州開會。無論何人，不得違反決議。就事實而言，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屬於公開性質，若於北京開會，外則受軍閥之壓迫，內則有反動分子利用軍閥以從中作梗。今年四月間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在北京開會，未半即輟南下，繼續開會於廣州，即基於此原因。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豈可故蹈前轍？使軍閥與反動分子得遂其破壞革命之陰謀。況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原定八月十五日在廣州開會，嗣因省港罷工，交通梗塞，廣州掃除反革命派，戰事頻仍，以致屢次展期。茲者廣東全省統一，廣州安如磐石，縱使交通頗感不便，亦無礙於開會。故已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於十二月十一日在廣州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於十五年元旦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已電囑林森諸同志，尊重決議，顧念事勢，迅速來廣州開會，勿持異端，致生糾紛。除胡漢民同志現在莫斯科；李烈鈞、柏文蔚兩同志於役京外，已電徵同意外，弟等一致尊重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之決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最近之主張，

並竭其全力，以擁護實行。謹此宣言，諸唯鑒察。中央執行委員汪兆銘、譚延闓、譚平山、林祖涵、李大釗、于右任、于樹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圖，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瞿秋白、韓麟符、于方舟、張國燾等。感。」③

爲了駁斥廣州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了決議案：《通電否認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一六次之三項決議案》：「廣州汪精衛、譚組庵同志並轉各級黨部同志鑒：感電悉。森等在京集會，實因共產派違反總理允許其歸化之至意，公然役於強俄，乘喪謀我，盤踞中樞，結託狂少，放逐展堂，迫走慧生，中央幹部，失去自由，此不能不移地開會之最大理由；北京爲政治中心，軍閥官僚，踞爲巢窟。本部志在政治革命，縋幽入穴，豈避艱險。且政局變動，民衆亟待指導，此大會應在北京開會之最大理由。今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已在總理靈前開會，決議取消共產派在本黨黨籍，及解僱鮑羅廷一切職務，修正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法，並直接指導民衆。來電所云，於黨於法皆不合，於國尤爲不利。除將往來電文就近轉知協和、烈武、右任、勵齋、鼎臣、恩克巴圖諸同志外，其他如譚平山、李大釗、于樹德、林祖涵及毛、瞿、韓、于、張諸人皆共產黨員，依決議毋庸通知。務請同志念吾黨締造之艱，責任之重，一致努力，是所切禱。至反動分子，自當竭我赤誠，納諸軌道；若自外主義的革命意義，當然爲黨之所不容，紀律具在，自當執行；又錦帆並未除名，公權猶在，請並轉知。林森、居正、石青陽、覃振、沈定一、鄒魯、葉楚傖、戴傳賢、石瑛、邵元沖、張繼、謝持、茅祖權、張知本、傅汝霖。冬。」

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的《爲取消共產派在本黨的黨籍告同志書》中，除了對於汪兆銘刻意避開的許多勾結鮑羅廷——中共的賣黨事實，繼續予以揭發以外，對於廣州在哥電中所說的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是否「合法」問題，第一次予以回答：「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給北京于右任同志等哥電所稱：『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只能在廣州開會已經決議在前』，與給北京林子超同志等感電所謂『中央執行委

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議決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須在廣州開會』。查上年在北京開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曾經決定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是有案可查、不容增減的。雖則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在北京開會未了，遷至廣州繼續開會，但只將北京開會時所決定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會。但一會期中，於同一事件，有兩種決議，已屬不合法理，至於以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須在廣州開會，不能在廣州以外的地方開會之說，查第三次全體會議，並無此項決議。

「哥電說：『此舉顯然未得北京執行部之同意』。查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須得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定地點所組織的執行部（參看黨章第三七條）的同意。這是根據何種法律？退一步說，哥電和感電都說『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議決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須在廣州開會』，假定這話不是捏造，那麼得北京執行部的同意，便可變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說得過去？

「哥電說：『熊克武因通敵被捕，聽候審判，何以達電請其來京？公然違反中央決議，及政府命令。』查熊委員雖因事被捕，但未開除黨籍，未曾撤銷委員，當然有列席的資格，即當然可以請其來京到會，不知所謂公然違反中央決議是指甚麼說？本黨以黨治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本黨最高決議機關，國民政府是統治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如果中央執行委員會有何決議，當然可以變更政府命令。所謂『違反政府命令』，無論和事實不合。這種口吻，也不像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說話。

「又查廣州政治委員會，是本黨的下屬機關，應受本黨最高機關之指揮，並且只有討論黨中關於政治的事件，不能過問黨事的機關。冬電竟以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根據政治委員會一個決議，限制中央執行委員會只可在廣州舉行。據此電說，政治委員會竟逾越權限，干涉黨事，實屬侵權。在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不予糾正，反據以通電，實屬溺職，都是非法，而且可以證明所謂『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

會全體會議議決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須在廣州開會』完全是一派誑話。若早經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議決，今又須政治委員會再來議決一次，不是笑話中的笑話嗎？」④

上海《民國日報》十二月三日的文章題爲《糾正汪精衛等感電之謬誤》。該文着重答覆廣州指責的「合法性」問題：「是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決議是無論何人都不得違反的，咱們所爭的，正是一個全體黨員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最高決議的服從。但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並沒有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及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必須在廣州開會這樣一個決議。這一點咱們還有成案可查，決不容誰增減的。今在感電中硬說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議決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必須在廣州召開，這是一個沒有法理根據的話，不是憑空虛造出來的是甚麼？……咱們不得不嚴行糾正的，還有下列各點：

「廣州政治委員會是黨的下層機關，應受本黨最高機關的指揮，決無指揮本黨最高機關的能力。乃觀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冬電，政治委員會竟首先有『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只可在廣州舉行』的決議，而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亦竟糊塗塗根根據政治委員會這一個決議，發出限制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只可在廣州舉行之冬電，這不是大笑話嗎？誰都知道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是最高權力機關，它的集會和集會地點，除了它本身可以決議外，簡直沒有第二個機關得以越俎干涉的。所以政治委員會限制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決議，是侵越職權的，是違反紀律的。廣州中央執行部根據這種違反紀律、侵越職權的舉動，也當然無效。」

對比一下廣州中央和西山會議在地點、時間問題上對「合法性」的爭論，廣州已經佔下風，因爲第三次全體會議只是對於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地點作過規定，從來沒有就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地點作過決定；被鮑羅廷——汪兆銘操縱的政治委員會雖然作過決定，但是政治委員會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下

屬機關，當然無法約束第四次全體會議的地點；而被中共黨員李大釗、于樹德操縱的北京執行部，仍然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下屬機關，當然也無權決定第四次全體會議在哪裏舉行。廣州中央在合法性問題上已經理屈詞窮。但是汪兆銘立即另在參加的執行委員人數上大做文章。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十二月四日做出開除汪兆銘黨籍六個月的決定以後幾天，汪在十二月八日在廣州《民國日報》發表談話，則以人數問題，換一個角度指出西山會議的各項決定無效：「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孫總理將中央執行委員會名單提交大會通過，額定實為二十四人，……去年八月因監察委員謝持、張繼有彈劾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之提議，總理遂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於廣州。時因各委員分散各地，往返甚難，故未得全體赴會，由是規定十三人為過半數，遂開正式會議。……蓋現參與北京會議之中央委員不過十人，至少尚欠四人始足過半之數耳。茲並將中央執行委員變更遞補之經過述說如下，當更明瞭：第一次代表大會閉會未幾，張人傑以病辭職，遞補者為邵元沖；本年六月，楊希閔以叛亂除名，遞補者應為鄧家彥，但鄧家彥亦以叛黨除名，故遞補者改為沈定一；本年八月廖仲愷以遇難出缺，遞補者為林祖涵；本年十月熊克武危謀國民政府被逮，現待審訊，尚未除名，故未有遞補。故現在北京開會之中央執行委員，實只得林森、鄒魯、戴季陶、邵元沖、葉楚傖、石瑛、覃振、居正、石青陽、沈定一十人而已。至主張依照前次決議案，在廣州開會者，則現已有十一人，即汪精衛、譚延闓、譚平山、林祖涵、李大釗、于樹德、于右任、恩克巴圖、王法勤、丁惟汾及胡漢民。胡漢民最近自莫斯科來電，對於懷疑不革命的分分子固主張其退出也。尚有李烈鈞、柏文蔚雖未見有若何表示，但近在北京而不加入西山會議，其不贊成可知。總而言之，此次林、鄒、戴等召集之北京會議，即單以人數論，亦非多數，況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之決議案，尤無可推翻之理。是此種會議，當然無效。」^⑤

對於這新的合法性問題的重要指責，西山會議諸人沒有及時反駁，大概不以爲這會是一個問題，因爲在排除了中共黨員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之後，在純粹的國民黨人中，參加西山會議的是絕對多數。查《清黨實錄·會議錄》，在汪兆銘發出新的「合法」問題指責以後，第四次全體會議又舉行了十二次會議，沒有一次討論過這個問題；在一九二六年元月四日舉行閉幕式，通過了系統論述第四次全體會議各項問題的《爲取消共產派在本黨黨籍告同志書》中，也沒有回答汪兆銘的所謂合法問題的新的指責。直到廣東少數中央執行委員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才就西山會議的人數爭論是否合法的問題做出回答。謝持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以個人名義發表《致海內外同志書》，第一次回答這個問題：「少數服從多數，係委員制之原則。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共計二十四人，除胡漢民委員被逐，熊克武委員被捕，在事實上不能開會外，只有二十二人，其中如共產黨之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林祖涵以案關本身問題，應在退席之列，則實際上又應減少四人；所餘能列席者，只有十八人矣。這十八人之中，列席第四次全體會議之委員，爲林森、石青陽、居正、覃振、石瑛、戴傳賢、沈定一、邵元沖、葉楚傖、鄒魯等十人；至於未列席之八人，其時李烈鈞在張家口，柏文蔚在開封，王法勤在西安，于右任、恩克巴圖、丁惟汾在北京，而在廣州方面者，僅汪精衛、譚延闓兩委員而已。是列席第四次全體會議者居多數，而在廣州者居絕少數。以絕對少數之兩個委員，又由汪精衛一人作主，擅用中央委員會名義，發電反對，其爲不服從大多數中央執行委員之決議，彰彰明甚。」

後來鄒魯在《西山會議》的著名小冊子中補充道：「李烈鈞雖未列席會議，卻來電贊成；沒有列席並沒有贊成的，只有汪……等七人。監察委員五人，列席西山會議的有謝持、張繼二人；吳稚暉召集西山會議，並於西山會議第一預備會出席，且做主席，所以吳稚暉說他是西山會議派，就是這個事實；鄧澤如雖沒有到會，卻暗中助過錢；只有蔡元培尚在國外，與西山會議沒有關係。」

幾十年以後，曾經擔任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的國民黨黨史專家李雲漢，在其名著《從容共到清黨》中，就所謂合法與否的問題，根據國民黨中央保存的檔案，做了一個比較全面的考察：「經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原始記錄，該全會僅於五月二十一日決議『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地點定在廣州，時間八月十五日』，並未規定第四次全體會議也一定要在廣州舉行。汪兆銘感電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須在廣州舉行』一節，係政治委員會第三十九次會議所決定者，政治委員會於十月三十一日致中央執行委員會轉達上項決議之公函中，亦明言係根據『本會第三十九次決議議決』，而未提及三中全會。在體制上，政治委員會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內的一個組織，居於下層地位而向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其決議自不能約束中央執行委員會。汪等感電以政治委員會之議決託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之議決，自是欠當。故純就法理而言，西山會議之以第四次全體會議名義召集於北京，並未構成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之決議之違反。」

「至於出席人數問題，依常例須有過半數以上之人數始得開議。中央執行委員總人數為二十四人，而列名西山會議者僅得十人，自不足法定人數。但就事實而言，列名西山會議之委員人數雖不足執行委員總額之半數，但卻超過純粹國民黨籍之中委名額半數以上，而且與實際在廣州之中委人數相比，則為絕對多數。蓋此時在粵之中央委員，除共產黨之譚平山、林祖涵外，僅譚延闓、汪兆銘兩人。譚對與容共反共之間，不明白表示意見，堅持西山會議為非法而必欲斥之為反革命者，共產黨徒而外，實汪兆銘一人而已。況西山會議之召集，乃代表一種反共勢力的集合，其列席人數是否夠法定人數的關係尚小，而所代表的群眾意向與對黨內外所發生之影響關係則大。即對中央執行委員來說，亦不宜以參加西山會議或未參加西山會議而作為思想劃分的標準，而應從每位中央執行委員之思想本質上是否反共或容共來論定西山會議係代表少數或多數問題。按第一屆二十四位中央執行委員中，列名西山會議的十人，皆為

反共之純粹國民黨人；與汪兆銘署名感電表明反對態度者亦十人，但其中四人是共產黨，于右任、恩克巴圖既不在廣州，亦未明白表示意見。其餘未參加西山會議亦未列名汪兆銘感電的中央委員有胡漢民、李烈鈞、柏文蔚、熊克武四人……就此項分析，可知胡漢民、李烈鈞持反共立場，與西山會議之主張相同；熊克武已喪失中央執行委員之資格，柏文蔚可視為無意見；是則贊成西山會議主張之中央執行委員人數實比反對者為多。若以事關制裁共產黨分子，凡共產黨之執委應行迴避，不予計算其名額，則贊成西山會議者尤為絕對多數。何況五位監察委員中有四位與西山會議有關係，而重要國民黨人如許崇智等，亦對西山會議積極贊助。」⑥

無論從開會地點或人數方面，汪兆銘的指責都完全站不住腳。蔣介石卻在這時站出來，全面肯定鮑羅廷——中共的作為，並且為汪兆銘辯護。

汪兆銘從排擠掉胡漢民起，完全是在鮑羅廷——中共的扶植下得到了權力，歷史家已經有相當多的闡述；蔣介石也是一樣，是在鮑羅廷——中共的扶植下驅逐許崇智，獲得軍權；在他們的繼續幫助下，以左派的面目，戰勝了昔日孫先生的主要助手們，即西山會議諸位元老，由軍權而擴及黨權、政權；然後再回頭，通過中山艦事變趕走了汪兆銘，壓住了中共；再在一九二七年四月進行武裝清黨，即殺戮幫助他上台的人，從而最後掌握了國家的最高權力達半個世紀之久。

掌權的蔣介石在這半個世紀中的最主要敵人卻是中共。因此，蔣介石必須掩蓋他們與鮑羅廷——中共的彼此幫助和親密扶持的歷史。事實上，沒有他的扶持，中共不可能起來；沒有鮑羅廷——中共的支持，他也不可能掌權。他有權力，所以能夠將許多的歷史真相掩蓋起來：有的歷史學家因為缺少材料而不明真相；有的迫於環境而不能直書；而御用歷史家則編造由謊言組成的歷史。由於汪兆銘後來變成中國人深惡痛絕的大漢奸，於是將中共扶植起來的許多歷史責任，很容易推到他的身上，反而更將蔣介石的歷

史責任深埋起來。但是，歷史的原始資料雖然已經發黃，當年出版的書卷已經蒙塵，畢竟可以找到一些。

蔣介石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即西山會議的主要文件剛剛發表之後一星期，就聯俄的意義發表講話，顯然針對西山會議《取消共產派在本黨黨籍案》、《顧問鮑羅廷解僱案》、《開除汪精衛黨籍案》而發。查毛思誠所著《蔣介石年譜初稿》（由蔣介石親自修訂，幾經修改以後，在一九三七年以書名《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出版），這一篇講話中關於加強與俄國聯繫的許多重要和關鍵部份，在這蔣介石親自修訂的毛思誠著作的兩種版本中（即《民國十五年前的蔣介石先生》和檔案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出版的《蔣介石年譜初稿》）都被刪除了，而且又加了一些內容。爲了弄清真相，在這裏憑依的是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三種版本。各種版本文字幾乎完全一致，只是題目不一樣，結尾的一段有的沒有。這三種版本是：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的《蔣介石的革命工作》，演講題目爲《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蘇俄革命紀念宴會演講辭》；三民出版部印行的《蔣中正演講錄》，演講題目爲《總理實行中俄聯合的意義和世界革命統一指揮的必要演講詞》；《蔣介石先生最近之言論》，演講題目爲《聯俄的意義》。以下只摘抄一九二六年出版的著作中都一致有，但是經過蔣介石親自修訂的《蔣介石年譜初稿》和《民國十五年前的蔣介石先生》中卻沒有，即被刪除的部份，因爲這恰恰是蔣介石親蘇俄——中共的、而又不願意公佈的部份；至於新增加的部份，也一並抄出，供參考。

開場白很短，被刪除部份是：「革命黨是不分民族，不分國界，並且是不分你我，更不能有強弱大小之勢力之見，是要請各位牢記着。」這與蔣介石在訪問蘇俄時所發表的關於國際主義的講話一致，後面他加以發揮。

以下被刪除部份是：「今天我們所以能在汕頭與各位同志們開這樣的聯歡盛會，原因在甚麼地方？

爲甚麼去年和前年不來？恰恰今年成立了國民革命軍，就能完全克服潮梅，來到汕頭。這種迅速的進步，可以說完全是從我們總理實行中俄聯合的一點成效。時代搬遷的影響，中華民族的覺悟，本黨同志的決心，和群眾的力量，固然對於革命進步的地方很多，但是本黨不改組，蘇俄同志不來指導我們革命的方法，恐怕國民革命軍至今還不能發生。（按：以下的講話在《民國十五年前的蔣介石先生》中被刪除，但是在大陸根據原稿出版的《蔣介石年譜初稿》中加以恢復。）我們今天能夠消滅叛逆，到達這個目的，大半可說是蘇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國際的勢力，與其革命的使命，起來以至誠與本黨合作，幫助我們中國革命的效力。因爲他們幫助中國革命，就是幫助世界革命；中國革命成功，就是世界革命成功，並且是俄國革完全成功的命。（按：以下在《蔣介石年譜初稿》中也被刪除）反轉來說，中國革命如果失敗了，那就是世界革命的失敗；如果世界革命不能完成，那俄國的革命就沒有意義。而且俄國的本身也非常危險，所以大家能夠不分彼此，同心協力，才能達到今天的勝利。從這個關係，已看出我們要達到世界革命成功的目的，便要先完成中國革命，還要明革命黨是以主義和精神來團結的。」蔣介石清楚地表明，他認爲中國的國民革命，是以蘇俄爲首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份。

以下比較複雜，因爲不僅僅被刪除了內容，還增加了一些三種版本中的沒有的話，故以下只好將《蔣介石年譜初稿》中的同一段落抄出，以便對比：「帝國主義者所造的謠言，最有力量、最能動人聽聞的一句話，就是說中國人不應受俄國人指揮。我且不說我們現在並沒有受俄國人指揮，即使有這件事的時候，我可以老實說，只要他革命先進的蘇俄，誠心誠意來幫助我們民族的獨立和平等，來指導我們中國的革命，我們世界革命的中國革命黨員，只要爲求我們民族獨立平等之故，亦並不是甚麼恥辱。我們對俄國同志認識之點，根本上在於我們的敵人，是國際帝國主義者，他們的敵人，亦是國際帝國主義者，他們的政策，是要解放弱小民族，本黨的革命，亦是要求中華民族的解放，進而至於世界大同。我

素來主張世界弱小民族的革命戰線是應該統一的，我對總理提起這個問題，亦不知幾次了。」順便指出的是，蔣介石後來在自訂年譜時增加的以上話中的關於平等的含義，恰恰像他過去強烈反對的西山會議有關決議案《決定本黨對俄國之態度案》：「遵照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如有不以平等待我者，無論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皆會反對。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九日。」

以下是該講話發表不久以後出版的三種版本，文字一致，與自訂年譜差別很大：「帝國主義者所造的謠言，最有力量、最能動人的一句話，就是說『中國人不應受俄國人指揮』。我們且不講我們是否已受了俄國人指揮，但我敢老實說，叫革命先進國蘇俄來指導我們中國革命，我們世界革命的中國革命黨員，實是願意接受的，而且是應該接受的。去年總理將要北上的時候，對我不但有面諭，而且是有手諭。總理的面諭說是：『鮑羅廷同志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情總要容納他的主張；你聽他的主張，要像聽我的主張一個樣才好。』現在總理死了，各位俄顧問對本黨的努力，仍與總理在日一樣，以親愛的精神，以同志的資格有事大家互討論，求得其理。誰的主張有道理，就實行誰的主張，並沒有一些勉強遷就的事情。事實上，蘇聯同志並非居在指揮的地位，不過我們以世界革命黨員自居，也很願意受革命先進國同志的指揮。這並不是妄自菲薄、甘居人下的一件倒霉的事，實在是世界革命、聯合被壓迫民族的戰線，指揮統一是在現在對帝國主義者作戰最要緊的一個戰鬥原則。我們對於俄國同志認識的要點，根本上是在於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者，他們的敵人，亦是帝國主義者；他們的政策，是要解放弱小民族。本黨的革命，亦是要求東方民族聯合的解放。進而至於世界大同。尤其是他們認識三民主義為救中國的唯一主義，所以我們對於蘇俄同志，根本上的主張，認識之後，就要免除一切的界限，消滅個人的意氣，而來同心協力的共同奮鬥。」這的確像一個第三國際的革命黨員所說的話，只是

令人不解的是，如果孫先生給他的極爲重要的面諭是真正的，爲甚麼要刪除呢？「保留」或「刪除」二者，總有一者是在欺騙，在編造歷史；蔣介石在這裏拾出孫先生的「面諭」，從而與西山會議將蘇俄作爲新的帝國主義的主張針鋒相對。

以下是長段的刪除：「因爲他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對於我們革命黨員聯合，恐怕世界革命指揮從此統一。所以凡是可以用挑撥我們國民心理，離間我們革命黨員的方法，他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來設法破壞我們世界革命聯合戰線。有些中國革命黨同志，竟被他這句受俄國人指揮的話所動搖，以爲是無上的恥辱，不知恰恰中了帝國主義這離間我們國民革命，破壞我們世界革命的毒計了。今日革命，完全是國際性的世界革命，所以我們說，革命是不分種族、不分國家，只要希望我們革命能夠成功，不教我們做賣國滅種的事，那麼我們做救國保種的革命事業，受外國人的指揮，是沒有甚麼希罕的事。如果今日俄國人勾結我們來做害國殃民的勾當，或是幫助我們來做軍閥，做亡國奴，那我們不但不能受他的指揮，而且要竭力的攻擊他了。試問各位，蘇俄同志，這兩年來的事實，還是幫助我們做賣國殃民的亡國奴，還是幫助我們做救國保種的革命黨。這樣一想，我們大家就可以明白總理聯合蘇俄的意義。並且應該明白，如果蘇俄同志，願意指揮我們革命，我們亦願意受他的指揮，不但不足爲恥，而且同列於世界革命黨員的地位，是一件人生最大的意義。不但中國革命黨受蘇俄同志的指揮，如果我們中國革命黨員，有能力，有本事，也可以指揮各國革命黨員來革各帝國主義者的命。我敢講一句話，蘇俄同志在中國革命黨工作的人，自鮑羅廷同志以下，人人當我們總理是他們的一個領袖，誠心誠意接受我們總理的指揮。這是甚麼緣故？這就是世界革命黨。不分強弱，不分彼此，誰有本事就可以指揮誰人的一個好例。我可以斷定，若是中俄同志誠心誠意地照現在這樣繼續努力做去，中國在五年之內，革命是定可以的。我們不只希望俄國同志來指導我們，就是別的民族如朝鮮人、印度人、安南人，只要他們有本事，肯誠心誠

意像俄國同志一樣來革命，我們也願意接受他們指揮的。總理在日，其主張常與鮑羅廷同志的主張，完全相同。就是以我所見所聞的，總理與鮑羅廷同志的主張是或小的地方有些不同，而大的主張，是如出一個人的意思一樣的。蘇俄同志看見中國有這樣思想偉大、主義堅定的革命領袖，將來革命定可以成功。所以他不辭遠道，不惜犧牲一切，不怕艱難辛苦，來同我們真正聯合在一條戰線上，共生死，同患難，這也可說是我們總理的誠心所致。而蘇俄同志這樣誠懇的來同我們合作，我們中國同志，不但不誠心地接受，而且還要懷疑，豈不可怪。歸納起來說一句話：我們接受革命先進國同志的指導，就是接受總理指導，接受實行總理的遺囑。我們總理遺囑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句話大家不要輕視忽略過去了。」蔣介石在這裏表明，他是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還說孫先生的主張「常與鮑羅廷同志的主張，完全相同」，而且他說他親眼見到「大的主張，是如一個人的意思一樣」。如果以上的讚美蘇俄的話，僅僅是爲了討好大權在握的顧問鮑羅廷，他就是一個謊言家；如果一切他所謂親眼見到的都是事實，他後來的背叛和刪除這些，也就證明他是一個陰謀家。孫先生在大主張方面，民族主義中的繼承中國文化道統的闡述，對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民族精神的肯定，與馬克思主義風馬牛不相及；在吸收西方思想的民權主義中，對於民主法制的嚮往，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主張格格不入；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的演講中，正面批判馬克思將社會問題本末倒置，對於歷史唯物主義強烈否定，提出階級鬥爭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動力是民生。蔣介石將二者等同起來，共產黨人不會同意，國民黨人也會強烈反對，西山會議的《爲取消共產派在本黨黨籍告同志書》中已經有簡要的闡述。

以下是一個結尾的無關緊要的段落，從略。

在北京西山會議和廣州中央用聲明、通電、文論互相指責的緊張之際，唯一的勢力人物蔣介石在十

二月二十五日發表《對於西山會議告國民黨同志書》。這份爲中共和汪兆銘張目的重要文件，在《民國十五年以前的蔣介石先生》中被刪去，現在大陸根據原稿出版的《蔣介石年譜初稿》中恢復原樣發表。

一開始就以汪兆銘都沒有用過的強烈口氣批評道：「本黨不幸。值茲廣東統一將告完成，北方民衆共起奮鬥，賣國軍閥自行崩潰，總理主義可即實現之時，忽有一部份同志異動，自赴北京，開其所謂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自佈議案，快其驅逐異己發抒私憤之褊心，而不惜阻撓國民革命之大業。跡其言，無一不悖於本黨之紀律與總理之意旨；究其開會情形若何，誰爲主席，誰爲提議者，誰爲附議者，是否經過議事程序所必須之討論表決，求之京滬報紙，皆無記載。……張靜江同志苦口勸告，尤不能促若輩之覺悟。」這一開始對西山會議的批評的強烈程度，超出了汪兆銘；但是他當時還抓不住誰是首要，但透露出他和張靜江的完全一致。

除了中共和廣州的汪、蔣以外，國民黨內最早公開反對西山會議者是張靜江。他的反對西山會議記載於各方面：在居正的《梅川譜偈》之中，他勸告居正不要參加會議，被居正嚴辭拒絕，不歡而散；邵元沖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日記記載：「又偕汝爲、果夫訪靜江，談粵局內部糾紛之情況。靜江極抱不安，謂欲親至粵共謀消泯意見及切實聯合之辦法，汝爲謂稍緩再商。」十一月二十九日邵元沖記載：「午後訪靜江一談，渠對黨事仍多未瞭解，頗以此次京會爲駢枝者，余亦弗與之多辯。」邵元沖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記中，則判定張靜江始終偏袒汪兆銘：「三時偕哲生訪靜江，渠言不日將至粵一行，然對於黨務則不願表示意見，蓋彼實爲始終偏袒汪兆銘者，故處處表現一種難言之隱也。」邵元沖在此之所以能夠得出張偏袒汪兆銘的結論，是因為在數天以前，張靜江公開發表批評西山會議的文章。查十二月十四日的上海《民國日報》的「本埠新聞」，上面發表了《張人傑告同志書》，其中根本否定西山會議的意義說：「試觀旬日以來，黨人中因有誤會而啓事端者」，並且說這樣會「授人以柄」。所以次

日的上海《民國日報》發表《言論》（按：即今天的《社論》）予以駁斥，題目是《讀張人傑同志告國民黨同志書以後》。以張靜江的認識事情的水平和他一生對共產主義的態度看，他對蘇俄——中共的認識深度不在其他國民黨元老之下。一方面是衆所週知的他與蔣介石的極爲深厚的歷史淵源，非任何其他他人能夠相比，他當然明白蔣介石在鮑羅廷——汪兆銘支持下，剛剛從一個既無一兵一卒，更未曾擔任過任何黨政職務的普通軍人，一躍而成爲最高的三人特別委員之一；再趕走許崇智，實際位置與汪兆銘並列，並且因爲掌握着軍權，前途無量。張靜江站出來支持蔣介石當然是理所當然的。蔣介石在這裏正好利用張靜江的元老身份來加強他反對西山會議的份量。

蔣介石的《告國民黨同志書》分爲兩部份，第一部份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第二部份分別爲中共、汪兆銘、鮑羅廷進行辯護。

蔣介石說：「關於共產主義之問題，若輩所以主張排除，不外兩種理由：第一謂共產黨之共產主義與本黨三民主義根本衝突，故共產黨在本黨之內，亦根本不能相容。不知共產黨之加入本黨，爲總理特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果使兩種主義根本不能相容，以總理之明，與第一次代表大會之忠於本黨，寧肯貿然決定，以貽本黨之危險，且總理已明言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矣。故第一說決非總理之意，此在若輩亦未始不知，於是有第二說。」軍人蔣介石在這裏不可能舉出任何兩種主義差別的理論要點，只是以「總理之明」壓人；他繼續說道：「謂總理之特許共產黨加入，乃欲共產黨完全化合於本黨，而非本黨爲共產黨所同化，今則共產主義已有蠶食三民主義的危險。」蔣介石仍然以總理爲擋箭牌說：「然總理果是褊小，三民主義果如是之易於撼耶？此說之誣總理、誣本黨，蓋地獄說尤甚。」然後他說理由：「總理手創之三民主義，誠不同於共產主義，而其爲革命的主義則同。總理深知必能包括共產主義始爲真正三民主義；同時亦必能容納共產黨始爲真正之國民黨也。今日中國革命已爲世界革命的

一部份，中國革命成功，則世界革命爲之促進，亦世界革命成功，中國革命始真正成功。總理自信三民主義能兼容共產主義，而決不懼共產主義將蠶食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可乘之百世，推之世界，豈在中國國民革命尚未完成之時，而已懼何種主義之蠶食。」蔣介石的非常獨斷的說法經不起推敲，照他的立意和邏輯，反過來說：不能包括共產主義的三民主義就是假三民主義，不能容納共產黨的國民黨就是假國民黨；一年以後蔣介石在上海的「四·一二」清黨，以及他在以後一生的言行，也都應當冠之以「假」。不僅孫先生沒有這層意思，而且這是根據蔣介石的權力需要，對三民主義的庸俗化的曲解。這裏還再一次（第一次是在蘇俄）顯示蔣介石對第三國際推動的世界革命的興趣，他後來在北伐最初期曾經多次主張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不過，難以判定這是缺乏理論素養的蔣介石是一時糊塗，還是爲了獲得權力而欺騙共產黨和世人。至於他表現的「不懼」，只是一種心態，一種主觀信仰，而不是道理；如果他說得正確，他後來清黨，則是「懼」了。

蔣介石爲共產黨辯護道：「此次所謂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宣佈共產黨籍之執行委員應除名共四人。夫以二十四名之中央執行委員，跨共產黨籍者四名，蓋僅僅六分之一。此而懼人之蠶食，非自暴自棄不自振作者，不能作此奇想也。此種怯懦之心理，其果愛黨者之所爲乎？」蔣介石在這裏避開了西山會議《取消共產派在本黨黨籍案》中所指出的基本點：「乃兩年來，凡共產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在本黨中一切言論工作，皆係受共產黨機關決議與指揮，完全爲共產黨之黨團作用。」也不顧在西山會議的有關《宣言》、《告同志書》中，以及鄒魯《告孚木》、《再告孚木》文章之中的大量論點與事實，僅僅把中共的作用說成是「四個人」的問題。當蔣介石在上海武裝清黨的時候，在不「怯懦」的蔣介石、汪兆銘的支持下，中共在國民黨的三十六個中央執行委員也才僅僅佔八個，是不是也因爲「懼人之蠶食」、「自暴自棄」，才大開殺戒呢？

蔣介石爲汪兆銘辯護道：「關於汪精衛同志，……共產黨爲預先求中國國民革命之實現而來加入本黨，謂其唯以消滅本黨爲策略，又何異謂共產黨唯求自殺。此語既誣，則謂精衛同志對於共產黨挑撥離間排除本黨同志之言動，一一實行，自無一非誣矣。」蔣介石在這裏首先肯定共產黨是「求國民革命之實現而來加入本黨」，然後莫名其妙地說，消滅了國民黨，就等於共產黨自殺。這裏的假定前提是，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以後，共產黨就不存在了，因此消滅了國民黨，共產黨就只能夠一起完蛋。蔣介石還以完全違背常識的前提進一步推論，因此說汪幫助共產黨消滅國民黨的事情就不存在。常識和歷史事實都告訴我們，這一前提從來只是相反存在，因此，蔣介石想要否定的事實，恰恰大量存在。大概軍人都以霸道著稱，善於強詞奪理，不然這樣低能的辯護，怎麼會說得出來？

蔣介石爲鮑羅廷辯護道：「鮑羅廷同志之爲政治顧問，爲總理所特許。總理曾親自詔中正：『鮑羅廷同志之主張即余之主張，凡政治問題均須容納其意見。』總理逝世以後，蘇俄同志對於本黨，以親愛之精神，同志之資格，遇事互相討論，求得真理，絕無所謂『包攬』、『專斷』的事實。……廖案發生以後，重要事件由特別委員會辦理，中正即爲特別委員之一，凡事應與精衛同志共負責，何得獨責精衛同志一人？更何得謂『鮑一人專斷』？」鮑利用孫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操縱政治委員會，從而代表蘇俄來支配國民黨，以便蘇聯的國家利益進一步擴張，其中的許多事實早已經公諸於世。現在公佈的蘇共中央檔案中，其陰謀更已經昭然若揭，不值得一駁。但是蔣介石提到了特別委員會，講到其時，他與鮑、汪怎樣「共同負責」，這點卻是真實的。正是由鮑羅廷提議，成立了汪、許、蔣三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從而將國民黨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事實上廢除，從來只當過參謀長，更與黨務、政府職務無緣的蔣介石，一下成爲最高的核心人物；正是在鮑、汪、蔣的共同負責下，驅逐了國民黨的中堅人物胡漢民，迫走了謝持；在鮑、汪的支持下，蔣介石發動武裝政變，趕走了另一名特別委員許崇

智，將曾經跟隨孫先生轉戰南北的粵軍將領十幾個人，以廖案嫌疑犯名義全部槍斃，然後將黃埔軍校的人馬佔據軍中各級領導，由此，蔣介石才真正算起家。沒有鮑羅廷的支持，蔣介石一樣都做不到。根據蘇共中央檔案，在這稍前兩個半月（絕密的援助計劃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七日提出）給予蔣介石的命脈黃埔新軍的援助如下：「（8）至於廣州，計劃提出黃埔必須建立新軍，使其軍隊達到二萬五千人，並擴充空軍和技術兵器。建議撥給黃埔一萬五千支步槍，一百挺機槍，二千萬發子彈，二十四門火炮連同炮彈，五十門迫擊炮連同炮彈，以及十三架飛機。現在黃埔軍隊總人數約六千人。廣州面臨的任務是：一、徹底消滅省內的一切敵對軍閥集團；二、統一全省，由政府掌握財權；確保抵禦北方的進攻。」⑧

關於蔣介石和蘇俄顧問的關係，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張國燾回憶道：「當時任中共廣東區委員會委員兼軍事部長的周恩來卻鼓吹廣東軍事應採取『黃埔中心主義』。他於一九二四年由法國歸國後，即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事實上他一直擔任政治部主任的職責。當時他隨着蔣介石將軍在潮汕一帶工作，也曾跑回廣州一趟來會我，表示對黃埔的前途極抱樂觀。他和鮑羅廷相處無間，為鮑羅廷所獎掖；他們兩人都主張抬高蔣介石將軍的地位，使黃埔力量能夠迅速發展。……蔣氏主持黃埔軍校的初期，色彩是相當紅的。第一期學生四百六十餘人中，中共黨員及共產主義青年團佔八十餘人；蔣那時對他們一視同仁。蘇俄教官為蔣氏所倚重，在校內更具權威；政治工作和政治教官多用中共黨員擔任；由具有黨籍的學生們所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也獲得蔣氏的支持。」⑨

不可忽略的是，蔣介石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將其長子蔣經國派往蘇俄留學，不是去進一般學校，而是進入專門培訓蘇俄在中國代理人的中山大學。如果將蔣介石在那時的許多親共言論聯繫起來看，這毫無疑問代表了蔣介石那時的政治傾向和對權力的頑強追求。

這時候的蔣介石，能夠離得開鮑和汪嗎？他剛剛得到權力才幾個月，在黨內、行政部門內毫無基

礎。這時的鮑、汪、蔣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以犧牲國民革命前途、以犧牲國民黨的利益換取各自權力的暫時同盟。蔣介石挺身而出為很孤立的鮑、汪辯護，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蔣介石的兩次講話，不在其內容，而在於唯一的軍權人物突然站到了西山會議的對立面，幾乎決定了西山會議在組織方面的失敗。

政治活動，特別是中國的政治，是勢力的較量；可以說，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是流氓政治。

註釋：

①轉引自《從容共到清黨》（上）第四二六頁，李雲漢著。

②《清黨實錄》第一九頁，居正編。

③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三日上海《民國日報》。

④同上。

⑤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廣州《民國日報》。

⑥《從容共到清黨》第四三一至四三三頁，李雲漢著。

⑦《蔣介石先生最近之言論》，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出版，編輯發行者，北京民社。

《蔣介石的革命工作》，上海太平洋書局印行，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初版。

《蔣中正演講錄·最近演講之二》，三民出版部印行（未標明出版年月）。

⑧《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一卷第五九一至五九二頁，第一八七號文件，李玉貞譯。

⑨《我的回憶》第二冊第四五〇頁，張國燾著。

十九、廣州中央顯示力量

鮑羅廷——汪兆銘控制的廣州中央雖然在「理」上輸了，在中央執行委員的人數上輸了，但是，這裏是孫先生長期以來經營的根據地，這裏有國民政府，有較為固定的財稅收入，尤其有剛剛擊敗了滇、桂軍和陳炯明部的黨軍；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決議，中央黨部移上海，廣州的中央應該停止職權，由設在上海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繼續領導國民政府和黨軍。但是廣州中央不服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決議，不但不交出財權、政權、軍權，恰恰憑藉這些根據地的優勢，製造出一個新的中央，製造方法就是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那時第四次全體會議還沒有結束，汪兆銘召開了所謂執監委員會暨各部部长第一二六次聯席會議，通過了汪兆銘提出的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

發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七個人中，竟然只有汪兆銘一個人是純粹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列名的廖仲愷夫人何香凝連中央候補執行委員都不是；還有譚平山等三位是中共黨員；有一貫反對中共、並且給西山會議暗中出過錢的監察委員鄧澤如，爲甚麼鄧會這樣呢？邵元沖的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記記載：「今日又聞山田純三郎新自粵歸，述湘勤等束縛之苦，又言粵中近日厲行偵探制度，凡各機關及各要人均有暗探相隨，以窺伺其行動言論。崇基亦有言晤鄧澤如，詢彼之態度，鄧出以詭辭曰：吾今在粵，乃只能粵言耳。其焦慮之深如此，則人不自聊可知。」可見鄧澤如是出於不得已。汪口口聲聲說十個中央執行委員參加的第四次全體會議是非法，可是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怎麼就可以擅自召集全國代表

大會呢？

這裏是國民黨史發展的關鍵，即用絕對的少數，召集所謂「代表大會」，製造出絕對的多數。一旦製造完成，就糾合在這製造過程中的得利者們，掩蓋這一關鍵的製造過程，編造歷史而成正統。現在的所謂國民黨的黨統，就建立在這經不起推敲的汪兆銘、蔣介石和中國共產黨（應該加上蘇俄顧問鮑羅廷）的大聯合上面。所以跟隨孫先生一起而創建中國國民黨的居正在《清黨實錄·序》中說：「至此而國民黨亡矣！」

能夠這樣做，憑靠的是勢力。

中國國民黨的黨統，從此不是建立在依據黨綱黨章的「法」上面，也不是建立在由黨綱黨章所衍生的「理」上面，而是建立在勢力人物的「力」上面，動力則是國家神器所帶來的「利」的誘惑；理想只是成了宣傳，成了對付老百姓而用的工具。沒有法理，就沒有是非、公理、正義。在國民黨後來執政以後，權力自然加速了執政者的腐化。

從這裏就種下了以後數年黨內的不斷的紛爭，甚至幾度大動干戈的種子，也種下了中華民國歷史的起伏和遞嬗變化。

孫先生時代的以革命理想來凝聚的國民黨，從此逐漸演變成爲因利益而聚合的執政黨。

這轉捩點就是廣州二大的召開，和建立在其上面的國民黨的所謂的黨統。

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發表的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以沒有新意的絕大多數篇幅，按照汪兆銘和中共的觀點敘述國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以來的歷史，反覆強調他們所謂的「先總理之根本方策」和「紀律」，而根本没有回答、也回答不了西山會議的各個文件之中，所揭露的蘇俄——中共篡奪國民革命領導權力，並且大搞階級鬥爭的事實。在最後兩段觸及到現實，立即暴露出這次會議是

爲了對付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主題：「當此之際，北方軍事，忽生變化，奉天軍閥，一朝瓦解，北京國民革命之勢，有如潮湧。凡我同志，誠宜及時努力，以求履行先總理之遺囑，完成國民革命之工作。而謝持、鄒魯等乃欲繼承馮自由、馬素、江維藩等之反動計劃，以圖破壞先總理所確定之根本方策。苟詳審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之革命趨勢，則於是非曲直，必能了然而無疑。今於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際，僅略述經過，以期策勵於將來焉。」（按：以下廣州「二大」的有關文獻，都不另外標明出處。）①

這裏有兩個高妙的策略運用，一是不提整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也不敢提及參加會議的國民黨的多數中央執監委員，而只提謝持、鄒魯兩個人（汪後來在報告中說是「一兩個人可惡」），以便於下一步分化瓦解；二是完全迴避西山會議的揭露，只談論歷史，不談論現狀，一談論現狀就結束宣言，與汪兆銘在廣州「二大」上完全迴避現實政治問題一樣。

過了兩個星期，蔣介石發表了反對西山會議的聲明，這聲明奠定了廣州的勢力基礎；並且在開幕式上舉行閱兵典禮，以顯示力量，這與一批手無寸鐵的老黨人在北京舉行西山會議成爲強烈對比。

於是，由唯一的一個純粹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汪兆銘發起的廣州「二大」，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開幕。

甚麼人才能夠參加這所謂國民黨的大會呢？當然要進行資格審查，審查委員會由五人組成：鄧澤如、林祖涵、林森、毛澤東、譚平山。林森正在北京西山主持反共會議，鄧澤如不願意與共產黨爲伍，因而由三位共產黨員來進行所謂國民黨代表大會的「資格審查」，夠荒唐的了；於是，在全數三百五十六位出席者中，中共黨員獲得九十席，佔三分之一強，更加荒唐！全世界的政黨史上，有這樣的事情嗎？並且中共在大會期間組織了以譚平山爲黨團書記的秘密黨團，每天都要集會，實際主導和操縱大會

的進行。

還有更荒唐的事情：正式會議開始的時候，竟然由共產黨員林祖涵在會上報告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經過，這正好說明中國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由中國共產黨來籌備，這樣籌備的結果，會有利於誰？中國國民黨的黨務（按：即組織工作）報告，竟然由中共黨員譚平山來做；宣傳工作報告則由毛澤東來做。這究竟是共產黨的代表大會，還是國民黨的代表大會？

國民黨的代表大會的秘書長，竟然是中共黨員吳玉章，這也是不可多得的荒唐！

還有荒唐的！大會宣言共分爲四個部份，第一部份「世界之現狀」主題是反帝，佔全部宣言的一半以上，根據張國燾的回憶，竟然是依照一封莫斯科的電報：「大會進行的前夕，莫斯科來了一個很長的電報；鮑羅廷將它翻譯出來，乃是一篇反對帝國主義的大理論。正當我和鮑羅廷閱讀這篇電文時，汪精衛來了。鮑羅廷不加解釋，將電文交給他；他也没有讀完全文，就說內容很好，可作大會宣言的資料。

後來，這篇文章果然成爲這次大會宣言的第一段。」①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廣州「二大」的靈魂和組織架構，基本是蘇俄——中共的。

似乎有點費解的，是汪兆銘在會議的有關幾個重要講話中，沒有提到西山會議，更不曾回答西山會議的各種批判。西山會議恰恰在廣州「二大」議程開始的當天，即元月四日，發表了《爲取消共產派在本黨的黨籍告同志書》，系統地敘述了取消共產派的黨籍、解僱鮑羅廷、開除汪兆銘黨籍六個月、將中央黨部移駐上海的理由。

汪兆銘在開幕典禮的演說詞中，主要回顧第一次代表大會以來的變化，即孫先生去世，以及廖仲愷被刺事件。基本精神是：「總理的主義，就是總理的生命；總理的主義是不死的，我們繼續實行總理的主義，便是繼續總理的生命。」「我們要牢記總理的遺囑，一方喚起民眾，一方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

之民族共同奮鬥。」打着孫先生的旗號，是做一切想做的事情根據，歸結的「喚起民眾」，是試圖爲中共在農村的暴力土地革命打掩護；歸結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爲縱容蘇俄的侵略外蒙古的行爲，爲鮑羅廷和龐大的軍事顧問團控制中國國民革命開綠燈。

在當天晚上宴會上，汪致歡迎詞，比較鬆散，仍然強調這兩點。

在元月六日，汪向大會作政治報告。報告幾乎只是敘述幾件事的過程：討伐滇、桂軍，聯俄，平息商團叛亂，孫先生逝世，廖案經過，扣留熊克武。敘述完以後說：「我們從此以後，對於軍政統一、民政統一、財政統一、軍需獨立、軍事訓練這幾個決議案可以着手實行了。現在規劃，第一步趕快把廣東鞏固起來，所以要除盜安民……至於計劃的第二步便是我們要把主義及政綱努力推行到全國，這是不能於此時有報告的。以上所述，都是第一次大會以來重要事實之經過；至於理論方面及未能見諸實行的，恕不多說。」這迴避了西山會議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問題，也沒有提到西山會議，哪裏像政治報告？！與西山會議成強烈對比的是，每次會議都圍繞着開除共產派黨籍、解僱鮑羅廷、停止汪兆銘黨籍的政治議題，各種報告、宣言、談話理直氣壯。廣州中央的「二大」，從頭到尾，幾乎都只談論歷史過程，迴避理論與政治問題，就是作爲會議主題的處罰參加西山會議有關人員的發言和決議，也只是在所謂違背聯俄容共政策和違反紀律兩點。再回顧在西山會議開始的前後汪兆銘等發來的幾封電報，也從來沒有面對過西山會議所指出的嚴重政治問題的是非進行辯解，這是廣州有「力」而無「理」的充分證明。

會議開始的時候有幾個演講是很有趣的。

堂堂的蘇俄顧問、廣州中央的主宰者之一的鮑羅廷，在演講中極爲尊崇孫先生，把他比作「母親」，他敘述開始和孫先生見面的時候說道：「同志們，我不是一個普通的新聞記者，走進總理辦事室談話時，滿口恭維和贊成，可是走出室外，就背地說他是一個理想家這一般人的樣子。……孫逸仙博士

委任我做政治顧問，我於是非常喜歡，我很願意和他合作。我二年的工作，都是以他的主義和教訓做材料，我只有這二種材料的工作，除了常常把主義和行爲這二方面想拉在一起外，沒有其他的工作。當我們在工作時候。常常遇到了困難，遇到了挫折，我們就去請教總理的引導。我們依了他的引導去做的時候，我們得到的結果就不會十分錯誤的。然而他現在死了，我們失去了一個導師，猶如一個小孩子失去了一個教育的母親一樣。」可是現在公佈的蘇共中央的檔案中，同樣對於最初見面的印象、對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評價，鮑羅廷對孫先生就盡情加以貶低和嘲笑。以下隨便抄錄幾段對比：「這些黨員的領袖孫中山本人所宣揚的思想，是與任何黨的精神背道而馳的。據孫的理論，人民應當知道，他孫中山正在爲全國的幸福而奮鬥，所以應該跟着他走。的確，反動軍閥妨礙人民跟隨自己的偉大導師前進，可是孫中山根本不認爲這些軍閥是中國獨特的封建武人餘孽。然而這又是可以用武力克服的障礙。他要求自己信徒們絕對無條件服從。這不僅僅有我們歐洲人理解中的英雄與群眾的理論，而且有某種開明暴君的意思。當然，事實上這樣做的結果，就只能是偉大導師又去尋求軍閥的幫助。……不管怎樣，有一點是肯定的：孫中山和我們上面提到的那些國民黨人，因受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理論脫離實際之害，目前還不是、今後長時間也不會是能夠領導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唯一理論。」（《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一〇一號文件，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日）過了兩個月，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開過，他又向莫斯科匯報，仍然大貶低孫先生：「孫中山把亨利·喬治的理論搬到中國，一步一趨，大加鼓吹，就好像是他自己的發明似的（孫中山從來不自稱是甚麼人的學生。相反，他照本宣科向之討教的那些人，反倒成了他的學生，因爲，他早就宣揚這些東西了）。……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也是如此，國民黨人所想像的民族主義，就是以聯省自治爲基礎的囊括所有少數民族的大中華形象。……民權主義是國民黨人從美國人那裏抄來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外加兩項權力，源自中國歷史。這樣從『先進國家』那裏抄

來，經過改頭換面的憲法，也說成是孫中山的發明，寫在國民黨人的綱領、宣言和演說之中。」（同上書第一一一號文件）姑且不論其內容的是非曲直，僅就鮑羅廷當面說人話，背地說鬼話來看，是何等的陰險！這樣的例子還很多，不必一一列舉。

爲了分化西山會議的參加者，鄧演達在報告中，不惜以編造的謊言爲戴傳賢開脫，可是謊言太離奇，使得戴的人格顏面都喪失，戴又不得不出來辯解。鄧報告說：「戴先生在前幾個月發表過兩篇重要文章，他的本意，原是爲見得本黨同志有些太過懦弱不振，有些不能認識革命的途徑，故發願把本黨黨員一齊喚起，一齊革命。後來有人騙他到北京開西山會議，這班人卻是違背黨綱，想利用他的文章去做不革命反革命的工作的。所以戴先生第二天便離京南下了，把西山會議的事情，一概取消，一概不理。戴先生原是抱一腔革命熱情，苦心焦慮，想找一點良好方法，能夠一同走上革命的大道，哪知他苦心孤詣的工作，卻會被人利用，覺得非常悲痛。他現在正在上海努力於反抗日本出兵這件事，向民衆活動。我相信他在相當時間一定能同革命的同志一起去做事的。以上是戴先生和兄弟談話所表現的態度。」

戴傳賢本來就一直在反共與中共之間左右搖擺，在寫了那兩本思想上批判共產主義的小冊子以後，被中共作爲了「五鬼」之一，但是他在行動上的動搖並沒有停止，經過他的朋友們的促進，才去到北京參加西山會議。卻遭到同志俱樂部的毆辱，於是離京南下，並在十二月十三日發表脫離政治的聲明（詳見下一節），給蔣介石的信中更敘述衷腸，使得廣州中央瞭解他在行爲上反共是不得已，因此在這「二大」上由鄧爲他下台階說話和進一步拉攏他。這反而使得戴傳賢不得不就鄧的報告發表聲明：「鄧君到潮州來看我，我正在苦病的當中，鄧君問及我西山會議的事，我說關於西山會議，本來不是我的發起，我接到召集電的時候並不是很高興去。……可是到了北京之後，四圍的空氣，很有使我難處的地方，所以我在二十日便行出京，但是我卻以書面聲明，在一定的主張下面，我可以同意會議的議決。發起西山

會議的人，是當年總理在大會提出通過的執行委員。他們的發起動機，是因為北京執行部強橫非法的行動的結果。總章上面，既沒有規定全體會議必須在何處開，那麼執行委員因實際必要，在任何地方召集全體會議，都是當然可以的。至於會議人數齊不齊，會議的成功不成功，決議的適當不適當，這是另一個問題，有甚麼騙不騙呢？鄧君的報告中，說我之到北京，是被人騙去的，這一種觀察，不但是蔑視許多執行委員同志的人格，也太蔑視我的人格了。我也很想得出鄧君的意思，是他個人以他自己的好意，想要在大會上爲我說法，可是這一種蔑視我人格的話，我卻不能承受的。至於他在報告中又說，他現在正在上海努力於反抗日本出兵事件云云，我伏居在窮鄉僻壤何嘗到過上海，何嘗努力甚麼。」②本來戴已經兩面不討好了，鄧演達想編造事實來掩護戴傳賢過處分關，把他拉過去。戴雖然在廣州「二大」中當上了中央執行委員，他的人格和信譽卻受損了，以至於他又不得不出來爲被開除的謝持、鄒魯說幾句好話。

廣州「二大」的重點，是對付北京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各項決議案，是以分化瓦解、各個擊破辦法，清除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執行委員們對最高權力機關的掌控，然後建立汪兆銘—蔣介石—中共的聯合執政體，即選出由這三方面人士掌控的最高權力機關——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具體做法是：迴避北京的第四次全體會議的各項決議案，即思想主義方面；將主要的人員開除出黨，而建立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即組織方面。

那時候，中共的勢力只在沿海的大中城市，所以這時候的廣州中央「二大」雖然來勢兇猛，基礎卻並不雄厚。這從基層的反對西山會議的各種電文可知。根據廣州國民政府檔案「廣州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最早發電掩護汪兆銘感電和召開「二大」，可這是在廣州市黨部的長期領導人孫科和黃季陸等都被迫離開以後，才有這種電文的發出；同一天，上海第九區第二分部

「請嚴行制止、切實查辦」「叛黨同志俱樂部分子林森、鄒魯」「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電報，仍然不能改變汪兆銘——中共在上海力量的薄弱情況，因為在改組之前，這裏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所在地，其長期主持者是居正、張繼、謝持等堅決反共的資深黨員，孫文主義學會也強有力，所以能夠輕易地驅逐上海執行部中的中共黨員（北京執行部則兩樣），新的中央黨部能夠在環龍路第四十四號順利辦公，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能夠順利在這裏召開；至於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特別黨部第四分部、廣東佛山市黨部、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官學校分校幹部、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特別區黨部、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二師政治部等，本來就是中共黨員直接控制的部門，根本不能說明汪兆銘——中共在國民黨內部的根基。

一九二六年元月十三日，廣州「二大」的主題開始，即懲處參加西山會議的諸人的問題。《關於彈劾西山會議審查報告書》的「審查結果」部份如下：

（二）審查結果：

（甲）謝持、鄒魯擬處以永遠開除黨籍處分。

（乙）居正、石青陽、石瑛、茅祖權、覃振、傅汝霖、沈定一擬處以暫時開除黨籍之一年處分。

（丙）張繼、林森、邵元沖、葉楚傖、張知本擬處以用書面警告處分。

（丁）戴季陶擬由大會訓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誤。

之後，由汪兆銘提出修正意見：「兄弟以為應把第二項暫時開除黨籍的都併入第三項辦理，給大家知道西山會議都是一、二人主動的事，其餘概予以自新之路。」

在元月十六日，會議通過了決議案，全文如下：

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

關於本黨少數中央委員及監察委員發起西山會議，大會接受各地報告之後，認定此等舉動，純屬違法，並足以危害本黨之基礎，阻礙國民革命之前途，非加以嚴重之處分，不足以伸黨紀而固吾之團結。大會聆悉關於本案之審查報告以後，認此事為吾黨成立以來違背黨紀之重大事實。但西山會議諸人，有主動最力而蓄意謀危本黨者，有屬於附和因一時之誤解為人所愚而致引入歧途者，有因本人的主張不同，而致為人利用者。情節既有主從之分，則處分自不能不有輕重之別。茲特按照各人之行為，判定其應得的處分如左：

(一)謝持、鄒魯二人，自民國十二年即在北京組織民治主義同志會，其意即欲於本黨之外，自成私人團體，以謀一己之利益。此次在京發佈種種反對國民政府言論，污蔑同志，破壞黨政府之信用，縱無西山會議，亦當處以嚴重處分。況此次西山會議，謝、鄒二人事前奔走聯絡，利用同志會之分子，搗亂北京執行部，更進而發起西山會議。事後又派遣黨徒分赴各地聯絡，攘奪黨部。故謝持、鄒魯二人，純為主動之人，其違反黨紀，以此二人為最。謝持、鄒魯應永遠開除黨籍。

(二)居正、石青陽、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權、葉楚傖、邵元沖、林森、張繼、張知本等十二人，附和謝持、鄒魯，除張知本外，均參加西山會議，實屬違背紀律。張知本雖未到會，然未聲明與西山會議脫離關係，亦不能無附和之嫌。唯此十二人，並非西山會議之主謀，略跡原情，由予以自新之路。由大會用書面向上列十二人提出警告，指出其錯誤，責其改正，並限期兩個月內具覆於中央執行委員會。若此十二人中有不接受大會警告者，是甘心背叛本黨，而與謝持、鄒魯同趨，中央執行委員會應已執行紀律，開除此不接受大會警告者之

黨籍。

(三)戴季陶於去年五月，曾在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起草關於容納中國共產黨分子加入本黨之訓令，乃曾未一月，未得中央執行委員會許可，即以個人名義發佈《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以致發生不良影響，惹起黨內糾紛。但於此次西山會議，始終未與會。離京之日，曾函吳稚暉同志表示悔悟。總核其個人言動，雖或出於愛護本黨之熱情，然因此致為反動分子利用成為破壞本黨的工具，與戴同志原意適得其反。唯念戴同志為黨奮鬥有年，翌贊總理改組本黨，頗有勳勞，應由大會予以懇切之訓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誤。大會對於西山會議一案判決如此。其有與別案關涉者當另案處理。

所謂「別案」，是在反對妥協退讓的中共強硬派的提議下，通過的處置西山會議參加者的其他議案，如《列名西山會議諸人兼有其他違反黨紀行為應另行處分案》、《厲行紀律案》等，於是對於已經從輕處置者，大部份仍然開除：

一、參加西山會議兼有其它違反黨紀行為者：

(一)居正參加西山會議，且加入北京同志俱樂部（按為馮自由、馬君武等於十四年四月所發起），現仍不顧警告，在湖北從事搗亂，應永遠開除出黨。

(二)石青陽列名同志俱樂部，且曾勾結軍閥，陷害同志，亦應開除黨籍。

(三)覃振、石瑛、茅祖權列名北京同志俱樂部，限於兩個月內登報聲明，脫離關係，否則表示自絕於本黨，亦應除名。

(四)邵元冲尚在上海主持偽中央執行委員會，應令其立即停止進行，否則亦應除名。

(五)葉楚傖尚在主持反動之《民國日報》，除警告外，應令其將《民國日報》交出改組，並

停止葉氏職務。

(六)沈定一在浙江不服從中央命令，並仍在主持其反動之浙江省黨部，亦應令其停止進行，否則除名。

……

四、桂崇基、周佛海、劉啓明、沈儀彬、劉蘆隱、馬超俊、郎醒石、袁世斌、黃季陸九人，皆參加上海偽中央執委會，應由大會予以嚴重警告，限令於兩個月內具函送中央執行委員會聲明脫離關係，如屆時仍不聲明，則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予以永久開除黨籍處分。

以上處分的輕重固然是廣州中央——中共的策略考慮，但是也反映他們是知內情者。汪兆銘在廣州「二大」上說「一兩個人最可惡」、「那一兩個主動的，自然應開除黨籍」，當然是指的謝持、鄒魯；但是晚到會，並且沒有參加會議籌備的居正，所受到的處分和謝持、鄒魯一樣重，爲甚麼？西山會議的大部份會議都由林森主持，並且林森也是最早到北京活動和發起者之一，處分卻輕。尤其是戴傳賢，曾經是中共最憎惡的「五鬼」之一，雖然在北京被同志俱樂部毆打，處分在所有人當中是最輕的。爲甚麼？其中的恩怨大概已經不能夠全部揭開，卻可以大致知曉。

根據在上海的商議（見鄒魯著《西山會議》），由謝持先到北京籌備會議，所以在會前反覆走訪李烈鈞、于右任、石青陽、石瑛等，籌備了大會；當在北京執行部開會遇到中共黨員于樹德的阻撓時，決定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也是由謝持去找鄒魯、林森做出的決定（根據謝持的日記）；于樹德在給廣州中央的告密信函中，指出了謝持、鄒魯、林森的重要作用，這大概是處分的依據之一；那時候的所謂「左派」丁維汾在廣州「二大」的關於北方黨務報告中，專門指出謝持培養「民治主義同志會」反共的罪惡，在處分時作爲重要依據。根據中共的各種回憶錄，民治主義同志會是中共在北方活動與發展的最主

要障礙，也是西山會議能夠在北京舉行的群眾基礎，當然引起廣州中央的憎恨；並且謝持從中國國民黨成立的時候開始，就是國民黨專門管理組織工作的部長，雖然中共黨員譚平山在改組以後接管組織部長，但是只能在沿海城市有中共黨員的地方活動，謝持當然被他們憎恨。

由於鄒魯是孫先生改組以來最受信任的人之一，擔任青年部長、廣東大學校長，孫先生將整個青年的工作交給他，所以他主持的廣東大學和教育界成了中共打不進的堡壘，被視作反共大本營；他以中央常務委員的資格，按照原則辦事，使得汪兆銘——中共很難以利用和奪取這最高權力機關，而不得利用政治委員會，但是利用政治委員會超越了諮詢機關的權限又引起了監察委員的追問和彈劾；鄒魯不僅僅發起和籌備了西山會議，一系列揭露鮑羅廷——汪兆銘——中共的文獻都是由鄒魯寫作，使得西山會議的基本精神得以傳達到全國各地，這引起了廣州中央的極端仇恨，所以處分最重。

居正既沒有發起會議，又沒有參加籌備，處分卻是和謝持、鄒魯一樣重。因為鮑——汪——中共知道，居正是國民黨核心成員中最早反對蘇俄——中共之一，只是以消極方式而已；一旦居正正式站出來，其影響就非同小可。因為居正從中華革命黨成立到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前，都是孫先生最信任的國民黨的幾個核心成員之一，長期主持中央黨部，在黨內的地位高於汪兆銘；在孫先生剛剛去世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居正就與謝持一起主張修改選舉法，以免中共控制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參加西山會議以前，受到張靜江的勸阻，而堅決北上參加大會，並且參與了會議的各項文件的起草修改工作；會議還沒有結束，就回到故鄉湖北，以他的威望和人際關係，進行了反對廣州中央的活動。所以在討論處分的時候，第一三九號代表就發言指出，由於「居正之於湖北，沈定一之於浙江，謝持之於四川，鄒魯、林森之於北京，均有反動事實。如果不嚴加懲戒，豈不是黑白不分？」

西山會議的大部份會議都由林森主持，並且林森也是最早到北京活動和發起者之一。但是在廣州

「二大」的最初的處分議案中說：「林森，平日本無他，此次純然受人包圍。」林森是孫先生的好朋友，曾經擔任非常國會議長，平日以德高望重聞名。在一九二四年夏天的著名的彈劾共產黨案中，根據蘇俄剛剛解密的中央檔案記載，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十次會議的報告》中，張繼因為反對鮑羅廷為中央政治委員會顧問，當着孫先生的面和譚平山進行了激烈辯論，最後一段是：「張繼憤然起立，主席胡漢民制止，說廖方才的話指的是另外一個問題，要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專門會議解決。林森支持共產黨，說只要共產黨遵守國民黨宣言和三民主義，國民黨就不應分共。」（第一一七號文件）在國共之間的各次衝突中都不見林森表示態度。林森最早的反對廣州中央的記載在鄒魯的文章《與共產黨奮鬥和北上侍疾》中：國民政府成立這樣重大的事情，僅僅由諮詢機關政治委員會決定，常務委員鄒魯和執行委員林森都不知道，所以他們共同去出席中央常會，使得林森非常氣憤。品行端正的林森後來遞補廖仲愷成中央常務委員以後，當然不會跟隨鮑——汪胡作非為，所以遭排擠離開廣州，因此發起西山會議，但是和鄒魯、居正、謝持這些一貫的反共者不一樣。在廣州企圖分化瓦解西山會議反共陣營的時候，企圖對林森加以利用，林森當然不為所動。

張繼受到從輕處置也是為了分化反共陣營。張繼與謝持、居正一樣是反共最早最堅決者，鮑——汪——中共對他是相當憎恨的。也許，因為張繼身在北京，較少參加了會議，使得廣州中央對他抱有幻想，欲加以分化利用，在《處分西山會議案記錄》中說，「張繼則僅到會一次即大哭而返」。根據邵元沖的日記：「午後開談話會，列席者余及稚暉、海濱、理明、季陶、楚傖、劍侯、慧生、詠薰、沐波諸人。又溥泉亦來，以齒疾未癒，少坐即去。」張繼怎麼會哭呢？是牙齒痛；現在的其它文件以及《清黨實錄》中保存下來的會議記錄，都記載參加第一次會議的人中有張繼，可見汪是胡說；並且幾乎所有署名的文件中都有張繼，有時候領銜。很可能因為汪兆銘在國民黨內太孤立，不得不把參加者說成那樣勉強，把

西山會議說成是個人的行爲，以便貶低會議的整體意義，並且可以收到分化瓦解對方之效。

戴傳賢的最輕的處分，以至於他自己都感到難堪，這要歸功於廣州的第二號人物蔣介石。

戴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公開發表《解除政治職責電》和《解除政治職責宣言》，突然宣佈不問政治，也許出於他一貫的調和立場，但實際上是幫助廣州中央，第一個拆西山會議的台。戴傳賢雖然在北京被同志俱樂部的人痛打，但是他發表的談話仍然認爲，「是日毆我之人論，其中多數仍爲有用之青年，唯以不明事實而受人利用」；並且發表書面聲明，在一定主張之下，可以同意會議決議，所以西山會議做出的各項決議仍然有戴的名字；初回到上海的時候，他參與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籌建。但是他公開改變立場時，他發電報的首要對象卻是「廣州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執行部」，他的聲明不過問政治的電文，卻是以承認鮑羅廷——汪兆銘的廣州中央爲前提的。本來在戴所列名的西山會議的各項決議之中，已經根本不承認廣州中央的存在，只是設在上海的中央黨部的廣州執行部而已。如今戴這樣做，實際上是對於西山會議的最早、最嚴重的背叛，是對政治的最大過問。戴所脫離的，只是墨跡未乾的西山會議的政治立場，而投身到廣州中央的懷抱之中；他一生都是一個政治人物，這自然是他的新的政治行動的方式而已。蔣介石發表他在國內親近蘇俄的第一篇講話《聯俄的意義》，則是在十二月十一日，在戴的「不過問政治」的講話之前兩天。從戴、蔣在日本的時候起，到這時，以及到戴臨終，他們二人在國民黨內外的一切風風雨雨中，都是最親密的夥伴。只是後來在西安事變中，戴主張強硬，而少顧及蔣介石的生命，使得他與蔣介石的關係略受到影響。

在宣言中，戴傳賢舉出了他「不過問政治」的理由：「數月以來，凡所聞見，無不足憂，益知左右傾已成騎虎，非理與情所能化。而振興緒統，建思想與事業之中堅，則又絕非懦弱之我所能勝。……數月來竭盡愚誠一無所達，則余之絕不能勝黨國重任，已顯明無餘矣。是以決意解除一切政務黨務之職

責，並宣誓不再任一切黨務之責，自今以後，余願盡個人所能，從事於學術。」對於一個從事政治活動的人來說，這當然不能成立，所以和他比較接近的邵元沖在日記上罵他有毛病，並且設法不要在報紙登載：十二月十五日：「……接季陶一信，並宣佈脫離政治、黨務關係之宣言，想腦疾又劇，殊為可異。又聞已付各報登載，餐後乃偕蘆隱至《民國日報》通知各報勿予登載，又至《商報》與陳布雷談。」十二月十六日：「……午後作寄季陶一函，告以現時個人對黨之不能分離暨此後工作之偉大及希望之可以成功、對青年方面之有辦法，勸其仍宜繼續負責等語。晚與楚儉、哲生、蘆隱等討論黨務進行及黨部組織綱領。」

戴傳賢公開脫離西山反共的政治活動，並且給剛剛才結束的西山會議反共活動一擊，所以廣州中央立即給他以獎賞，任命他為廣州大學的校長（因為鄒魯剛剛被撤職而引起大批教授學生離開學校的風潮），十二月的上海《民國日報》登載了戴傳賢拒絕這一任命的消息；鄧演達在廣州「二大」上為了使得這個被中共稱為「五鬼」之一的人開脫，由於編造的謊言過於離奇，以至於戴不得不說：「現在把一切都抹煞了。卻只把我一個人的名字，拿來製造笑罵的材料，這是何苦呢？」（《對於鄧演達報告的聲明》，《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九八七頁）這些公開拉攏，對於一個知識分子是難堪的。

這其中的關鍵人物是蔣介石。

大半個世紀以來，國民黨在大陸和台灣出版的許多重要的歷史書中，都敘述蔣介石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如何為西山會議諸人辯護，從而減輕了對他們的處分。在毛思成編著的《民國十五年前的蔣介石先生》中，所謂為西山會議說情的原話是：「公主張西山會議提案不提出於此次大會。」蔣介石親筆在主張前面加上「堅決」二字，如今《蔣介石年譜初稿》對蔣介石親自增刪的字都特別標出。但是蔣介石的《聯俄的意義》的講話發表在廣州「二大」之前二十天；《對西山會議告國民黨同志書》則發表在

廣州「二大」前只有幾天，特別是在廣州孫文學會成立前夕，是軍方勢力人物對於會議最基本問題的表態；在過了十幾天以後，廣州「二大」做出了處分西山會議參加者的決定，蔣介石恰恰是以勢力促成者。

就在廣州「二大」開始的元旦那天，那時西山會議還沒有閉會，中共的主要領袖李大釗在北京的升旗典禮上發表演講（登載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的《國民新報》副刊第三十一號），引用了蔣介石的話，李說：「蔣介石同志在他所作的《〈黃埔軍校同學錄〉序文》中，有幾句最沉痛的話，大意是說：『我們所能告慰先烈的，就在我們有總理遺留給我們的一系列相傳的國民黨內共產主義者與非共產主義者凝結而成的血統，繼續國民革命的大業。我們悔未問過那些殉死的先烈們，是為共產主義而死呢？抑為三民主義而死呢？但是我們可以替他們回答道：他們是直接為總理三民主義而死，間接即為國際共產主義而死。』我們同志們應該諦聽介石同志沉痛的話，本着我們黨內三民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凝結而成的精神，踏着他們提攜前進的血路，為革命的工作努力，把一切的猜嫌疑忌蠲除淨盡。」③不僅僅這段政治話說得很動人，而且出自軍事強人之嘴，李大釗正好給同在北京的國民黨人以示威。

國民黨的官方史家，還反覆多次引用做出處分決定的頭一天，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為西山會議說情，請求寬大處理，以掩飾蔣介石支持中國共產黨和汪兆銘的事實。所引用的蔣介石的原話只有這抽象的兩句：「我們只有以總理之心為心，以總理之志為志，以總理之政策為政策。」蔣介石真的為反共的中國國民黨員說了情嗎？查這兩句話出自《黃埔軍校歡迎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再論聯俄演講詞》（引自《蔣中正演講錄·最近演講之二》，三民出版部印行），與掩蓋者的說法相反，蔣介石全面支持中共。蔣介石在開始的時候說：「現在總理的精神寄在哪兒呢？就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諸同志的身上，今天我對諸同志報告，就是對總理報告一樣，不敢有絲毫虛假，本來總理既死，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總

理的化身，因為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秉承總理遺志，繼續總理生命的一個關鍵。」一個最有勢力的軍人，對於爲鮑羅廷——中共——汪兆銘所控制的、基本爲蘇俄利益效勞的會議，這樣肯定，是會議能夠處分反共國民黨人的保證。蔣介石演講道：「我們聯俄，意在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因爲中國問題，完全是世界問題，中國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我們要中國革命成功，一定要聯合世界的革命同志，才能打倒世界的帝國主義；世界帝國主義果真打倒了，中國革命方能成功。一定要聯合世界革命的同志，才能打倒世界的帝國主義；世界帝國主義果真打倒了，中國革命方能成功。由此我們可以下一個中國革命聯俄的定義：『我們聯俄，實在是聯合世界革命黨，打倒世界的帝國主義，完成世界革命。』所以我們聯俄，不可當作俄國一國看待，亦不可當作聯俄國政府看待，我們要當作聯合蘇俄全體人民和蘇俄全體革命黨同志看待。」蔣介石非常明確地把中國的國民革命劃入了蘇共領導的世界共產革命的範圍，所以聯俄是絕對不能夠反對的。他又說：「總之聯俄是總理定下的政策，總理的一切方針和目的，決不會有錯誤的。我們對俄國認識的地方，在客觀方面，是認識他蘇維埃憲法和制度上得來的。由這點再看到他全國的民衆現狀，是再不許他有覆蹈帝國主義覆轍的餘地，所以說俄國同志要到中國來攬權竊柄，想來侵略中國是事實上做不到的。……此外認識俄國還有三點：（一）我們中國的敵人，是帝國主義者，俄國的敵人，亦是帝國主義者，如此中俄的敵人是同一個。（二）俄國現在的政策，是謀解放世界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本黨的綱領和政策，也在謀解放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政策既同，而且我們中國自身又是被壓迫民族，現在各國，只有蘇俄是中國的良友。（三）俄國在中國革命的立足點上，認識三民主義是爲中國救國救民的根本主義，由此決定中俄兩黨聯合共同奮鬥。……不但中國共產黨黨員在本黨是實行三民主義，就是俄國同志，也是在中國國民黨內做三民主義的工作，並且要請各位代表同志，開完大會回到各省時，對於反共產同志，可以問問他們，本黨的共產分子現在所做的有哪一件事不是三民主義，諸位

這樣問他們，且看他們還有甚麼話來答覆。」蔣介石的演講完全將中國國民黨和蘇共的性質、目的等同起來，怎麼會要求從寬處理參加西山會議的人呢？就在這份演講中，他要求「嚴重處置」，而不是許多爲蔣介石護短的人說的那樣是「從寬處置」，蔣介石說：「我們只有以總理之心爲心，以總理之志爲志，……那麼究竟用甚麼方法來解決這個糾紛呢？我們只有二種辦法，一方面是要整飭紀律，對於犯法的黨員，要嚴重處罰；一方面是要安慰總理的靈魂不使本黨分裂，這樣既可以整飭紀律，又可以團結同志。」這正是蘇俄的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的翻版。所以汪兆銘在第二天的大會上根據此意思說：「昨晚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及黃埔軍校代表各同志曾爲西山會議開過一個討論會，蔣中正和兄弟都曾列席。討論結束，大家都以爲對於此案之處分，最好以總理之心爲心，……那一兩個人主動的，自然應開除黨籍，但其餘有一時受惑或受人利用的應該從寬處分。」這完全證明是汪蔣聯合起來，以軍隊爲後盾力量，對西山會議的參加者加以處分；只是因爲西山會議參加者衆多，所以將參加者分別對待，將會議整體說成是個人行爲，既打擊了參加者，又否定了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整體，還爲蔣介石的親密夥伴戴傳賢等開脫。並且僅僅以汪兆銘一個中央執行委員召集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處置了對手以後，就像戰爭對待「俘虜」一樣，給他們以寬大，其中特別寬大像戴傳賢這樣以調和爲名的投降者。汪、蔣都是以出賣國民革命給中共爲交換條件的。並且這所謂的「寬大」，實際並不出於他們，而出於第三國際策略的轉變（下一節將要略述）。

處分了西山會議諸人，然後就是權力瓜分：根據張國燾從上海帶來的第三國際的退讓策略，中國共產黨在中央執行委員所佔的比例，由原來計劃中的三分之一下降到只佔六分之一；一批和國民黨的奮鬥歷史從來沒有關係的人，由汪兆銘拉進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從此以後汪就再也不是光桿司令，這就是後來一直跟着他沉浮的改組派；從來不曾參與過黨政工作的蔣介石，一躍而爲中央常務委員，黃埔系的何

應欽、繆斌和陳果夫也進入了中央。中國共產黨因為受到汪兆銘的扶持而起來，有關的揭露已經很多，其實同樣重要的還有蔣介石。

查一查那時候的報刊，都以汪、蔣並稱，連和蔣親密的吳敬恒、李石曾在廣州「二大」以後致電林森、鄒魯，以調和為名為廣州中央說項（清黨實錄第三十四頁），一開頭就說「廣州汪、蔣諸君應付過當……」，也證明廣州中央是二者的聯合；這二者再加上中共，就被稱為「廣東混合黨」（見居正著《梅川譜傷》民國十五年的段落），對此，蔣介石從來是諱莫如深的。在蔣介石去世以後，才由中國青年黨人沈雲龍在台灣出版的《清黨實錄》（大海出版社出版），也不得不將所有蔣字抹去，留下空白；《致蔣介石同志書》（第一〇二頁）把蔣介石三個字去掉，成為無受書人的空白。這是蔣介石對於這一段與汪、中共互相扶持以奪取權力的歷史極端心虛的表現。

可以說，沒有蔣介石的軍力作為後盾，廣州「二大」就難以順利開成，這個「混合黨」就難以建立，因為這個「混合黨」的基礎薄弱。那時候，中共最擅長的農民運動才剛剛起來，並且只在海豐、陸豐一帶，根本不足以左右形勢；廣州市的工人運動，由於原來反共的領導者謝英伯、馬超俊作過深入的工作，中共並沒有佔到上風；社會運動的先鋒學生界，則長期由鄒魯領導，中共毫無辦法，因為鄒魯被廣州中央解除廣東大學校長的職務，而退學的學生達到六百多人，在廣州孫文主義學會成立的時候，最有力的支持者就是廣州學生聯合會；軍人之中，反對中共的孫文主義學會和親近中共的青年軍人聯合會，處於尖銳對立的局面，蔣介石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正是廣東反對中共力量的大聚會的前夕，曾經從潮州打電報給廣州孫文主義學會，要他們不要涉及黨務。兩天以後，蔣介石發表他反對西山會議的《告同志書》，以軍隊最高指揮官的身份壓抑廣東的反共力量。以下試舉兩個例子，說明蔣介石以軍隊壓住廣州反對中共強大勢力，使廣州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得以召開：

一、受到西山會議的影響，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廣州二沙頭魏邦平的家裏召開有二千多人參加的孫文主義學會成立大會的籌備會議，會中決定向廣州「二大」提出決議：「A·凡是國民黨員不准加入其它的政黨。B·跨黨黨員應無被選舉權。C·凡國民黨員不能宣傳其它主義及政黨。D·以上三條由學會名義提出中央秘書處提交全國代表大會。如果大會不接受，則用手槍對待反對的人。」③這是何等的激烈；於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廣東大學的操場舉行廣州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典禮，參加者竟然有數萬人，聲勢浩大。反共的群眾運動在強大的軍方壓力下，能夠有此盛況，可見其潛在能量之巨大。

二、張靜江檔案保存了汪兆銘的心腹王懋功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致張靜江函。蔣介石對軍隊是絕對地獨佔，根本不能容忍汪的人擔任第一軍第二師的師長兼任廣州衛戍司令，所以在廣州「二大」剛剛閉幕的二月五日就被趕走，這是王裝出一副可憐樣子向蔣介石的密友述說：「及賀衷寒等到省開該會成立大會，謀以孫文主義學會作全國之運動，將學會與黨並立，其種種不軌行爲，聯絡各處反革命派之孫文主義學會，鼓動第×師全體武裝加入巡遊，反對第二次代表大會共產分子當選，爲彰明較著之反共產行爲，身××（按：以下二字不清楚），諸如汪先生，鮑羅廷同志等，親見親聞。當時廣州市人心惶惶，發現西山會議及贊成西山會議傳單，一、三兩軍亦爲震動（汪先生言之），並於廣州市內發現倒蔣口號（此爲國民政府副官潘文治倉皇走告者）。功彼時奉校長、黨代表嚴厲制止該會巡遊如違逮捕之命，且身爲師長兼代衛戍，主持全軍後方，責任何等重大。設若因巡遊而危害本黨，牽動大局，懋功何以對黨，何以對介公及一般同志，故不得不×嚴重制裁之手段，解此危難。舉動措施雖無利於該會，但自問本軍以及本黨非此不足以顧全大局，解決目前糾紛。……及校長反省，汪先生及鮑羅廷同志等將該會經過情形盡情吐露，共謀挽救之法。功因其問題重大，未敢妄置一辭。校長之大罵該會賣黨並賣本軍，不應與鄒魯等勾結，及痛責……等。」⑤這一段向蔣介石的密友表功的肺腑之言，不僅僅證明了蔣介石的親共

立場，尤其證明了如果沒有蔣介石掌握的軍隊的威懾措施，遍佈各界的反對中共的力量，尤其是軍隊中的力量，很可能將要阻止汪兆銘——鮑羅廷——中共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那時廣州已經動亂在即。

黃埔軍校的教務長，也是孫文主義的負責人王伯齡在多年以後寫道：「學會呢，經過一兩年的努力，誠足驚人，共產黨承認他們的失敗，承認不能與我們抗衡。我們勢力既足，要給他們一個致命之打擊，甚麼呢？就是學會要正式成立，來個大遊行，這是他們的致命傷，何以呢？參加我們遊行行列的人起碼有三十萬，而且多數是工人。若此一來，共產黨的西洋景完全要拆穿了，完全沒有立足的餘地了。這個消息出來以後，共產黨大大地驚慌，陰謀阻止我們的遊行。想來想去，還是利用他們的走狗，我們的汪黨代表，大電報到汕頭，不知講了些甚麼，蔣先生嚴令來了……。於是大家去找汪黨代表。……。他代表共產黨讓步了，提出遊行可以，但只可極少數人參加，開會可以幾十萬人一齊參加。我想他夠受了，不要急壞他，索性說：『遊行不遊了，三兩千人遊行，人家還以為孫文主義學會只有這樣少的人呢，我們就僅僅開成立大會罷，也不必這麼多人。』」⑥如果蔣介石的立場兩樣，以這樣深厚的群眾基礎，加上軍隊，這為第三國際服務的、被中國共產黨操縱的廣州「二大」能夠開得起來嗎？

蔣介石以軍隊壓制了廣東根據地的反共群眾運動，壓制了西山會議主張在全國的響應貫徹，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與中共一起，將中國推向了左的軌道。

一九八九年才公佈的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共中央文件揭示，中共在廣州「二大」取得勝利以後，又計劃進一步奪取政權：文件名稱：《中央通告第七十六號——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我們應做的工（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二日）》。第二部份是策略問題，共分爲(A)、(B)兩部份，「(A)C.P.與國民黨合作政策，仍當繼續從前的政策，與左派結成密切的聯盟而與大多數群眾接近，竭力贊助左派發展革命運動

的工作，竭力贊助左派對右派的鬥爭，竭力擴大左派的組織，同時，又要到處擴大鞏固我們的黨。因爲左派的發展是要以C.P.爲核心的，離開了C.P.，絕不會形成一個有力的革命黨左派。」中共所謂幫助革命黨的用心已經暴露無遺，不必再加以說明。(B)部份是分化所謂右派的策略，這策略已經在分化西山會議的反共人士方面獲得了成功，但是中共內部是如何策劃的，則比較少見。這部份分爲四條，在開頭說道：「……我們應建立一民衆團體的聯合戰線，我們要在這個聯合戰線的策略中去減輕右派的反動力量，去拉住一部份較好的右派首領，去取得右派下面的群眾。實行這策略應注意下面幾點：一、在現時中國大革命的高潮中，沒有確定的右派，因爲確定的右派一定要成爲反動派。現時的右派首領，多是很多動搖的，常常徘徊於革命政策與反革命政策之間，尤其是右派下面的群眾，性質更不固定。所以我們對於右派的政策，決不能籠統的把他們看成是與左派敵對的固定的組織，更不能逼他們團結成一氣，把他們看成整個對象來攻擊，我們而努力使他們逐漸分化，好的走到這方面來，壞的驅逐出國民革命戰線之外。聯合或戰線的政策就由此產生。二、我們一方面要努力反對右派的口號策略，努力宣傳左派；一方面又要講聯合戰線……。三、應設法抓住右派中比較左傾的首領，應把他放入各級組織之內，使他在左派勢力包圍之下……。」⑦中共把張靜江、戴傳賢、孫科、邵元沖、葉楚傖等反共的國民黨員拉到廣州，參加或支持廣州「二大」，就是中共的策略的勝利。的確，從現在存留下來的中國國民黨的黨內文件，從來沒有發現像中共中央這樣細緻周到、按部就班的防守策略，更沒有對付中共的進攻策略可以談了。而那些當年被中共拉過來的反共人士，絕對不會想到，他們正在被中共牽着鼻子走。

三個月前的九月二十日，蔣介石才因爲驅逐了許崇智獲得了軍權；憑此，聯合汪兆銘和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廣州「二大」，獲得了黨權。哪怕蔣介石明白蘇俄——中共的野心，他也要繼續支持這「混合黨」的中央繼續下去，這是他的利益所在。

汪兆銘、蔣介石和中國共產黨的大聯合，以力量製造了一個新的國民黨中央。

註釋：

①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四輯（上），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

② 《戴季陶文存》第九八六至九八七頁。

③ 《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第二五五頁。

④ 《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第二〇八至二〇九頁，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廣東。

⑤ 同註釋①的第三三一頁。

⑥ 轉抄自《中華民國史實紀要》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⑦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二六）第一七四至一七七頁，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

二十、主義與利益的選擇

第三國際對於國民黨內反共勢力的昌盛相當緊張，擔心這會造成蘇俄在中國的失敗，因此不滿意鮑羅廷在廣州的所作所爲。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書記瓦西里耶夫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向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報告說：「(1)國民黨和中共之間的關係目前是(部份地已經是)非正常的，後果堪虞，極其危險。(2)兩黨之間的關係之所以呈現這種狀況，是因為中共許多領導人員不大清楚民族解放運動的任務、中共在其中的作用以及中共目前的總任務所致。這是左傾危險，而且犯此弊病者，尤以我們的軍事幹部爲甚。(3)此外還有這樣一個印象，即我們的中國領導同志過份熱衷於軍事和外交問題，至使民族解放運動中爭取群眾的工作受到嚴重影響。……我的建議是：(1)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應盡快重新研究國共關係的性質問題。領導國民黨的工作務必身份謹慎。黨團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發號施令。共產黨不要硬求派其黨員佔據所有軍政領導職位，相反，應該廣泛接納不是中共黨員的國民黨員參與重要工作。」(第一七六號文件)①因爲鮑羅廷利用廖仲愷被刺事件，將所有所謂右派都趕走，造成了廣州爲所謂左派的天下和國共關係的全面緊張。寫信的時候雖然還沒有召開西山會議，但是蘇俄官員的政治嗅覺已經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而提出建議補救。其建議是十分狡猾的，即「領導國民黨的工作，務必十分謹慎」。證明廣州的國民黨已經被鮑羅廷——中共在領導了，但今後務必不露聲色。

爲此報告，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草

案》，幾乎按照瓦西里耶夫的建議逐條發出指令，檢查同國民黨的關係（見第一八二號文件）。

共產國際遠東局局長魏金斯基在九月二十八日提出書面報告，第二部份是《關於國民黨問題》說：「我想，國共摩擦的主要癥結，就在於我們黨還沒有在政治舞台上充分亮相，在許多地方還沒有明確建立我們的組織，因而國共關係若明若暗，乃至引起左派懷疑、更給右派以口實叫嚷共產黨要奪國民黨的權。……我們的同志，尤其南方的同志犯了不少錯誤。一方面，他們沒有在廣州建立起適應革命時期客觀環境的黨組織，另一方面，他們又過份暴露出急欲控制國民黨機構的意圖。……關於國共關係的特別提綱，是陳獨秀同志擬出的，其中提出了調整兩黨關係的實際措施。要點是，不一定急於進入國民黨領導機構，而應多做群眾工作，當然要繼續留在工農部門和軍隊的政治機關工作。不讓剛入共產黨的人加入國民黨，尤其是工人。再者，在國民黨的廣大黨員中做大量的解釋工作，宣傳國共兩黨聯合和組成統一戰線的必要性。……」②蘇俄和中共黨徒都是非常精明的，他們都不僅僅能夠發現由於奪權行為造成國民黨內部的普遍反共情緒，而且及時地提出了補救措施，但是其狼子野心更加可怕。以這些內部文件對比蔣介石為中共、汪兆銘、鮑羅廷的辯護演說，再和西山會議的揭露蘇俄——中共——汪的各項決議對比，西山會議和蔣介石誰對誰錯一目了然。

蘇共中央新公佈的檔案中，還有共產國際的兩位領導官員之間對於國共關係的討論，即瓦西里耶夫致信魏金斯基，時間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這些討論導致了他們對付國民黨的策略的大改變：「我們覺得，廣州已經箭在弦上，那裏已經在鋌而走險，過河拆橋，要把聯繫共產黨先鋒隊同民主派群眾之間的橋樑全部燒燬，從而使中國共產黨徹底受到孤立，並招致不堪設想的後果。比如，我們對胡漢民事件一無所知，接着又是一些國民黨活動分子被迫去職，又是解除許崇智的武裝，不一而足。……鮑羅廷的報告一到，我們就有新證據，知廣州左傾，日趨孤立必將自取滅亡，儘管鮑羅廷解釋說此乃形勢瞬息萬

變在所難免。眼下我們提出的這些問題意義更加重大，因為反動勢力已經開始發難。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有些甚麼針鋒相對的反措施？……」鮑羅廷聯合汪、蔣在廣州乘廖案發動的政變，雖然得逞，但是付出了重大代價，就是國民黨人的普遍反抗。這就導致了以上信件中所敘述的「箭在弦上」、「中國共產黨徹底受到孤立」、「必將自取滅亡」的嚴重形勢。這使得敏感的蘇共中央的中國通打算改弦更張，等待「關於廣州形勢的詳細報告」，以便採取新的策略。③

半個月以後，瓦西里耶夫得出結論，並報告共產國際：「我們擔心政策導向的錯誤，果然不幸言中」（第一九〇號文件），於是在第二天（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八十三次會議正式做出決定：「基本贊成中國委員會的建議」，即包括在九月二十八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草案》中的政策的改變：「建議中國共產黨遵循以下原則即速檢查同國民黨的關係：一、（1）應極其謹慎地做領導國民黨的工作。（2）黨團不應發號施令。（3）共產黨不應要求其黨員非佔有軍政領導職位不可。（4）相反，共產黨應當盡量廣泛吸納國民黨員（不可加入共產黨的），首先是左派參加中國民族解放鬥爭的領導工作。（5）同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應經常細心研究國民黨所依靠的各社會階層的各種動向，和軍閥間社會力量的改組情況。……（十）加強吸收工農分子擴大黨的隊伍的工作，並要提出加強黨內教育的問題。」這政策改變的操縱過程證明：共產國際是在蘇共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之下，其報告必須由蘇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然後再以共產國際的名義指令中共中央執行。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的中共中央，首先是為蘇俄的國家利益服務的，但是在表面上，有成套的意識形態語言來掩蓋這一切。

這裏不得不順便提及蘇俄在這時候，不僅僅援助廣州的蔣介石，根據蘇共中央的檔案，還打算援助與革命政權針鋒相對的吳佩孚、孫傳芳，以及利用大量援助控制馮玉祥部隊。這再次證明蘇俄的援助原

則不是甚麼說得天花亂墜的「無產階級革命」或者「國民革命」，而是赤裸裸的蘇俄的國家利益。蘇俄看見誰的勢力強大就支持誰，完全是帝國主義的那一套。他們得到情報說，吳佩孚又將崛起。所以由斯大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第八十六次會議，同意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主席伏龍芝元帥的建議，將此建議「作為加拉罕同志的政治指示」。該建議說：「中國事態的發展正日益明顯地把吳佩孚和他領導的直系推到前台來。吳佩孚勢將成爲一個核心的政治領導人物，因而也似乎是國民運動新爆發的火種。國民軍的特別是馮玉祥的作用和意義並不清楚。整個形勢提出了，爲了國民軍、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而同吳佩孚建立明確關係的必要性。對中國現政府（按：指與蘇俄有關係的北洋政府）亦應採取相同態度。如果在這方面繼續遲疑、動搖和躊躇不前，就必將越來越削弱那些同情我們的各派系的力量。……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同吳佩孚結盟的必要性。應在此結盟的基礎上，建立一屆新的代表直系、北方的國民黨人（馮玉祥）和中國南方（廣州政府）的政府。」（《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六一五至六一六頁，第一九七號文件）打算再次聯吳，甚至和北京的北洋政府合作，是符合蘇俄的國家利益的。只是由於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在張家口召開的軍事政治會議上，因爲受到馮玉祥的堅決反對而作罷。第一九九號文件（按：魏金斯基參加該會以後的報告）說：「國民軍的代表聲稱，馮玉祥堅決反對同吳佩孚發生任何接觸，說馮玉祥依然認吳佩孚爲敵，打倒張作霖後，立即就要槍口對吳。」蘇俄在中國的所作所爲，實際上超過任何一個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損害。可是最早認識清楚這點的中國國民黨的政治領袖們，在那時候，卻是那樣地孤立。他們發表那樣多的通電和決議，舉出那樣多的事實和說明，竟然敵不過鮑—汪—蔣—中共的聯合打擊；連一些西山會議的參加者，對蘇俄—中共—汪兆銘有相當認識的中央執行委員們，也敵不過廣州掌權者的具體利益誘惑。

在蘇共中央更改策略以後，首先通過蘇俄駐上海領事，在共產國際遠東局局長魏金斯基（按：也翻

譯作符定斯克，是這次政策轉變的主導者之一）的親自參與下，從內部分化西山會議的參加者。

張國燾是在上海與魏金斯基、陳獨秀具體制訂這一新政策者，並且是由他將這一新的指示帶去廣州，促成以退卻來打擊西山會議的轉變。張回憶道：「中共中央鑒於事態的嚴重，急起商討挽救方策。我們根據所知道的情況，認為西山會議派的活動，將造成國民黨的全面分裂；廣州現在的局面可能因而垮台。西山會議派中也有些中派人物，他們不願意廣州革命局面的摧毀。因而我們決定採取具體步驟，爭取他們，來分化西山會議派。由於陳獨秀先生的主動，並獲得維金斯基的協助，我們約好孫科、葉楚傖、邵元沖在外白渡橋蘇俄領事館內，商談國共關係問題。這三位先生或多或少與西山會議有關係，我們視為當時國民黨中派的代表人物。中共中央方面則由陳獨秀、蔡和森和我三人為代表。」④

本來，葉楚傖、邵元沖從北京分別回到上海以後，在宣揚和執行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各種決議方面，成績顯著：

在宣傳方面：葉楚傖當時主持的上海《民國日報》，大量地宣揚了第四次全體會議的基本精神。過去他主持這報紙期間，曾經因為受到中共黨員的脅迫和謾罵，專程到廣州向孫中山先生告過狀；他參加西山會議返回上海後，《民國日報》立即登載大量的各個地區的中國國民黨分部擁護第四次全體會議的函電；十二月十二日到十四日，在每日的頭版頭條發表《言論》（按：即今日的《社論》），題目是《解除國民黨和共產黨抱合形勢以後》；十二月十三日，以第一版刊登西山會議的重要文獻《取消共產派黨籍宣言》；在十二月十四日登載張靜江的反對西山會議的文章以後，次日立即以《言論》位置，登載批評文章，題目是《讀張人傑同志忠告國民黨同志書以後》；十二月十六日的《言論》題目是《聯合和附》，闡述聯俄的平等原則，並且登載《駁汪精衛十二月四日通告》一文；十二月十七日登載文章《告汪精衛和共產派》；並且以頭版地位登載大量中國國民黨各地區黨部清除該部內中共黨員的啓事……。

邵元沖在十一月二十八日返抵上海後，稍稍商議黨事，兩天以後返南京家。於十二月十二日到達上海，按照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決議，立即投入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建立工作。並且著《中國國民黨宣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痛批汪兆銘十二月四日的通告，該宣言理直氣壯，文字流暢：「查第四次全體會議，乃由多數中央執行委員所召集，且根據向例，全體會議開始之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應停止行使職權，故在第四次全體會議之時，廣州原有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已無行使職權的餘地。及第四次全體會議議決，移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上海，廣州方面，只置廣州執行部，廣州已不能借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汪精衛已經全體會議議決開除黨籍六個月，在此時期之中，尤不得假藉本黨名義，擅發無聊之言論。現在在廣州之中央執行委員，除已開除之汪精衛，及因共產黨關係而開除之譚平山、林祖涵等而外，只譚組安同志一人，尚為合法之中央執行委員，組安軍政紛冗，對黨務素少直接負責，其數月以來操縱黨務者，皆汪精衛一人為之。今日以非黨之資格，盤踞國民政府，借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佈通知，蠱惑視聽，其強顏無恥，……並鄭重聲明，此後凡汪精衛在廣州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所發之文字，皆不足以代表本黨，特此宣言。」⑤

在組織方面：根據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決議，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移駐上海。在十二月七日舉行首次中央執監委員首次聯繫會議，首先決議撤銷原上海執行部，取消原來在那裏工作的中共黨員惲代英等的職權，接收法租界內的環龍路四十四號的上海執行部，並在這裏成立中央黨部辦公處。這次會議還決定了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屬的各部部长人選。

十二月十三日，正式接收原上海執行部，在次日發出接管和開始辦公的第一號通告，宣佈各部的部長人選（因為規定中央執行委員不兼任部務，所以北京決定的部長人選作廢）：「本會遵照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決議，移至上海，內設組織、宣傳、農民、工人、商人、婦女、海外八部兼秘書、

幹事兩處，委定劉蘆隱爲組織部長，周佛海爲宣傳部長，馬超俊爲工人部長，劉啓明爲商人部長，郎醒石爲青年部長，徐季龍夫人（沈儀彬）爲婦女部長，黃季陸爲海外部長。桂崇基爲秘書長，袁世斌爲幹事長，均經就職視事，業於本月十四日在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開始辦公，特此通告。」⑥邵元沖當天的日記記載：「午後至環龍路四十四號中央黨部一行，見各部部长均已就職，興會均佳。」完全以信念聯合起來，當然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十二月十七日：「晚在莫里哀路十號，召開移滬後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各部部长第一次聯席會議，討論宣傳標準，各部組織委員會及各省黨部之組織進行辦法。」（以上根據邵元沖日記）並且就政策問題作出五項決議，全文如下：

一、對於解決時局的主張：（甲）根據總理遺囑召集國民會議預備會議，開國民會議組織國民軍的統一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乙）反對妥協和違反民意的政府組織及爲地盤權利而引起武力爭鬥。

二、對於黨務：根據總理全部演講著作，闡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政綱之真意義，說明第一、二、三、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議決各案與宣言，與移滬後之中央黨部宣言訓令之重要意義。

三、對共產派分子：取友誼的態度，告以合則兩傷，離則雙美。

四、對於在粵之黨軍及其他國民革命軍隊，獎勵其過去之功績，勉勵其在此後之衛黨及繼續三民主義國民革命之工作。

五、對於北方之國民軍及其他同情於本黨之軍隊，取同志的態度，勉勵其負荷北方之三民主義國民革命工作。⑦

這五條決議可以說是新的中央委員會的政綱概要。這第一條和廣州中央沒有區別；第二條的關鍵在於要闡發西山會議的各項決議和宣言；第三條顯示了西山會議和平分共的很重要特點。即在緊接的第二次聯席會議上，通過要求各級黨部執行的五點，第一點就是要求對中共「採取友黨態度」。這證明西山會議諸位元老並不是在謀求消滅共產黨人，而主要是反對中共加入國民黨，在內部控制各種權力，反對鬥爭，只要中共退出國民黨即可，然後兩黨再一起並肩進行國民革命，這也是西山元老們的民主素養。由於蔣介石統治以後，生怕提到西山會議，所以這有區別的重要政治主張被埋沒；而在大陸，從來的宣傳運動都把西山會議和蔣介石的清黨的主張混為一談，這與歷史事實不符合。第四條顯示，把鮑羅廷——汪兆銘的國民黨中央和其領導的國民革命軍隊嚴格區別開來，後來發展到把汪、蔣區別開來，這策略的運用使得鮑——汪很難對付。在上海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曾經向在廣州的黨軍發出訓令，強調革命軍人應該以孫先生的人格為模範，事事以三民主義為標準，這意味着將廣州中央與國民政府、黨軍分開對待。第五條的意義同於第四條，這種政策的貫徹，有利於北伐以後各個黨部的最後統一。

但是，蘇俄的策略轉變以後，開始對在上海的反共人物進行了拉攏，並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根據史料可以知道，這最初被拉過去的人是孫科。但是，誰是拉孫科這位過去堅決的反共者呢？這幕後的核心人物是張靜江。

第一、張靜江反對西山會議的立場，前面已經提及，不必再引述。

第二、衆所週知的張靜江和蔣介石的非同尋常的關係，也不必過多費筆墨，在蔣介石親自修改過的《蔣介石年譜初稿》中，保存着一九二一年一月十日蔣介石給張寫的信，信中稱張靜江為良師，戴傳賢為益友，並且張的教導他最能夠聽從。關於這《年譜》的可靠性，據編者毛思誠在《跋》中說：「已乃

先生一緘謄數具，親付收藏，檢其中所儲者，手卷也，日記也，公牘也，其餘雜存也，反覆披覽，悉外間所不克見，而爲歷來珍秘之故楮，驚喜以獲至寶。於是什襲以庋之，次比以抄之，益以公署檔冊，清閣書報，而雅齡故事，則多得於里社傳誦時日致勤，綴成此篇。」雖然書中難免阿諛奉承之辭，但是到底是早期所寫，可信度很高。該《年譜》中所保存的蔣介石致張靜江的信件，摘錄如下：「關於弟以後之處世事，請兄隨時指教，以冀有成。弟自知尚有賢賢嫉惡一日之長，唯養氣功淺，加之自少欠缺居敬工夫，持之不能恒久。故隨俗變遷之病，仍不能免，每用自戒，而終未能痛改爲恨。季陶爲我益友，而公則爲我良師也。惟自苦天資頑鈍，素性暴躁，對於愛我諸公，恒未能奉若神明，而且時出侮辱之言行，既傷感情，復灰友心，非有一二篤愛友好，嚴厲督責，因事規正，終恐隕越貽羞。」⑧還有其它的书信不一例舉。蔣介石剛剛奪得軍政大權，張靜江這時候在政治上幫蔣介石的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邵元冲的日記中，在孫科倒向廣州中央的前夕，有幾次提到孫科去勸張靜江，但是每一次也就可能是張、孫互勸，最後在廣州巨大誘惑面前，孫倒向了張。邵元冲在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都記述孫科與張靜江的接觸，孫科還提到張靜江要到廣州去。去做甚麼？去參加廣州「二大」。張靜江因病早已經辭去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汪兆銘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式函請張以國民政府委員資格出席廣州「二大」，是特別優惠。由孫科出面邀請邵元冲、葉楚傖到蘇俄駐上海總領事館談話是在二十五日。這幕後的交易，只有從記述的後面猜測了。

鄒魯在《西山會議》中指出：「實際西山會議的主張，固然得到海內外黨部及同志的贊同，在這主張下努力奮鬥的黨部及同志，尤爲不少。若論當時在西山開會的委員，則不過十幾個人罷了。且西山會議十幾個人當中，有二、三人由上海俄領事約去談話，說明『共產黨不要政權，只要三分之一的黨權，

汝們不必再主張清黨了』。如是就有若干人到廣東，悔罪式的，或登告白，或寫書信『脫離西山會議』。⑨鄒魯這一重要而含蓄的揭露，在幾十年以後出版的邵元沖日記上，得到非常清楚的證實。邵就是被蘇俄領事約去談話的人，並且之後去到廣州，得到了一個新的頭銜。可惜邵到廣州以後參加廣州混合中央的活動（接近半年）的日記沒有保存，是否是難以見人而銷毀，不得而知。邵元沖的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的日記，比通常的記錄要長得多，是研究這一轉變的兩篇珍貴文獻，全文如下：

二十三日：「寄介石一函，寄默一函。」

午前楚儉來，言已解職之共產黨分子要素欠薪與彼滋鬧，並言黨中有力分子各挾私意，無團結奮鬥精神，爲之慨然不已。午後與哲生商黨中維持之辦法，又謂：若照此大家不肯負責，則此後國民黨必敗，然將來之主義則能成功，然必犧牲其主義。余此謂，若此際我黨自己不努力，失敗無疑，然共產黨之行動，亦必失敗，兩敗之後，國內或有若干時期之紛亂，爾後再有新勢力、新團體、新運動發生，而收其成功云云。又與朱叔痴、黃復生談稍傾，叔痴謂，受川中人之委託，欲至粵請釋錦帆。或謂錦帆之被繫，純出鮑羅廷主動，即請精衛已不能作主，故叔痴又擬赴京求加拉罕電鮑營救云云。嗚呼可痛已！晚閱《C.Y.之決義案及組織》等，具見其工作之已切近實際，吾黨中散漫無緒，各逞私圖，尚何言耶？晚八時哲生來，謂加拉罕派東方局長符定斯克來（按：即魏金斯基），對黨務謀所以調節，並邀余及楚儉同至俄領署一談。余三人遂驅車前往。符氏先詢我對總理決定之聯俄及容許共產分子加入之兩大原則，有無懷疑或動搖之點？如無之，則一切枝節都在可討論之列。余等謂對於以上二原則仍承認之，但現在完全基於一年餘以來事實之困難，故不得不有此沉清黨籍之工作，而廣州方面又堅持不服從決議，故吾人不得不堅持原決議以執行，若粵方有相當讓步之表示，則須先將

代表大會延期，而C.P.方面亦須停止對國民黨文字及廣告之攻擊，然後始能議及善後問題。符氏亦謂扼要之點，並謂若吾人樂意討論者，彼可以明晨約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等再作詳密之協商，余等允之。乃定翌晨十一時再商。余等乃復至靜江處相商，以旁人混淆，不及詳談而歸。一時頃寢。

以上開始說的國民「黨中有力分子各挾私意，無團結奮鬥精神」指的是誰？西山會議中的中堅人物鄒魯、居正、林森、張繼、謝持在改組以後早就從權力中心被排除，並非「有力分子」，並且和以上諸人在北京告別後還不及會面；這似乎指汪兆銘，但是在日記中對汪的不滿都直指其名，這應當是剛剛出現的「有力分子」蔣介石，蔣介石反對西山會議的態度已經逐漸明朗。在「有力分子」之下，邵和孫科都對前景感到悲觀。不過這些日記俱是稍後整理抄上，因此這不滿的表示，為以下接受蘇俄的調停和與廣州妥協作為鋪墊。本來，如果蘇俄——中共接受條件，洗心革面有何不可，事實證明在重要問題上毫不退讓，只是以退讓的說辭來分化利用而已。在結尾引出張靜江，顯示出這談話的可能的背景。

次日孫、葉、邵與蘇俄的談話，表明在根本問題上蘇俄——中共以種種藉口毫不讓步，唯一同意讓步的內容，廣州方面也沒有採取，但是卻把他們都拉過來了：「午前哲生、楚儉先商一討論提綱，即關於黨務方面，宣傳方面，國民黨對C.P.、對蘇俄、對第三國際，均有討論。遂至俄領署，由符定斯克介紹與陳、瞿、張晤面，彼等對於各點大體皆承認，以為可以容納。而對於C.P.分子完全退出黨、政、軍、學各機關，則以為妨礙職務之進行；對於鮑羅廷暫行離粵一點，符定斯克以為現時香港攻鮑甚劇，若此時令鮑行，則恐適以墜彼輩之策。因此，這兩點暫行保留。唯實行之第一步為：由我方電精衛等暫停文字上之攻擊及展緩第二屆代表大會，符氏照此意電鮑羅廷，陳等則平山等，俟得覆，再討論邀集全體委員會會議協議善後而散。午後與哲生訪靜江，決定我方之電由哲生、靜江出名。晚在黨部開聯繫會

議，商議開市民大會反對日本出兵滿洲事並其他數事。十一時歸，十二時頃寢。」這裏記錄的蘇俄——中共不能讓步的中共黨員退出國民黨和解僱鮑兩點，是西山會議決議的重點；達成協議的所謂「實行之第一步」，即停止攻擊和推遲即將召開的廣州「二大」，蘇俄——中共方面也從來沒有執行，他們要求的讓步一點也沒有得到，但是他們一樣地接受了「協調」。

日記中又顯示了張靜江的重要作用。

第二天，邵寄快信給戴傳賢，「告以此兩日來接洽情形，請其從速來滬」。數天以前邵對戴所謂不問政治的責備，突然被急迫相告的相同情緒所代替。

中共方面的張國燾記述這同一個歷史過程道：「那天上午九時，我們六個人都如約到達，圍坐在領事館樓下的大客廳裏。領事館職員沒有出面招待，更沒有人參加會議。我們見面時，仍和平常一樣，互相寒暄，氣氛卻有些嚴肅。沒有人談到廣東、上海、西山等地最近發生的事情，大家都很謹慎避免說惹起是非的話。會談開始，先由陳獨秀發言，他表示中共沒有包辦國民黨事物的企圖。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黨部，多推選國民黨人士出席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中共亦不希望在大會的中央委員改選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的人數。中共主張國民黨的事應由國民黨員來負責。至於廣東方面的情形，事實上並不如外間所謠傳，要排斥某些人士參加；廣東負責當局希望各位能步調一致，負擔起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各種責任。陳表示了上述態度以後，進而徵詢他們的意見。孫科、葉楚傖、邵元沖相繼發表簡單的聲明，主旨是他們愛護廣東的一切，只要情況許可，他們都願去廣東參加大會。……這次會議有良好的效果，雖然有一部份西山會議派的頑固分子斥之爲『對中共的妥協』，但大多數國民黨人確而改變態度，不再強調廣州政府實行共產統治，爲中共所包辦等論調了。大家要求團結一致，共維廣州的革命局面。西山會議派的分裂企圖，似因此而給阻滯了。」⑩

蘇俄對於中國的政策並不一致，主要是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分歧。鮑羅廷在國民黨內部採取強硬和陰謀的策略，如廢棄中央執行委員會，用三人特別委員會代替，趕走許崇智、胡漢民、謝持等，根據張國燾的述說，並不一定通過蘇俄駐華大使加拉罕，而是直接通天到斯大林處，也不把共產國際放在眼裏。如今魏金斯基主張緩和的分化策略，引起了鮑羅廷的反對。那時與鮑密切的周恩來在一九四三年記述道：「這時正是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夕，我從汕頭回廣州，和兩廣區委書記陳延年同志、蘇聯派到廣東的國民黨和政府的顧問鮑羅廷商量。當時，我們本來確定的政策是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我們計劃在大會上公開開除戴季陶、孫科等人的黨籍，在中央執委會中我們黨員佔三分之一，少選中派，多選左派，使左派佔絕對優勢。在軍隊方面，當時的實際情況，蔣介石的第一軍只有三個師。第一師是何應欽，第二師王懋功接近當時國民黨左派的汪精衛。除第一軍以外都不是蔣介石的。因此計劃給蔣介石以回擊，把我們的黨員完全從蔣介石部下撤出，另外與汪精衛成立國共兩黨合作的軍隊。我帶着這個意見回到汕頭去，並等待中央回電到後，立即正式向蔣介石提出。當時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左派佔了絕對優勢，實現上述計劃是完全有保證的。等了好久，中央來電不同意。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與戴季陶等大開談判，請戴季陶等回粵；爲了爭取右派回粵，還特地拍電報到廣州把大會延期一個月，等候他們，對右派採取完全讓步的政策。孫科於是代表右派回到廣東，把蔣介石的腰撐起來了。中央則派張國燾做這次大會的黨團書記，說我們過去把左派包辦了。以後應獨立形成共產派，使共產派與左派分開，讓左派獨立起來。在選舉上，向右派做了極大的讓步。結果，三十六個執委中，共產黨只有七個，比我們原來計劃的少了一半。」①周恩來的計劃，就是鮑羅廷的如意算盤，已經到了實行的邊緣。周恩來等擔任黃埔系的重要職務，就是到了汕頭，他還兼任東江行政公署主任，一切完全是蔣介石的親自提拔，可是他安的是甚麼心？周帶到汕頭的計劃，已經到了具體實行的邊緣。

歷史並不記載沒有發生的事情，可是，鮑羅廷——中共的計劃，卻是非常有戲劇性和令人浮想聯翩的……。

張國燾還敘述了他與鮑羅廷等的辯論：鮑問張，「爲甚麼廣東方面將那些陰謀破壞革命的國民黨右派分子驅逐出去了，現在卻又要將他們請回來？」鮑認爲國民黨左派與中共應該向右派勢力進攻，主張強迫中派追隨左派，要他們無條件地擁護國民政府和廣州國民黨中央，「他譏諷中共中央與孫科、葉楚傖、邵元沖等所成立的協議是要不得的安撫政策」。張國燾的意見是：「我指出中共中央與孫科等中派所取得的協議是合理和必要的；因爲聯絡中派以攪垮西山會議派的組織，就是向右派勢力進攻的一個主要方向。我曾反問鮑羅廷，除了這種分化的辦法外，所謂國民黨左派與中派合爲一體的說法，是否含有中共與國民黨左派應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中，包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席位的意義在內？所謂強迫中派追隨左派和進攻的說法，又應如何實行？……在國民黨內，居然存在着一個中國共產黨，這是國民黨人大感不安的；即所謂左派，也不例外。」^⑫

如今解密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公佈了在廣州「二大」後，中共中央的新策略：「我們現在對於國民黨的工作，應該懂得下列幾個主要策略：A、C.P.與國民黨合作政策，仍當繼續從前的政策，與左派結成密切同盟而與大多數群眾接近，竭力贊助左派發展革命運動的工作，竭力贊助左派對右派的鬥爭，竭力擴大左派的組織；同時，又要到處擴大鞏固我們的黨。因爲左派的發展是要以C.P.爲核心的，離開了C.P.，絕不會形成一個有力的國民黨左派。」以上雖然句句話都重要，最後的兩句話最能夠說明中共的野心，即左派要以中共爲核心，這就是所謂的合作，實際是國民黨的滅亡。接着又說：「B、左派與右派的聯合戰線：……我們應該建築一民衆團體的聯合戰線，我們要在這個聯合戰線中去減輕右派的反動力量，去拉住一部份右派較好首領，去取得右派下面的群眾。實行這個策略應注意下列幾點：一、在現時中國大革命的高潮當中，沒有確定的右派，因爲確定的右派一定要成爲反動派。現時右派的

首領，多是很動搖的，常常徘徊於革命政策與反革命政策之間，尤其是右派下面的群眾，性質更不固定。所以我們對於右派的政策，決不能籠統地把他們看成與左派敵對的固定的組織，更不能逼他團成一氣，把他看成整個的對象來攻擊……二、我們一方面要努力反對右派的口號策略，努力宣傳左派；一方面又要講聯合戰線……。三、應設法抓住右派中比較左傾的首領，應把他放入各組織之內，使他們在左派勢力包圍之下，……。四、在聯合上部首領的工作中，切不要忘記是要藉此打入下部的群眾中去，是要藉此引起一切的行動……。⑬如此周到慎密的策略，是處於防守地位的國民黨所沒有的，也是國民黨防不勝防的，事實上西山會議最初的分化，正是這策略的成功。

正是國民黨人在西山會議對於蘇俄——中共的反抗，迫使蘇俄——中共退卻；這退卻的策略使得周恩來提到的計劃中的以中共——汪兆銘為一方，以蔣介石和所有的反共力量為一方的武裝攤牌沒有爆發的可能；但是這退卻策略又從內部，從組織上拆了西山會議的台。

真是巧合，孫科等站到了相反的陣營去，離西山會議召開剛剛一個月；離葉楚傖主編的《民國日報》上，登載許多怒斥中共——汪兆銘的文字才十幾天或幾天就再轉彎；離邵元沖義正嚴辭地寫《中國國民黨宣言》才八天，宣言中聲稱廣州中央已經不存在，對黨務沒有發言權，還罵汪兆銘「怙惡不悛、弁髦紀律」等等。

當孫、葉、邵在蘇俄駐上海領事館去接洽的時候，西山會議還沒有結束，林森、鄒魯、謝持還在北平、居正在武漢。他們不知道在上海建立中央黨部的人，已經在廣州中央讓步很少時，幾乎無條件地投入了廣州中央的懷抱。

孫科在廣州「二大」開幕以後，在一九二六年元月十一日抵達廣州，元月十二日，向大會上「報告總理葬事籌備經過」。孫先生的哲嗣一反長期以來的反共立場，是鮑——汪——中共的重要勝利。但是他得

票最少，名列三十六名中央執行委員的最後一名，有的參加會議者不原諒他曾經反共反汪。後來他進一步靠攏鮑，在武漢紅色政權擔任高官，但是不久又成為反共人士，在南京再次獲得官位。

葉楚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寫信給張靜江，為參加西山會議表示悔悟，開始的四句話是：「日間備聞痛語，人孰無心，能弗於悲愴之後，繼以悔疚。」^⑩上海《民國日報》再次大轉彎，成為廣州中央的喉舌，緊接着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海《民國日報》拒絕刊登一切文件；在汪兆銘因為中山艦事件被迫出國以後，蔣介石的權力進一步擴張，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經廣州中央常會通過，任命葉為廣州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秘書長。

一直被中共視為所謂右派的邵元沖，並沒有立即到廣州去參加「二大」，他在上海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只是蔣介石在廣州與中共發生衝突，汪兆銘出國以後，他才被廣州中央常會任命為青年部長，成為蔣介石的重要幕僚。

廣州「二大」對西山會議的參加者中的處分最輕的，是戴傳賢，而且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這是按照蔣介石要求「以總理之心為心」，對部份人員寬大的結果。在眾目睽睽之下，戴沒有上任，他覺得人格受到損傷。但是過了四個多月，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戴傳賢被廣州國民政府任命為廣東大學校長，他沒有推辭，半年以前不過問政治的宣言已經煙消雲散了。從此在蔣介石的權力核心輔佐蔣介石二十幾年，直到在廣州去世。鄒魯在北伐軍隊打下南昌以後，在一封信中談到戴的反覆無常：「若季陶則忽而主張開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清共產黨，逐鮑羅廷；忽而離京，忽而在上海組織中央黨部，忽而宣言不問黨政各事；忽而匿居湖州；忽而任校長，任政府委員；甚而至於率全校員生向鮑羅廷行鞠躬禮，此種舉動，即季陶清夜自思，亦當無以自容，固不待於弟之責備。」^⑪

張靜江不僅僅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九日，在廣州中央的二屆二中全會上，當

選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

這是他們在權力和信仰之間所作的選擇。

註釋：

- ①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五六二頁，第一七六號文件，李玉貞翻譯。
- ② 同上書第五七六頁。
- ③ 同上書第五八七至五八八頁，第一八六號文件。
- ④ 《我的回憶》第二冊第六六至六七頁，張國燾著。
- ⑤ 《清黨實錄》第六八頁，居正編輯。
- ⑥ 《清黨實錄》第七五頁。
- ⑦ 《從容共到清黨》（上）第四四〇頁，李雲漢著。
- ⑧ 《蔣介石年譜初稿》第五五頁，毛思誠著，萬仁元、方慶秋編，檔案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
- ⑨ 《鄒魯文存》第三集第七九頁，鄒魯著。
- ⑩ 《我的回憶》第二冊的四六三至四六五頁，張國燾著。
- ⑪ 《周恩來選集》上卷第一一九至一二〇頁，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北京。
- ⑫ 《我的回憶》第二冊第四七五至四八一頁，張國燾著。
- ⑬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第四四至四六頁，中央檔案館編，一九八九年，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
- ⑭ 《鄒魯文存》第三集第一二五頁。

二十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由於汪兆銘在廣州「二大」依靠鮑羅廷——中共和蔣介石的支持，把許多在歷史上與國民革命無緣的人拉進了新成立的中央執監委員會，成功地製造了姓汪的政治班底（後來稱為改組派）；由於蔣介石憑藉剛剛起來的黃埔勢力，在廣州「二大」第一次進入了黨的最高領導階層，並且很快成為了中國的最高執政者，哪怕他們後來都與中國共產黨反目成仇，他們仍然把廣州「二大」作為了他們的「黨統」所在。而從北伐到抗戰前期的大約十年的時間，基本都是汪、蔣（或蔣、汪）聯合掌權，所以對於廣州「二大」，都是修飾加掩蓋對待之；對於凝聚中國國民黨的真精神和純粹國民黨人召開的上海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向來以強權來加以全面否定和封殺。因此，有必要將堂堂正正的上海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真實面貌，呈現在讀者的面前。

第一、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與閉幕不久的廣州「二大」有幾點根本的不同：

（一）因為由中共黨員組成了資格審查委員會，確定誰可以參加大會，所以廣州「二大」的出席代表中，中共黨員佔總出席人數的三分之一；會議的有些重要報告也由中共黨員包辦，大會秘書長是中共黨員；中共由張國燾擔任黨團的書記，每天晚上聚會，決定了會議的進程；宣言的基本精神是蘇俄的；爲了政策調整，中共黨員仍然佔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的六分之一，加上汪系的人馬的配合，使得中共完全控制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在上海舉行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完全不同。在孫先生剛剛去世就在北京召開的第三次中央全會上，居正、謝持就要求修改對中共有利的選舉法，與中共及其同路人展開了激烈的爭辯，後來在他們缺席時，在廣州通過了有利於中共的選舉法，而讓中共得以控制廣州「二大」。

早在北京西山召開的第四次全體會議上，就正式通過了議案：《修正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法》。第一條的（丙）項規定：「取消本黨黨籍之共產派人，不得與於選舉之列。」這使得共產黨人完全不可能出席大會，廣州「二大」被中共決定一切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第二條的（丙）項規定：「總理指派出席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代表，除身故及開除黨籍者外，一律出席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不足三人之省份，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指派之。」這一條保證了代表的質量和連續性，西山會議開除的唯一國民黨人汪兆銘也不可能出席大會。按照這規定精神，馬超俊遞補廖仲愷，桂崇基遞補彭素民，李東園遞補于樹德，管鵬遞補陳獨秀，林雲陔遞補譚平山，姜紹模遞補李大釗，等等。第六條詳細規定各省份按照黨員人數多少比例選舉代表，保證了選舉的民主方式和代表性。總之，這選舉法使得在上海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為純粹的國民黨人的會議，而不是如廣州「二大」是為中共控制主導的會議。

（二）廣州「二大」開除的是甚麼人呢？孫先生主持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選出的純粹國民黨人的二十四個中央執行委員中，當時胡漢民在蘇俄，熊克武在獄，除去四個中共黨籍的委員以外，只有十八個，可是受到開除等處分的，有十個，而且鄒魯、林森還是中央常務委員；一九一九年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一共有總務、黨務、財務三個部，後來增加宣傳部，四個部長中廖仲愷去世，剩下的三個部長居正、張繼、謝持都被開除；張繼在民國初年就是國會議長，林森為護法時期的非常國會議長，居正擔任過內務總長，謝持擔任過總統府秘書長並兼任國民黨代總理；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主席團由五人組成，其中有四個國民黨人，其中反共的胡漢民在國外，林森、謝持則被開除出黨，只有汪受俄人驅

使。

在上海舉行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的第二天，就通過了一項決議：「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所決議各案本會完全接納。」開除黨籍半年的只有汪兆銘一個人，其餘全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與廣州「二大」形成強烈對比。

國民黨的兩個代表大會，廣州懲處的是孫先生原來的左右助手和國民黨的核心領導幹部，上海懲處的是鑽入國民黨內奪取權力和搞階級鬥爭的異黨分子。

(三)廣州「二大」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之中，林祖涵、于樹德、李大釗、吳玉章、楊匏安、惲代英、譚平山、朱季洵，以及候補委員毛澤東、許甦魂、夏曦、韓麟符、董用威、鄧穎超，以及監察委員等；其中的譚、林、楊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佔常委總數的三分之一；各部的部長之中，最重要的組織部長是譚平山，農民部長是林祖涵，再加上一些副部長和秘書，再與中共狼狽為奸的汪兆銘的人馬合作，完全控制了中國國民黨的最高黨部。

但是在上海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選出的中央執監委員，以及所有的部長，全部都是純粹的國民黨人，二十五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得票最多的前十名是：林森、鄒魯、覃振、張繼、謝持、胡漢民、李烈鈞、居正、沈定一、傅汝霖；由中央執行委員中選舉謝持、鄒魯、沈定一為中央常務委員；由居正擔任組織部長，林森擔任海外部長，等等（後來居正兼任常務委員）。這裏面不僅僅沒有共產黨員，而且在國民革命的歷史上，都有過光輝的貢獻。

通過這最簡單的對比，兩個代表大會，哪一個是真正的中國國民黨的代表大會，已經一目了然。

第二、上海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宣言，洋溢着為孫文主義而奮鬥，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並且揭露和批判蘇俄繼承沙皇俄國的侵略政策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

張繼致開幕辭的要點有三：「一、中國國民黨是繼續中國同盟會的生命，未死的同志應當完成同盟會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鼓掌），革命即是盡忠於總理孫先生，亦即盡忠於黃花崗殉難的七十二烈士。

「二、中國國民黨的主義是全國人民起來救中國、救中華民國的，換言之，是革命而非階級戰鬥。

「三、中國革命，是國民建國問題，並非與世界各國宣戰，除得各弱小民族表示贊助外，亦須得非侵略主義的各民族的同情，換言之，是中華民國建國問題，並非世界革命，亦非國際革命。

「以上三義，鄙人跟總理革命多年，持此為寶，二十年如一日。今天敢以此義敬獻於諸同志之前，又敢請諸同志努力猛進。至對共產黨分子，弟仍持年前八月在總理面前之主張，好意的分開，對中國革命方為有益，否則不幸之事層見疊出，兩敗俱傷，革命永無成功之日。」（按：以下引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有關資料，都出自居正編輯的《清黨實錄》，不再註釋。）

這開幕辭的第一點，是總的籠統繼承同盟會的革命傳統，廣州「二大」可以說得出來；但是第二，卻是針對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來的，因為中國國民黨從來認為國民革命是全民的，而非階級的；第三點講明中國革命是國民建國問題，而不是世界革命，也不是國際革命。因此，將中國革命說成是世界共產主義國際革命的一部份的說法，完全分開了。而共產黨總是將中國的國民革命拉向反對整個西方國家的陷阱，把國民革命與第三國際說成是一體的（蔣介石在「四·一二」上海清黨以前，也持此說）。最後是西山會議一直主張的和平分共的原則，強調「好意分開」，否則「兩敗俱傷」，這一原則不僅僅被斯大林—第三國際反對（陳獨秀、張國燾卻贊成），也被汪兆銘、蔣介石堅決反對。後來的歷史發展的主導者正是斯大林—第三國際和汪、蔣，終於造成流血地分裂。這證明了西山會議主張的遠見與坦率和誠意，但是大多數歷史家都將不同主張混為一談。

在上海舉行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則是全面地體現和繼承孫文主義。不僅僅拋棄了第一次全國代

表大會宣言中的鮑羅廷強加進去的蘇俄馬列主義精神，還很有創造性的解釋了三民主義。這份被遺忘的歷史文獻，以今日的觀點來看，仍然不失去其價值。

宣言一開始，就將全世界的民族分爲戰勝民族和被戰勝民族，戰勝民族實行侵略，就是被中國儒家批判的霸道政治：「環顧世界各民族具有人類四分之一之人口而賦有王道之文化者，唯爲中華民族耳。是以本黨之民族主義，主張融合此四分之一之人口以與戰勝民族抗，主張此王道文化以與弱小民族友。」由這種分野，而奠定了以下的闡述，宣言的第一部份就是關於中國文化，非常精闢：「(一)關於中國之文化。何謂文化？於相互的道德見之，於經濟、政治之發展更顯見之。仁愛爲吾民族文化之結晶，亦即革命之基念也。舉語言、風俗、習慣、信仰、職業、國籍、色種各不相同之人類世界，捨仁愛之外，更無足以爲統一中心而立世界大同之基礎者。吾人唯一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最終之目的，則在促人群之進化，以人類共同之能力，創造世界和平也。……本黨總理孫先生所垂示之『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國家建設』，是皆我民族勃發其創造文化之潛力之黑暗明燈。此創造能力之從新發揚，已顯示中國文化之復興之象。文化之復興，這非復古之謂，乃回復其被壓抑而潛伏之能力也。中國既有這創造文化之能力，則勿庸專事模仿他人。乃共產黨人以幼稚之故，盲目模仿蘇俄，並自己民族具有絕大之潛伏的創造能力而亦不敢自信，且因憎惡一切舊習慣舊勢力之故，視中國文化如敝屣，而專奉其所模仿者爲至高無上之準則……。」中共成立的思想基礎，就是陳獨秀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討伐，然後以蘇俄文化爲至尊，填補文化空白所致，這時髦的思潮曾經吸引了不少青年人歧途。宣言在這裏立足中國文化的仁愛核心，對此展開正面的批判，顯示出西山會議的基本精神與共產主義精神的深刻的文化層面的尖銳對立。宣言正是以文化爲理論基石，引申出蘇俄繼承沙皇的霸道文化，以及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不適合中國的結論。

這份文獻中，創造性的提出「戰勝民族」和「被戰勝民族」，從而將蘇俄主持的第三國際於西方帝國主義把持的國際聯盟，都作為「戰勝民族」的組織，把蘇俄第一次正式劃入戰勝民族之列，即西方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行列。而廣州「二大」的文獻中，蘇俄被說成是當然的「被壓迫民族」的代表。宣言說：「不平等條約，是桎梏吾國之枷鎖。枷鎖一日不去，則我國家一日不得自由。吾人深知除去此不平等條約者，不僅廢除其實，而且在最惠國相待中，必使絕無不平等待我之事實發現，始能獲得真實之聯合。不平等如何能聯？不平等如何能容？此理至顯，無待窮研。今蘇俄於自動宣告廢除不平等條約後，其在事實上待我如何？就國家關係言，不特彼在帝俄時代侵佔我國之領土，如今之東海濱、阿穆爾、後凡爾、扎穆斯克、斜米巴拉廷斯克、七河費爾干等區域尚未歸還，且中東鐵路之把持，外蒙古之侵佔，庚賠之拖賴，皆實錄於外交史中。而不平等之要挾，如領事額無限制，如回復線路通商條約，且層出疊見。就黨的關係而言，外蒙等於省區之一，載在本黨報章，而蘇俄操之在掌上，不復有我中央直接統系，是皆彰明較著，無可欺世者。吾人熟審此種事實之發生，由於蘇俄猶帶有帝俄時代之遺傳病，此遺傳病，不能因一度革命而根本消除，乃復演於國交上而成為結核。」中共因為一直依靠蘇俄而發展壯大，所以在以後的長期歷史中，從來都把蘇俄作為「被壓迫人民的救星」。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毛澤東的共產黨與之破裂以後，到一九七〇年代才把蘇俄稱為「社會帝國主義」。並且歷史也證明斯大林的蘇俄，對周圍鄰國的侵略，遠遠超過沙皇俄國時代。這宣言中既列舉蘇俄侵略中國的事實，也指出蘇俄繼承沙俄的帝國主義本性。這些是中國本世紀中對蘇俄帝國主義最早、最強烈的揭露和批判。但是從策略上的需要，這次代表大會還不敢公開和蘇俄全面決裂，在結尾時說：「吾人之責任，在使蘇俄遵守國際革命之正軌，而糾正其回復帝俄時代之舊習，籠統的仇俄與盲目的親俄，皆非本黨所為也。」

但是廣州「二大」的宣言則相反，其「國際之現狀」部份是把蘇俄作為「平等待我之民族」為前

提，根本無視蘇俄大量侵略中國的事實，然後說：「故民族運動，與國際運動，實為相須。而民族主義與國際革命主義，其內容實為一致。」即將中國的民族自救運動，納入蘇俄反西方的國際革命的軌道，再以列寧的帝國主義觀來解釋國際間發生的一切，篇幅冗長。張國燾的回憶已經揭示這根據莫斯科的一封信長電報，廣州「二大」的宣言實際上是第三國際的一份改頭換面的宣傳材料。

上海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宣言，還直指中共的理論和作為：「關於共產黨者，中國共產黨為第三國際東方支部之一，其所企圖，本不合於吾人之救國主張，其所主張之階級鬥爭，更不合於吾黨在理論上之主張與方法上之決定。吾人深信全民政治之建設，必須實行國民革命；經濟落後之中國，不但理論上無資本主義之立足點，即事實上亦無發展資本主義之可能。……共產黨在中國主張階級鬥爭，實有不合社會之需要。蓋階級鬥爭之說，至易破壞國民革命，吾人為統一國民革命陣線之故，勢必截斷其主張。……乃兩年以來，凡共產黨員加入本黨者，一切言論行為，唯其共產黨機關之指揮是從，在本黨內實行黨團作用。本黨以其幼稚，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曾下嚴重之訓令，以執行紀律相告。及總理逝世，共產黨更積極其妨礙本黨之行動，不徒入據本黨之策源地以自大，尤復極其離間挑撥之能事，強析本黨同志為左右派以逞其迎拒，甚其暗中截斷本黨與民眾之聲氣，毀壞本黨之信仰，此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所以取消共產黨在本黨黨籍之決議也。」這裏在理論上對階級鬥爭的批判，對於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論點，在今天仍然沒有過時。因為這兩點，在中共執政以後，已經用鮮血作了證明，鄧小平所謂改革開放的起點，就是停止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做法，而以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來挽救搖搖欲墜的中共政權。鄧小平以來的十幾年，就是中共為了生存，而對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共幾十年以來的總路線的事實上否定。但是，正式在理論上第一次批判和否定，卻是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光憑這一點，這次會議的歷史價值就不容低估。

這次代表大會最引起中共注意的，正是宣言中體現的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民黨的歷史責任。陳獨秀在中共的機關刊物《嚮導》（第一五〇期）上著文，以《國民黨右派大會》為題，對於宣言進行批評。陳說，「現在右派的上海大會，已將他們的理論具體的、負責任的在大會的宣言上公表出來」。「右派的西山會議，即以變更聯俄容共這兩大政策為目的；由西山會議而產生的此次上海大會，也是同樣的目的。……同時，實際上歷數蘇俄對中國侵佔領土，把持中東路，侵略外蒙，指勒庚子賠款等罪，和張作霖及其他反革命派對於蘇俄之宣傳論調完全一致。事實如果是這樣，其結果安得不一反聯俄政策？」陳獨秀在此對於具體事實無法反駁，只能用與軍閥主張相同和違背孫先生政策的帽子扣人。陳的文章以三民主義的三個方面來進行批判：在民族主義方面，陳舉出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應當肯定的部份，恰恰是關於民族自決問題，蘇俄正是利用所謂「民族自決」而出兵侵佔外蒙古，並且還企圖侵佔其他地區。如今的蘇俄中央檔案已經揭示，這是鮑羅廷強加而為孫先生最不喜歡的部份。陳批評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宣言的「戰勝民族」和「戰敗民族」分法，而把蘇俄劃入戰勝民族的帝國主義陣營，是違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這正是說明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關於民族主義問題解釋的創造性，因為如果主張將國土奉送給蘇俄，就只能是賣國主義，或者中共的政治語言所稱之為的「國際主義」。關於民權主義，陳肯定的「一大」宣言中的恰恰又是鮑羅廷與胡漢民爭論很久而強加的部份，陳批評的，是反對階級鬥爭的精華：「而從此右派宣言極力號召全民政治，顯然與第一次大會宣言所解釋的民權主義相違。」關於民生主義，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中，被加入了不少階級鬥爭的色彩，以這為標準來批評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宣言，陳說：「兩相對照起來，前者是主張為農夫工人之解放，反對特殊階級而奮鬥……；後者實際上是主張階級調和，是反對階級鬥爭，且明言『階級鬥爭之說，至易破壞國民革命，吾人為統一國民革命陣線之故，勢必截斷其主張。』」以歷史的長遠發展來看，能夠面對廣州汪、蔣、中共聯合的強權，

而主張階級調和的氣概，是應當肯定其價值的，是高瞻遠矚的理論。因為後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學說，搞得中國窮民窮，害死了幾千萬中國的老百姓。

第三、這次代表大會，不是幾個老資格的中央執監委員及滿腔熱情和義憤的黨代表的簡單的聚合，而是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國民黨在危難中奮鬥的自然結果，也是群眾基礎深厚的基層黨組織的代表為挽救危機的正常商討。根據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會議錄，代表們都是自費到上海出席大會，是在經濟拮据、政治壓力強大的情況之下舉行的大會，參加者始終表現出政治上的自信和奮鬥不息的拚搏精神。

各個省、市向大會的報告，為我們保存了許多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以及基層組織中，不同的政治思潮和國共兩黨的具體衝突情況，這些是真實的歷史記錄，非常珍貴。以下簡要摘錄之：

浙江省代表的報告很長，第一為政治狀況，其中包括財政狀況、軍政狀況、教育狀況、自治狀況；第二為社會狀況，包括婦女狀況、農工狀況、學生狀況；第三為黨務狀況，報告道：「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開會，決定清理黨籍，遂尊令進行清理。至今凡六個月，組織部正式成立者為蘭溪、泰順、平湖、臨海，臨時縣黨部有昌化、寧海、嵊縣，其中因叛變結果，舊有黨部一律均待改組。……宣傳工作，除開會演講外，中有浙江不定期刊及國恥紀念追悼會等，各種運動及宣言、招待新聞記者、統一輿論、訓練工作，除文字及講話外，於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後，特開全省各縣常務聯繫會議，統一清黨工作擁護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決議案宣言等。……一般社會對本黨已有相當之認識與瞭解，即對於馬克思主義與孫文主義，階級鬥爭與國民革命均有相當之認識與瞭解也。」

駐日本總支部的報告反映，在日本的國共兩派衝突比較尖銳：「日本方面自總理逝世後，一般僑胞及學生，有感於今日外交內政之痛苦，非實行三民主義不足以挽救，故年來黨員之激增，驟達千餘，而革命精神之勃發，亦不亞於辛亥之前。不幸共產分子加入本黨，陽奉陰違，不唯妨礙本黨工作，且危害

本黨生命，已成脫胎換骨之勢。關於駐日總支部一切黨權，悉握於黃……等共產黨小走狗之手，東京支部同志，見黨的生命，陷於危殆，遂一致奮起，於去年十月停止第四分部黨籍。……黃等欲維持其根本，即以總支部名義，申斥東京支部爲非法……是月十九日各支部同志見黃等共產黨派搗亂行爲，着着迫人，遂會議發通電，根本否認，並同時聲明黃等所把持之總支部，一切命令，不生效力，並將黃等十人一律開除黨籍，前非法總支部遂根本消失矣。」

香港、澳門緊靠廣州，中共中央委員也親自插手黨務，所以國共的衝突格外激烈，其代表報告道：「未幾香港罷工，該地同志罷工回粵，共產黨利用罷工機會，把持罷工委員會，派共產黨中堅分子鄧中夏、劉少奇、李深、黃平等，指揮罷工工友（罷工委員十一人，內有九人係同志）共產黨指揮之工會，係海員工會、同德工會（挑伕工會）、煤炭工會。新組織之機工聯合會，其勢力薄弱到如此，但在共產黨政權壓迫之下，不能不暫時屈從，故罷工會之權，操諸共產黨。唯黨務方面，頗多成績：未罷工前，在港成立分部四十餘個，罷工回粵之後，成立二百餘個，有三萬餘同志。回粵未幾，成立香港支部，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均爲努力分子，共產黨因未得佔據席次，竟設法抵制，廣州僞中央之不發經費蓋由於此。然各同志爲帝國主義奮鬥而回粵，滿腔熱血勇猛無前，雖乏經費，辦黨依然銳進。又成立『三五革命同志團』等團體，此等團體之同志，欲加入孫文主義學會，不意共產黨又來壓迫，不准加入，現在只有暗中聯絡。」報告的後面有兩千多字的原始史料，分爲「對工會之搗亂」、「對農村之搗亂」、「對學校之搗亂」、「對報館之搗亂」、「對政治機關之搗亂」，對於瞭解那時候的基層群眾運動和運動中的國共衝突，非常重要。

處於華中的湖北地勢重要，漢口和湖北的代表分別報告之：漢口代表報告道：「本黨向來在漢口有黨的基礎，十三年五月四日，總理特派覃委員振、張委員知本來漢口組織執行部，本黨純粹同志遵照漢

口執行部聯繫會議之決議案，逐漸進行，黨部的基礎始能成立。厥後廣州七十五次會議譚平山，根據共產黨徒劉芬私函，捏報漢口市黨部組織為不合法，並指揮劉芬等來漢口組織，而漢口遂有兩個黨部之出現。」然後以五個部份說明之。其中「關於工人方面」說：「工人為國民革命之先鋒，固不待言。所以本黨專以扶助工人，為工人謀利益，以防階級鬥爭之慘痛，斷不肯效共產黨利用工潮，以工人作犧牲品，而為獲取蘇俄金錢之資。故『二七』慘案以後，凡屬工人，均有覺悟。如京漢鐵路江岸分會、漢口人力車伕工會、漢口煙廠工會、漢口花廠工會、武漢輪船工會、染廠工會，皆在指揮本黨主義之下。共產黨徒益多方引誘，亦終不肯聽從。」湖北代表則分為四個時期，其匯報說：「接到中央委任後，即組織臨時省黨部，實行清理黨籍，凡掛名共產黨者，一律取消。此時全省之純粹同志，來省登記者，一月之間，即有一千餘名之多。……全省七十餘縣中，皆有同志中之青年，分頭宣傳，截止本年二月底止，已正式成立之縣黨部，計有……等九縣；而已經組織分部一個至三個者，則有……等十五縣；此外……等十九縣，籌設縣黨部或分部者，皆在組織中，尚未正式報告成立耳。」

安徽省代表的報告分為七個部份，第二部份是「共產黨破壞本黨經過」，其中的一段反映國共雙方的爭取群眾的情況：「總理週年紀念，省黨部聯合各團體在省議會舉行追悼大會；該偽黨部亦在黃家操場開會，用種種卑劣手法，塗改省黨部所印貼之廣告，改省議會為黃家操場字樣，以圖混淆。然是日省議會致祭者，頗為踴躍，自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絡繹於途，總商會等各團體暨各中小學校共計六十餘團體，及市民參加者不下萬人；赴黃家操場者，係偽黨部數十人而已。由此可見民眾認識本黨極為清楚，諸同志與偽黨部之奮鬥，至此遂告一段落矣。」

廣東是汪—蔣—中共執政之地，但是反對這聯合者大有人在。廣東省代表的報告很長，其中列舉的廣州學生聯合會的選舉，很能夠說明高壓下的人心所向：「廣州學生聯合會，自共產黨分子把持後，即

常假藉名義，發出有利於己之傳單通電，各校學生皆深表不滿。本黨學生同志尤憤恨異常。及改選期至，本黨學生同志，均踴躍出席競選。結果，本黨卒獲勝利，然已受過利用一年之痛苦矣。且選舉之時，共產分子預遣無賴工人數十人入場，準備失敗時搗亂會場秩序，後爲公安局獲知，其計遂不得逞。」

四川省代表統計全省的忠貞的國民黨員人數，可見其力量：「茲將確實可靠之黨部及其黨員概數，列表如左。其無把握者，則不更闢也：重慶市黨部，二千零五十人；成都市黨部，一千二百人；郫縣縣黨部，三百人；璧山縣黨部，五百人。總計四黨部黨員總數四千零五十人，本表所列，均已清理黨籍者，其餘權未列入。」「總合右述各項，及四川黨務言之，共產分子在四川有相當之組織和宣傳，以行其把持本黨、破壞本黨之計劃。又內挾蘇俄之援，外結吳、鄧之叛，利誘勢迫，着着逼人。而四川同志唯憑精神相與搏擊，處境非易，操心亦良苦矣。」

江西省的情況是，省黨部被中共黨員把持，但各縣黨部則爲中國國民黨的純粹黨員領導，江西省的報告中說：「共產派雖將臨時省黨部把持，而各縣市黨部均是純青白化之同志所組織，……各縣同志見省黨部未經正式手續忽然成立，所有執行委員全爲共產分子，於是由九江市派去代表向中央控告，結果因中央亦爲共產分子所把持，所派代表等不得要領而返。遂有九江召集各縣同志開聯繫會議，議決只有消極抵制之一法。於是各縣黨務完全停頓者數月。去歲外交代表團經過九江時（按：即是林森、鄒魯所率領者），始明白解釋一切，並囑繼續工作。於是數月停頓之黨務，又陸續恢復矣。」這報告顯示，因爲共產黨加入而造成的分裂，並非只是在中央，基層也照樣嚴重。只是第四次全體會議使得分裂公開和全面化了。

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致辭或發電報致賀的，還有中國國民黨在美國、澳洲、德國、法國、古巴、

越南、墨西哥等國的國民黨組織，以及國內的河南省、直隸、重慶、南京、蕪湖等省份和城市的國民組織，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這些基層組織的政治態度，體現着國民黨內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潮的普遍性，西山會議的主張並非是孤立的。

第四、因為會議開始的時候，正是「中山艦事變」剛剛發生，不少代表因為對蔣介石反對中共的期望，主張把開會的地點搬到南京去，雖然未成，這花很多時間的起伏的討論過程，體現出捍衛他們的信仰和價值觀的艱難。

最初，會議打算在北京的西山召開，可是由於北京的政治環境，而不得不改在上海的租界之中舉行。在會議開始的時候，在廣州的蔣介石剛剛和中共以及汪兆銘發生了第一次嚴重衝突，即發生了「中山艦事變」，使得派代表赴廣州交涉之說沸騰起來，並且還有人激昂慷慨地主張把大會搬到廣州去，那是國民黨人流着熱血創立的根據地！在三月三十一日的預備會議上，第五十號代表沈定一說：「現在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開會諸同志想想我們黨自由抑不自由呀？（鼓掌）我們的黨既不自由，要取得自由，必須要我們同志的努力奮鬥。（鼓掌）廣州是我們總理多年的奮鬥得來的，是我們同志們的頭顱熱血而得來的，他們共產黨既無力奮鬥，又未犧牲頭顱和熱血，可是現在廣東竟被他們安然得去了，這是何等痛心一事。從前總理在滿清帝皇橫暴之下，尚要帶了同志去襲擊廣東總督衙門，現在我們同志難道不能去拚一拚不成？（鼓掌）所以我主張我們的這個大會在這個時機，應即馬上移到廣州去開。（鼓掌）假使萎靡不前，搖尾乞食於人，就是不革命。（鼓掌）我們現在要全體代表一同到廣州去，就是死也死在廣州好了。（鼓掌）這是兄弟的主張，請同志們採納。（鼓掌）」於是，下一個（第七號代表）發言說：「我主張先派代表赴粵，其目的在：1.要廣州政府及介石同志承認我們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2.要廣州政府介石同志自動地否認前次在廣州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要國民政府的政權完全交還於我們真正的

黨。」這些激發人心的演說，在艱難環境中奮鬥的代表們中，贏得了多次的掌聲。之後就是否將大會移到廣州繼續開，或派代表先去打聽聯繫，或者以上海孫文主義學會上海分會的名義去，進行了一再的討論。因為廣州到底是國民革命的根據地，如果能夠去，就可能使混合黨的國民政府改變性質，事關重大。但是沒有去，去不了。

雖然廣州中央有軍力、財力的支持，混合黨所根本缺乏者，是純粹國民黨的精神和孫先生時代的資深黨員所象徵的中國國民黨的黨統，所以對於上海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還是很害怕的，擔心根本政局的動搖。早在會議開始以前，廣州中央就發出了通緝令：「去歲冬間，少數叛徒托庇軍閥及帝國主義勢力之下，在北京開西山會議，在上海開偽中央會議，蓄謀破壞本黨基礎，造謠煽亂，無所不至。第二次代表大會曲加矜恕，許其自新，稍有人心，當知後悔。不圖少數叛徒，倒行逆施，每況愈下，近更以三月二十九日開偽代表大會號召，仍謀在西山開會，不遂，則在上海舉行。似此公然叛亂，實屬罪不容誅。政府僅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對於此等叛亂嚴厲懲治，特此佈告，凡有敢在上海、北京等處假冒本黨最高機關名義，以遂其叛黨營私目的者，不分首從，一概拿交法庭，照叛逆論罪。」①這以國民政府名義的命令，可謂氣勢汹汹，但不可能阻礙會議的召開。

在獲悉第二次代表大會欲派出代表赴廣東活動，為會議遷移作準備的時候，廣州更嚴令緝拿。四月六日命令道：「近聞上海偽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偽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派人前來廣州搗亂，應即緝拿嚴辦，請公決案。當經決議，着國民政府嚴令軍警一體緝拿歸案懲辦。」四月九日，再發通緝令，還列出了有關名單。直到五月份，還再發出兩次通緝令，可見對於上海方面可能派出的人員的重視。就像沒有蔣介石對廣州反共勢力的彈壓，廣州就不可能順利地召開「二大」，沒有蔣介石的反對，也不可能阻止上海的代表大會遷移到上海召開，因為蔣介石當時是廣州衛戍司令。根據蔣介石日記編成的年譜中，四

月五日記載：「宋子文告密，右派擬開廣州市黨部大會，而爲示威運動。公函吳鐵誠制止之。謝持等自滬電張、譚，欲來粵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公聞之，恨其思利用機會以搗亂者。」蔣介石親自將最後一句改成「置之一笑」，這是軍權的掌握者的自傲心態的表現。這段話也說明蔣介石是鎮壓廣州反共力量的主要力量，也是制止上海第二次代表大會遷移廣州召開的基本阻力，廣州的通緝令是在七月十日下午的。

當出席在上海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對於蔣介石殷切期望之時，蔣介石在四月三日針鋒相對通電反對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國民黨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各省諸黨部、各報館公鑒：三月二十日鎮壓中山艦一案，全係個人局部問題，已由中正個人完全負責，呈明政府，自請處分在案。中正自隨總理以來，立志革命，無時不以犧牲個人自矢。近日竟有本黨之不良分子，以中山艦案爲名，造作謠言，以行其反革命陰謀之實，不使本黨同歸於盡而不止，（按：以下八個字，在蔣介石修訂年譜時刪去，大陸出版時恢復）此種敗類，不除何待。今又接上海西山派所謂全國代表大會通電，希圖破壞本黨，摧殘革命，（按：以下十二字被蔣介石刪除，大陸出版時恢復）其煽惑挑撥之伎倆，已窮途匕見。此種托庇於帝國主義勢力範圍下之行動，不自愧其爲帝國主義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電，視中正爲傀儡，殊堪痛心。中正今特敬告本黨同志，與全國人民曰，中正誓爲總理之信徒，不偏不倚，唯革命是從，凡與帝國主義有關係之敗類，有破壞本黨與政府之行動，或障礙革命之進行者，必視其力之所及，掃除而廓清之，鞏固黨國，而慰我總理已死諸同志在天之靈，耿耿此心，唯共鑒之。蔣中正叩。江。印。」（《蔣介石年譜初稿》第五五四頁）在四月八日對黃埔學生的講話中又說：「現在還有少數黨員，在上海擅自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這種現象，於本黨前途是非常悲觀的。這樣下去，我們雖有五十萬黨員，可說是沒有一個，現在上海所謂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一種非法行動，我們爲黨國

計，不得不群起而攻之。鏟除障礙，才講得到黨的統一，黨統一了，而後才能實行主義。所以我們對於這些立意搗亂，使黨分裂的分子，要當他是本黨的罪人，這一點，各位同志都要觀察清楚，不要依感情作用，被謠言煽惑受敵人誘騙，這樣才算是本黨黨員，要不然，便失去黨員資格了。」②本來廣州的基本秩序是由蔣介石所奠定的，他的政治立場，是廣州中央反對和通緝的基本條件；他的粗魯的表態，使得上海方面對他的殷切期望破滅，自然不可能派出人員前往聯繫。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參與者，後來擔任秘書長的桂崇基在多年以後回憶道：「自四中全會閉幕後，接着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即國民黨黨部所在地，正式成立了中央黨部。……此時經費奇絀，上列諸人中有全靠大學任教，以其節餘補助黨部經費。至此階段，國民黨因共產黨加入所引起的內部紛擾，已經旗幟鮮明了，表面化了。所謂物莫能兩大，涇渭不相混，正是類此情形。上海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立後，即在海內外成立分部，其負責人在共產黨與廣州國民黨夾攻之下，多能不計利害得失，以保持國民黨之真面目。遂於民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二十九日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四月十日閉幕，發表閉幕宣言，文長九千字。……唯此一宣言，上海各報隻字未提，送請新、申兩報登載不受，請以廣告方式登出，亦不受，因共產黨及廣州國民黨皆屢施恫嚇，不許登載。檢視全文之所主張，皆本乎三民主義之原則，暨中山先生平日之言論，針對時弊，發人之未發，言人之所不敢言。雖事隔四十餘年，但其思想與主張，仍合時宜，誠足以代表國民黨人之真面貌。」③自從葉楚傖倒向廣州中央以後，上海《民國日報》就轉向，使得這時候的宣傳工作格外困難。桂崇基的這一段回憶，可以見到從經濟到宣傳的困難情況。

雷嘯岑著的《三十年動亂中國》中比較廣州、上海兩次代表大會寫道：「廣州新選出汪兆銘、譚延闓等三十六位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凡參與西山會議的人，一概擯棄。新當選的共產黨分子有吳玉章、

楊匏安、惲代英，連同原有的李守常、林祖涵、于樹德共爲六名，此外新當選者皆爲國民黨中的新進左傾分子，而汪兆銘的親信人物顧孟餘、陳公博、經亨頤、陳友仁、甘乃光等，皆赫然入彀，種下了以後改組派的種子。

西山會議派亦依照大會決議，將中央黨部移設上海，並於十五年四月一日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林森、鄒魯等二十五人爲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以與廣州對抗。如是，國民黨因容共反共之爭，遂分裂爲兩個中央黨部了。論黨統與中委人才，上海黨部自然較勝一籌。然廣州爲革命政權所在地，又有軍事力量與國際應援，聲勢卻比上海的正統中執會爲優越；廣州方面的宣傳力量，也比上海黨部來得浩蕩。……

這樣一來，國民黨內部公開形成了大分裂，黨齡與資望較高的，多傾向上海黨部，其他資望較淺的，如汪兆銘一流人，爲着要利用時機，攘奪權力，即與共產黨一鼻孔出氣，佔據廣州中央機構，發號施令。國內與海外黨部，亦因此發生裂痕，形成兩大壁壘，相互鬥爭。中山屍骨未寒，而其黨徒亦墮落如斯，實可慨嘆。最不幸的是國民黨人甘受共產黨的玩弄挑撥，公然自相作踐，如臨大敵，而共產黨則置身事外，以全力推波助瀾，使國民黨內訌日烈，獲致分化政策的奇效。……國民黨內經此大分裂運動後，不特元氣大傷，精神渙散，再無精誠團結之日，且種下以後二十年來中國內亂之因。「其始也簡，將畢也鉅」，這是當年執行聯俄容共政策的人所不及料到的吧！④

註釋：

①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選集》第四輯（上）第三六四至三六六頁，江蘇古籍出版社。

- ② 《中華民國史實紀要》中華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一至十二月份第三〇五頁。
- ③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桂崇基著，台灣中華書局發行，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二十二、左右開弓者

廣州國民黨「二大」以後，因為汪、蔣、中共（此時鮑羅廷在北方）各自都在進行權力的擴張，於是發生新的權力格鬥。「中山艦事變」是這權力鬥爭的集中表現，而「整理黨務案」則是蔣介石和蘇俄—中共妥協的產物。

當廣州「二大」還沒有閉幕的時候，蔣介石已經對蘇俄表示不滿；「二大」閉幕以後，彼此衝突加劇了。這在蔣介石的日記、並且由蔣介石親自修訂的《蔣介石年譜初稿》中，有多處的記載，今按時間順序摘抄，並且將其政治環境加以說明如下，以便瞭解其過程：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九日，廣州「二大」閉幕那天，《蔣介石年譜初稿》記載：「公（按：即蔣介石）近對羅、季二顧問主張，心輒不樂，嘗謂：『我以誠往，彼以詐來。』非可與共事的同志也。」當蔣介石從汕頭回到廣州參加「二大」的時候，主張立即北伐；在廣州「二大」的軍事報告中，也認為向外發展的時機已經成熟。但是蔣介石給汪兆銘的信中說，蘇俄軍事顧問季山嘉等反對北伐，而且陳獨秀也在《嚮導》週刊上發表文章反對北伐^①。據學者研究：「共產黨卻不贊成北伐，其原因是：他們在軍事上尚未取得決定性的權力，如果北伐勝利，國民黨將擁有雄厚的軍事力量，對共產黨不如在廣州時多所倚仗；他們在國內各階層的勢力也很薄弱，對工農方面雖以全力從事爭取，但時間尚淺，基礎未定，且各省工農群眾的階級意識亦甚模糊，一時不容易接受共產主義宣傳，萬一北伐成功，政治改善，一般工農較前安定進步，共產黨爭取工農的工作，更將事倍功半，即無法達成第三國際指示他們的任務。」^②

二月七日：「上午十一時，季山嘉顧問就談政局與軍隊組織，語多諷刺，又若甚疑公者。因喟然曰：『今之中國社會與空氣，無怪其以土耳其爲殷鑒，並鄙中國軍人盡爲貪污者也。嗚呼，國家若此，軍人如彼，感觸現象，能不深用汗顏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楊天石研究道：「一月中旬，奉直軍閥在華北攻馮玉祥的國民軍。爲此，季山嘉提出兩項建議：一、由海道出兵往天津，援助國民軍；二、蔣介石親赴北方練兵其地點，據說是海參崴。對於這兩項建議，汪精衛贊成，蔣介石最初也表示同意。」（按：見於其一月二十日、二十八日的日記中）然而，蔣介石很快就改變了態度。二月六日，軍事委員會會議決黃埔軍校經費三十萬元，王懋功第二師經費十二萬元。七日，軍校經費減至二十七萬元，王懋功第二師經費增至十五萬元。此事引起蔣介石的疑忌，懷疑是季山嘉起了作用。當日，蔣介石和季山嘉進行了一次談話。」③這次談話就是蔣介石上面所記載的。因爲王懋功是汪兆銘的人，汪在隨後致蔣介石的信函中婉轉地支持季山嘉。於是，蔣介石認爲環境惡劣，提出辭去軍事委員和衛戍司令職務。蔣介石和汪、季的矛盾都尖銳起來。

二月十九日：「上午，致鮑羅廷書，長約數千言（稿失），旋與汪兆銘商議赴俄事。公近以怨尤叢集，環境險危，部下思想未能一致，而安樂非可以共，決定再度遊俄，自以爲新生命存亡之一大關鍵。季山嘉過往聞之，狀似不安。」這是因爲蔣介石在這裏提出赴蘇俄修養的下馬威之故。當時蔣介石雖然在軍隊中掌握了最有戰鬥力的第一軍，但是在第一軍中的第二師師長王懋功卻是親近汪兆銘的；第一師長是蔣介石的心腹何應欽，黨代表卻是周恩來；第三師的師長雖然是蔣的人，但是黨代表是中共黨員。其他幾個軍的軍長譚延闓、程潛、李濟深、朱培德、李福林等人，對蔣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滿。蔣介石一旦和蘇俄顧問的摩擦加劇，他就倍感不安，所以提出辭呈，要到蘇俄去「修養」。因爲不是真心去，所以提出了以後，又觀望蘇俄顧問季山嘉的反應。

二月二十六日：「奪王懋功師長職，並扣留之。（按：以下三句爲蔣介石在編年譜中親自加的）俄人季山嘉等爲之震驚，以其利用王懋功圖謀不軌、顛覆本黨革命勢力不成也。」蔣介石的起家，一切靠的是軍隊，所以只要碰到軍隊問題，就毫不妥協和手軟：他果斷地趕走了提拔他的上司許崇智；他及時地以莫須有的罪名解決了熊克武和他統帥的川軍；如今，他再次突然逮捕了第二師師長王懋功，以他的心腹劉峙繼任，還說蘇俄顧問利用王懋功「圖謀不軌」。蔣介石在「中山艦事變」以後曾經爲此說道：「我自汕頭回到廣州以後，就有一種倒蔣運動，無論本軍裏或軍校裏，都造出一種不良空氣，使得軍隊裏的官長來反叛，並拿利祿來引誘我們的官長。我只拿一件很小的事來證明，請大家來判斷這件事對不對。現在廣東統一有六軍，廣西有兩軍，廣東是第一、二、三、四、五、六各軍，照次序排下去，廣西自然是第七、八軍了。但是第七軍的名稱，偏偏要攔起來，留在後面不發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叛離了我，推倒了我，然後拿第二師和第三師編成第七軍，即以第七軍長報酬我部下反叛的代價，這是不可掩飾的事實。」僅僅依據主觀的猜疑和判斷，蔣介石將王懋功逮捕，並且派副官將王押解到上海，給蘇俄顧問和汪兆銘以沉重的打擊④。蔣介石則很滿意，覺得一個月以來的時常提防的狀況結束，至此才安定下來。

二十七日：「上午，往訪汪主席，報告要事，及對季山嘉處置意見。公以季山嘉之專橫矛盾，如不免去，非危害黨國，且必牽動中俄邦交，然料其爲個人行動，決非蘇俄當局意也。有頃，季聞之，知過，並願辭退。公甚疑之。」顯然蔣介石一不做、二不休，進一步要季山嘉辭職，並向汪表示，如果蘇俄顧問不辭職，他就辭職。關係已經到了非常尖銳的地步。

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劉峙、鄧演達知人有以油印品分送，作反蔣宣傳，公聞之，心轉釋然。」在蔣介石不斷擴張權力的情況下，對手會有所反抗，蔣介石感覺到了一「單槍匹馬，前虎後狼」的艱難處

境。這樣的心情，是他在中山艦事變期間採取斷然措施的心理原因。

十九日，這是事變的前一天，但是已經開始行動：「上午，往晤汪兆銘，回寓會客，痛恨共產黨挑撥離間與其買空賣空之卑劣行爲，其欲陷害本黨、篡奪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於此當機立斷，何以救黨，何以自救？乃決心犧牲個人，不顧一切，誓報黨國。竟夕與各部密議，至四時，詣經理處，下定變各令。」蔣介石雖然半年以來，從鮑羅廷推薦他擔任特別委員起，雖然一帆風順，但是政敵也增多了。他既把王懋功趕走，解除了汪兆銘對軍隊的任何控制，和汪兆銘的關係緊張起來；又和蘇俄最高軍事顧問日益對立，而這兩者是結夥的；而在廣州的其它幾個軍長和蔣介石的關係並不友善，況且各個部隊的政治工作都在中共的掌控之中。所以本身就多疑的蔣介石，這時處於日夜惶恐不安之中（見其《年譜》）。所以當他發現共產黨員率領的中山艦調動升火，加之汪兆銘家的幾通電話，他就懷疑對方已經採取行動對付他，於是果斷地採取了軍事行動反擊，這就是中山艦事變。蔣介石的心腹陳肇英回憶這過程道：「蔣校長遂於午後八時光景，專使密邀我與徐桴、歐陽格三人，在東山官邸籌商對策。當時蔣校長顧慮共黨在黃埔軍校內擁有相當勢力……。且在我等會商之前，已着徐桴同志派陳毓輝購妥開往汕頭的日輪廬山丸艙位，並由陳氏攜款三萬元先登輪埠，因是九時許仍未定計，蔣校長即邀余等數人分乘小轎車二輛，詣赴廬山丸停泊處。迨車抵長堤東亞酒店附近，蔣校長考慮至再，終覺放棄行動，後果殊難把握，亟命原車駛回東山官邸重新商討。」⑤陳立夫也回憶，蔣介石的欲登輪船離開，但猶豫不決，汽車往返徘徊於東山與長堤之間數次，最後蔣介石決定留下。這兩段回憶證明，並不如像周恩來等共產黨人所說，「三月二十日事變，完全是蔣介石製造的」；但是從蔣介石採取軍事行動時，無論中山艦上，還是中共所控制的軍隊，和蘇俄軍事代表團的倉皇反應，以及中山艦長李之龍等的回憶，也說明肯定不是中共所製造的。也許是由於誤會，或許是政治家的挑撥利用，總之，近來歷史家們已經有若干

的考證，這裏就不浪費筆墨了。

但是蔣介石從這事變卻獲得了政治上的大利。

蔣介石出其不意，先發制人，先將毫無防範心理的中山艦副艦長引誘逮捕，然後不經流血佔領中山艦，在李之龍家中將他逮捕；再將兵工廠和廣州罷工委員會等中共控制的機關都奪取過來，兵不血刃就得到了全面的勝利。

半年以前，蔣介石通過汪兆銘和蘇俄顧問的支持，趕走了許崇智，第一次獲得了軍權；三個月以前，蔣介石在廣州「二大」上才剛剛進入了中國國民黨的領導階層，成了汪、中共、蔣三方聯合掌權的局面；現在通過中山艦事變，趕走了汪，汪悄然去了法國。汪本來在黨內就沒有根基，唯一忠於汪的部隊在二月被蔣介石解決，如今發動軍事行動，竟然不通過這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最高領導人。汪不能不走，走了以後，還要被說成是企圖綁架蔣介石的嫌疑犯。這樣，蔣介石突然實質成為了黨的最高領袖。他沒有黨內的資歷不要緊，他從上海請來了有資歷的張靜江，和葉楚傖、邵元沖，來加強他的地位。剛剛在廣州「二大」形成三方聯合執政，如今只剩下兩方。

另外的中共一方的意見，即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領袖陳獨秀、張國燾的意見，是和蔣介石妥協，再加以利用。這既是聽命於蘇共中央，也是勢力薄弱的中共所能夠做的選擇。張國燾立即被派往廣州，他認為此事變的原因有三，第一是由於蘇俄駐廣州最高軍事顧問季山嘉的方針和態度，主要是過度重視與北方馮玉祥的關係，引起了蔣介石的反感；其次因為汪、蔣的權力衝突，「兩雄之不能並立所致」；再次是，中共在廣東的軍隊、國民黨部和群眾運動中的勢力膨脹，引起了蔣介石的不安。

事變發生的時候，由蘇共中央委員布勃諾夫率領的代表團正在廣州，他認為事變的主要起因是蘇俄軍事顧問季山嘉等在廣州的錯誤所引起：「首先，不善於預見國民政府內部的衝突，它在軍隊中也有反

應。第二，過高地估計了廣州領導的力量和團結一致。第三，未能盡早揭露和消除軍事工作中的冒進做法，這在三月的事件中暴露得十分清楚。第四，參謀部、軍需部、政治部的集中管理進行得太快，沒有考慮到中國將領的心理和習慣。第五，將領們受到過份的監督……。⑥季山嘉等數十人，被命令立即回國。

莫斯科命令鮑羅廷迅速回到廣州，以便執行蘇俄——中共的妥協政策。

這樣，剛剛在國民黨廣州「二大」上形成的三方面的聯合執政，只剩下一方面大權獨攬，中共內部這時把蔣介石稱為「中國的拿破侖將軍」。對於蔣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解決敵手，《蔣介石年譜初稿》中記載，張靜江因此稱讚蔣為天才：「張人傑聞公述遭陷瀕危臨機應變之狀，極許為天才（對方亦以此推許之）。」這「對方」就是中共。軍人出身的蔣介石剛剛才直接插手政治，已經體會到權謀之術的重要性：「政治生活全係權謀，至於道義，則不可復問矣。」⑦

蔣介石這時候最需要的，是對他獲得的權力進行鞏固。他的鞏固的方法，就是反過來打擊反共的國民黨人，以便再次得到了鮑羅廷——中共的支持，這支持是政治上的，也是物質上的，蘇俄的大批軍火在五月六日運到黃埔。

首先，他趕走了和鮑羅廷同船到達廣州的胡漢民。

胡漢民在蘇俄半年多的期間，雖然與蘇俄各領袖會見，不得不發表了一些適應環境的言論，卻對蘇俄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他返國途中到達海參崴時，正好發生中山艦事變，蘇俄卻要他返回莫斯科。在海參崴停留二十幾天以後，終於和鮑羅廷、譚平山、邵力子等同回到廣州，已經是四月二十九日。

五月三日，胡漢民出席廣州中央的會議，報告他的遊俄經過，特別是他對蘇俄的深一層的瞭解，他說：「我已經考察出蘇俄的真相了。第一、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機密，對付中國國民黨的策略，是始終

不給我們曉得的。……這回我在莫斯科誠心誠意地和他們交涉，他們卻生怕透露了秘密，仍然和鮑羅廷一樣的見解。不特俄之聯我，只視我爲工具，不能相見以誠，即其中國 C.P. 寄生我黨，一面不斷地陰謀搗亂，也是無可轉移的政策。第二、蘇俄名爲無產階級專政，其實是共產黨專政；名爲共產黨專政，其實是幹部派斯大林專政；第三國際做假招牌，更不必說。然而他們公然以中國革命問題爲內部問題黨競爭的工具，爭相利用爲個人的勢力。如此談革命，不知其相去幾遠！他們還要說中國國民黨不免有小資產階級意識，不能代表無產階級，不知他們這種爲個人『奪取政權』的意識，配得上何種階級。」⑧這是胡漢民對蘇俄——中共的真知灼見。並且胡漢民還在報紙上發表宣言，表明他的反共態度。按理說，蔣介石剛剛對付了中共，逼迫得他們倒退，胡漢民的回國，正是在黨內沒有歷史的蔣介石所最需要合作者，這是國民革命之所需，是中國國民黨之所需。但是，蔣介石採取了逼迫胡漢民離開廣州的做法，以便適應蔣介石個人權力的擴張所需。

《蔣介石年譜初稿》記載，在胡漢民回國到達廣州的第二天的四月三十日：「下午，又與胡漢民談話，（按：以下是被蔣介石親自刪除，而在大陸一九九二年出版時按原稿恢復的兩句話）其言似多挑撥，心疑不確。二時半，與鮑羅廷論黨事。」胡漢民給蔣介石說些甚麼挑撥話呢？是要蔣介石逮捕鮑羅廷，但是蔣介石立即將此話報告了鮑羅廷。蔣永敬著的《胡漢民先生年譜》中，在胡漢民離去後引用鮑羅廷的話說：「胡漢民曾經提議以兵力監視我……。」《鮑羅廷與中國大革命》第三六二頁說「胡漢民剛回廣州時，一方面宣揚自己的遊俄經歷，一方面與蔣介石頻頻接觸，並要求蔣介石扣留鮑羅廷。」張國燾在一九七三年出版《我的回憶》的書中說：「四月二十九日，鮑羅廷回到廣州……他告我，剛才蔣介石將軍曾向他轉述胡漢民的話，要蔣不再信任鮑羅廷，並將鮑扣留起來。他說完這些話，向我搖搖頭，聳聳肩。接着表示他固然不相信他真會被扣留，但他覺得他的好朋友蔣介石將軍居然藉胡的話，向他來一

次下馬威。」查閱《蔣介石年譜初稿》，在胡漢民回到廣州的當天和次日，和蔣介石見過面，以後一直冷遇他。蔣介石完全爲了自己的利益，洩露胡漢民的話給鮑，藉此給鮑施加壓力，增加自己的政治份量；還引起鮑對胡漢民的不滿意，利用鮑來對抗胡漢民和逼迫胡漢民離開廣州。胡漢民回到廣州，不僅僅孫文主義學會的青年人覺得有了領袖，在廣州中央裏面的反共人士伍朝樞、古應芬、孫科、吳鐵城等也有了中心，當時社會上盛傳胡漢民將重新出山。胡木蘭回憶道：「先父自俄返粵後，在羊城有歡迎大會，許多黨政大員皆與會。致辭時，台下頗有噓聲，先父亦知爲共產黨人所爲，稍後乘船離廣州。」⑨如果蔣介石稍微有一點所謂「公心」，將會和胡漢民合作，由胡漢民主黨政，蔣介石主軍，進一步團結中國國民黨，將國民革命引向新的勝利階段，胡、蔣合作將是中國國民黨之福。但是，蔣介石想的卻是他的權力獨佔。他把胡漢民所謂的挑撥話洩露出來，向世人表明蔣—鮑—中共是站在一起的，中山艦事變引起的不快已經過去；並且直接給胡漢民冷遇，興致勃勃回國的胡漢民只好躲在家中；在蔣介石全盤控制下的廣州，在五月七日廣州各界舉行國恥大會的會場外，竟然由中共黨員組成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分子，將反共的孫文主義學會的領導人潘佑強、楊引之打成重傷；五月八日，胡漢民要求會見蔣介石的要求被拒絕；五月十一日，胡漢民攜女兒悄然赴香港，《蔣介石年譜》中記載胡漢民離去時蔣介石的反應：「聞展堂昨晨隻身赴港，船中適遇精衛，（按：以下兩句話被蔣介石刪除，在大陸出版時按原稿恢復）嘆曰：異哉，冤家逢對頭也。」蔣介石已經在汪、胡矛盾中得利，這裏表現出一種幸災樂禍的心情。

爲了換取鮑羅廷——中共的支持和妥協，蔣介石這時候對廣州的反共人士立即進行打擊（以下均根據《蔣介石年譜初稿》）：四月二日，扣留艦隊司令歐陽格，蔣介石加之的罪名是「以其聯絡右派，不利於黨也」（《蔣介石年譜初稿》第五五三頁），歐陽格是按照蔣介石命令直接指揮奪回中山艦，並且逮

捕李之龍的人，李之龍卻緊接無罪釋放；也不用直接參與鎮壓的陳肇英；在四月三日蔣介石發通電反對西山會議的當天，與廣州中央的反共黨員古應芬、伍朝樞談話，蔣介石記載道：「右派徒思利用機會，聯接帝國主義，以陷害黨國」，古應芬是政治委員會委員兼廣東省民政廳長，伍朝樞是政治委員會委員兼廣州市長；四月五日，制止廣州市黨部發起的反共示威活動；四月十四日，又反對伍朝樞與孫科向英國借款的意見，最後迫使他們離開廣州；四月二十三日免去反共的吳鐵城廣州市公安局長職，繼而逮捕之，吳當時還兼任第十七師師長。當事人吳鐵城回憶道：「我和孫科、伍朝樞同去黃埔那一天，原來有一個主意，就是：倘若蔣校長同意我們對共產黨制裁的主張，我們準備將首要的共產黨員十數人，僱備一艘輪船，把他們送到中山縣附近一小島或送到上海去；次要分子，暫時加以拘禁。因為當時所有知名的共產黨員，他們的地址，公安局都有特別戶籍的登記；他們的活動，我隨時得有報告，無所遁形。」

⑨《吳鐵城回憶錄》在台灣所寫的，所以他說是李濟的陷害，不可能說是蔣介石。邵元沖的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日記也記載是蔣介石做的。張靜江告訴他，蔣介石的意見是打擊「右派」：「十時頃靜江得介石方面消息，謂鐵城近者行動異常，且有勾結黃埔學生情事，昨日黃埔軍校火藥庫爆烈，聞亦有關係……故今晨九時已將鐵城拘留憲兵營；囑靜江邀哲生來商之，會哲生已偕梯雲來，因共談一切；又聞外人言梯雲亦與香港有所往還，故望梯雲亦暫行離粵，並希望哲生充政府及黨之代表赴俄與第三國際接洽……」這些原始史料已經充分證明，蔣介石毫不留情地打擊，使得廣州反對中共的各種計劃不能實行，楊天石綜合史料敘述道：「吳鐵城、馬超俊、古應芬等人並曾有一個計劃，準備以突擊檢查的辦法逮捕在廣州的全部共產黨人。吳鐵城的被捕使這一計劃破產，從而消彌了危險。」⑩做這一切都是剛剛從中山艦事變中得到利益的蔣介石，他再從打擊反共人士中謀取巨大政治利益。那時候，在上海的西山會議諸人哪裏想得到蔣介石是這樣一個只圖私利的左右開弓者！

蔣介石想的是甚麼？

三月八日，《蔣介石年譜初稿》就與蘇俄關係，引用蔣介石日記寫道：「上午，與汪兆銘決定革命大計。公以『一切實權非可落外人之手，雖即與第三國際取一致行動（按：蔣後來改成「聯絡亦應定一限度，要當不失自主地位」），汪極謂然。」九日又記：「公以軍事處置，失其自動能力，又共產分子在黨內活動，不能開誠相見。貌合神離，則革命未能有成者，故決辭職。」（按：後來改動的不必抄了）這實權對於蔣介石來說，豈止「外人」，是不可落入一切人之手，這也是他和蘇俄顧問以及汪兆銘產生摩擦的重要原因。蘇俄——中共就是再愚蠢，也清楚所追求的是「實權」，所以當然不能「開誠相見」。這說明蔣介石和汪兆銘一樣，雖然極力與之合作，不惜損傷中國國民黨的利益，但是在「權」的問題上，最終導致他們之間的分裂。

事發當天的三月十九日，毛思誠編撰的《蔣介石先生年譜初稿》中，根據日記而成的原文是：「回寓會客，恨共產黨陷害，決赴汕頭避禍。午後五時行至半途，猛思『我何爲示人以弱？』仍返東山，誓犧牲個人一切，以救黨國。」編年譜時，蔣介石就把心理活動改得十分冠冕堂皇：「上午，往晤汪兆銘，回寓會客，痛恨共產黨挑撥離間與買空賣空之卑劣行動，其欲陷害本黨，篡奪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於此當機立斷，何以救黨？乃決心犧牲個人，不顧一切，誓報黨國。……此時若不殉黨，何顏立世。」前面的原文是，恨共產黨陷害他自己，所以避禍；後面改成恨共產黨陷害「本黨」，所以準備殉職。可是蔣介石不僅僅是反對西山會議的中堅人物，也是反對和鎮壓廣州的反對共產黨的最重要人物，他是在爲中國國民黨着想嗎？

三月二十一日，即事變後的次日，他告訴蘇俄使館的參議，鎮壓措施並非針對蘇俄，只是「對人」，而換得蘇俄立即召回季山嘉，機敏的蔣介石爲以後對蘇俄的妥協留下了後路。而西山會議與蔣介

石相反的是，在一切講話、宣言中，首先都是針對蘇俄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政策，鮑羅廷只是執行這一政策的人，恰恰是對事不對人。

三月二十三日，蔣以「事前未及報告，專擅之罪」而請求軍事委員會處分，各軍的軍長譚延闓、朱培德、黃紹雄爲了挽回汪兆銘，竟然表示贊同，迫使蔣在二十六日向汪遞交請假書，還表示「寒心」地乘軍艦駛抵虎門，四月一日才返回黃埔。他在三月三十一日記載的兩句話最爲重要：「只要王權在我，何事不可遷就。」表示在權力問題上，對於蘇俄，對於一切人都不可讓步。有了權力，再來遷就妥協。這就是蔣介石在這時的行動準則。

四月十日：「自共產黨退出軍隊後，（按：以下一句是後來加上）公心甚痛苦，因嘆：『團體分裂，操戈同室，損失莫大。兩年來心血，盡於此矣。』」次日又記：「廣東現局，右派與共產黨之間，顯樹敵幟，土匪與地方主義常伏暗礁，深用焦慮。」（修改前的原稿最後一句是「善後無良策」）蔣介石的作法是對共產黨和反共產黨的國民黨人都進行打擊，實質是利用雙方矛盾謀利。兩年以來蔣介石的確爲黃埔操勞，他由黃埔起家而獲得了他夢寐以求的權力。對於蔣介石來說，黃埔是一個屬於他的整體，任何分裂都會使他本人受到損失。這和西山會議的參加者們處處立足於中國國民黨根本不同。如今因爲由中共黨員組成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國民黨員組成的孫文主義學會的勢不兩立的局面，使蔣介石非常心疼。同樣，蔣介石在汪兆銘與胡漢民的不和中得利，也在國共兩黨的衝突中突然晉陞權力的最核心，他始終想把握雙方、駕馭雙方，而沒有從國民黨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後來在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四·一二」清黨之前，也是因爲鮑羅廷——中共開始採取了限制蔣介石的策略，蔣介石的政治生命的依附體，被迫從「雙方」變成國民黨一方，所以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清黨」。在中山艦事變以後不久，他分別解散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期待雙方仍然是他個人的力量，聽他的指揮，爲他個人效勞，這當然

是一廂情願，因為中共不純粹是一個中國的獨立政黨，只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根本上為蘇俄的利益服務。蔣介石在這時期只貪圖個人權力的作為，深深損害了國民革命和中國國民黨。

在鮑羅廷——中共的退讓和蔣介石的鎮壓所謂右派的行動中，廣州中央的第二次全體會議終於在五月十五日開幕，通過了著名的《黨務整理案》，其基本精神是一方面限制共產黨的活動，一方面又提高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地位，由孫先生時代的容共，變成平等的兩黨聯合。該決議案一共有四個決議案，第一決議案的要點有二，第一是改善國共關係的四項原則，第二是組織國共兩黨聯繫會議，以國民黨代表五名，共產黨代表三名組成，「本會議之議題範圍，為審查兩黨黨員妨礙兩黨合作之行動、言論及兩黨黨員之糾紛問題，並協定兩黨有連帶關係之各種重要事件」共有八條。從而將中共地位提高，成為黨對黨的形式。

第二決議案共九條，其基本精神在於對中共進行限制。第二條是：「凡他黨黨員加入本黨者，各該黨應將其列入本黨黨員之名冊交本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保存。」第三條是：「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在高級黨部（中央黨部、省黨部、特別市黨部）任執行委員時，其數額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執行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第四條是：「凡他黨黨員之加入本黨者，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等等。中共被迫讓出的部長等職位，在胡漢民、汪兆銘都不在，而西山會議諸位元老已經在上海另立中央的情況下，只能由蔣介石親近的人擔任，黨的主席根據第三決議案，由張靜江擔任，蔣介石兼任組織部長。

第三決議案是《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案》，為蔣介石今後的領袖地位創造了根據。

第四決議案是《全體黨員重新登記案》。

蔣介石在這裏限制了共產黨的活動，卻立即又向共產黨「以誠懇的話來解釋」，甚至說「本黨黨員老弱不奮鬥，對共產同志懷疑不信任，故致有這條文的規定」。在《整理黨務案的理由》為題的演講

中，蔣介石說：「自總理容納共產黨加入黨後，共產黨不能離開國民黨而革命。同為革命集團，國民黨是領導各階級革命的。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無疑問。共產黨革命目的，是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目的，亦是打倒帝國主義，同向帝國主義進攻。如離開共產黨，國民革命亦不成。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係增加革命力量。兩黨合作攜手，中國革命前途，有希望成功。……現在世界革命中間，有第三國際，可稱為世界革命總司令部。……故要革命成功，須聯俄共同打倒帝國主義。聯合世界革命力量後，中國革命，方可成功；總理主義政策，方能實現。講到此點，有兩句結論：總理聯俄，係打倒帝國主義；容納中國共產黨加入，係要共產黨實行三民主義，完成中國革命；反之，俄國幫助中國革命，是否要中國實行共產主義，不然，係實行國民革命；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否要實行共產主義，亦不然，係要實行三民主義。」①既然中共於國民黨目標這樣一致，沒有合作，中國革命就不能成功，還限制中共做甚麼呢？蔣介石在實際的作為上，是左右打擊，然後得其利。但是這個軍人想要在理論上對此作出解釋，則是一塌糊塗。以上講話以後，蔣介石收到一些來信，於是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七日《軍校紀念日演講辭》中，「把中國國民黨對於第三國際的關係，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大加發揮，認為沒有第三國際的統一指揮，沒有中共的合作，國民革命就會失敗……等等。如果真的要將蔣介石在這時期的言論，按照先後次序排列起來，的確會讓讀者墮入五里雲霧之中。

「黨務整理案」此後被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津津樂道者，是對於共產黨在上層的權力限制，蔣介石覆張繼的信中也對於這表示得意。但是共產黨除了與國民黨內獲得平等的合作地位以外，最重要者，獲得了從事下層的農工運動的進一步控制。只要看一看解密的蘇共中央檔案就可以知道，對於在中國發動底層的農工運動，使得中國社會從根本上動盪，以便蘇俄火中取栗，從來放在第一要位。如今蔣介石斤斤計較於上層的權力，而把從事底層的農工運動大權讓人，是最大的失誤。從此，以地痞流氓和土匪為

主力的中共骨幹力量，從廣東擴張，隨着北伐軍事勝利而有湖南、湖北的痞子運動；甚至中共在後來的抗戰勝利以後成功地打下天下，都是靠的基層的農工運動。執政的國民黨人從一開始就忽略了這一點。

爲此，在上海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警告蔣介石書》，對於蔣介石爲了一己的權力於蘇俄——中共的妥協，提出書面警告，但仍然以同志相稱：「自去年十一月以還，執事初則附和揚言左傾之汪精衛，繼而發現共產黨之陰謀，又召集五月十五日之偽會，思有以解決之；解決無方，又與之委蛇。半年中態度三變，執非同志所望於執事者也。」——共提出四點警告：「共產黨之加入本黨也，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時，曾再三聲明以個人資格入黨，絕對服從本黨政策及紀律，……第二次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並確定最高原則，訓令各級黨部一體遵守，免滋糾紛。是本黨完全爲獨立的純粹的革命集團，在最高黨部之內絕無國共兩黨聯席會議之理，彰彰明甚。執是不察，方翊以共產黨分子不許爲中央部長爲限制共產黨之妙用，曾以思僞中央常務委員大半爲共產黨乎？執事既已洞察覆黨覆國之陰謀，應毅然遵照去年十一月第四次中央全體委員在總理靈前會議所決定之清釐黨籍實行辦法辦理。此警告者一。」

「……執事近來公開演講，竟悍然不顧一切，主張國民黨應隸屬第三國際爲世界革命，凡所設施及一切宣傳品皆漫着國際色彩，傾覆派共產黨員邵力子代表赴俄參與第三國際會議，在執事之爲此，或別有不堪告人之苦衷，姑不具論，但此種行爲，不唯誤黨且誤國。執事即不念總理之遺訓與本黨紀律之制裁，獨不思中華民族有悠久之歷史與強毅之獨立性乎？執事過矣，所謂第三國際者，不過爲蘇俄侵略之工具耳，於真正世界主義何有？更於吾黨三民主義何有？深慮執事勿爲所惑，背總理先求民族獨立之旨，昌言世界主義，並舉並黨屬之第三國際也。此應警告者二。」

「共產黨分子自依附本黨以來，破壞我黨基，混亂我旗幟，顛覆我政府，陷害我同志，跋扈飛揚，

無惡不作，試觀若輩對於本黨忠實黨員不誣曰反革命，即誣曰不革命。……乃廣州各處運動宣傳悉掛紅旗，公共場所悉貼赤標，舉青白化烏有矣！執事身歷其境，視若無睹，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又何怪國內軍閥以赤化爲中傷吾黨之利器也。甚望執事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實行純粹三民主義，使上述叛黨舉動不再見於本黨根據地，然後同志不致疑慮，軍閥亦無所藉口也。此應警告者三。」

「俄人鮑羅廷，夕總理時代一僱傭耳，近則執事稟爲師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計議，悉聽命於鮑，而軍中大小計，則悉聽命於俄國軍官加侖，甚至關於黨政一切重要會議，既由鮑召集於其私寓……。今執事固大權獨攬者，亦竟俯首聽命，則誰尸其咎耶。深冀執事翻然變計，驅逐客卿，收回主權。必先有獨立自由之黨與政府，而後有獨立自主之國家也。」

鄒魯立即致函張靜江和蔣介石，對於此次會議加以否定，並且提醒他們不要上當。關於第三國際的各種命令要由所謂國共聯席會議通過一事，鄒魯認爲，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的時候，就通過設立國際部來約束中共，但是共產黨根本不執行，所以鄒魯說：「今之共產黨用舊法對付吾黨，固無不可，弟竊意必進一步對付，完全承認條件，但條件中載明：『華共黨及第三國際對民黨內之共黨一切訓令，須交聯席會通過。』可見其不對民黨內之共黨訓令，可無須交聯席會議。此後彼一切皆以對共黨、對第三國際黨員訓令，我無參與之權，彼之黨團作用如故，彼之破壞吾黨如故，蓋彼黨員奉行彼之命令，自不利於本黨也。」關於加強紀律問題，鄒魯評論道：「加入吾黨之共派，一面文字上申明紀律，一面事實上軌外行動。」鄒魯認爲，「十五日鄭重之大會，其效等於零。……此次十五日之會成立，以廣東爲吾黨根據地，軍權復在介石之手，尚非戒嚴不能安然成會而謂與共產黨同心同德到底，雖三尺童子當知其不能。此種事實，一一昭示。兄等不於吾黨力猶可能清黨之時，爲黨免除後患，必欲使黨伏其隱禍，甚非兄等忠於總理、忠於黨國之本志也。」⑫鄒魯一面分析該「整理案」，一面以事實打動張靜江和蔣介

石。雖然蔣介石一再反對西山會議，但是西山會議諸人根據蔣介石在中山艦事變中的作爲，仍然判定蔣介石是終於要反共的。

要從意識形態，從孫文主義或者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得出蔣介石的政治信仰結論，是非常困難的。因爲對於階級鬥爭是否是社會發展的動力，要不然同意馬克思，要不然同意孫先生的民生主義，是不可居中的；對於蘇俄侵佔外蒙古，以及指使中共在孫先生去世後進一步奪取中國國民黨的領導權，控制了中央執行委員會，要不然同意，要不然反對，也不可居中。但是蔣介石忽而盛讚蘇俄和第三國際，忽而痛詆之；忽而說民生主義的下一步是共產主義，忽而說共產主義萬惡滔天；忽而在中山艦事變中逮捕中共黨員，忽而逮捕和驅逐在中山艦事變中的爲他效勞的反共的國民黨員；忽而大反西山會議的和平清黨，忽而自己搞血淋淋的武裝清黨，等等。

雖然蔣介石在蘇俄期間，強調「世界革命的主要基地在俄國」，中國的國民革命只是這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但是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卻無視蔣介石的親近表現，強調蘇俄與中共的更親近關係，並且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也必須做出新的解釋才行（見《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九十六號文件）。故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任何援助，從來都是以國民黨對中共的態度而定。汪、蔣的靠攏蘇俄，無論如何總隔了一層。對於蘇俄和中共來說，蔣介石永遠只能是「外人」，一個可以利用的對象而已。因此，蔣介石與蘇俄——中共之間，在權力問題上是很難調和的，二者只是互相利用，只能夠越來越疏遠和惡化。

蔣介石從跟隨陳其美參加辛亥革命起，他就是一個國民黨的黨員，雖然由於他自己的個性和利益需要，爲了一點點小事情，常常隨意離開革命隊伍；他考察蘇俄，也是以國民黨人的身份去的；他多次主張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但是從來不曾是一個共產黨員，他的個人政治前途，也只能夠和國民黨的前途聯接在一起；他親近的師輩人物張靜江是反共者，他的密友戴傳賢被中共視爲「五鬼」之一；無論蔣介

石如何左右打擊，他仍然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出現。所以西山會議的各項文件中，對蘇俄中共的透徹地揭露的同時，對於汪總是無保留地批判，對蔣介石在批評之餘，字裏行間總是以拉爲主，他們希望總會在不同程度上打動國民黨員的心，包括蔣介石。

但是蔣介石這位具有強烈政治企圖心的國民黨人的急速陞遷，卻與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逐步奪取權力拴在一起，蔣和中共都需要繼續維持這獲得共同利益的聯盟。蔣介石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從來離開權力中心很遠，也沒有具體可以控制指揮的軍隊；他從蘇俄考察歸來後，適逢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當選的中央執監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好幾個軍人，可是蔣介石連代表都沒有當上；蔣介石在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給孫先生寫長信，既表白他的忠誠，又抱怨孫先生對他的不夠重用信任（見《蔣介石年譜初稿》第一六〇至一六四頁）。在孫先生去世以後，群龍無首，廖仲愷被刺事件發生，由鮑羅廷提議，蔣介石才突然晉陞三人最高權力機關特別委員會委員之一；進一步趕走許崇智奪取軍權，也是與鮑、汪共同謀劃的結果。中共——汪兆銘的每一次成功奪權，都離不開蔣介石，蔣介石步步高升，也離不開中共——汪。所以蔣介石以軍隊實權來支持鮑、汪，製造出廣州「二大」，打擊國民黨內的反共勢力，將共同所得到的權力固定下來。但是這只是利益的暫時結合，當這三者在權力擴張中，逐漸彼此變成權力奪取的對象的時候，他們之間就成爲敵人，所謂的「中山艦事變」就發生了，軍隊的控制者就開始打擊中共和汪兆銘力量；但是蔣介石一時還完全離不開中共（汪已經被蔣趕走），還有共同的利益糾葛在一起，他於是將中共的力量加以約束，而不是趕走或消滅，就提出「黨務整理案」，使得中共動彈不得。

而中共，只是在社會底層掌握有一些烏合之衆，在國民黨內部和在軍隊內部，都仍然很弱小，成不了氣候，他們不得不接受蔣介石逼迫，退出國民黨內的部長、交出黨員名冊等等，他們吞下上層失利的

苦果，伺機依靠底層的農工運動再起。

「中山艦事變」的結果，使軍人蔣介石突然大權獨攬，嚐到甜頭的他，準備學習法國革命時期的羅伯斯庇爾和蘇俄的專政方式，進一步軟硬皆施控制國民黨，並以武力建立一個由他獨裁統治的中華民國。他這時候的日記，已經表現出這一傾向，這也是在清黨完成以後，在一九二八年之後的三年中，他和西山會議諸人繼續衝突的原因：

五月七日：「上午，與鮑羅廷商肅清反動派。下午，高級訓練班（學員為共產派之退出軍隊者）開學，公施訓話，說明共產黨員的立場與中國革命的需要。……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這兩種勢力發生衝突，一定會使革命失敗，一定會叫反動派敵人乘機來破壞革命戰線。因此，我們一定要在大處注意，要懂得要有一個革命中心，如大處不注意，專注意小處，僅說親愛、團結等口頭話，仍歸無用。如法國革命便因為革命指揮不統一，發生了多頭政治，彼此衝突，結果革命不成功，內而造成拿破崙帝制，外而造成梅特涅的專制。反之，俄國革命便因為黨的統一，指揮集中，有唯一的領袖指導，遂收大效。……我們須知道，革命非專政不行的，一定要有一個主義，一個黨來專政的。想到一年以前，軍隊裏和學校裏並沒有分裂現象發生，為甚麼到現在才有呢？一則是因為各方面的謠言，一則實在C·P·的進行太急。當時若能注意於此，聽我的指揮，從中調節，決不會發生這種事情。」蔣介石在這裏認為，法國和蘇俄革命的經驗就是實行「唯一的領袖指導，便收大效」，甚至國共之間的衝突，也是因為沒有他立於兩黨之上來調節，才演變而成現在這個樣子。所以他的「黨務整理案」就是由他這位軍人提出，並且執行。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很荒唐的，並且等到第二年的春天，他就在「兩黨」上面坐不住，在上海大開殺戒了。不過這裏可能是剛剛得到大權的蔣介石的獨裁思想的最早暴露。這一段《年譜》摘抄還很重要的一點是，蔣介石打擊「反動派」，即打擊在廣州的反共力量，是和鮑羅廷商量以後進行的。

三天以後(六月三十日)逮捕了吳鐵城，並且在七月二日的年譜中記載政治委員會常務委員們告假，即趕走了反共的國民領袖胡漢民、伍朝樞、古應芬，而以張靜江、宋子文代替。這是蔣介石打擊西山會議反共勢力以外，再次聯合鮑羅廷——中共對中國國民黨忠實黨員的迫害。

六月九日：「下午，看法國革命史，乃曰，俄國革命之方法，非其新發明，十有八九皆取法於法國，其經驗實可寶貴。」六月二十二日，蔣介石還在看俄國革命史，甚至北伐等事，出發打仗的當天，打到了湖南省衡陽、長沙以後，仍然在看俄國革命史。蔣介石學到的法、俄經驗，就是如前所述的專政、獨裁，是要站在兩黨之上。所以蔣介石這時候以軍隊所捍衛的，不是如像西山會議那樣的純粹中國國民黨，而是一個夾雜許多中共黨員的混合黨。要等到同樣在擴張權力的中共，反過來極力限制蔣介石的權力擴張的時候，這二者在國民黨內的利害衝突加劇的時候；還要等到蔣介石個人的勢力進一步強大，使得他的利益和他控制國民黨的利益一致的時候，他才會在與中國共產黨的衝突中為國民黨的利益行事。然而那時候，中國共產黨的星星之火已經不可能被撲滅。

蔣介石晚期有著作《蘇俄在中國》問世，這是他和他統治的國民黨被中共打敗以後，在台灣的蔣介石企圖總結事變的教訓經驗的文字，裏面的確有一部份是可讀的。但是這本書牽涉到早期，即一九二七年四月武裝清黨以前的部份，則有不少掩飾和編造的謊言，這些謊言是出於把蔣介石自己說成是終身反共的智者和英雄的需要。如果蔣介石是一個稍微誠懇一點的君子，他就會為他早期在已經明白蘇俄——中共的目的和作為的情形下，為了自己的權力需要，仍然扶持中共，幫助中共，讓中共的勢力隨着北伐而擴張到全國的歷史行為負責，可惜蔣介石的書中缺少了這重要的一部份。

註釋：

- ① 《蔣總統秘錄》第六冊第八一至八二頁，日本《產經新聞》連載，《中央日報》社印譯，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台北。
- ② 《三十年動亂中國》第八五頁，雷嘯琴著。
- ③ 《尋求歷史的謎底》第四三二至四三三頁，楊天石著，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 ④ 《革命文獻》第九輯第八九頁，羅家倫編，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台北。
- ⑤ 《傳記文學·八十自述》第三十三卷第六期第一五頁。
- ⑥ 《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第三七三至三七四頁，亞·伊·切列潘諾夫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北京。
- ⑦ 《蔣介石年譜初稿》第一五一頁，毛思誠著，萬仁元、方慶秋主編。
- ⑧ 《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蔣永敬著，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台北。
- ⑨ 《吳鐵城回憶錄》第一六〇頁，吳鐵城著，三民書局印行，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初版，台北。
- ⑩ 《尋求歷史的謎底》第四七〇頁，楊天石著。
- ⑪ 《蔣介石先生最近之言論》，北京民社編輯兼發行，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出版。
- ⑫ 《鄒魯文存》第三集第一二一至一二三頁，鄒魯著，北華印刷局印刷，中華民國十九年，台北。

二十三、信念的力量

通過「黨務整理案」，中共在國民黨中的力量受到限制，蔣介石的有些政治朋友也到達廣州進入權力核心，蔣介石的地位得到加強。但是，他與中共的利害衝突逐漸尖銳起來，甚至越來越難以調和。這使得蔣介石在思想路線上和西山會議的基本主張接近起來。於是，蔣介石一面開始北伐，企圖以軍事上取得成功，來突破在廣州的地域限制和蘇俄——中共的羈縛；一面通過個人關係和西山會議諸位元老聯繫，並以官位等利益來誘惑他們，企圖換取他們對他個人領袖地位的擁護，以便構築他在國民黨內的根基。沒有一槍一彈的中國國民黨上海中央，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召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定了堅持清黨方針和支持廣州國民政府北伐的兩項基本任務，中央黨部依然通過函電、通告，以及各地黨部的具體工作對局勢進行影響。在策略上，對蔣介石是批評加聯絡，以同志相待；對中共以及汪兆銘，則是不妥協地揭露批判。是信念的力量支持着上海中央的上下同仁，在主張被貫徹的時候，在組織上被蔣介石等加倍打壓的艱難日子。

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下北伐動員令，蔣介石於九日就總司令職；十一日，北伐軍攻入長沙；經過激戰，北伐軍在十月十日攻入武昌；經過三次易手以後，北伐軍在十一月七日佔領南昌。

但是，隨着北伐的推進，蔣介石和中共的利害衝突尖銳起來。

對於約束中共的「黨務整理案」，中共內部的意見並不一致。鮑羅廷、陳獨秀、張國燾是主張妥協

的，他們的意見主導了中共的政策。在《嚮導》一五七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出版）上，就所謂聯合戰線問題，登載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竟然對於使得中共吃虧的決定表示擁護，說這決議是「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關於以後兩黨合作方式，則吾兩黨本為革命聯盟中之友軍，可各自根據其黨之議決以相協商，文函會議皆可。」

在同一期的《嚮導》上，陳獨秀發表了給蔣介石的公開長信，主要精神是對蔣介石的肯定和支持。關於「中山艦事變」，陳獨秀說：「從建立黃埔軍校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且正當英、日、吳、張反動勢力大聯合，攻破北方國民軍之時，復在廣州陰謀倒蔣，這是何等助長反動勢力，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國共產黨是這樣一個反革命的黨，你就應該起來打倒他，為世界革命去掉一個反革命團體；如果是共產黨同志中哪一個人有這種反革命陰謀，你就應該消滅他，絲毫用不着客氣。不過我知道我們黨並且相信我們黨中個人，都沒有這樣反革命陰謀。」然後陳獨秀就蔣介石所指出的中共的陰謀問題一一做了解釋。關於受到共產黨的威脅問題，陳把責任完全推給孫文主義學會，並且反過來讚揚蔣介石說：「如果先生當時不在廣州，孫會中人當真會大殺共產黨；而且我們還聽說若不是先生切力阻止，歐陽格、吳鐵城輩還要徹底幹下去，這些事實正足證明精衛先生即令有那樣的話，卻非神經過敏，更不是有意激動風潮。先生要知道當時右派正在上海召開全國大會，和廣東孫會互相策應，聲勢赫赫，三月二十日前，他們已得意揚言廣州即有大變發生，先生試想他們要做甚麼？」然後對於蔣介石批評的四個事實一一做了長篇的解釋。幾乎是披肝瀝膽的語氣說道：「至於說我們有反革命的陰謀，即倒蔣陰謀，則我們不能承認。中國革命的力量還很弱，我們敵人的力量卻非常之大，我們的革命工作，好像撐破船於大海巨浪之中，急求友助還來不及，豈有自毀危舵之理！我們對於馮玉祥尚且要愛護，何況蔣介石！即右派中之進步分子，只要他們不贊成以區區一萬一千

元出賣革命的根據地——廣東於英國，我們都不拒絕和他們合作，何況蔣介石！」

在「黨務整理案」出現之後，中共雖然受到了限制，但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陳獨秀以上致蔣介石的信件，卻一再公開表示對蔣介石的真誠擁護，有點令人費解。從最近幾年公佈的中共中央文件上，我們知道在中共內部，已經悄悄把蔣介石叫做「新右派」了，進而有限制蔣介石的一系列政策出現。就在陳的以上信件發表以後的下一個月，即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執行委員會會議文件的第一個文件《中央政治報告》中，在第四部份《國民黨內分化和我們的態度》裏，將國民黨中央分為四種勢力（按：大概參加西山會議的諸君已經被整體開除，不算在內）：「反動的右派（李福林、馮自由、馬素、古應芬），代表第一種；共產派代表第二種；左派（汪精衛、甘乃光等）代表第三種；新右派（即中派如戴季陶、蔣介石等）代表第四種。我們對於國民黨的態度應該與對全國各種社會勢力之政策是一致的，就是我們要聯合左派並向反動的右派進攻；我們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聯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傾，而不能希圖消滅中派，猶之在社會勢力中我們現在還不能敵視資產階級，有時還需要扶助中派。」①（以下引用自同一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者，皆不另外註明。）蔣介石在這裏已經被劃入了新右派的範疇，自然就實質成為了敵人，根據需要而鬥爭了。

在該擴大會議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決議案》中，一開始就把矛頭對準蔣介石：「一、廣州三月二十日事變，國民黨中央五月十五日會議，黃埔軍校六月七日又提出處置共產派問題——凡此一切，都是一貫對共產黨的進攻。廣東方面，現在攫得政權者是武裝的中派，而全國則有右派的反赤運動，他們都向共產黨進攻。」這裏把蔣介石同全國的反赤運動並提，但是蔣介石是掌權者。第三條規定，為了「保證無產階級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現時我們在國民黨內的政策，應當是：擴大左派與左派密切的聯合，和他們共同的應付中派，而公開的反對右派」。所謂的右派，在鮑、汪、蔣聯合之

下或者已經在廣州「二大」中被開除了，或者如胡漢民、伍朝樞等人，已經在蔣、鮑聯合下被驅逐了，吳鐵城坐了牢。如今輪到蔣介石自己成了「革命」對象，成了「應付」的中心。

中共中央作出了決議，立即開始了「應付」蔣介石的行動。最重要者，就是從下到上開展「迎汪」運動，即將出賣國民黨給共產黨的「左派」汪兆銘從巴黎請回來，以便約束蔣介石的權力擴張。黨史專家李雲漢引證國民黨中央保存的文件顯示：「十五年七月，在共黨分子把持下的國民黨浙江、安徽、湖北、江西、江蘇五個省黨部及漢口、上海兩個特別市黨部，聯銜電請『汪主席銷假視事』，開啓了迎汪運動的序幕。」②這是中共中央文件下達以後的第一個響應。

緊接着，中共中央給廣東的中共組織發出了兩封信件，就所謂「蔣汪合作」問題作出了詳細指示，以下稍稍加以摘錄：「一、廣東政府自中派當權以來，縱容各縣知事及駐防軍與土豪劣紳民團勾結，摧殘農會，殺戮農民，包庇反動工賊，袒護反動右派學生，打擊左派學生，苛取商民捐稅，壓抑一切民衆自由……。有些同志以爲，我們不必變更現在的中派政權，在這個中派政權下我們亦可以發展民衆運動，這個見解完全不合實際。因爲我們要不反對中派政權，只有停止發展民衆運動；愈發展民衆運動，則民衆愈不滿足，愈反對中派政權。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爲救廣東，使我們不能不決定對於中派政權的態度，不能不決定因群眾對於現狀不滿而提起的迎汪反蔣口號。」這段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所謂中派政權與中共的根本分歧，即蔣介石等到底是國民黨人，反對基層的階級鬥爭，不容許中國社會的根本動搖。所以不管蔣介石在上層如何一再打擊所謂右派力量，因爲反對階級鬥爭這一點，就一定不能滿足中共的要求，一定會被劃入「新右派」的行列，與其它國民黨人一樣，受到打倒的命運。

下面部份是中共策略的三種選擇：「二、我們不維持中派政權有三條路可走：（一）迎汪倒蔣；（二）蔣汪合作；（三）使蔣成爲一個左派，執行左派政策。……三、這三個辦法，第一辦法太危險……第三辦法亦多

困難。……四、我們現時仍是希望實現第一個辦法。我們可以向蔣表示，汪出並不是要倒蔣，並提出保證條件：(一)決不報仇；(二)決不取消黨務整理案。……」

在中共的壓力下，同樣根據《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發表的中共中央給廣東的信件，蔣介石曾經派胡公冕到上海向陳獨秀疏通，請求中共不要贊成汪回國。陳婉轉地對汪的回國問題做了解釋。同時，蔣介石又請求共產國際遠東局長魏金斯基去武漢解釋幫忙，以便緩和關係。在九月二十七日，魏金斯基和中共中央商榷以後，最後確定了對蔣介石的策略：「第一，……須將軍權和黨權分開，請汪精衛回粵將黨權交與汪精衛。第二，為避免蔣與各地小軍閥權利之衝突，為滿足各地民眾自治的要求，須將地方的軍隊及財政與中央劃分……。第三，我們當引導蔣注意準備更遠大的全部革命軍事工作，維持蔣之中央軍事領袖地位……。照以上辦法，既適合蔣之好大喜功之心，又使汪蔣及各小軍閥間的權力或者不至衝突。……」這策略的成功之處在於，由於維護蔣介石的軍事領袖地位，使得蔣介石在這時願意維持與中共的聯盟。但是，要蔣介石將黨權交給汪，並且以唐生智等地方軍閥來約束蔣，又加劇了蔣介石和中共的矛盾衝突，後來終於發展到了所謂「寧漢對立」，發展到了血與火來解決的地步。

同時，已經對於蘇俄——中共的企圖明瞭的蔣介石，也終於掉過頭來，與他經常痛罵為「不革命」的西山會議諸領袖開始了聯繫，以尋求支持。

蔣介石因為和中共的矛盾加劇，他個人的權力追逐和長遠的政治需要，除了依靠有悠久歷史和奮鬥理想的中國國民黨以外，別無選擇。因此，他個人的利益逐漸和中國國民黨的利益接近，也就不得不在思想上逐漸接受了西山會議的理念。並且，蔣介石在黨內的歷史單薄，就是幫他的忙和擁護他的老資格的吳敬恒、張靜江，多在法國居住，信仰的是無政府主義，在中國國民黨內也缺乏根基。所以蔣介石在組織方面，非常需要西山會議諸領袖的支持。在上海的中國國民黨中央到底在許多省份有基層的黨部

在運作，而且在政治主張上，也無可挑剔地是爲了國民黨自身，加上他們在國民黨內有深長歷史和人脈。但是蔣介石的具體做法，卻是去以官位拉他們，要他們來爲蔣介石個人獨佔黨、政、軍的不穩定的領袖地位服務，甚至要他們在這個「混合黨」內工作。在承認蔣介石地位這個前提下，甚麼都可以商談。

最早的有關記載見於《鄒魯文存》第三集第一三七頁，是鄒魯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日寫給吳敬恒的信件。後來在《回顧錄》中又說：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以後，「吳敬恒先生來和我們接洽，他對我們說：『廣州中央預備成立五院，把在滬的同志安置在監察和考試兩院內，特來請我們全體回去，共同合作。』我們很誠懇地答道：『此間同志唯一的希望就是清黨，廣州方面若實行清黨，我們就可以無條件回去合作，他非所問。』」③西山會議諸位領袖，怎麼可能爲官位所引誘呢？鄒魯、林森本來就是中央常委，居正本來也是常委，因爲反對中共，在第一屆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上堅辭不當；張繼和謝持是地位同樣高的監察委員。如果他們貪圖官位，去附和鮑羅廷——汪兆銘，甚麼都有，何必到西山開會，走一條荆棘叢生的道路呢？爲的就是理想和原則，就是清黨。

蔣介石獲取權力通過四個步驟：第一，趕走許崇智獲得軍權，趕走胡漢民、謝持等獲得黨權，形成與汪兆銘、鮑——中共合作的局面。第二，通過廣州「二大」開除整個西山會議元老集團，將這三方合作固定下來。第三，通過中山艦事變，趕走汪兆銘，打擊了中共，將三方合作變成兩方。第四，通過黨務整理案，將中共約束起來，再將張靜江、葉楚傖、孫科等請到廣州，形成「蔣」的一方獨佔局面，任何國民黨人想要在國民革命中發揮作用，都只有附和於蔣，蔣已經開始集黨、政、軍的權力於一身：六月四日，國民黨廣州中央通過出師北伐，並任命蔣介石爲國民革命總司令案；七月五日，蔣介石被任命爲軍人部長；七月六日，被廣州中央任命爲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這樣，廣州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黨

部、各級軍事機關都納入了蔣介石的掌控之中。在此時，他需要鞏固自己已經得到的地位，所以他一方面打擊共產黨，一方面又打擊廣州的反共力量；一方面發表大量攻擊西山會議的言論，一方面又派人到上海對西山會議諸位領袖進行拉攏。

邵元沖六月八日的日記記載，他和張靜江已經邀請田桐、林森、張繼等南下廣州。廣州「二大」期間，對於參加西山會議的諸人採取分別處分的分化瓦解的政策，已經成功地把孫科、戴傳賢、葉楚傖、邵元沖拉到了廣州，如今分別邀請，正是繼續拆西山會議的台的組成部份。現在作為西山會議參加者的身份到上海，邵元沖可以起到別人不能起到的作用。他的日記顯示，此行是直接奉蔣介石之命的，臨行前在廣州的六月十七日：「午前江道沂來訪，詢此間約子超來事，余告以既經介石、靜江、組奄等聯名邀請，當無其他問題云云答之。」以林森的資歷和德望，並且既是西山會議的發起者之一，又是上海中央的海外部長，能夠把他拉過來裝璜廣州混合黨的門面，當然重要，但是並沒有成功，林森哪裏可能像被蘇俄領事館出面拉過去的幾個人呢？

邵元沖的六月十九日記的有關記載：「午前訪介石談行止事，決定於下星期行。」這「行止」是指即將的上海之行。

六月二十一日日記的有關記載：「晨與介石談赴滬任務。……晚與雪竹、雨岩等談良久，又與靜江談。」這一天的日記證明邵之赴滬是蔣介石的安排。

六月二十二日：「晨間訪介石，並囑其致函汝為，稍盡友誼，又略談黨務而行。十時頃致黨部開部務會議。十一時以後歸，與靜江一談。」許崇智是被蔣介石褫奪軍權趕下台，是西山會議的重要幕後活動者之一，邵給蔣介石出主意，要他「稍盡友誼」，即從個人角度示好，以利益引誘，核心仍然是「黨務進行」，拆西山會議的台。邵元沖帶着蔣介石、張靜江的交待，坐着「亞洲皇后號」的頭等艙，到上

海去進行拉攏工作了。

但是他遭到西山會議諸人的拒絕，邵元沖七月一日的日記記載：「五時頃訪田梓琴不遇。至汝爲宅，見溥泉、梓琴、覺生、慧生、太蕤、道腴、廷煥、復生、梯雲等在坐，遞次陳述對粵意見。汝爲殊牢騷，謂應有表示；溥泉則謂，非與共產黨派脫離，決無辦法；慧生等辭旨亦極激昂。言動如此，殊爲憂之。九時頃散歸，檢物至十二時頃寢。」參加者不僅僅有許崇智、張繼、居正、謝持等西山會議的領袖人物，還有因爲在廣州中央反共，剛剛被迫離開的伍朝樞，也有黃復生、王用賓、田桐等老資格的頗有聲望的國民黨人，他們加在一起，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國民黨正統力量。而這正是廣州中央所非常缺乏的。可是他們堅持的「與共產派脫離」的原則主張，不爲所動，使得邵元沖「殊憂之」。

從一九二五年的「廖案」發生到這時候不到一年，中國國民黨內部由於中共、汪、蔣的合作翻攪，卻已經面目全非。最初被趕走的是許崇智、胡漢民、鄒魯、林森、鄧澤如、謝持；最近胡漢民第二次被趕走，同時並趕走的還有伍朝樞、古應芬，而吳鐵城則進了監獄。作爲實權人物的蔣介石，是這一系列使得中國國民黨深深受損的主角。他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就是因爲掌握着軍隊，和與鮑羅廷——中共合作。只是在他與中共發生利害衝突以後，他才回頭聯絡中國國民黨的正統中堅力量。但是他仍然要繼續聯合中共，以便隨時給國民黨的正統力量予打擊；但是也想利用國民黨的正統中堅力量來壓迫和打擊中共，造成最後掌握大權的是他個人。只要稍稍有一點黨德黨心的人，決不會如此，而只會按照西山會議的決議，與中共和平分離，從而實現中國國民黨的大團結。西山會議的諸位元老們，怎麼會去爲這樣一個左右開弓的軍事獨裁者捧場呢？附和者邵元沖當然會碰壁和「憂之」。不過，邵仍然繼續完成他的任務，與張繼、覃振接觸，七月十日的日記還記載與田桐、周震麟商議，要他們設法打消在環龍路四十四號的中央委員會宣佈蔣介石罪狀的舉動。

與居正關係深厚的湖北老黨人田桐，也參加了斡旋。他和周震麟親自到達剛剛攻下的武漢會見蔣介石，他並不知道蔣介石對此行調和的反感。《蔣介石年譜初稿》九月十六日記載道：「下午，田桐、周震麟來談，公以老同志語不堪入耳，深為氣憤。」田桐回到上海以後，根據張靜江檔案，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寫信給張靜江說：「靜江、介石二兄鑒：自接來示後，與諸友有商量，唯子超在廬山養病，業已多日，刻已去函相約。昨接陳樹人來函，並洋一千元，溥泉前已得兄接濟，不需此款，單寄三百元付子超矣。」西山會議的領袖們因為廉潔奉公，往往窮困，蔣介石總是在政治上打擊以後，在經濟上予以接濟，以便從個人角度拉攏。謝持日記記載，在一九二七年秋天的汪、蔣聯合把特別委員會搞垮以後，也派人送錢給謝持，以便緩和，當然不起作用。田桐在信件中繼續寫道：「介石兄新就總司令之職，弟甚希望大功告成，蕩平全國。唯成功要素在寬大包容，消弭隱患。關於以上辦法，宜分三種：甲、專函請謝慧生、鄒海濱、居覺生、黃復生、覃理明、劉群士及應請諸同志，不問其來與否。乙、兩執行委員會之調和，以弟之見，宜採兩委員會合併策。丙、對於展堂、汝為二人之緩和，此策由二兄定。三者並行，弟等易於為力。弟以斡旋此事為主，遲早赴粵，視事體如何，刻下未能定。……」④田桐本人是上海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還參與了中央黨部的工作，他希望兩個中央黨部合併，增強力量。他不知道蔣介石對於他進行調和的反感，從武漢回來以後，又寫信給張靜江，他們善良的願望當然不會起到作用。並且《蔣介石年譜初稿》記載，在九月的二十九日，蔣介石已經決定請在法國的汪兆銘復出返國，以便加強他的現實地位，還在十月三日通過廣州的張靜江、譚延闓致電汪兆銘，聲稱：「本黨使命前途，非兄與弟共同一致，始終無間，則難望有成。」蔣介石這時候，的確需要在黨內有歷史的汪出來，以便穩定局面，和獲得廣大國民黨員的支持。因為上海中央堅持清黨為前提，不斷通過公開和私下途徑，批評蔣介石從廣州到湖南都高唱的「接受第三國際指揮」，「加強與中共合

作」，而汪在這點上，則與他完全一致。但是鮑羅廷——中共卻立即利用「迎汪」，來排擠蔣介石，反而引起了他們之間裂痕的加大。

從中山艦事變起到黨務整理案的出現，上海中央黨部的領袖們都看出來了蔣介石一定會接近西山會議的主張，一定會和中共分道揚鑣；並且如邵元沖和田桐式的溝通在不斷的進行，吳敬恒與鄒魯的對話也沒有停止（見鄒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致吳的信件），使得雙方的瞭解在增進，也加強了西山會議諸人的信念。信念的力量支持着忠貞的中國國民黨人，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沿着西山會議和上海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思想路線前進。第二次代表大會所建立的上海的中央黨部，從不間斷地進行着運作，對中國國民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由謝持、鄒魯、沈定一（後來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居正代替沈，居正原來擔任組織部長）主持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四日開始工作以來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六日，共舉行了四十九次中央常會，做出了許多影響中國政局的決議案。

中央常務委員的工作十分繁重，僅僅在開始運作的一九二六年四月，就召開了八次會議，工作的範圍包括大政方針的執行，如各個委員、部長的來去，各個省黨部的聯繫和指導，各方面的交涉等等。現在根據《清黨實錄》，以五月三日的中央常會的工作記錄，瞭解一下責任的重大和工作內容的繁重，並且瞭解當時的方針政策。該日通過的各項決議案，先前在四月二十六日的第七次中央常會上就討論過。

「五月三日第九次會議決議案：（一）北京市黨部提案審查報告：

「一、對廣東政府態度案，決議：修正如下：廣東國民政府原為本黨政府，亦即中華民國之唯一政府，但現在為共黨分子從中搗亂，致礙進行，本黨當努力肅清，俾其鞏固，以完成國民革命之工作。」上海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廣州處於非常矛盾的境地，即對廣州「二大」和廣州黨中央全盤否認，但是對

國民政府及其領導的北伐，又採取支持態度。因為廣州是國民革命根據地，有國民政府、軍隊和稅收來源，而上海中央就只有中央執行委員會，只有主張。但是領導北伐的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又是廣州中央的組成部份。用陳獨秀後來的話說，西山會議的主張貫徹了，但是在組織上失敗了。

「二、確定對世界革命態度案，決議：照審查報告（聯合世界被壓迫民族組織民族國際）。」即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非階級革命，也不是國際革命。

「三、確定對蘇俄態度案，決議：照審查報告（照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辦理）。」即只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蘇俄是新的紅色帝國主義，被排除在外。

「四、對農工態度案，決議：照審查報告（將原案交農工工人兩部備作方案之根據）。」這方面的高瞻遠矚的主張，下一節將要詳細敘述。

「五、對共產黨態度案，決議：照審查報告（照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辦理）。」這態度就是一再聲明的和平分共原則，要求所有中共黨員退出中國國民黨，然後作為友黨並肩反對軍閥。這一主張從西山會議開始，到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張繼在上海「二大」開幕辭中所說，「好意的分開」，否則「兩敗俱傷」。但是中共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在鮑羅廷的指揮下繼續搞陰謀詭計，在國民黨內加緊奪權活動；蔣介石又堅決反對，一再演講說，呼籲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說沒有中國共產黨，國民革命一定要失敗。實際上，蔣介石為首的廣州國民黨中央，和中共之間已經暗地在權力問題上衝突非常尖銳了。西山會議到這時候，仍然主張的和平分共原則，就更有價值。

「六、對國家主義派態度案，決議：照審查報告，改為『在國民革命實際上之戰線上，以我們的立足點為標準，認其不相衝者，可與之合作，但仍應時時糾正其理論與行動之錯誤。』」這裏對於青年黨主張採取的合作態度，將其視之為友黨的主張，並沒有為後來國民黨的掌權者採納。胡漢民和蔣介石在

北伐成功以後，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呼聲中，取締了青年黨。

「七、對廣東第二次非法召集大會態度案，決議：照審查報告，依照上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宣言，毋庸再議。」

「八、確定本黨宣傳出版物之計劃及系統案，決議：照審查報告，1.中央黨部應設日報及週刊。2.省黨部設日報及週刊。3.市黨部設週刊。此兩項皆由宣傳部訓令各級黨部斟酌情形，分別緩急先後舉辦。」西山會議以後國共兩黨關係的發展，已經證明了西山會議的理念的正確。但是處於無軍隊、無財源、無政府的上海中央黨部，只有進一步宣傳自己的主張，以便影響國民革命的進展。可由於經濟拮据，也由於北伐進展太快，一九二七年秋特別委員會成立以後，滬、寧、漢三個黨部同時取消，不可能辦更多的報刊。由居正主辦的《江南晚報》後來成為反蔣的喉舌，一直堅持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因居正被捕才停刊。

「九、黨員訓練問題案，決議：修正如下：『由中央各部長負責分別實行訓練，不由各級黨部另設訓練部。』」這也因為北伐軍不久以後進入上海，特別委員會成立而沒有執行。

「十、本黨紀律案，決議：本黨總章及議決案已經包括紀律問題，不必另提方案。」

「十一、擴充北京《民生週刊》為《民國日報》案，決議：照審查報告（民生週刊繼續出版，另行籌備《民國日報》）。」

「十二、擴充北京大中公學為中山學院案，決議：照審查報告：1.大中公學改為中山學院，其組織計劃、經費等項，由改校主辦人擬定具體計劃及說明，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再行審定。2.大中公學債務，候中央有款時，照前屆執行委員決議，每月津貼五百元之數發還。」

「（二）海外部決議案……。」等等。

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最爲重要，確定了過半數的委員才能夠開會，和候補執行委員的遞補辦法；選出了中央常務委員三人；確定居正爲組織部長，林森爲海外部長，孫鏡亞爲秘書主任等，並且確定石瑛、李烈鈞、覃振等爲派駐北京的中央執行委員，居正、林森、張繼、許崇智等爲留滬的中央執行委員，未成立黨部的省區一律派籌備委員；還審查通過了《告民眾書》等等。財務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繼續運作的重要條件，在西山會議召開期間，財務的籌備主要由孫科負責，他後來到廣州又當上中央執行委員以後，給中央黨部增加了很大困難。這時候，財務委員由林森爲首，還有謝英伯等，顯示財源主要來自海外華僑。

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七月九日召開，一共開了七次會議，在七月二十二日結束，重點是黨務和財務問題。在黨務上，推選居正爲中央常務委員，代替久病不到任的沈定一，還確定駐滬委員過半數就爲中央執行委員的法定人數；在財務上，增加了鄒魯、許崇智、居正、張繼、田桐、覃振等爲財務委員，即由比較單方向的海外籌款，轉向廣泛的籌集。因爲這時候，經費特別困難，中央每月的經費最低需要五千元，各個省黨部的經費也都是自籌，各個負責人的生活基本需要，從來是自理。

這期間，上海中央黨部與浙江省、四川省、安徽省、湖北省、北京市、南京市、重慶市等黨部，以及香港、法國、古巴、墨西哥、日本、加拿大、越南等國外黨部都有呈文、黨務報告或訓令的往來。

中央執行委員會又在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舉行第一次臨時會議，主要討論由覃振起稿的《警告蔣介石書》的問題。因爲蔣介石不同於汪兆銘的完全叛黨，對汪是幾次宣佈其罪狀；而蔣介石曾經對中共予以打擊和限制，但是蔣介石不僅僅繼續於中共合作北伐，還在這期間，一再發表加入第三國際和與中共進一步加強合作的演說。所以不得不警告，而警告又以秘密派人送交的方式送達，但是在中央會議中，鄒魯又主張將此警告同時送達參加北伐的諸將領，以讓大家明白其中的是非：「八月二十九日第一

次臨時會議第三日。(一)審查委員宋鎮崙報告審查修改《警告蔣介石書》案。(二)審查委員李鶴報告《警告蔣介石書》審查結果案。(三)管委員提議，遞送《警告書》郵遞或派員送往，應用何種辦法案。決議：派員送往，至於派員事件，由常務委員辦理，至遲不得過三日。(四)鄒委員提議，對北伐各將領及有關係同志，應致一函，並附送警告書一份案。決議：照所提議辦理，書稿推宋振崙起草。(五)管委員提議，《警告蔣介石書》何時方可發表案。決議：俟蔣介石收到此書有表示時發表。」再加上在中央常會上的兩次討論，可見對蔣介石這個勢力人物的慎重，而又表現在原則問題上不妥協的堅定立場。

這《警告蔣介石書》，並非以宣佈罪狀方式，仍然以同志、執事相稱，既誠懇而又非常尖銳。第一段指出：「執事初則附和左傾之汪精衛，繼而發現共產黨之陰謀，又召集五月十五日之偽會，思有以解決之，解決無方，半年之中態度三變，甚非同志所望於執事者也。」以下指出了蔣介石的獨裁傾向，要他警惕：「執事最近與溥泉同志書，為共產黨委曲掩飾，甚至設成功固黨之幸，失敗則願以一身負責，此種即黨之言，實反乎總理以言黨公諸黨員之旨。敗固黨受其禍，成亦何足以為訓，中央黨部久欲告執事，使知警惕。」西山會議諸領袖在蔣介石上海清黨以前，多是反對蘇俄——中共，之後和蔣介石的對抗，大多與反獨裁，爭取民主有關，以上是這一精神的最早體現。然後提出「嚴重警告，執事其諦聽而省改之」。第一點是對「黨務整理案」所形成的兩黨聯合局面提出批評，認為改變了孫先生的容共政策，改變了中共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做法：「……本黨完全為獨立的純粹的革命集團，在最高黨部之內無國共兩黨聯繫會議之理，彰彰明甚。執事不察，方詡以共產黨分子不許為中央部長為限制共產黨之妙用，亦曾思偽中央常務委員大半為共產黨乎？執事既以洞察共產黨顛覆國之陰謀，應毅然遵照去年十一月第四次中央全體委員在總理靈前會議所決定之清黨黨籍實行辦法，此應警告者一。」

第二點着重批評蔣介石主張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的言論：「……執事近來公開演講，竟悍然不顧一

切，主張國民黨應隸屬第三國際爲世界革命，凡所設施及一切宣傳品皆漫着國際色彩，頃復派共產黨員邵力子代表赴俄參與第三國際會議。……所謂第三國際者，不過爲蘇俄侵略之工具耳，於真正世界革命何有？更於吾黨三民主義何有？深願執事毋爲所惑，背總理先求民族獨立之旨，昌言世界主義，並與本黨屬之第三國際也。此警告者二。」雖然蔣介石掌握軍權，西山會議諸人，在原則問題上絲毫沒有妥協的跡象。

第三點是舉出事實，說明共產黨在廣州的飛揚跋扈的嚴重性，要蔣介石不要縱容：「……執事身臨其境，觀若無睹……，甚望執事在青天白日旗幟下，實行純粹三民主義，使上述叛黨舉動不再見於本黨根據地，然後同志不致疑慮，軍閥也無所藉口也。此警告者三。」

第四點是要他驅逐鮑羅廷：「客卿專政古已有禁例，近代民族尤力抗任何異族之宰制。俄人鮑羅廷者，係總理時代一僱傭耳！近則執事稟爲師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計議，悉聽命於鮑；而軍中大計，則悉聽命於軍官加倫；甚至關於黨政一切重要會議，既由鮑召集於其私寓，依然形成一太上政府。嗟乎！吾黨、吾政府之威信至此掃地無遺矣，民族光榮安在乎？往者精衛當權，咎有攸歸。今執事大權獨攬者，亦竟俯首聽命，則誰施其咎耶？……此應警告者四。」最後希望蔣介石「覺悟」，「回頭猛省」，才能夠「恢復黨內一致精神，得全民信仰，勳名亦將並垂不朽矣」。

此《鄒魯文存》第三集第一二七至一三二頁，也有另一篇《警告蔣介石同志書》，其內容大體相同，這裏不再引用分析。

在九月十二日，上海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了第二次臨時會議，那時候，漢陽、漢口已經被北伐軍攻佔，所以會議重申西山會議的決議精神，並發表對時局的四點主張，即（一）召開國民會議，「期國民之利益得由各種代表詳細討論」。（二）改組國民政府，「集全國之人才，力圖民衆利益之實現」。（三）對外政

策，「能以平等待我者，我必表示誠摯之友誼」。(四)發展實業，「遵照民生主義進行，以防階級鬥爭之弊」。

十一月九日，國民革命軍攻下南昌，一時廣州中央的若干重要人物雲集於這裏，鄒魯《覆南昌同志書》，尖銳地指出蔣介石明知故犯，因圖私利造成國民革命損失：「介石兄總以弟爲過份矣。須知介石握黨、政、軍大權，如不明共產黨覆國陰謀也，則不應有三月二十日處置中山艦案，驅逐一部份俄員離粵事，五月十五日提案取締共產黨事，黨軍開除全體代表事，黃埔軍官學校不許跨黨事。如其明共產黨覆國陰謀也，則上述各種處置，豈能謂之徹底？況翻手之間，鮑羅廷復無形爲黨、政、軍之最高指揮者；共產黨勢遍佈政治部，遂使北伐軍所到之處，即共產黨勢力所及之處。弟立足國民黨之間，已效忠於國民黨，則對於蔣介石此種行動，又豈能免於責備？河南某同志對於介石，極具同情，特到粵晤介石，調查粵情，及歸告人曰：『介石非共產黨，當然不至忠於共產黨；但亦非忠於國民黨者。其用人不論共產黨、國民黨、非共產黨、非國民黨，能擁己則容納之；不能擁己則排拒之。』介石種種翻雲覆雨，不過欲增自己勢力也。……介石之對於共產黨，高下由己，而不爲黨國根本計，安見其不爲『領袖』之毒中耶！雖然介石真智，共產黨豈盡愚乎？……我利用彼，彼豈不利用我？觀於總理逝世以後，共產黨突飛猛進，寧非諸同志利用之結果？而況國覆黨覆之機，即伏於此利用之下乎？」⑤按照西山會議精神指導的上海中央黨部，始終立足於反對蘇俄——中共，以此來宣佈汪兆銘罪狀，來聯絡和批評蔣介石，這立場不曾動搖過。

但是，在最艱難的時候，西山會議的上海中央內部核心成員中出現動搖。本來，廣州中央一直通過與西山會議有關係的人，如邵元沖等，私下對西山會議的成員進行拉攏，以便放棄原則去附和廣州的混合中央，這時候產生了一點效果。

最重要者是，第二次代表大會致開幕辭的反共領袖之一的張繼，突然宣佈不過問政治，然後離開上海，去到遙遠的大連居住。現在出版的《邵元沖日記》中顯示，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七月十二日、九月九日，以及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二月二十七日等等，有多處記載拉攏張繼的事，多由邵元沖出面，有時吳敬恒、張靜江參加，蔣介石也出面送過錢。

另外一位核心成員覃振，也登黨報脫離黨事。謝持的一九二七年二月八日日記記載：「偕覺生、海濱兩赴汝爲家。夜偕理鳴由愛文義路步行還家，理鳴發議自動撤銷中央黨部。吾叩以理由，及宣言與救黨責任託付，不能答也。溥泉消極矣。理鳴平居喜空論而不事事，今又如此，可嘆也。」三月七日又記：「下午兩次赴黨部。理鳴亦登報脫離黨事關係。吾於溥泉既無責，於理鳴又何責耶。先予牋勸之，旋冒雨訪之，不遇。」居正晚年的日記中記載，居正告訴訪者說，張繼在民國十六年背叛了西山會議。

林森也是重點拉攏對象，但是没有成功。謝持日記記載，在北伐軍攻下南昌以後，曾經利用林森與蔣介石的關係，派他上廬山促進清黨，後來返回時，謝持記載，頭髮都白了：「子超脫廬山之險來滬，訪之東亞旅社。遇吳鐵城。子超精神突然，而髮與髭皆白矣。」林森後來自述道：「辛亥革命前，孫先生定青天白日旗爲革命旗幟，先生逝世之後，共產黨起意篡竊，我們幾個人，因而有西山會議的召集，以謀對付。可是事與願違，失敗了，而又遭到處分。我從那時起，就不穿西裝，改用藍布長衫，以此作爲有恒的紀念。」⑥林森在上海中央只負責海外部的籌款工作，但是在壓力下，他有時候去到廬山的古寺廟與僧侶爲伍。特別委員會以後，他變得超然，但是胡漢民被扣留事件中，他站出來以監察委員名義彈劾蔣介石。

在最困難的時候，核心的領導只剩下居正、鄒魯、謝持三個人。沈定一則一直主持很重要的浙江省

的黨務，並且常常生病，直到被暗殺爲止。

註釋：

① 《中華民國史實紀要》中華民國十五年第一七〇頁。

② 《從容共到清黨》（下）第五二六頁。

③ 《回顧錄》。

④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四輯（上）第三六五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南京。

⑤ 《鄒魯文存》第一二五頁。

⑥ 《林森紀念集》第一四三頁，高拜石文，文星書店出版，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台北。

二十四、上海的槍聲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階級鬥爭推進歷史前進的基本原理，根據第三國際的指令，根據中共的各次會議決定，中共工作的重點始終是發動農工運動。即以利益引誘底層無知的農民工人，掀起一股利慾橫流的洪水，要他們起來破壞一切現存的秩序，然後利用來奪取國家社會的統治權。利用者為蘇俄，為中共。中共按照蘇俄旨意加入國民黨以後，在有些上層問題上做出讓步，可是在控制農工運動方面，從來沒有讓步一點。廣州國民黨中央內的任何人，似乎從來沒有介意。

自從汪兆銘在中山艦事變出走以後，廣州國民黨的一切，都是蔣介石的絕對領導，黨內的其他人都只是輔佐者，如張靜江、吳敬恒之類，或者是附和者，如葉楚傖、邵元沖之類，或者是分一杯羹者，如孫科之類。查一查「整理黨務案」的四次會議決定，以及在北伐過程中蔣介石的所有演講可以知曉，廣州中央的精神都注意在上層的權力鬥爭上面，或者軍事的進展上面，根本忽略了中共最重要的奪權手段。軍人的蔣介石根本沒有長遠而深刻的政治眼光，這也是抗戰以後丟掉大陸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研究一下上海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件，恰恰極為關注基層的農工運動，但是他們沒有權力貫徹他們的主張，他們的決議和吶喊被忽略。

中共在底層大搞階級鬥爭的做法，如在湖南、湖北、江西成功的農民運動，在上海的武裝工人運動，一定會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廣州國民黨中央產生不可克服的矛盾，並且中共在政治上利用「迎汪」打擊蔣介石，在軍事上扶植唐生智削弱蔣介石，不可避免地會爆發流血的鬥爭。

共產國際關於在中國煽動階級鬥爭的指示非常多，隨便可以舉出例子。例如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布哈林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就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指示草案提出的修改意見。這正是《孫文——越飛宣言》發表以後不久，國民黨剛剛開始改組的時候。布哈林的重要指示幾乎全部在基層的農工運動，共有八條：「1. 在中國進行國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戰線之際，必須同時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國人民的基本群眾，即小土地佔有者吸引到運動中來，中國革命才能無往而不利。2. 因此，農民問題乃是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無論出於任何考慮而迴避這一基本點，都意味着不理解這個社會經濟基礎的重大意義。而只有在這基礎上，才能勝利進行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消滅中國封建制度的鬥爭。3. 所以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政黨，應當力求實現工農聯盟。只有通過堅持不懈的宣傳工作和真正實現下述土地革命的口號，才能達到目的：沒收地主土地、沒收寺廟土地並將其無償分給農民、歉收年不收地租、廢除現行徵稅制度、取消各省間的包稅和稅卡、廢除包稅制度、鏟除官僚制度、建立農民自治機構並由此機構分配沒收的土地。4. ……」①可以說，從聯俄容共時期的兩湖農民運動，到中共的所謂土地革命時期，再到抗戰勝利以後中共在農村的土地改革運動，都大體上體現着布哈林指示的基本精神。中國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政策從一開始就有着連貫性。

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在一九二三年寫信給鮑羅廷，要求他利用在廣州的地位搞土地革命，指出「土地法令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廣東省內的一場革命」。

前面曾經提到，在鮑羅廷剛剛到達廣州，正碰上廣州軍事危機，鮑要求孫先生立即武裝農工，進行土地革命以穩定根據地，被孫先生堅決地拒絕；也提到在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訂章程期間，鮑羅廷一定要把共產黨式的土地革命精神寫進去，也被孫先生拒絕的事。但是鮑從不死心，一有機會，他就會貫徹在農村搞階級鬥爭的做法。在清除了西山會議和廣州中央內部的反對中共的力量以後，

在北伐戰爭勝利進行的時候，在攻下武昌的前夕，鮑羅廷就土地問題在廣州中央黨部作長篇報告，他竟然大談中國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他從太平天國、義和團談到辛亥革命，指出「以前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都因為土地問題未解決而失敗了」，「國民革命是首先要解決土地問題，若不解決土地問題，是不能成功的」。他在最後一段說道：「革命黨是不能獨行的，軍隊也不能獨行的，必定要有鄉村、縣、省都為革命堡壘，革命黨才能行動。……革命要在反帝國主義與軍閥這兩條鋼軌上去，必須解決土地問題，使農民組織起來，站在革命黨方面來工作，並且我相信將這個問題解決了以後，各個階級都會聯合起來革命，而完成總理的事業。」②可以說，不搞階級鬥爭，不搞群眾運動就不是共產黨人。鮑打着孫先生的國民革命旗幟，按照第三國際的指令，不顧一切地在中國掀起一場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中共正是貫徹這一企圖的基本工具。

中共中央的各種決議中，對農工運動極端地重視，對國民黨人採取毫不猶豫地排斥態度，以保持對農工運動的獨佔領導。在廣州國民政府農民部從來被中共控制，曾經任職秘書的中共農民運動領袖彭湃，就把廣東的海陸豐一帶的農村搞得天翻地覆。到了一九二六年的夏秋，隨着北伐的進展，中共領導的農工運動終於在湖南、湖北農村如洪水般地發展起來。

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開始就提出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根本問題。」出身農村的毛，深知中國農村的弊病，而利用這些弊病，將中國社會按照經濟地位來劃分成為不同的集團，即階級，以便掀起中國農村的階級革命。這已經完全不是聯合各階級的全民的國民革命，而是共產黨的暴力的蘇維埃式的階級革命了。中共雖然在所謂「合作」的營壘之中，不過是利用國民黨的威望，進行階級革命而已。可是只是一心一意於奪取國民黨內最高權力的廣州國民黨中央的領導者，並沒有從根本的方面有所察覺，而讓中共肆無忌憚地在農村橫

行。

一九二六年八月七日，瞿秋白在上海的一次演講中，關於農民運動問題說道：「農民在五卅以後的奮起，如廣東農民與地主肉搏的階級鬥爭，如湖北、湖南農民協會的發展，如直隸等處農民運動的發軔，如河南、安徽、山東、四川、陝西、江蘇等處紅槍會、大刀會、硬肚會、協作社等運動的爆發，不必詳說了。……農民的贊成革命戰爭，不單是『用嘴來說』，而且是『用手來做』的。他們迫切的要求是：（一）鄉村政權歸農民；（二）武裝自衛；（三）極大的減租減稅。他們爲這些要求而贊助、參加北伐。他們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失望——對北伐戰爭的失望，是無足爲奇的。這種渴望或幻想革命戰爭的事實，正足以證明無產階級爭取革命及其武裝之領導權的萬分必要了。」③與鮑羅廷私人關係也十分密切的中共領袖之一的瞿秋白（見張國燾著《我的回憶》），以上談話反映：中共在北伐剛剛開始的時候，已經發動農民「用手來做」，即在農村進行普遍的武裝奪取政權，完全違背孫先生的民生主義，在農村搞階級鬥爭。對於國民革命重要組成部份的北伐，已經「失望」，而要求「無產階級爭取革命及其武裝之領導權」了，即中國共產黨要在北伐過程中革中國國民黨的命，將國民革命轉變成爲由蘇俄——中共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但是蔣介石呢？在同一個月，在湖南仍然發表幾次加強與中共合作，將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和打擊西山會議反共力量的講話。不管出於暫時的策略或其它的考慮，他對於中共自下而上的農民暴力運動沒有防範，沒有政治遠見，也沒有出於公心而團結全部國民黨的正統力量來應付的措施。

在農村已經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在軍隊已經開始掌握軍隊的中共，再也不是像「中山艦事變」和「整理黨務案」剛剛出現的時候那樣，只有擁護勢力人物的軟弱表示，他們已經在內部提出通過農村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就在瞿秋白做出以上報告的當天，中共中央成立了農委，專門指導各地的農民運動，各地也必須每月把農運的情況報告中央農委。並且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至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與共產國際代表的聯繫會議上，制訂出指導奪取政權的《農民政綱草案》（以下材料都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輯，不另外加註釋）。該草案第一條是：「正在發展的中國民眾革命鬥爭，不僅是中國向帝國主義國家求政治獨立的鬥爭，而且是要求建立完全民主制度國家的鬥爭，即是說要推翻城市和鄉村中封建官僚的民主政權，並在平民民主政權上統一全中國。」這正式把奪取政權提到了日程上，撕下了進行國民革命的遮羞布。草案提出了九點政綱：

「一、推翻農村中劣紳的政權，並要由革命的農民建立平民的政權。二、革命的農民參加縣政府組織。三、武裝農民，鄉村中一切武裝勢力受鄉村的革命民眾政權指揮。四、沒收大地主、軍閥、劣紳及國家、宗祠的土地，歸給農民。……」這就是乘北伐之際，在農村全面建立共產黨政權的政綱。但是這樣做一定會引起有關當局和社會普遍的警惕，所以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關於湘鄂贛三省農運決議案》中說：「鄉村政權問題即是農民政權問題代替封建式土豪劣紳政權的問題，這種政治運動，在實際運用上，我們重在實際推翻土豪劣紳的政權而不必叫出農民政權的口號，以免除別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發生恐慌。」中共想要把這場蘇維埃式的革命實質掩蓋起來，仍然掛國民革命的招牌。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全體會議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舉行，其中對於中國的農民運動有詳細的決議；中共中央稟照這決議，在十二月的特別會議中，才有《關於湘贛鄂三省農運決議案》。

在中共的鼓煽之下，湘、鄂、贛的暴力革命席捲大地，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召開的湖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發表的宣言中，為殘酷的鬥爭手段叫好：「農民在鄉村中打擊土豪劣紳，雖所採取手段出於法律之外，其實這是革命鬥爭中所必取的手段。這時候，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怎麼不嚴厲一點？若是駭怕『糾紛』，採懷疑或反對的態度，這不算是革命黨。免除糾紛的舊的政策已不適

用了，我們只有大家建設新的政策，即是使農民在鄉村中建立民主的自治，根本鏟除土豪劣紳的封建政權。」④所以湖南農民運動的領袖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為「清算」、「罰款」、「關監獄」、「戴高帽子遊街」、「槍斃」等暴力叫好。據統計，湖南省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有農會會員一千三百三十六萬人，兩個月以後，增加了二百萬人。

湖北省農民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召開，其《告全省農友書》中說，參加農會的已經有二百多萬，佔全省農戶的十分之一。⑤

《江西省第一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宣言》聲稱：「農民協會是我們的炮台，是我們農民利益的保障。只有我們自己的農民協會發展並鞏固起來，才能使我們從千萬斤重擔的磐石底下翻一個轉身。」⑥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道：「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裏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

⑦瞿秋白在為毛澤東這篇著名文章的所作的序言中，極力加以稱讚，一開始就說：「『匪徒、惰農、痞子……』這些都是反動的紳士謾罵農民協會的稱號。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國的卻正是這些『匪徒……』。湖南的鄉村裏許多土豪、劣紳、訟棍等類的封建政權，都被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這些『匪徒』現在在那裏創造平民的民權政治，正是全國的『匪徒』才能真正為民族利益而奮鬥而徹底反對帝國主義。」中共在社會底層的農民暴力運動，是其真正的力量基礎。但是，卻不是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全社會的國民革命所需要，相反，這導致了與掌握大權的蔣介石的完全分裂。

當中共在幾個省份掀起階級鬥爭的風暴，在基層開始奪取政權的時候，在上層，鮑羅廷——中共對北伐總司令蔣介石，也從排擠、限制到開除黨籍，並且建立了實質上由鮑羅廷主宰的武漢半赤色政權。

躲在後面的鮑羅廷——中共逐漸出現在前台，他們的具體策略是「迎汪」、「聯唐」。

在蔣介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情況下，中共造成的迎汪活動，是一着打擊蔣介石的妙棋。因為汪在國民黨內的資歷遠遠高於蔣，蔣介石無論如何也要分一些權出來；而在表面上，蔣介石又不可能加以反對。中共中央文件記載，蔣介石曾通過張靜江向中共表示，不願意讓出中央常委主席的職務。中共內部議論，其它的重要位置總要讓出來。中共和蔣介石在廣州中央形成的聯合體，因為權力的分配問題而逐漸解體，並且成為敵人。

關於迎接汪兆銘返國復職問題，中共中央給粵區黨委的指示信件，可以看一看當時的内部情況：「蔣這次發電迎汪，絕不是他已有絲毫覺悟非如此不可，完全是前敵將士及後方民衆的反蔣空氣，再加以軍事的失敗逼迫他不能不如此。據加倫同志報告，關於迎汪問題，初與談未遂，後又談三小時蔣一言不發，聽加說而已。第二日蔣發電亦未交加過目，自此以後蔣態度更不好，表現要自動，不願聽人被動。二十六日曾不顧一切地亂下總攻令，加知之力阻始罷。從這些事實皆可以證明蔣對汪回之真正態度，他是滿心不樂意汪回，迫不得已始發出那一封電報，在這封電報上又弄了些花頭，令絕不能出國門一步的李石曾、張靜江往迎……」⑧蔣介石的迎汪電報在十一月三日發自江西前線，那時戰略要地南昌都還沒有攻克。

同時，鮑——中共還扶植另一個野心軍人唐生智來壓抑蔣介石。唐本是趙恒惕的部下，在國民黨內毫無地位，中共對他也没有好感，只是利用他「要想在政府及黨中佔一地位」的想法，滿足他，拉攏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中共内部文件分析道：「唐是需要的，尤其在現在我們需要他來壓抑蔣介石；他須執着在蔣的手裏，他在軍委內、在北伐軍內、在國民政府内部應站在這樣的地位。爲了這緣故，他應當有必須的力量。但須注意不要使從對抗蔣的力量變成對抗國民政府的力量，這便是我們的唐策略的準

繩。」針對內部對唐的不同看法，中共中央在十二月九日的信中認為唐生智比蔣介石在任何一方面都要好。

經過鮑——中共的運作，在廣州中央在武漢召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會議決定大大削弱蔣介石、張靜江的地位。由於中共領導的農工運動高漲，並且在政治上以「迎汪」、「聯唐」來壓蔣介石，使得蔣介石左右開弓，企圖駕馭所有政治力量謀利的美夢破滅。武漢政府終於成了鮑羅廷——中共的天下，蘇俄赤化中國的陰謀部份實現。

蔣介石只好統帥一部份效忠於他的廣州中央成員，先後在南昌、南京另立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以反抗武漢當局，蔣介石不得不走上了西山會議的反共政治道路。中共經過蔣介石長期的縱容、扶植，羽毛已經漸漸豐滿，所以和蔣介石的對立已經不僅僅是政治方面，而且是武裝的、軍事上的。西山會議的和平的清黨方式已經成為過去。因為在第三國際的命令下，中共黨員始終利用聯俄容共的政策支持和培植蔣介石，以行奪取政權之實；蔣介石則利用軍權高唱聯俄容共到底，實則利用此政策奪取黨權和政權。中共和蔣介石，這廣州中央的基本組成部份，最後都不得不採用血與火的方式來實現他們的企求。

鮑羅廷傳記的作者評論鮑於蔣的既聯合、又對抗的關係時說道：「鮑羅廷與蔣介石的關係是互相利用、互相制約、互相依賴而發展的多方面複雜關係，並非是領導與被領導、援助與被援助的單純關係。從他倆發生關係的開始，蔣介石已被定下了一個基調：他是孫中山所信賴的部下，思想傾向有激進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加之他的訪蘇俄的本身也已意味着他將是蘇俄在中國南方扶植的重點對象——

『黃埔中心論』——他將被培養成為新型的軍事人才，並指揮一支新型武裝力量的部隊。加之蔣介石的所作所為是無法離開蘇俄的經濟、武裝援助，包括蘇俄軍事顧問的指導幫助。……從鮑羅廷的角度來看，蔣介石在當時的作用還找不到第二個人來取代，包括贊同工農運動、誓守黃埔、打擊右派、充當各

派之間的中介人（不必是『紅色』的）等……。越想滿足蔣介石的胃口，想藉此利用蔣介石，反而成了蔣介石討價還價的籌碼，反而造成一個既使人憤慨、焦慮不安而又無法擺脫的『魔鬼』——袖珍拿破崙——蔣介石。」鮑羅廷與蔣介石長期的互相利用的結果，最後使中共黨員躺在血泊中，使得中國國民黨元氣大傷。蔣介石在鮑羅廷——中共的扶植下，終於大權到手，中國共產黨也在二十年後成了最後的勝利者。

但是廣州中央內部的這兩股勢力，終於以槍桿子來解決他們的分歧，通過血與火，來滿足他們的權利需求。

上海響起了槍聲。

蔣介石在上海實行武裝清黨，擊敗了中共的工人武裝；繼之汪兆銘在武漢也清黨，全國響起了槍聲。這槍聲都起自廣州中央的內部，這是汪——蔣——鮑——中共的廣州中央，對抗主張和平清黨的上海西山會議中央的結局。

在上海的西山會議中央，一面通過函電、通告和基層黨部的運作，來支持北伐，還鼓勵所屬的黨員參加北伐；同時繼續推動清黨，一個重要方式就是利用各個黨員與廣州中央的私人關係，去影響政局。他們對於中共在基層煽動農工運動的認識和警惕，在國民黨內是獨具慧眼。

還在孫先生在世的時候，湖北黨人劉成禺就對孫先生提出建議，要他特別警惕中共破壞農村的社會結構，煽動農民奪取土地的暴力運動的嚴重後果，非常的深刻，他說道：「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意在併吞消化國民黨，因國民黨黨內派別有裂痕，乘隙勾引而來。中國軍閥戰爭十餘年，人民能安居樂業，生產富庶，以供應南北數十百萬之以戰為業者，由農工商下層未波動，社會未倒轉紛亂耳。今共產黨政策，欲推翻中國原有農工商社會之安定，以行其全國恐怖計劃，侵入國民黨，為喧賓奪主之計，失敗則

吾黨受人唾罵，成功則共產黨橫行全國，國民黨亦遂而消滅，所謂渾成一團，無從分別也。」（轉引自李雲漢著《從容共到清黨》第二二四頁）。

由於西山會議的參加者中，有老同盟會員，也曾經是中共創黨人之一的沈定一，他深知中共的農工運動的危害，和國民黨人只注意上層工作的嚴重缺失。在他與戴傳賢、覃理明的到達北京參加西山會議的次日，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謝持在日記中極為稱讚他的發言：「夜九時又赴竹竿巷，玄廬道出本黨工人運動失着之處，透闢極矣。」這位深知中共者在上海舉行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揭發：共產國際遠東局長「魏金斯基之主張將國民黨與農人工人之關係截斷，譬如南洋煙草公司罷工，共產黨弄得不得了，即請國民黨調解，但一方面又宣稱國民黨是保護資本家。」

西山會議的注重農工運動有兩個特點，即貫徹孫先生的民生主義，關注農工生活的改善，同時及時揭露和批判中共煽起農工運動，搞階級鬥爭以漁利。

西山會議結束以前所通過的宣言之中，有關農工運動的部份，既不同於鮑羅廷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用偷天換日的手法加入的共產國際的意見，更不同於廣州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中，直接根據共產國際的文件而成的部份（按：本書前面已經有詳述）。西山會議結束以前，發表的經典文獻《為取消共產派在本黨的黨籍告同志書》中，非常鮮明地反對階級鬥爭之說：「孫先生為要實現三民主義而革命，自然是全國民衆的革命——國民革命，不是階級革命，或其它非全民的革命，那末本黨不容許有違背本黨的主張而鼓吹階級革命，更不容共產黨利用本黨的招牌來鼓吹階級革命。」這樣正面批判階級鬥爭的文字，在鮑羅廷——中共，以及汪兆銘和蔣介石主導的廣州「二大」中當然不可能有的；宣言又說：「所以本黨關於勞動方面的工作，如非共產黨員包辦的，共產黨必定千方百計地破壞，甚至殘殺我們的同志而不惜。武漢工人遭軍閥的慘殺，由於他們告密，便是確實的實證。總之，共產黨不欲本黨得大多數民衆

的力量，是他們顯然的心理。」關於農民運動，在引用了中共有關的決議以後指出：「共產黨處處要叫佔國民大多數的農民工民，只接近他們的黨，而不使本黨接近。」

基於對於中共利用和壟斷農工運動的認識，在上海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農工運動佔了重要的位置。根據大會會議錄，在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由十二個人聯合提案，經討論通過了《改進農工商學各團體組織原則案》；而且各個省向大會的報告中，也有不少對於農工運動應該與中共針鋒相對做出說明。浙江省代表在報告中，突出地反映了浙江農村的嚴重問題：「浙農在此兩年中，表面極少變化，實際已至忍無可忍之苦境。即耕田不足，失業者日增。在此兩年中，浙東舊八府農中，出外求苦力生活者，日漸增多，此其一；戰爭日多，死亡日見……。」港澳總支部代表報告中有專門部份敘述「共產黨在粵搗亂詳情」。《對工會之搗亂》部份細說對於各個工會的搗亂。關於機器工會的部份說：「機器工會，向受本黨指揮，團體堅固，深明大義，洞悉共產黨之詭惑，嚴拒共產黨加入，共產黨於是指使油業工會與機器工會宣戰……。」《對農村的搗亂》部份說：「本黨在鄉村設立農民協會，本地方自治，實現民權之主義，其力甚大。但被共產黨把持，該會組織權已落入他人之手，共產黨發出打倒地主、打倒資本家口號，復利用無業遊民，土豪劣紳，綠林盜匪，在鄉組織農會，各處搗亂……。」^⑩

所以在上海舉行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上海的中央黨制訂了詳盡的《農民運動計劃書》，以便在農村實行民生主義，防止階級鬥爭，防止中共對農民運動的壟斷。這份計劃書，是中國國民黨真正體現民生主義的第一份重要文件，其開始部份把基本道理敘述出來：「我國以農立國，農民生產佔全國生產百分之九十，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而此大多數農民，內受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及一部份地主之直接壓迫剝削，外受帝國主義之間接侵略，遂令取給有餘者轉而為貧，貧者不自持，流為盜賊，此種現象，苦不堪言。現世共產黨人知其然也，於是利用時機，對於農民之有餘、不足者妄自挑撥，偏興偏

廢，以自完成其階級鬥爭之主張。究其實際，並未顧及農人自身之全部利益。長此以往，農民之間相互之感情，相助之事業，愈趨愈惡，喪敗何可勝言。本黨精神注在全民革命，一面注意於大多數農民所受之痛苦而力求改善；一面嚴查農民直接間接之障礙而方予鏟除。又深知農民革命若出於他人代庖，是疑似的，是虛浮的，稍有不慎，更由疑似的虛浮的惡劣演進，輾轉而爲他人之利用品。故始終認農民革命貴於農民自身之覺悟，尤貴自身覺悟病癥之所出而一致奮鬥。……」於是引出農民運動的四項原則：「(一)改良農村。(二)增進農民教育。(三)救濟農民經濟。(四)以法律保護農民之地位與均平權利。」^①依據以上原則，制訂出具體的改進農村的七點計劃，以防止階級鬥爭和中共的利用。

西山會議的諸位領袖因爲深知中共在農村的詭謀，並且知道農村問題的嚴重性，而有以上的農村計劃。但是中國國民黨北伐統一全國之後，國民政府的當權者並沒有採納以上農村改革的意見。居正在若干年後的抗戰勝利前夕，再次向國民政府提出《民主主義土地改革綱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將在一九九九年的《居正全集》中出版），其前言與以上的計劃書的前言基本精神一致，居正說：「確認土地改革之目的，在於廢止地主階級之剝削坐食關係，以促進國家之進步，而不在於毀滅此一階級之個人。故在實施改革過程中，對於地主階級之生活，應予適當處置，以示推行之順利。因中國爲一經濟落後的國家，地主階級在中國現實下爲較有教養之社會中堅，亦爲文化技術智慧積累之所寄託，……即能以暴力加以毀滅，以適爲國家建設進步之重大損失。」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以後，成功地進行了土地改革，是亡羊補牢之舉。因爲中共在抗戰以後能夠席捲全國，其最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以土地改革誘惑和煽動農民。

若干年後，國民黨丟失大陸，居正深刻地認識到失敗的根本原因在農村：「『更重要的實在是因爲我們拋棄了農民。你應該知道，我們的失敗在於忽視了農村工作，以致被共產黨搶走了農村。』居先

生很認真說下去：『我們的教育太失敗，留學生回國就上海南京來回跑，連小都市都不屑一顧，不要說農村；學校畢業的青年也不肯再到鄉下老家去工作，大家都想做官。』我忽然自覺臉上有點發燒，『政治也失敗，大家成為人民的寄生蟲，我們只有問鄉下人要的，而沒有給鄉下人的；大家都不顧鄉下人，實際大家都在吃鄉下人，穿鄉下人』。突然居先生感覺話說得太過火，停住點起一支『雙喜』抽着，又慢慢地說：『我們本不希望如此，但不幸又偏偏如此。久而久之，佔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在政治上變成無人顧問的棄兒，連一般主政的大員都把農村拋到腦後，金圓券時期政府所頒佈的全國經濟緊急措施條例，竟一切都以上海為對象；好像上海就是中國。』⑫西山會議諸公既看透了中共鑽入國民黨的内部奪取權力的伎倆，也看透了中共破壞中國的社會基層，自下而上煽動農民運動的手法，他們對於農村問題的重視是一貫的，國民黨後來也就輸在這裏。

為鮑羅廷——中共所控制的廣州「二大」中，雖然農工運動也佔了重要位置，但是其基本精神並非出自民生主義，而是出於共產國際和中共掀起階級鬥爭需要，二者的基本精神完全相反。廣州的重要當政者蔣介石雖然後來在「中山艦事變」後提了「整理黨務案」，對於共產黨有所限制，但是蔣介石幾乎只着眼於國共間的上層鬥爭，更沒有在理論上對於中共的階級鬥爭進行批判。蔣介石在後來的長期執政時期，仍然最注重軍事，政治次之，群眾運動從來不重視，與中共恰恰從基層做起相反，中共是三者並重。

在鮑羅廷——中共和附和者的主持下，廣州中央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至二十日在武漢召開了三中全會，決議要點有三，即接受蔣介石辭去中央常會主席和政治分會主席的職務，把黨政軍大權給予剝奪；實際推翻蔣介石在整理黨務案中對中共黨員的限制，農工兩部重新由中共黨員譚平山、蘇兆徵擔任部長；大會支持由中共領導的農工運動，這使得兩湖的農民暴力運動合法化並火上添油。並且在北伐軍進

入上海的前後，上海的工人已經在中共組織領導下，進行了三次暴動，以便和蔣介石爭取對上海的控制權。

這時候，西山會議在上海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各種渠道支持北伐，促進清黨。他們還與廣州中央受到武漢打擊的部份人士，開始聯絡和協商合作。

在南昌攻下以後，蔣介石已經自成爲中心；而徐謙、陳友人、孫科、宋子文等附和鮑羅廷者，在十二月十三日成立了所謂聯繫會議，以分蔣介石的權。於是形成武漢、南昌兩個中心，對立日漸尖銳。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及時發表聲明，宣佈共產黨三條罪狀，歡呼北伐的成就，不點名地支持蔣介石。

廣州中央三月中旬在武漢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在「提高黨權」和「反蔣倒張」的聲浪中，大大加強了中共黨員吳玉章、譚平山，以及附和者徐謙、陳友人等人的權力，並且給尚未歸國的汪兆銘以最高的領袖地位，實際權力歸於中共，主宰一切的太上皇就是鮑羅廷。至此，武漢的半赤色政權形成。

西山會議的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秘密寫信給蔣介石、張靜江、李烈鈞、李濟琛、朱培德暨各個軍長，除了控訴蘇俄——中共控制國民黨的罪惡以外，第一次正式提出黨務統一，聯合起來的主張：「今者事機危急，如一髮繫千鈞，倘吾儕純粹同志仍以黨部系統之不同而生隔閡，以疇昔責備之微詞而懷芥蒂，此種罅隙，適爲共產分子所乘。在專制時代，英雄逐鹿，尚知定天下者無私怨，何況彼此同懷總理天下爲公遺教乎！同人努力清黨於運動，幾更寒暑，凡反抗帝國主義及軍閥之兇燄，擴大國民政府及革命軍之基礎，始終一致，素無權力意氣之爭。耿耿此心，可質天日。所冀執事提挈同志，毅然清黨，毋使一共產分子殘存於青天白日旗幟之內，壁壘一新，中國直可傳檄而定也。同人於清黨之外他無所求，共產分子肅清之日，即本黨黨務統一之日。」^⑬這是一篇很重要的信件，因爲只有國民黨的大團結，才

是國民革命之福，中國國民黨之福。可惜掌握勢力的人物爲私利所弊，沒有及時響應。

對於武漢三全會，鄒魯著文《再說共產黨清黨了》，既揭露鮑羅廷——中共的陰謀，又提醒當政者：「共產黨奉着莫斯科的決議，總理逝世後，三年內要消滅國民黨，自然是無日不向這個目標進行了。所以我說國民黨不清共產黨，共產黨亦要消滅國民黨，這是無貳無疑的。但是有一小部份同志，爲首領慾所迷，受鮑羅廷所哄，代共產黨操刀，今日說這個右派，明日說那個反動派；今日開除黨籍，明日下午通緝。煮豆燃箕，相煎日急。那時候我就警告同志，伐柯發柯，其則不遠了。果然是打倒西山會議派不久，就打倒孫文主義學會派，今則實行打倒蔣介石、張靜江等等了。但是共產黨打倒西山會議派時，卻要孫文主義學會喊一致的口號；打倒孫文主義學會時，卻要蔣介石、張靜江等等喊一致的口號；今打倒蔣介石、張靜江等等，卻要唐生智、譚延闓等等喊一致的口號；恐怕喊聲未絕的時期，又有人在那裏喊打倒唐生智、譚延闓等等了。」⑭這些明顯的事實，對於任何一個忠實的國民黨員來說，是沒有辦法抗拒的。

上海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對黨員發佈訓令，要求所屬的國民黨員擁護北伐，促進清黨：「此次在漢口開所謂全體會議，凡忠於本黨之同志，概未參與。唯共產黨分子必藉此挑撥離間，以爲北伐軍陣線的工具，中央除鄭重宣言偽中央黨部改選所謂國民政府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以及其它舉動當然無效外，用特訓令海內外各級黨本同志，當此帝國主義兇正燄張，殘存軍閥負隅自固之秋，更應繼續擁護北伐軍，並促其肅清共產分子，毋使共產分子挾中央黨本擅發偽令，以擾亂北伐軍之陣線，是爲至要。」所謂「概未參與」的同志中當然包括蔣介石。這是不點名對蔣介石的支持。四月七日，再次發表宣言，宣佈中國共產黨罪狀，即「破壞本黨之罪狀」，揭發中共篡改三民主義，在國民黨內挑撥離間，製造混亂；「破壞國家之罪狀」，指出中共受蘇俄這個「柔性的帝國主義的指使，處處賣國」；

「破壞社會之罪狀」，揭露中共搞階級鬥爭，破壞社會和諧的慘劇。

同一天還《宣佈汪精衛罪狀》，也是針對中共的「迎汪倒蔣」運動，而間接對蔣介石表示支持（以上文件均出自《清黨實錄》）。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變」時，因為對蔣介石的期望很多，點名支持，結果被蔣介石大罵，而且反過來打擊反共力量，所以這裏不點名支持。

在這時候，的確已經到了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千鈞一髮的時候。他們除了在武漢有上層政權以外，在基層，農工運動已經到了翻天覆地的地步。

在農村，如湖北省，從三月起，每天平均有兩萬三千個新會員加入農民協會；暴力不斷升級，如在陽新縣，「農民私刑處死了二十五個土豪劣紳，還有二十人被農民扭送縣署，並在農民堅持下槍決。……根據省農民協會的意見，各級農民協會的最近任務是：（一）武裝農民，（二）實行鄉村自治，（三）成立信貸合作社。」^⑮這哪裏是全民的國民革命，完全是蘇維埃式的階級鬥爭革命，與當初加入國民黨的時候所說的完全兩樣了。

面對已經不受鮑羅廷——中共擺佈的蔣介石統帥的北伐軍東進，鮑羅廷——中共在上海則武裝工人，企圖在北伐軍到達以前，由所謂無產階級的暴動，建立所謂工人政權。中共領袖之一的趙世炎記述道：「奪取武裝消滅軍閥的暴動，上海工人階級在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兩日的巷戰中完成。自俄國十月革命後，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績，添入了上海工人三月暴動的一段新的歷史記錄。在中國的革命史中，工人階級的血戰功績，更因上海工人的三月暴動，確定了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地位。三月暴動在世界革命史中的價值，是寫在十月革命後的一頁。……上海工人就以自己的血和肉從事實上證明，工人階級的確是全國最革命的階級，能夠切實擔負起革命的使命，能夠領導其他被壓迫階級摧殘軍閥的武力，並建立新的民主政權。」^⑯蔣介石面對武漢的半赤色政權，面對基層的武裝奪取政權的農民工人暴力運動，除

了武裝對抗，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

於是，廣州中央的監察委員吳敬恒、蔡元培等提出檢舉共產黨分子案，蔣介石下令鎮壓上海的工人武裝暴動。

上海響起了槍聲。

註釋：

- ①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二〇九頁。
- ② 《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第一〇八至一一〇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北京。
- ③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二冊補編》第四〇七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北京。
- ④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二冊補編》第三四八頁。
- ⑤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二冊》第三四八頁。
- ⑥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二冊補編》第四一八頁。
- ⑦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 ⑧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四四六頁。
- ⑨ 《鮑羅廷與中國大革命》第四七〇至四七一頁。
- ⑩ 《清黨實錄》第二一四至二一五頁。
- ⑪ 《清黨實錄》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頁。
- ⑫ 《居覺生先生哀思錄》第三四頁，出自《居覺生先生全集》下冊。
- ⑬ 《清黨實錄》第二七八至二七九頁。

- ⑭ 《鄒魯文存》第三集第三四頁。
- ⑮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集第二輯》第三五七頁。
- ⑯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集第一、二冊補編》第四二六至四二七頁。

二十五、團結的障礙

由於在容共和反共問題上的分歧，中國國民黨已經分裂為三個中央黨部和兩個國民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初夏，上海開始清黨，照理說，由於造成分裂的原因已經解決，中國國民黨的南京、上海的兩個黨部應當立即統一起來。但是，這是國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已經在望的時候，統一變得格外複雜，障礙重重。

根據謝持的日記，早在剛剛攻下南昌的時候，上海中央就派林森到廬山去，促使蔣介石早日清黨；曾經擔任上海中央黨部秘書長的年青人桂崇基，幾十年以後回憶，他也曾經被派往江西促進清黨：「民國十六年二月，上海中央黨部中央委員張繼、謝持、居正、鄒魯等人，公推作者赴贛敦促下決心清黨。抵達南昌，與廣州中央常會主席張人傑晤談數次，至為融洽，並定下腹案，一俟北伐軍攻克上海，即將實行清黨。」①謝持日記（三月二十九日）還記載：「開會決推覺生訪介石。」北伐軍在三月二十一日，由東路前敵總指揮白崇禧佔領上海，蔣介石在三月二十六日也抵達，二十八日，吳敬恒、蔡元培、張人傑、古應芬等廣州中央的監察委員召開預備會，已經對清黨事宜做出安排，清黨之事已經箭在弦上，由重要人物居正出面訪問聯絡，當然更具有影響力。

因為擔心鮑羅廷又有緩兵之計使出，怕蔣介石臨時又有動搖，早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鄒魯直接寫信給蔣介石和張靜江，陳述利害，請他們不要動搖：「介石、靜江同志鑒：去歲關於清黨事，曾疊奉函，未得覆。嗣於報端見介石致溥泉兄書，以弟為放言高論，幾疑兄等能以至誠感於共派，使其不為本

黨之障，在革命戰線上一致工作矣。弟亦樂得安於緘密。乃遲之又久，所得各方報告，共派對於謀覆本黨，日益有加。……昨閱介兄紀念週演講，洋洋數萬言，揭共產黨之陰謀。見諸言辭者，與此間所得各訊，無大出入。則事實已歸一致，解決寧有二歧。因再申前議，請兄等爲黨爲國，將共產黨肅清。……唯昨夜又得報告，謂鮑羅廷主張變更即日倒兄等計劃，謂目前預備未妥，倒兄等恐有失敗，擬再與兄等妥協，以張作霖爲共同目標云云。兄等不明共黨覆黨、覆國之謀則已，否則此種緩兵之計，當能燭其奸謀，嚴予拒絕，立行處置。」②

這種擔心是根據於歷史的經驗，即蔣介石在中山艦事變以後，曾經突然變卦，反過來打擊廣州的反共力量。並且，蔣介石本來在中國國民黨內沒有地位，孫先生去世以後，一方面蔣介石自己用非常手段，在鮑羅廷——中共支持下獲得軍權，在廣州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開始進入黨中央，半年之內，將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中共、汪兆銘、蔣介石是同時擊敗昔日孫先生的左右助手們而獲得中國國民黨的最高權力的，目前他們之間雖然在權力的分配上已經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是他們之間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擔心變卦。

但是這一次，蔣介石與中共的矛盾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不過，這並不等於蔣介石可能回頭與堅持原則的上海中央委員會合作。因爲不管中共——蔣介石如何分化拉攏，去依附蔣介石的只能夠是戴傳賢、邵元沖等個體。而西山會議的上海中央始終是一個政治整體，一個有歷史、有影響的、正式經選舉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這個整體不可能附和於蔣介石個人，而且只能夠按照中國國民黨的章程原則辦事；蔣介石個人哪怕今後當上了黨的領袖，也不可能將他個人的權力高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上。所以急切想要當絕對領袖的蔣介石，並不期望與剛正不阿的西山會議元老們合作，而是寄希望於同樣追求個人權利的汪兆銘，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本來蔣介石對於武漢中央的「迎汪排蔣」是很反對的，但是在取得東南以後，形勢對於蔣介石不利：廣州中央的部份要人留在武漢繼續與中共合作，北有統領重兵的馮玉祥，西有野心勃勃的唐生智，蔣介石很孤立。如果把汪拉攏過來和他一起反共，以上的反對力量將基本可以消除。

所以，張靜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致函汪夫婦，動之以情，說之以理，並且為蔣介石在一年前的中山艦事變中趕走汪的事辯解。現將這封親切的信件摘抄如下：「精衛四兄、七姊同鑒：弟本病廢海市，聊盡餘年，徒以總理三十年之厚交，回憶前年病危在床，執手隕涕，弟亦泣不可抑，惻愴之懷，如何可緩。國家之痛，義忘生命，是以去年三月聞廣州內部糾紛，不辭道死，刻日南行，冀稍盡其獻替。豈知弟三月二十二日在長堤登岸，先二日介兄已向共產黨行斷然之手段，而季兄（精衛）亦飄然引去矣；弟乃憂懼不知所出。聞道路傳言，季兄之行，則因介石兄未以非常之舉前告。長者為行，不使人疑，若有不得不行之勢。聞諸介兄，彼正有深痛之隱，獨示意於弟；弟以為共產黨之陰險，或有擊而不中之虞，不先告季，將失敗時介自負之，季仍可自收其殘局，各有其分義，弟亦何言。弟到之時，介兄仍欲徹底解決，斷此亡黨之毒腕，以慰總理之靈。但弟當時與今日尚受催眠之諸公，同此見解，以為共產黨徒病幼稚，無拳無勇終何能為？但當正色以告之，誠意以結之，止其包辦之運動而約束之，必可就緒。……乃至今思之，弟亦愚妄可笑。欲就條文組織方面而與彼輩為疏闊之制裁，真所謂班門弄斧，太不自量。共產黨買空賣空，別無長技，彼輩所設之天羅地網，使人有其誠，無可拆其偽也。……由此隨介石兄於前數日共哀民宜兄飛渡海西，泣求兄姊早歸。弟不及兄姊之至，已即日拔出政潮，……言盡於此，敬祝長途曼福。弟人傑謹啓。」③鄒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致吳稚暉同志書》中曾經說，蔣介石在中山艦事變期間，準備徹底解決共產黨，懷疑後來受到吳敬恒的勸導，沒有這樣做。張靜江的這封信件證實了這件事的存在。這封信還透露，張已經認識到過去他相信共產黨是「愚妄可笑」。正是過去對共產黨

的「愚妄可笑」的相信，所以曾經阻止居正去北京參加西山會議的行動，而且把幾個參加西山會議的人，如葉楚傖、邵元沖等都從西山會議的反共陣營中拉出去，參加了中共——汪——蔣的聯合戰線。但是張在此處做的，並不是去結合對於蘇俄——中共有先知先覺洞察力的西山會議諸位元老，而是回頭去結合與蔣、張有深切共同利害淵源關係的汪兆銘，這是令人回味的。直到汪後來投降日本人當漢奸，國民政府的基本政治格局都是蔣、汪聯合執政，雖然他們兩人之間在權力上有難以克服的矛盾。

汪兆銘在四月一日到達上海後，四月三日，蔣介石發表通電，對於汪表示極其熱烈地歡迎和擁戴，這通電對於我們認識蔣、汪合作的局面是重要的。全文如下（頭銜從略）：

「我軍勢力進展，業以全定東南，江北戰事，迭傳捷音，豫境敵勢，已難復振；在此功虧一簣之際，果能統一黨權，得有全黨信仰之人指揮領導，俾糾紛悉泯，障礙胥蠲，則國民革命指顧即可完成。汪主席病假期年，不獨全國群眾渴望綦殷，而黨國要政亦受重大影響。中正迭電請求，今幸翩然再出，大旱雲霓，莫喻新慰。汪主席在黨為最忠貞之同志，亦為中正最敬愛之師友，此次回國，對於黨國大計，業已懇切晤談；中正深信汪主席既出，必能貫徹此意旨，鞏固黨基，集中黨權，以底國民革命之全功，而竟總理未盡之遺志。此後黨務政治既已負責有人，後顧無慮，中正應當專心軍旅，掃除軍閥，完我革命之天職。為此電告我軍將士，自汪主席歸來以後，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須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中正唯有統帥各軍，一致服從。至軍政、軍令，各有專屬，軍政大計，應規統一，而中正獨司軍令，俾專責成，同心一德，完成革命。務仰各軍官長遵照此意，對於汪主席完全服從，竭誠擁護，黨權得以真正集中，以完成本黨國民革命之使命，而促成三民主義之早日實現。特此電達，希各遵照。總司令蔣中正印、江」④在這時候，聽命於蔣介石的上海《民國日報》，連續登載了許多歡迎汪的廣告，以及奉承汪的文章。蔣介石那時候已經開始反共，發表過抨擊武漢和中共

的講話，卻仍然把汪吹捧成「全黨信仰之人」，「在黨爲最忠貞之同志，亦爲中正生平最敬愛的師友」，汪的回國，是「大旱雲霓」，汪將「鞏固黨基，集中黨權，以底國民革命之全功，而竟總理未竟之遺志」，等等。並且蔣介石表明他自己將交出黨政大權，一心一意統軍，是毫無野心的純潔軍人。不過，蔣介石寄意於汪是有歷史淵源的，蔣介石的獲取權力的最初，和汪兆銘、中國共產黨、鮑羅廷是休戚與共的同志；如今武漢方面正在加緊宣傳攻擊蔣介石的獨裁傾向，蔣介石這樣做，一方面表白他交黨政給汪以緩和寧、漢之間的對立，另外不得不表明他並不追求權利。這其中暗藏的是權利的交易和妥協，所以後來汪在武漢給蔣介石以種種懲罰以後，南京國民政府的五個常務委員中，仍然給汪保留了一席。蔣介石不可能站在中國國民黨的立場上，以功過是非的觀念檢討以往的過失，他的取捨都出於他個人的權利考慮。中國國民黨在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前夕，是非和原則已經被利益當頭的腐敗所代替。

爲了向汪示好，甚至在四月二日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正式會議上已經通過的各項堅決清黨的決議和文件，也因爲汪的到達而延期公佈，和中共的決裂也就延期了。所以，謝持對於汪、蔣的重新合作的可能感到不安，因爲汪從來是和中共結合在一起的，這很可能會阻礙清黨的進行，謝持日記記述道：「訪覺生，見報載介石交政於精衛，電精衛而出，未可忽視也。海濱亦至，遂定明日在吾家會商。」

汪兆銘在上海停留期間，蔣介石曾經與他幾度交談，期望他加入反共行列，汪口頭也表示贊同。但是卻私下秘密與陳獨秀、周恩來等接觸，與武漢通聲氣。在孫先生去世以後幾乎只追求權力的汪，雖然蔣介石說要把黨政大權交給他，也許他對一年前被趕走之事心有餘悸，卻仍然選擇了與中共合作的路線。以致於四月五日，蔣介石、吳敬恒、蔡元培、李宗仁、白崇禧等在上海的要人，都聚集一堂，與汪商議解決國共危機的辦法時，早晨的報紙卻登載由陳獨秀起草的《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聲稱國共之間應當「如兄弟般的親密，反問之言，自不得乘間而入也。披瀝陳詞，萬希各自省察，勿自爲親者所

悲，仇者所快，則中國革命幸甚，兩黨幸甚。」以致於在會上，吳敬恒就和汪立即爭執起來，不歡而散。

蔣介石、吳敬恒要求汪兆銘留在上海領導反共，汪都虛與委蛇，只反對立即對中共採取斷然措施，並提出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開四中全會解決國共間的糾紛。就是他去到武漢的目的，也說是爲了把在武漢的中央執行委員請來南京開會。但是汪一到武漢，就立即投入鮑羅廷——中共的懷抱：

四月十日，到達武漢的當晚，住在鮑羅廷寓所，開談話會表明基本的態度；

四月十一日召開執監聯繫會，發表聲明反對上海的執監聯繫會，書寫「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走開去」的著名口號；

四月十四日，漢口各界在德國球場開迎汪大會，汪的演說重點是擁護執行所謂「三大政策」，並提出：「懲辦以反共產名義，實行反革命的一切反動分子」。

四月十六日，發表銑電，說南京的預備會議是西山會議式的會議：「若自召集西山會議式之會議，是直使本黨陷於分裂。至於圍繳工人糾察隊槍械。既違背中央之命令，且與總理扶助農工政策，大相刺謬，悍然爲之，無異甘爲民衆之敵。」

四月十七日，汪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名義，命令撤去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並通緝之，再由中央黨部開除其黨籍。而同時任命馮玉祥爲總司令，唐生智爲副總司令。那時候，唐、馮是武漢政權的支柱，但是馮有更大的野心，想要坐收寧、漢對立之利，故對南京也表示親近。

由此，武漢與南京完全對立。於是，出現了南京、上海、武漢三個中央黨部，武漢、南京兩個國民政府，兩個國民政府都控制着軍隊。

形勢緊張起來。

南京沒有退路，於是，在上海和各省加緊清黨。但是上海的清黨，卻是在槍聲之中偷偷摸摸地進行的。由吳敬恒提出的查辦共產黨的重要文件（在四月二日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上通過），只送達忠於蔣介石的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這些名單也經過監察委員會的審查。至於對外公佈的，則是鄧澤如、吳敬恒、蔡元培等廣州中央的監察委員在四月九日發出護黨救國通電；四月十二日，白崇禧發表公告，取締上海總工會工人武裝糾察隊。但是，這兩份關於清黨的公開文件卻並不主張清黨，與吳敬恒提出而送達中央執行委員的不一樣。

所謂的護黨救國通電，竟然不是針對國共對立的危急的現實而發，而是針對武漢的聯繫會議，中心思想是說聯繫會議不合法。那時廣州中央在一個月前召開的武漢三中全會上，已經將聯繫會議撤銷。這份通電有好幾千字，沒有一句話是正面批判中共，更不是大義凜然的清黨的命令或行動綱領，不痛不癢。

白崇禧的公告，是對中共領袖周恩來、顧順章領導的工人武裝進行開槍的戰鬥命令，可是文字又非常奇特。因為篇幅不長，全文抄錄如下：「爲佈告事：本早聞北武裝工友大械鬥，值此戒嚴時期並當前用兵之際，武裝工友任意衝突，殊屬妨礙地方安寧秩序，不得不嚴行制止，以保公安。除派部隊將雙方肇事工友武裝一律解除外，並派員與上海工會妥商善後辦法，以免再啓鬥爭，而維持地方秩序。所有本埠各廠工友，務各照常工作，毋得輕信謠傳，自貽伊戚。爲此佈告，仰各界人等一律知悉。此佈。」（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事實上，「四·一二清黨」，中共稱「四·一二大屠殺」，是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是聯俄容共這一歷史時期用流血方式的結束。但是發佈的命令，卻如此躲躲閃閃，如果不做出說明，會弄不清楚這關於制止「械鬥」的佈告，怎麼會載入重要文件的史冊。

而真正發動者的蔣介石，在他的佈告中，一方面指出共產黨有「謀叛證據」；面對已經出現的流

血，則通告「仍須和平解決」；尤其正式聲明，「並非變更國民黨任何政策」，即指聯俄容共政策仍然繼續。蔣介石的佈告全文如下：「爲佈告事：照此次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舉發共產黨連同國民黨內跨黨之共產黨員等有謀叛證據，請求中央執行委員會各委員在所在地將首要各人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機關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予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爲，仍須和平待遇，以候中央執行委員會開全體大會處分等因。此係阻止少數叛亂分子發生叛亂行爲而已，並非變更國民黨任何政策，所有一切農工主要團體及各級黨部皆照常進行，毫無更張，務望各方皆應安堵如常。本總司令職司討伐，以維持地方秩序爲則要；如有借端擾動，有礙治安者，定當執法以繩其後也。此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⑤明明聯俄容共的政策已經結束，一場流血的武裝清黨開始，當事人說的卻完全兩樣。

更有甚者，由白崇禧發佈命令，將環龍路四十四號的西山會議的中央黨部予以查封。上海《民國日報》四月十三日報道：「本埠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前日擅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表宣言，聞昨已由東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制止其行動矣。」發出查封命令以後，鄒魯立即拜訪吳敬恒，吳解釋是白崇禧幹的（鄒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致函吳敬恒說，「當時弟因此事晤先生，先生云此事係健生所爲，介石不知。及後查之，乃介石所命。」）⑥。鄒魯在《清黨感言》中又說：「同時白崇禧同志，接了蔣介石的電，發出文電，來查封四十四號的中央黨部。」這樣荒唐的事情，並未敢執行，但是仍然會帶來政治後果。

西山會議的上海環龍路中央黨部，在四月十四日，正式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致函張人傑、蔡元培、吳敬恒、鄧澤如、李石曾，既提出質問，又說明聯俄容共的政策可以加以修正，全文如下：「昨由鄒委員海濱報告稚暉同志對於清黨之決心及辦法，一則以慰，一則以驚。所以慰者，自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西山總理靈前開會決議開除共產派在本黨黨籍以來，同人喑口噤

音，繼續號召，今日得諸同志一致實行。頻年癥結，一旦解剖，雖自愧無功亦差幸無咎；所以驚者，聞諸同志表面之辦法仍主張聯俄容共，打倒西山會議派。俄果然爲平等待我而來，則雖驅逐共產分子亦可提挈如故；若爲侵略我國消滅本黨而來，則目的既失，方針更見仁見智，此時姑且不論，容俟事實上之證明。若夫共產派之反動，分而言之爲其分子，合而言之爲其團體，本黨不明白共產派之罪狀以開除之，則何去何從，原有之同志恐難抉擇，新來之同志亦不知趨向。共產派棲息混於本黨者，猶將滋蔓不絕。專以叛黨名義而淘汰之，則叛黨者絡繹相望，內無以堅黨部之組織，外無以正各界之視聽，而共產黨挾有第三國際之命令與虛布，加以信用未堅，必爲國家社會後患。揣諸同志所以如此，將囿於聯俄容共爲總理之政策乎？殊不知政策本視利害爲轉移，不必膠柱鼓瑟。總理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演說且言『政綱是隨時可以修正的』，何況無明文規定之聯俄容共政策，安有不可變更之理。至於打倒西山會議派，則同人自反而忠，自反而信矣。橫逆之來不值一喙，然焦頭爛額爲上客，曲突徙薪者不與焉，猶可也。倘必認曲突徙薪爲罪無可追，不平之氣磅礴鬱積，豈本黨之利乎？本黨屢仆屢起，以有光明磊落之歷史。今明知其不然者而曰容納，明知其然者而曰打倒，且有容納者力加懲治，於打倒者方擬收容。共產黨固宿沒齒難忘之仇，同人誰甘蹴與之食？一唯示人以僞，僅存正氣摧殘殆盡，於世道人心影響匪淺。日前以軍警收繳武裝糾察隊槍械，目爲工友衝突，掩耳盜鈴而曰天下皆愚我獨智。寧有是理？適予共產黨以攻擊之隙耳，仰猶有不已於言者，據報載白崇禧之通電，對於本黨黨部及汪精衛之宣言，一則曰非法機關，再則曰蔑視黨紀，應即查封，此殆打倒西山會議派之預定計劃歟？唯同人是否非法，是否蔑視黨紀，毋勞尸位代庖；退一步言，亦可比文天祥立景炎祥興；總理開國會非常會議，應難濟變，此心泰然。若反唇相譏，試問有力者一月來之舉動，究竟秉承何種合法中央機關？根據何種黨紀？願同志平心思之。同人毫無權利意氣之爭，前致靜江、協和、介石諸同志函，已具言之，特佈所懷，佇

盼答覆。否則，唯有將此函披露，以待公論，合併聲明，專此藉候。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⑦這封態度強硬的公函對於蔣介石等的既清黨，又要聯俄容共；既步西山會議後塵，又要查封中央黨部的做法予以揭露批評以外，指出還應該變更孫先生聯俄容共的政策，並且提出依據，這應當是一份重要的文件。並且表示如果要堅持錯誤的話，會公佈一切，讓公眾來評判。

西山會議的主要主持人之一的鄒魯，在這期間，多次與吳敬恒進行交涉，在著名的《西山會議》小冊子中，鄒魯記載：「我不清共產黨出去，共產黨必然清我出來，尤其是當權的蔣介石，共產黨再不能相容。果然這話不幸言中。軍隊到了長江，共產黨就奉了第三國際的命令來倒蔣了。武漢共產黨用本黨名義，開甚麼會，說甚麼提高黨權等十幾個問題，暗中卻是倒蔣。陳銘樞同志，得到這個事實，抱病跑到江西，報告蔣介石，及請示辦法。那時蔣介石仍抱着左邊拿着國民黨，右邊拿着共產黨，來做中國革命領袖的美夢（這話不是推測，觀蔣介石南昌演說文便知），將他的條件一一容納。誰知道共產黨是奉第三國際命令倒蔣的，蔣介石雖然容許他的條件，他卻不要蔣介石容許，仍非將蔣介石清出來不可。報告事件與蔣介石知道的陳銘樞同志，也被迫出武漢來了。打倒蔣介石的口號，普遍了兩湖。蔣介石同志至此才恍然大悟。各地忠實同志清黨的進行，也預備成熟了。蔣介石到了上海、南京，始決心清起黨來。西山會議的主張，總算見諸事實了。」

「西山會議只有清黨的主張，屢向各方表示：共產黨脫離本黨的日子，就是黨部歸於統一的日子。所以南京、上海將清黨的時候，我們決定四個黨務統一辦法：

「（一）恢復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施行職權。

「（二）粵、滬兩方之第二屆執行委員會，施行職權。

「（三）滬、粵兩方中央黨部分別舉出同等人數，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集事宜。」

「(四)滬中央黨部，宣告清黨目的已達，自行結束。」

「上海將清黨前數日，吳稚暉同志正式來說蔣介石等決定，黨是決定清了，不管汪精衛如何和緩，共產黨如何退讓，卻不遲延了。但是實際雖然清黨，外面還要說是容共聯俄。清黨雖是西山會議派先覺，我們統須出來辦事，但外面還要說是打倒西山會議派，總請我們原諒。我們大怪起來，與吳稚暉同志辯論了三、四個鐘頭。他們的主張不能變更，我們所定的四個辦法，就無從向他們說起。所以四月上海清黨的時候，竟不敢公開反共，偏說是工人與工人衝突，軍警出來彈壓。對於容共政策，是不變的。同時發出查封環龍路四十四號西山會議中央黨部的文電。蔣介石對於北京查抄俄公使館，搜出許多謀害中國的證據，還要為俄國抗言。卻是汝要容共，共早不要汝容，俄國早在莫斯科聲討蔣介石了，這可謂『心勞日拙』吧。」⑧這份簡要記錄這一歷史過程的重要部份以及其它文件，在後來出版《西山會議》的時候，被迫刪去了對於蔣介石不利的話，歷史的真面目被掩蓋起來。只要對比沈雲龍教授主編的「紀念中華民國建國六十週年史料匯刊《西山會議》」(第一九四頁，大海出版有限公司)，就可以明白。

當上海清黨開始以後，吳敬恒、蔡元培與胡漢民等立即赴南京，準備召開廣州中央的第四次全體會議。這時候，鄒魯致函給寧方全體重要成員：蔣介石、吳敬恒、蔡元培、李石曾、胡漢民、張靜江、鄧澤如、李烈鈞、古應芬、譚延闓、柏文蔚、李濟琛、李宗仁、黃紹竑、陳明樞、朱培德、白崇禧，與他們討論黨務，痛斥上海清黨的做法的錯誤，並且警告這將要重新開啓黨內糾紛：「明明國民黨肅清共產派，而偏假工人自相衝突，當局出於制止等虛偽手段；文告電言，復不敢涉共產黨三字，且云一本向來容共政策，甚至同時有打倒西山會議之演講，有查封四十四號中央黨部之文電。與某同志所言一一符合。竊以為此種行動，非特清黨無功，而黨內之糾紛，殆將愈甚；且諸同志進退失據，更恐有不久即覆之禍。……西山會議，係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及監察委員洞共產派覆黨覆國之陰謀，在西山總理靈前開

第四次全體執行委員會會議，決議肅清黨內共產派案、解僱鮑羅廷案等等，完全純粹同志救黨救國之清黨運動。而四十四號，則第四次全體會議決定中央黨部移滬案之中央委員會機關也。究犯黨章何條何項，而應打倒查封？若云開會地點何不在粵？昔日之粵爲共產黨把持，猶夫今日之鄂。介石同志等手握黨政大權，今日半年赴鄂開會，又何責於其時手無寸鐵各委員乎？若云開會人數不足，粵之迭次開全體會議，人數又足乎？（第一屆第三次之在粵開全體會議，人數不足，開會完後數日，始持簽名簿到頤養園請組奄等補簽，魯實目擊。在粵開之第四次全體會議，人數亦不足，但得報告，未得目擊）。武漢之會不論矣。在寧之本月十五日會議，又真能使其人數滿足，真欲使其開成會乎？同是委員，豈出諸有槍者則合法，出諸無槍者便非法乎。在此點言，以云合法，則皆合法；以云非法，則皆非法。他人可欺，魯不可欺也。至西山會議爲純粹同志集合，其他則共產派雜於其中，尤不可同日而語。……」以上除了揭露蔣介石清黨的虛偽以外，對於有槍就「合法」，無槍就「非法」的申斥，道出了蔣介石軍人政權的實質，義正嚴辭，無法反駁。本來當吳敬恒去會見鄒魯的時候，雖然說明一面清黨，一面繼續打倒西山會議的做法，也說明在這以後，會給西山會議諸人以「職位」，被鄒魯嚴肅拒絕，就像在廣州二大的前夕，也是由吳出面，卻把考試、監察兩院交給西山會議諸人主持的做法，被嚴肅拒絕一樣。這些高層的利益交換原則的政治交易，說明了權利對中國國民黨的腐蝕。

南京在四月十五日召開過第四次全體會議的預備會議以後，鄒魯在四月十八日，再次寫信給以上同樣的人，對南京清黨的做法提出強烈批評，指出其不光明磊落的三點。到了五月中旬，鄒魯寫信給過去長期與他進行交談談判的吳敬恒，又一次批評南京的做法。

西山會議諸領袖，過去在鮑羅廷——中共——汪兆銘——蔣介石的聯合的時代，對他們加以開除等等處分，他們絲毫沒有屈服；如今蔣介石步他們的後塵清黨，他們怎麼會屈服或被引誘呢？這自信的心理在

謝持的日記之中表現出來，正是南京中央預備會剛剛結束，而又沒有任何改變的四月十九日：「清黨之氣頗振。惜主軍政者挾智任術，捨大路不而而以僞天下。吾人守西山會議之正，初無所損益。然欲導天下於正，不幾南轅北轍耶？故爲國須識大體。」

中國國民黨因爲共產黨問題而分裂，如今引起分裂的原因已經消除，分裂下去只能繼續損傷國民革命本身，爲甚麼蔣介石會這樣做呢？這問題鄒魯在《清黨感言》中有簡要地回答，共分四點：

「(一)出發點不正。此次清黨，自然是一般黨員熱烈運動，尤其是介石同志的大力主持，才有這個結果。但是介石同志清黨的出發點則完全不正。何以呢？共產黨之謀害本黨，不是最近始。他的陰謀之發現，亦不是最近始。本黨的同志通通明了，介石同志尤其明了。但何以介石同志不容納本黨同志清黨之言來清黨，甚至二月底武漢提出各種條件，倒黨計劃大著特著，介石同志仍然一律承認。及至共產黨對介石同志承認各條件，尚要倒介石同志，口號到處喊，標語到處貼，陳銘樞同志被迫離開武漢，武漢一般同志，非殺即捕。介石同志看到共產黨不能容自己了，才決心清黨。似此，則此次清黨，介石同志不是立在黨上來清黨，乃立在介石同志身上來清黨。不然，何以共產黨許多危害本黨之事實發生，介石同志不唯不清黨，還要卵翼着共產黨來迫害同志，到了危害本身的時候，方劍及履及的來清黨呢？這幾年來，共產黨能夠這樣囂張，介石同志主持大權，偏助地方，萬難咎免。尚幸共產黨看到羽翼已豐，下手倒介石同志，使介石同志決然清黨。然當時共產黨滿佈心腹，已無必勝之權了。現在湘、贛仍陷在共產黨手中，就使倖能全勝，使本黨處到這樣危險地方，介石同志功能補過嗎？何況不是爲黨來清黨，係爲自己來清黨，那就更不可訓了。」

「(二)態度的曖昧。……事前主持清黨的要人來接洽說：『清黨是決心與西山會議一致的，但表面上仍是聯俄、容共、打倒西山會議，請你們西山會議的人原諒原諒。……現在清黨的，言西山會議的言，

行西山會議的事，用西山會議的人，並且認為先覺，認為正氣，卻口裏頭，偏要說打倒。……最可笑的，還有精衛一事：當局的人說他是『叛黨賣國』，說他是『張邦昌、吳三桂』，還有『借刀供他自殺比他做一隻狗』。介石同志偏通電，私將政權、黨權一手交給他，今日一電說『負責有人』，明日一電說『合作到底』；各地方、各團體承介石意旨，『歡迎汪精衛』、『擁護汪精衛』，更鬧個不休。不上幾天，還現出原形，要『打倒賣國、叛黨、冒稱領袖的汪精衛』。十幾日前，又何苦做一番虛偽功夫呢？我輩革命黨，日日以誠信號召，還怕人認不明白，這樣虛偽態度一來，究竟使人何所適從呢？」

「(三)事實的荒謬。清黨要清共產黨，自是不費解的。但此次當局偏要『打倒西山會議』，方才清的是我的黨，清黨是他的功。遂使向不大接近黨務的人來辦清黨的事，更不能不根據共產黨所把持黨員之名冊為黨員根據。這樣一辦，共產黨與非共產黨都認不明了，所以共產黨重要人都跑得清光；不是有名的共產黨，卻仍牢牢固盤踞在黨的底下。……」

「(四)個人擁護。黨員站在黨裏頭做事，做得對，是應該的；做得不對，是要負責的，用不着人來擁護。這回清黨前後『擁護蔣介石』、『擁護汪精衛』的呼聲，鬧得我耳鼓欲穿。……擁護個人的毛病，目前已十分顯著，現在仍不悔悟，起勁的擁護個人起來。擁者不曉得恥，被擁的不曉得覺。又何怪變本加厲的在那裏擁護國父鮑羅廷呢？……站在個人身上，弄來弄去，總跳不出個人主義範圍，故有此結果。流弊所到，尚堪問嗎？……」

西山會議諸人，在得不到南京的執政者的善意回答時，在報紙將分歧公開，不得不訴諸公論了。

這時候，一方面是西山會議諸公不屈服於蔣介石的強權；另一方面，蔣介石左右做法皆失去根據的情形下，需要人出面緩解。直到胡漢民加入南京陣營，才使得國民黨內的僵持的局面出現轉機。

胡漢民和西山會議的諸位領袖昔日都是孫先生周圍的左右助手。張靜江等人和孫先生雖然交往很

長，但是他、吳、蔡、李幾個都是長期在法國，並沒有和孫先生一起奮鬥，所以和西山會議諸人沒有在一起奮鬥的經歷。而且孫先生去世以後，胡漢民由過去比較居中的立場，迅速轉變到反對蘇俄——中共方面，與居正、張繼、謝持等立場一致；廖案發生，他同在被排擠之列；而且一九二六年四月底回國以後，再次受到鮑羅廷——蔣介石的聯合排擠。但是他與西山會議諸位領袖有很大的一點不同的是，他沒有參加西山會議，那時候他在蘇俄。他回國的時候，廣州中央憑着軍隊、財政、根據地等的有利條件，在組織方面已經對只有主張的西山會議上海中央居於優勢。胡漢民在一九二六年五月被排擠到上海以後，他在政治上採取了極為謹慎的態度，閉門讀書，不參與上海、廣州兩個中央的對立活動。因為沒有這一層歷史包袱，在北伐軍攻下武漢重鎮以後，九月十日，他致書蔣介石，表示熱烈祝賀，這拉近了他與蔣介石的距離。所以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清黨開始以後，蔡元培、李石曾、吳敬恒等一起拜訪胡漢民，胡漢民欣然應允立即到南京參加清黨工作。因為他支持蔣介石，就表示了部份孫先生左右的元老和國民黨的正統的支持，彌補了蔣介石的嚴重不足；甚至後來南京在與桂系，與閻錫山、馮玉祥的軍事對決的關鍵時期，胡漢民都起到了可能算得上是決定性的作用。

胡漢民一到南京，四月十四日，就主持了第二屆中央全會的預備會；十八日，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胡漢民擔任代理主席；國民政府的第一號命令就是通緝鮑羅廷、陳獨秀等將近兩百名中共黨員；五月，兼任政治會議主席和宣傳部長的胡漢民領導制訂清黨原則。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蔣介石對黃埔同學會改組代表大會講話的時候，開始對西山會議改變態度，他說：「打倒西山會議派，或打倒孫文主義學會這個口號，不要說我們同學，一般民眾中也已經印得很深。……各位要詳細研究考察，西山會議派這個名字，是哪一個造出來的；是CP造出來的。……我們要詳細的考察一下，西山會議派是不是個個都落伍退後，不配再來做我們黨員的！照我們國民黨本

身來講，也斷不能因一部份人不對，就把全部人一概抹煞。所以我們現在不管西山會議派、孫文主義學會，甚麼派別，我們總要審查裏面分子有革命，或反革命的。」⑥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上海《民國日報》第四版，登載了胡漢民關於西山會議的講話：他說中國國民黨內的所謂左右派，都是中共為破壞國民黨製造出來的；孫文主義學會的宗旨，是為宣揚孫文主義，應當肯定；西山會議的同志都是為了反共救黨，不能打倒。六月六日胡漢民在中央黨部紀念週上正式宣佈，今後不容再有「打倒西山會議派」的口號，他說：「西山會議的同志，目的原是反共救黨。西山會議以外的同志，同此目的的，也不知有多少，何能單指那開會議的人，便自成一派呢？這般同志，都很忠實、很努力、很具苦心，有若干雖到現在，仍舊很奮鬥的。不過，所取的方法手段，不很合適，所以中了中共的詭計罷了。至於我們，對這些同志當時的反共，方且同情之不暇，何能沿襲共產黨的口號，口口聲聲打倒他們呢？我們現在既然明白這一層，以後也就不能容這個口號再發現。」六月七日，胡漢民主持南京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正式做出決議，恢復西山會議諸人黨籍，決議原文如下：「查因純粹反共而被開除黨籍之同志林森、張繼、謝持、居正、鄒魯、石瑛、石青陽、茅祖權、沈定一，均應允先行恢復黨籍，俟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提出追認。」⑦

這些改變，是形勢所趨，因為蔣介石跟隨西山會議反共以後，不可能再繼續把反共的先覺們和共產黨一起打倒。正因為這些改變是被迫的，所以南京不是承認西山會議的政治路線，不是平等地將兩個中央黨部聯合起來，帶有勝利者給予「平反」的意味，也不符合鄒魯在清黨前夕提出的四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

上海中央並沒有屈服。就在給他們所謂恢復黨籍的當天，根據謝持的日記，那天他在整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議事錄》，顯然要將這段歷史的是非和真實記載於文字；他和林森、居正、鄒魯「連名

治酒，飲晉、豫、魯同志。」上海中央黨部雖然沒有軍隊，但是有基層的黨部支持。謝持在之前三天，已經知道南京對上海中央態度的轉變：「得趙鐵橋南京箋，言南京張靜江提案恢復吾人黨籍。靜江用意，在個人，而不在黨，所爲非所讚許也。」中國國民黨團結的障礙去掉了一些，但是還有待努力。

鄒魯在這時候致函擔任斡旋的陳銘樞，並且請專致胡漢民、吳敬恒，道出了不肯屈服強實力的信息：「……而仍不能如兄意發表宣言，收束四十四號者，蓋爲黨之心，終有未安也。自正義言，西山會議在三年前，即暗口噁音，號召清黨，何以須打倒？須查封？倘密受而屈，私人得失，所關甚細，其如革命之團體如何？且一黨之內，不以正義爲是非，而以勢力爲曲直，更恐非黨之福。若謂趨勢已成，莫可如何，則革命正以破已成之惡勢，目前之清共，即其一例。奈何一面清共，一面沿襲共產黨之口吻與政策，人謂當局排出異己，將亦無辭以自解。展兄云：欲以人之團體屈服已，事實不可能。斯言誠然。但今日之西山會議，非欲南京會議或廣東會議屈服也。清黨之後，需主統一，公私早有表示。今日襲西山會議之言，行西山會議之事，偏恐共產黨謂與西山會議預有聯絡，便不惜打倒出諸演說，查封出諸文電，是又豈西山會議欲人屈服也。……」⑩西山會議的出現，就是根據他們的理念而向有勢力的汪——蔣——鮑——中共挑戰；對於廣州「二大」的處分，是以召開上海「二大」針鋒相對回答；如今已經證明他們有先見之明，蔣介石步他們的後塵，蔣介石進退失據（口說聯俄容共，實際上用槍彈反共；跟着西山會議反共，卻又去打倒查封），他們怎麼會向南京屈服呢？這同一封信中說，現在由胡漢民、陳銘樞擔任調解斡旋南京、上海的工作。

蔣介石查封西山會議的上海中央黨部，完全出於私利和政治野心，忌恨反共的先知先覺，爲了他個人一統天下。不然怎麼解釋此舉呢？由胡漢民等出面調和的本身，就說明了蔣介石以查封的強力手段對付西山會議諸公的失敗。並且隨着時間的推移，分裂的現狀就愈加顯得荒唐不經。

顯然，分裂已經不允許繼續下去。南京與上海的兩個中央黨部的聯合，終於提到了日程上。

註釋：

①《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第五三頁，桂崇基著，台灣中華書局出版。中華民國六十二年。

②《鄒魯文存》第三集第一一七頁。

③《革命文獻》第十六輯第二四頁，羅家倫主編，編輯者，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台北。

④同註釋③，第二六頁。

⑤同註釋③，第三五頁。

⑥同註釋②，第一三八頁。

⑦《謝慧生先生事跡紀傳》第二七七至二七八頁，謝幼田著，近代中國出版社，中華民國八十年，台北。

⑧同註釋②，第八〇至八一頁。

⑨同註釋⑦，第四一二頁。

⑩同註釋②，第一三八頁。

二十六、滬寧統一運動

上海清黨以後，國民黨內造成分裂的基本原因消除，可是分裂照舊。

對於廣大國民黨員來說，這是不能夠容忍的。因此，自六月初以來，自下而上地出現了推動國民黨內的團結運動。

《清黨實錄》專門有一節，以《黨部統一之呼聲》為題，保留了基層國民黨員對於團結的推動文獻。這些基層的呼聲完全沒有任何利害關係，一切着眼於國民革命，着眼於三民主義的實行；大部份用海內外團體的名義，也有個人或若干人聯署的。常常是娓娓陳述，急迫懇求。

菲律賓的華僑代表葉獨醒攜帶巨款歸國，發表通電催促南京、上海兩個黨部統一，真是「嚶嚶泣鳴，血與淚共」，感人異常。葉獨醒的通電說：「本黨年來因共黨分子之作祟而致分裂，今因共黨分子之叛變而趨一致，又非不幸中之大幸也。唯以整論及事實上言，我黨既以依舊團結為唯一新生命，以後絕對不應有兩個重心。應由我黨權政權的雙方同志，由言論上之溶合，各進一步，而為事實上之統一。庶幾『帝國主義』、『軍閥』、『偽共產黨』之打倒不成問題，而總理在天之靈亦含笑矣！懇我國內親愛之同志，言行勿貳，迅速進行事實上之攜手，更望我海外各地黨部，齊起努力黨中統一之要求，則國民革命前程、成功，實所利賴焉。獨醒年逾六十，憂患頻結，只知黨國，不問其他。此次代表菲島華僑樂輸巨款之誠意，不憚跋涉，回國報告，一路由粵而閩而滬，凡耳目親所聞見，而以為喜者，不敢不欣然告我海內外同志；而以為憂者，亦不敢不愁告我海內外同志。嚶嚶泣鳴，淚與血共。伏希我海內外親

愛同志，共鑒衷愚，急起進行黨務統一，則總理在天之靈，當諸同志指導也。」

在過去上海、廣州兩個中央嚴重對立期間，在日本的華僑之間也常常對立衝突。在上海的駐日總支部旅滬黨員，也以焦急的心情致電南京、上海兩黨部雙方說：「黨賊不除，同志之恥；黨基不固，同志之辱；吾黨主義及政策，不能早期實現，尤爲吾黨同志之奇恥大辱。……最後尚欲再進一言者：則今日黨政諸公，無論是否在朝，皆當本先總理愛主義、愛黨國之精神，而合力以謀忠實同志之大團結，如有稍持異議，離間分裂者，即爲違反黨德，將陷國民於自穀之途。此即共產派化身、本黨逆賊、總理叛徒、人人皆得誅之反革命派，凡我忠實同志，當特別認識者也。」這是何等的尖銳急切！

旅歐歸國黨員，以及華僑協會、澳洲總支部駐粵辦事處、東京華僑、印緬革命俱樂部、駐粵南洋平民同志會、聯義海外交通部、古巴同志俱樂部、美洲同志會、南洋總支部、菲律賓華僑總會、南洋華僑實業俱樂部等，也致電上海、南京兩個中央黨部，表達他們的憂慮和共挽狂瀾的期望。

在促進兩個黨部統一的過程中，以上海和廣州的團體通電的氣勢最大。上海先後有九十個工會組織、三十九個團體、四十八個團體聯合發出通電。上海的九十個工會組織的通電說：「查本黨忠實同志，自前年在西山總理靈前開會而後，遂一黨而成爲兩個中央，一在上海，一在廣州，然考一主張不同之點無它：一主清黨，一主與共產黨合作而已。今則南京中央黨部之主張，與上海中央黨部之主張一致，洵爲本黨統一與本黨團結之機，所堪太息。……凡屬純粹同志，不宜過泥於黨部分合承襲之跡，而求事實之可通；不宜計較已往之異同，而當平心靜氣，公而忘私，心口若一，力謀團結一致。蓋非如此，不足以去心腹之疾，而成不敗之功。所望主同志恢宏愛黨精神，速商兩中央黨部正當統一，以便集合全黨之力，完成艱巨責任。否則爲功爲罪，在諸同志自擇而已。」上海三十九個團體的通電說：「斷不可有絲毫運用政治手段，及憑藉甚麼權威的意思摻雜其間，更不可因爲對人的問題，連黨的統一也放

下不講。同人等希望中央統一，同志團結，甚於飢渴。伏懇主持黨務的同志諸公，不泥成見，不涉偏私，不以成敗爲是非，不以正統爲爭執，不計較個人的利害，開誠協商。」四十八個團體的通電指出團結是形勢的急迫需要：「今者殘餘軍閥未除，武漢偽政府尚在，共黨妖首，更分頭活躍，希圖破壞革命，傾覆本黨，急宜一一蕩平，以建設莊嚴燦爛之共和國家。」

廣州中華女界聯合會等三個團體、廣東九個行業工會、廣東全省商民協會、中國國民黨廣州市的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黨部、廣東學生聯合會，以及廣東七十四個團體和佛山總工會所屬的一百二十餘個工會、廣東總工會代表的廣東三十五個縣的六百七十二個工會，以及香港總工會所屬的一百五十九個工會都表示了對於分而不合的局面的痛心，希望兩個中央黨部立即統一。廣東各團體及各黨部所代表的六十個團體和佛山的一百二十個工會的通電說：「今者黨內糾紛已隨共產黨而消滅，黨內同志已無左右之分。西山會議諸忠實同志，中央亦認爲本黨純正分子，乃西山會議諸同志至今仍棲遲滬濱，殆以黨部系統不同，致生隔閡。夫西山會議諸同志皆本黨第一屆中央委員，全國同志之所愛戴，總理之所信任，奮鬥歷史，昭著中外。際此變亂切平，正賴老成謀國，而公忠黨國之同志，因受共產黨挑撥離間，致令本黨中心分而爲二，言之寧勿痛心。同人等愛黨出於至誠，不忍見我忠實同志因清黨主張先後之不同，以致分而不合。除聯電南京、上海諸忠實同志懇請克日統一黨部外，謹此電達，即希一致主張，黨國前途，庶利賴之。」

另外潮州海外同志會、安南華僑組織、南通警察廳黨部、汕頭各界、江西清黨促進會、旅歐歸國黨員、無錫的國民黨員、蜀、湘、粵、桂旅滬的有名望的國民黨員等等，都以各種方式表示了期望兩個中央黨部統一的願望。

在清黨要進行之前，吳敬恒和鄒魯會面的時候，鄒魯提出了四個條件，其中之一是兩個黨部合併。

但是蔣介石、吳敬恒等清黨主持者不同意，他們對上海中央黨部先查封之，然後由陳銘樞等轉達他們的意見，希望自行結束，再以個人身份到南京當官，被拒絕。但是，基層的黨員、黨部没有任何的私見，他們完全一致希望兩個黨部平等合併，這恰恰與西山會議諸公的意見一致。南京如果不接受此意見拖下去，就會更暴露出自己的私心。蔣介石在上海清黨時查封環龍路四十四號，想得太簡單了，以為這幾個元老手無寸鐵，可以憑力量擺佈之。作為軍人的他，沒有想到「力量」只能夠逞於一時，只有「理」才可以恒久。這個「理」，就是從同盟會以來的廣大的中國國民黨黨員的革命經歷形成的信念，就是他們對三民主義的信仰，就是他們對於實踐孫文主義的信心。中國國民黨畢竟有推翻滿清，有和袁世凱、北洋軍閥長期奮鬥的歷史，畢竟有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的薰陶和孫先生堅定的意志和人格的感化，這使得黨員有一定的非觀和辨別事物的能力。這無形而強大的力量，是國民革命的基礎，是中國國民黨的基礎。

這就是中國國民黨統一運動的能量。

那時候，湖南、湖北、江西都在武漢粉紅色國民政府控制之下，北方在北洋軍閥統治之下，國民革命軍只能夠統治廣東和上海周圍一帶。統一運動的最強聲音正是在這裏發出。南京當局不得不面對這一切。

居正以《我黨之統一運動》為題，回顧了國民黨分合的歷史，以及統一的困難，提出統一的三項原則：

一、「黨源必清。語云：『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濁，其可得乎？』中國國民黨亂源，由於共產黨混入以後，何以如此專橫？則以赤色帝國主義發縱指示，故武漢中央，完全受制，不待說明；南京中央，雖厲行清黨，而猶不能明白宣示，其中或苦於環境與事實，可為知者相諒。……上海中央，自民國

十四年以來，即端本清源，備嘗艱苦，寧受任何壓迫，不與任何屬性帝國主義勾結，亦不受任何有槍階級操縱，不磷不緇，赤條條清白本質，表示中外，是以能博民眾之認識與信任。即今日被通電查封，而民眾同情，益增濃厚。此無他，源清故耳。凡事欲人相信，必先自己能相信；若自欺欺人，事終無濟。」居正當年加入同盟會，以及後來反對南北軍閥的經歷，就是為一個理想，而沒有個人的得失，更沒有對權利的追逐活動。西山會議的舉行到上海中央在重重困難中的堅持，也仍然是追逐革命理想。這就是他所說的「源」。「源」清，則「流之不濁」。國民黨在打下天下的前夕，這「源」，已經被個人的利益追求所腐蝕，「源」不清了。只有保持純潔的理念的人，才在權利追逐的上層，提得出這原則。

二、「黨基必固。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本立而道生，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中國國民黨根基，經共產黨兩年之搖動，實在不固。……今武漢中央，如人受梅毒，業已灌頂，復元絕對不能；南京中央，新穎脫出，比之武漢，自不可同日而語。然鼠牙雀角，破斧缺斨，根本損傷，非同小可；唯上海中央，處荊天棘地中，枝幹固多殘破，而一探其基礎，非唯絲毫無所影響，而且安如磐石，撼之愈緊而愈堅，迫之愈沉而愈重。古語云：南山可移，此案無動。上海中央雖不敢自誇，而中堅人物素有此志。假使武漢方面忠實同志，與南京方面忠實同志，覺己身立足點不牢，翻然改圖，合同建築於堅實基礎上，庶幾一轉移間，而黨之大本立矣。」中國國民黨的根基，的確因為第三國際指使中央加入，而根基動搖，才有國民黨的分裂。所謂的根基，就是在廣大國民黨員心目中的信念，這信念常常在代表他們的領袖人物的政治行為，和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的抉擇表現出來。汪兆銘在孫先生去世以後的反覆無常的動搖，就是他追逐私利而放棄理念的表現；蔣介石在中山艦事變中，已經清楚第三國際和中共之所為，但是仍然縱容包庇，使得中共的勢力隨北伐而伸延於大江南北，而且開始控制部份的軍隊。如果他的信念沒有動搖，沒有被領袖慾所迷惑，他肯定不會如此。居正對比三個中央，自然最沒有勢力的上海中

央，「源」是清澈純潔的，居正文章中洋溢出一種「安如磐石，撼之愈緊而愈堅」的自信，這是辛亥革命以來的國民黨的真正的精神所在，是正氣所存。

三、「集中黨之中心勢力。中國國民黨重心，一向集中於總理，總理逝世，自然集中於繼承的同志。平心而論，最近走武漢的汪精衛，總算是總理易簣時親近的一個人。乃私慾狹隘，我見太深，恐與一般舊同志相處，意見偶不一致，不能退個人私意，爲所欲爲。故一意左傾擁共產黨徒以自封，力排異己。果能痛改前非，未始不可招致。然觀其在武漢的言論，不爲共產黨徒所包圍，即屬執迷不悟。望其來歸，恐成泡影。此外孫科、譚延闓流亞，無足輕重。反觀南京、上海之間，中心人物，亦只有次數。而南京力以吸收武漢中央爲唯一企圖，不敢接近上海的中心人物，貽武漢以口實。善意推之，固可諒解。乃跬步自封，總不免有削足適履的痛苦。而投機跨黨者流，復施以離間挑撥，黨之中心勢力，終莫由形成。故上海中央人物，唯有力持冷靜，避免一切誤會，徐圖勢力集中，爲黨開一條生路。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愛黨愛國同志，走到路不通行的時候，亦捨此路而未由。」國民黨的幾年以來的重大問題，都是孫先生去世以後，失去領袖，失去中心而成。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像孫先生一樣，從信仰上、人格上、組織上統帥全黨。汪兆銘爲私利所蒙蔽，反覆無常，已經不可能成爲國民黨的重心人物；居正沒有提到的蔣介石，前面兩項原則之中所批評南京者，即暗中指他。他太迷信強力，強力可以得到天下，但是不能得到人心、黨心。他從黃埔崛起上海清黨，他雖然以武力獲得最高權利，但是靠的是鮑羅廷——中共的支持，並且以難量的國民黨的利益爲交換，是以國民黨的基本理念做爲代價。雖然他以北伐功高而握神器，但是他始終不能把握國民黨的黨心，所以分裂戰亂不斷。後來到了抗戰軍興，時勢造就他爲國民黨的中心人物，但是因爲他始終在德望上的不足，不能夠真正統一和團結全黨，終於被中國共產黨的計謀打敗。

該文章的結語說：「右所述之統一原則，對於或別開生面之議，較進一步；然或者由此譏愚爲膠柱鼓瑟，亦意中事。而且上海中央黨部，毫無實力可言，不爲世人注意。愚則以爲凡是一個地方，有有形的，有無形的；有形的力有限，無形的力無限。譬如空間之空氣，至無形可擬，而包括宇宙，容納萬有，力量之大，莫之或名。上海中央黨部，在混沌失去中，亦等於空間之空氣而已。我黨之統一運動，胥觀各個黨員之修養如何，修養功夫完成，即統一實現。爲期不遠，拭目俟之。」居正雖然習佛，對儒家的治國平天下學說，也有很深刻的認識，他正是立足於中國的歷史經驗來觀察當時的混沌局面，並且提出解決之道。可惜在權利追逐者衆的國民黨的上層人物中，並未引起起碼的重視。大概這裏是第一次對這篇經典文章加以引用闡發，而歷史已經過去了大半個世紀，中國早已經經歷了滄桑劇變。

居正所期待的廣大國民黨員的「修養」功夫的節節進展，自下而上地激盪出國民黨的統一浪潮，在一九二七年七月達到高潮。在七月三日，上海市民在閘北蒙古路更新舞台和天后宮橋總商會兩個地點，分別舉行「上海市民歡迎國民黨忠實同志並促滬寧兩中央黨部統一大會」。居正、鄒魯、謝持、焦易堂、覃振、何世楨、孫鏡亞等作爲來賓參加了兩邊的大會。

在閘北方面，參加者有數百個團體的代表，代表人數二十五萬左右。主席團代表致開會辭說：「今天上海市民歡迎忠實同志，並促成滬寧黨部統一大會。大眾要明白這個意思，就是三年前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北京西山總理靈前開會，議決開除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的黨籍。那時候廣東的革命策源地，已經被共產黨把持了，所以不能執行這個決議案。後來忠實的武裝同志出來北伐，節節勝利，到了南京就執行清黨，同二年前忠實的同志主張一樣。現在更進一步的說，希望上海、南京中央黨部統一起來，鞏固革命力量，打倒一切反動派云云。」在湖南代表報告湖南被共產黨蹂躪的情形以後，大會致歡迎辭：「上海市民用十萬分的熱情，來歡迎中國國民黨先覺先知的忠實同志。三年前之西山會議就是此次

清黨運動的種因。今天是論功行賞的歡迎大會，我們拿清黨運動的首功，交給『曲突徙薪』的忠實同志，我們一齊高呼着『功不在大禹下』來歡迎我們忠實同志，並希望滬寧兩中央黨部統一起來。打倒共產黨！鏟除殘餘軍閥！打倒帝國主義！」

在天后宮方面開會時，主席團報告開會宗旨說：「今日係上海民衆歡迎忠實同志，並促成滬寧黨部統一大會。來者衆多，不爲天熱所阻，足見諸君愛黨愛國之熱忱。張溥泉、謝慧生諸老同志，於三年前，即發覺共黨陰謀，實爲我小同志所欽佩。今兄弟不欲多言，函請老同志指導一切云云。」

居正編的《清黨實錄》保存了謝持代表中央黨部的答詞和謝持在兩面集會的演講、鄒魯的一次演講和焦易堂的一次演講。鄒魯的演說着重指出國民黨分裂的國際背景，他說道：「……至於俄國呢？口裏說不侵略，扶助弱小民族，解放被壓迫階級，實踐上呢？他們的侵略比甚麼東西都還要厲害。……但是中國國民黨是有主義、有政策、有方略的政黨，決非像平常的一般政黨。所以他們想要侵略中國，國民黨卻是他們的障礙物了。所以他們唯有消滅國民黨之方法，以遂其侵略野心。所以第一步就決定分裂本黨，第二步消滅國民黨，第三步併吞中國。左派、右派、新右派等，即爲分裂國民黨之最好方法，亦即消滅中國之絕妙手段。但是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西山開會，都知道有俄國的搗亂，國民革命決不能成功，所以毅然的實行清黨……。到了今天，雙方的清黨了，才有統一中國國民黨的呼聲。現在民衆要求統一，兄弟個人也是贊成的。現爲了統一之後，革命勢力就能夠集中，那麼我們所有的敵人（帝國主義、軍閥、共產黨）都不難打倒。所以統一黨部，也是本黨前途之福，也是全國、全世界之幸。所以我希望大家下一決心，一致努力着滬寧黨部的統一。」

謝持兩次演說都比較長，這裏只是摘抄第一次演說的一段，他一開始就感慨地說道：「諸位同志：今天我們環龍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及各級黨部的黨員，受你們這樣熱烈歡迎，實在

非常感謝，並且非常的慚愧。說到忠實同志，說到中央黨部統一，這二句話令人傷心感慨。中國國民黨原來是整個的，今天卻說要統一來。當然在今天以前有分裂的事實，是甚麼緣故呢？就是共產黨破壞我們國民黨，用他們分化的策略，來挑撥離間我們的同志，又用種種陰謀，妨礙國民黨的進展。……我們的同志如能團結一致，無論共產黨如何利害，也是不成問題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不能如期於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在廣州開會，是我們同志中內部危機已經動了，我們不得已乃有改在北京西山總理靈前開第四次全體會議的事。這次會議的重要決議案，很有幾個，我今天但與統一有關係的說說……。論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的決議案，黨員應該一致服從執行的，哪裏料到廣州方面的同志不能執行我們在西山開會的決議案。我敢斷言共產黨的萬惡行動，絕不會鬧到現在的樣子，就是中國國民黨本身，也絕不會鬧到上海中央與廣州中央對峙的局面。既鬧不到上海、廣州對峙的局面，又怎會有今天的上海、南京中央黨部的統一問題。兄弟說到這一點，有一句話要聲明，在廣州方面的同志，那時候實在是十之八九，都對於西山會議的決議極端表示同情的，卻是如何會鬧到今天以前的局面？這完全是汪精衛的罪惡，是共產黨把持我們黨權的罪惡，一般的廣州同志，實在是無法抵抗這兩重的惡魔罷了，這一點要請諸位明白的。但是說到兩個中央統一的問題，我們實在慚愧得很，因為自今年四月十二日收繳總工會槍械以來到現在，已經三個月了，我們着手清黨，已經三月，尚未得到兩個中央黨部統一，煩勞諸位於今天熱烈的開起促成滬寧兩中央黨部統一的大會來。諸位關心中國國民黨的事，關心國家的事，何等真切。我們實在十分感激，十分佩服，只有更加努力，才能夠勉副大家的期望。但是我們在十四年西山開會時，早已決定共產黨問題解決之日，就是本黨統一之日。……今天諸位不怕天氣，如此熱烈的開會，關心本黨統一問題，即是群眾參加革命的一種很深切的表示。我們奮鬥之餘，很希望大家負起責任，將陷在共產黨殘酷下的兩湖、江西，及在軍閥鐵蹄下的各省民衆，一齊解救出來。」

《上海市民歡迎忠實同志並促成滬寧中央黨部統一大會宣言》，是這統一運動的歷史文獻，如下摘抄直接有關統一的文字：「自共產黨寄生國民黨內，用奸險陰謀手段，分拆我同志，破壞我黨國，罪惡昭彰，罄竹難書。國民黨忠實同志目睹此狀，怒焉憂之。乃於前年北京西山總理靈前開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摘奸發覆，力主清黨。……今共產黨既經驅逐，即應速謀統一，維護重心。往者主張絕殊，今則主張己權，除武漢方面應予拒絕外，上海、南京兩中央黨部，尚復何懼何疑，何顧何慮，而留分裂之跡，真愛黨愛國者似不應出此；且黨不集中，可謂無黨，兩中央不統一，可謂無權。長此因循，則漫流所極，恐將空有黨名，將孫公以黨治國之精神，付諸東流。設不幸而至此，總理在天之靈，其何能慰。唯是統一之方，不宜偏執，尤不宜挾有私意，梗於其間。諸君追隨孫公，具有不朽之業，挾私之見，吾人固信其無。然堅執法，偏重事勢，強人從己，皆非重黨而尊人者。市民等愛國心長，所希望於中國國民黨者倍此。亟望上海、南京兩中央黨部，克日統一，以完成國民革命。其統一方法，懇請諸位從長計議，務使全黨忠實同志，無老無少，無新無舊，團結爲一，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如此庶幾處分尊事，而實力不分；應付敵人，而離間不入。否則枝葉雖繁，而根幹已腐。累卵之危，恐不只於個體而已也，是豈諸君愛國愛黨之初心哉！況今者，殘餘軍閥未除，武漢偽政府尚在，共產黨妖魔潛行活動，用其全力，破壞革命，顛覆國民黨。一髮千鈞，稍縱即逝，是在諸君圖之。」

對兩個中央黨部統一的期盼，反應了民衆對於政治家的無私品德的要求。提出要求的本身，就反映出民衆對於政治家「爲私」的不滿。共產黨問題能夠引起國民黨的分裂，在實際上是孫先生去世以後，群龍無首，主政者私慾大發而成。有了汪兆銘、蔣介石私慾大發的内部原因，才給予鮑羅廷——共產黨以利用機會，才造成了中國國民黨無可估量的喪失。這份宣言警告國民黨內領袖們不要爲私，「否則枝葉雖繁，而根幹已腐，累卵之危，恐不只於個體而已」。這些鏗鏘之言，能夠打動被私利所蒙蔽的領袖人

物嗎？

基層國民黨員和民衆推動的統一運動，加上南京本身需要聯合西山會議的上海中央黨部的形勢，才使得滬、寧的統一提到了日程上。

南京雖然被革命軍掌控，在國民黨內有歷史威望的胡漢民、鄧澤如等到達南京加強了國民黨中央的力量，但是地位仍然很不穩定。

在軍事方面：北方軍閥張作霖在日本支持下，加上吳佩孚、孫傳芳的殘餘力量，仍然不可忽視；在武漢所屬的唐生智率領三個軍，加上張發奎部隊，在五月下旬佔領河南，與馮玉祥於六月一日在鄭州會師，武漢的諸要員汪兆銘、譚延闓、孫科於六月六日在鄭州與馮玉祥會談，聲勢浩大。當時的斯大林對此抱着極大希望，因為控制着北方，就非常易得到蘇俄的軍火和各種支援。但是武漢國民政府將剛剛得到的河南地盤交給了馮玉祥，因為武漢「後院起火」，持反共態度的軍人夏斗寅、楊森等進軍武漢，唐生智不得不撤回湖北。因此擁兵二十萬的馮玉祥成了舉足輕重的力量。他雖然很快出賣武漢，與南京諸要人在徐州會面，但是他對與寧、漢的全面對立採取坐觀虎鬥，準備收漁人之利的態度；武漢的唐生智部隊是國民政府的基本支柱，隨時準備對付南京；譚延闓素來見風倒，他被推舉為武漢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主席，他遙控着第二軍，第二軍的部份軍隊在南京附近，該軍政治部主任是中共黨員李富春；第三軍軍長是朱培德，武漢爲了拉攏他，將江西省長等寶座給了他，趕走了忠於南京的李烈鈞；第六軍的軍長是程潛，政治上接近武漢政權，並且政治部主任是著名的共產黨員林祖涵；就是在反共的國民黨內部，李宗仁也不滿意蔣介石對待西山會議諸元老的态度。

外交方面：「三月二十四日的『南京事件』尚待了結，英、日各國的兵艦雲集寧滬之間，而日本更出兵魯境，替北京的軍閥政府保鏢；蘇俄自然是支持武漢，仇視寧方的；英國暗中對華中華南的殘餘軍

閥實力吳佩孚、陳炯明、孫傳芳之流，隨時贊助掩護。在這種內外形勢之下，寧方既不能悉索敝賦，大舉北伐，藉以緩和內部糾紛，消除危機；又不能進軍武漢，掃蕩共產黨巢穴，統一革命陣營。唯一要務，必須先使分崩離析的國民黨陣營團結起來，共圖善後。」①

寧方左手要清除共產黨，右手要打擊西山會議，同時還要對付北方軍閥和武漢方面的敵人，就很困難。

南京的困境，使得滬、寧的統一運動開始實際地進行。

在南京的胡漢民、張靜江、蔣介石對上海發出了友好的談話以後，從日本歸國的張繼到達了南京，雙方統一的協商立即開始。鄒魯《回顧錄》記述道：「我們上海中央的成立，其主要目的全為清黨，曾疊向粵方中央（寧漢中央黨部的前身）各同志表示：共產黨脫離本黨之日，即黨務歸於統一之時。……旋寧方中央黨部成立，而各方同志，以寧、滬一致清黨，黨務應該統一，於是提議寧、滬合作。寧方中央執監委員，如胡漢民、吳敬恒、李石曾、蔡元培、蕭佛成、古應芬、鄧澤如、丁維汾、葉楚傖諸先生，聯名函約滬方同志往寧，以瞻望總理墓地為名，實則謀黨務的統一。我們亦以非正式手續，提出前章所敘述的（一）、（二）、（三）種辦法，和寧方同志相商。這時張繼先生由日返國，前往南京。在他返滬的時候帶來了胡、吳、李、蔡、蕭、古、鄧、丁、葉諸先生的覆函。以上諸先生在函中雖沒有完全署名，但在函末聲明，某某因事未到，故未署名，而對於函中所說的一切，悉表同意。他們主張以最無痕跡的辦法，來實現黨務的統一。這就是採用我們第三項辦法，由寧、滬中央黨部各舉出相等人數，籌備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函末並說，若滬方同意，請即派人赴寧，協商進行。滬方即派覃振、劉積學諸先生為代表，偕同張繼先生往寧。到後寧方胡、吳諸先生對統一辦法，意見仍屬一致，唯云俟蔣先生回寧參與，即可見諸實行。乃蔣先生自前方還京，遽行宣告下野，寧、滬合作的協商，因此中斷，但寧、漢、滬的合作，

已經在醞釀之中。」②

李雲漢根據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保存的上海中央黨部的記錄原件，在《從容共到清黨》中，就上海中央向南京中央協商的五個條件寫道：「張繼回滬之後，遂於七月七日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臨時會議（按：《清黨實錄》只保存了前三次臨時會議的記錄），決定與南京協商統一辦法五條：（一）本中央與南京中央協議統一；（二）雙方推舉同數委員組織委員會籌備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三）接洽進行事宜推舉委員若干人負責辦理；（四）接洽委員於協議籌備委員會之職權時，須注意清黨及改組時各級黨部事宜；（五）推舉張委員繼、覃委員振、劉委員積學三人為接洽委員。張、覃、劉旋即相偕赴寧與胡漢民、吳敬恒等磋商，已有成議……。」

中國國民黨的大團結終於在望了。

註釋：

- ① 《三十年動亂中國》第八〇頁，崔書琴著。
- ② 《回顧錄》，鄒魯著。
- ③ 《從容共到清黨》第七五九至七六〇頁，李雲漢著。

二十七、特別委員會始末

在滬寧合作接近完成的時候，形勢發生了變化，武漢汪兆銘開始清黨，南京蔣介石下台。

一貫爲了權利投機取巧的汪兆銘對於他的轉變，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在廣州中山大學以《武漢分共經過》爲題，講述他的分共反共，是由於第三國際要中共組織黨軍等原因。他說，第三國際代表魯易給他看了一份莫斯科的指示，共五點，第一點是要讓農民運動完全脫離國民黨。第三點是要在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增加共產黨人的名額。第四點「要武裝二萬C.P.黨員，並挑選五萬農工分子武裝起來。他說的農工分子其實也即是共產分子。第五點是要國民黨領袖組織革命法庭，來裁判反共產的軍官。這是要國民黨領袖替共產黨做劊子手，來自己殺自己。」魯易因爲向汪洩密而被鮑羅廷驅逐回俄國了，汪感覺到中共革命革到自己的頭上，因此開始反共。但是他仍然對中共抱着幻想，他只是開始分共，即讓共產黨撤出在國民政府擔任要職的共產黨員，但是並沒有在國民黨內驅逐共產黨；而且仍然鼓動討伐南京的東征；在國民黨中，中共黨員仍然佔據重要位置，除了衆所週知的葉挺、賀龍等以外，著名共產黨員惲代英仍然是張發奎的參謀總長，等等，汪仍然繼續包容。胡漢民因此著文批評汪的武漢分共是「偽裝」。直到中共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武裝暴動，汪兆銘才說「國民黨不得不由和平分共而進於嚴厲的驅共了。」①南昌暴動使得汪非常狼狽，他給武漢中央常務委員會的報告近乎謾罵：「這種狼心狗肺的東西，我們再說優容，我們就是叛黨！這種叛徒，我們要用對付敵人的手段對付，捉一個殺一個。同時我們要自請處分……。」②中共幾乎斷送了一心一意與它合作的汪的政治前途，所以汪恨

之人骨。

事實上不僅僅如此，還有不得已的原因。這就是馮玉祥政治態度的轉變，並且對武漢政權加以壓迫，以及武漢所統率的軍隊的反共行動。

馮玉祥的強大，全靠的是蘇俄的武器裝備，但是馮並不忠於蘇俄——中共，他有自己的野心。他不費吹灰之力而從武漢手中取得河南省以後，統領重兵的他，對於武漢政權已經到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他發現國民黨的黨心，國民黨的軍心、全國的民心，都不可能使得共產黨人取得勝利，例如武漢國民政府將河南省交給他，是因為唐生智部隊內部的反共風潮汹涌澎湃之故。所以他向武漢提出近於勒索的無法辦到的條件，然後倒向南京。桂崇基寫道：「會後（按：指六月十日馮與武漢要人汪、唐、張在鄭州的會面），馮玉祥又與南京方面接洽，部署徐州會議。遂致電武漢政府，請發步槍十萬枝，槍彈五十萬發，大炮五百門，現款二千萬元。汪兆銘得電，謂武漢政府所屬全部軍隊也沒有此數，至於現狀，只有印刷機一部。馮明知武漢政府無此能力，只是以之作爲赴徐州的藉口。馮玉祥態度的轉變，確與金錢、官爵有莫大關係。緣武漢政府曾允許每月協助馮部經費六十萬元，但馮從未得到分文，以致於其所寄存庫軍械無錢起運。雖陳獨秀以中共領袖資格去函鮑羅廷，代其說項，亦僅得十萬元。於是馮於取得河南地盤之後，乃轉而與寧方聯合。馮由鄭州起程，蔣總司令迎之於黃口。六月二十日及二十一日舉行徐州會議，出席者，除蔣、馮二氏外，有胡漢民、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李烈鈞、吳敬恒等。這種堅強陣容連袂前去，一則表示重視馮玉祥，二則表示寧方人物皆與國民黨有深切關係，只有寧方才能真正代表國民黨。會議由吳敬恒主席，決議聯名通電北伐，並由馮促請武漢政府克期解散。同時，蔣總司令亦允許每月助馮部軍餉二百萬元，將來並畀予軍政部長之職。於是，馮自徐返鄭，遂致電武漢政府。」

③這電報的基本內容是譴責農工運動，要求將鮑羅廷解職等等，這是要求武漢在政治上進行根本的轉

變，完全放棄與中共的合作政策。

當時第三國際出於斯大林的企圖，想要通過馮玉祥對北方的控制，打通與蘇俄的直接聯繫的通道，故馮玉祥的反叛對蘇俄——中共的打擊極大。另外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沒有領導中國奮鬥的歷史，沒有可以被廣大中國人所認同的理論，所以中共只有依附於國民黨而發展。雖然國民黨內的汪、蔣為中共創造了發展的空間，但是他們畢竟是國民黨人，蔣介石在上海的「四·一二」清黨，使得蘇俄——中共開始失去了重要憑依。中共真正唯一的力量來源，就只能夠是從根本上動搖整個傳統社會根基的農民運動。先有彭湃在廣東，後有毛澤東在湖南掀起了暴力的急風暴雨。但是，中共在武漢政權的失敗，又與這底層的暴力運動直接關聯，因為在湖南、湖北的暴力運動中深受傷害的，還有軍隊的家屬。何鍵統率的三十萬軍多是由湖南人組成，夏斗寅統率的獨立第十四師就是由湖北人組成，他們的反叛使得武漢政權失去基本的支撐力量。夏斗寅的反叛通電就道出了湖北農村的破壞情況和軍隊反叛的道理，通電說：「斗寅等以耳目所及，僅就我鄂人所受之痛苦言之：我鄂人久處軍閥鐵蹄之下，民衆焦悴於虐政者，已非一日……。而共產黨徒……把持政柄，操縱時機，以法律賦予威權，為個人報恩抱怨之具，不悉官吏為何物，政治為何事，謬託邪說，黷敗綱常，舉凡軍閥所不敢為之箝制輿論而悍然為之，軍閥所不忍行之苛捐細稅而毅然行之，縱奸僧橫行市場以害商，教流痞擾亂里閭以病民，誅鋤非種，強姦民意……故數月間商嘆於市，農怨於野，百業蕭條，遊民日衆，四境騷動，皇皇然如不可終日。本謀解放，反加之以痛苦；本求平等，反益之以不平，此誠有史以來未有之奇變，而為我北伐軍始願所不及也。……竟致此極，不獨影響我北伐大計，而我將士、我父老昆季之環泣於斗寅等之左右者，亦戶限為穿。如再因循，勢必至水益深火益熱，而北伐終不竣工，而軍閥終難消滅。斗寅處此，忍無可忍，只有率我將士為民請命，班師東下……。」④這通電在五月十三日發出，到了五月十八日，駐紮在宜昌的夏斗寅師迅速進軍

至武漢附近的紙坊，武漢政府爲之極大震動。

與之一同行動的，有楊森統領的川軍第二十軍。楊森在台灣著的《九十憶往》記述：「當時，爲加強與中央聯繫，余復派遣前四川政務廳長陳抱一同志常駐南昌，與蔣總司令請示，期能秉承中樞旨意而行。同時，國民黨西山會議派中堅謝持同志，與共產黨鬥爭尤烈，特派石青陽、黃復生、盧師諦同志，亦蒞本軍，磋商清黨辦法。」石青陽是參加西山會議的中央執行委員；黃復生在辛亥革命以前與汪兆銘一同炸滿清的攝政王而名滿全國，是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老資格的盧師諦因爲聯絡滇軍驅逐陳炯明有功，曾經被孫先生任命爲第八軍軍長，與謝持交誼極厚。

何鍵統率的反共軍隊在出發去河南之前，曾經拒絕登車；他部的許克祥團長曾經在五月二十一日發動「馬日事變」，對於長沙的農工暴力運動予以鎮壓；六月二十九日，何鍵以軍長地位發出反共訓令，主張驅逐中共，實現三民主義。何部是唐生智部隊的主力，對局勢頗有影響。

正是馮玉祥與南京的聯合，加上兩湖的軍隊倒戈反共，使得武漢政權沒有辦法存在下去。但是汪在七月十五日主持的中央常會擴大會議所作的決定，仍然對中共分而不反。直到八月一日南昌的槍聲響了，汪兆銘才決心反共。很明顯，汪的立場的轉變，完全是被迫，是自己的個人前途到了山窮水盡，而非出於中國國民黨的利益和國民革命的前途。他雖然反戈一擊，國民黨的元氣已經大受損傷了；他所包容的中共軍隊，在南昌暴動以後，火種就沒有熄滅，直到抗戰以後摧毀中華民國的國家軍隊。

汪兆銘的這筆賬，以後他只是幾句話帶過，沒有人去清算。如果不是汪後來成爲大漢奸，也會掩蓋若干年代；蔣介石扶持中共的這筆賬，則至今仍然疑雲重重。國民黨的歷史自此以後以蔣介石爲中心來書寫，就沒有立足於百姓福祉上的正義是非可言。沒有是非的時代，就再次造成思想真空，爲中共的意識形態的全面傳播創造了條件。

在武漢開始分共和醞釀清黨的時候，上海中央黨部由與汪兆銘有交情的許崇智派出代表至漢口，商量滬漢合作事宜，曾經得到汪的覆函。由於蔣介石在這時候下台，寧漢合作的障礙已經掃除，於是上海中央黨部提議南京、上海和武漢的三個中央黨部的大聯合，經過三方磋商，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

中央特別委員會的成立，是中國國民黨因為聯俄容共以來的分裂狀況的結束。在後來糾紛重新開啓的時候，曾由上海中央的幾位負責人聯合敘述其成立經過，現將這份經典文獻摘抄如下：

「中央特別委員會之成立，雖由滬寧漢三方之合併，最初只有寧漢合作之議；及武漢清黨，乃由漢滬合作之議，終於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其經過有足述者。……當武漢醞釀清黨，滬方同志即由許崇智派人耑赴漢口，催促實行，並商黨務統一辦法。隨得汪精衛同志覆函，主張滬漢合作，提出意見兩點：一、漢滬同志開預備會，充分交換意見。二、漢方開第四次執行委員會，請西山會議諸同志參加工作，聲明除中央黨部須俟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外，其餘各機關一律均可參加。當時滬方同志覆汪函，對於第一點預備會完全贊成，並要求寧滬漢三方合作，以謀本黨同志大團結為主旨。而認為第二點不當，故覆函中並不提及，但另提出前與寧方協同之三種辦法向汪精衛同志協商。嗣蔣介石同志下野，寧漢合作之議亦起，譚延闓、孫科二同志以代表漢方同志資格，由潯而寧而滬，為漢寧滬合作之進行，在滬與某等進行疊次談話，均主張集合漢寧滬三方同志，徹底研究大團結辦法。譚、孫來寧，亦偕汪精衛、李宗仁、朱培德、李烈鈞諸同志再來滬，于右任、程潛兩同志相繼至，集合漢寧滬三方代表協商。初則分頭接洽，各方一致，乃於九月十日下午，在武定路鴻慶里張靜江同志家，商定次日開正式談話會。九月十一日上午三方代表到會，推譚延闓同志為主席，以莊嚴之儀式，宣告開會，恭讀總理遺囑，開議辦事，議決各案如下：

（甲）關於黨務者

一、組織特別委員會，統一黨務。

二、特別委員會由寧漢滬推出若干人組織之。

三、漢寧滬三方將其職權委託於特別委員會。

四、特別委員會除行使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職權外，應負責統一地方之中國國民黨黨部，並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最遲十七年一月一日開會。

五、特別委員會委員三十二人，候補委員九人，三方共同推出，寧漢兩方面將全體人名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會議發表之，上海中央黨部亦同時將全體人名發表之。

六、中央各部長人選，由特別委員會決定之。

(乙)關於政府者。

寧漢兩方面政府之合併，及改組方法並人選，如一、政府委員，二、各部部长，三、軍事委員會委員，由特別委員會決定之。

(丙)統一宣言，推汪精衛、譚組庵、蔡元培、謝持起草。

是日爲正式談話會之第一日，應注意之點有三：

(一)公約所商事件，其決定方式不取表決手續，以全體一致爲定，免有多數壓少數之嫌。凡議一事，如有一人提出異議，即再討論，必以無一人異議始止。此公約不特此次談話會始終依據之，即中央特別委員會至今猶守此公約。

(二)討論(甲)之五項時，原草案係「寧漢兩方面將全體人名由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之」，而寧方同志以不承認漢方第三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故，因之不能承認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張寧漢分別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兩方同志相持甚烈。後刪去第四次字

樣，改由臨時會議發表之。決定以後，李石曾同志仍請求保留，待至次日決定，以便退商於未列席之寧方同志。次日即九月十二日繼續開會，李石曾同志報告寧方同志意見後，始如上文決定。是第四次中央全體執行委員會，寧方同志堅不承認，而漢方同志之代表已不復爭持，此即某等書云互相退讓互謀補救之一事也。則今日猶高唱所謂第四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者，何嘗真爲黨爲法統之爭，實則別有用心而已。

(三)宣言起草委員四人，又互推汪精衛同志起草。

九月十二日開第二次談話會，除決定昨日(甲)案第五項外，推定特別委員及候補委員，漢方推出特別委員譚延闓、孫科、何香凝、于右任、朱培德、程潛；候補特別委員……。寧方推出特別委員李宗仁、李煜瀛、蔡元培、王伯群、伍朝樞、李烈鈞；……。滬方推出特別委員林森、許崇智、謝持、居正、覃振、鄒魯；……。滬寧漢三方公推特別委員汪精衛、胡漢民、張繼、吳敬恆、戴傳賢、蔣中正、唐生智、馮玉祥、閻錫山、楊樹莊、李濟琛、何應欽、白崇禧。又特別委員二十名，候補特別委員九人，均一致通過。

是日談話應注意之點有二：

(一)漢方所推特別委員、候補委員各名單，係汪精衛同志親筆寫錄所提出。

(二)會畢時，汪精衛同志特向蔡元培、謝持說明伊起草宣言大意。

九月十三日，第三次談話會決議案如下：

……

上列三次談話會，列名者爲汪精衛、于右任……等，聚漢寧滬三方面代表同志於一堂，正式討論三日，結果至爲圓滿，遂一致於九月十四日專車赴南，十五日漢寧兩方同志在南京成賢

街中央黨部開中央執監委員會臨時會議，滬方同志在南京紫金山總理墓地開中央執行委員會，

分頭一致，將三次談話會之結果，正式決議通過，同時發表，特別委員會是焉產生。^⑤

寧方的主要人物、特別委員會和國民政府的常務委員之一的蔡元培，曾經敘述特別委員會的經過，以下抄錄一小段於後，以與以上西山會議諸公的敘述相證。一九二八年十月的《國民革命軍日報》登載蔡元培的有關特別委員會的演講，他說：「今日最重要的問題，厥為寧漢合作組織之特別委員會，各同志不知真相每每以為疑問。當未合作之先，上海有中央黨部，南京有中央黨部，漢口亦有中央黨部；南京有政府，漢口亦有政府……乃漢口政府大倡東征之議，調派軍隊，潛行東下。南京方面，不得已將前線北伐軍隊，抽回抵禦，遂至徐州蚌埠各處，得而復失，北伐事業因而停頓。其時馮玉祥同志，在鄭州會議，漢口方面有人報告：在漢第三國際黨員秘密會議，實行消滅國民黨，汪同志本欲國共兩派聯合，現知已無希望，痛哭流涕，自恨上當。……及後孫哲生、譚組庵兩同志來寧，始知彼方並無大軍東下，李宗仁同志又親赴江西，彼此誤會，完全消釋。孫、譚兩同志到寧後，又來上海，商議數次，其時最難的問題是開會，漢方之意欲開第四次會議；承認第二、第三兩次會議議案；寧方同志不贊成，在戈登路伍同志宅中，開臨時談話會，議決彼此同志一致團結，漢方寧願犧牲其第四次會議之主張，遂定為特別委員會，由寧漢滬三方面，各舉委員六人，候補三人，以組織之，而委員人選，亦幾經考慮，並除去共產分子，於是兩方面合作問題解決，此組織特別委員會之經過情形也。現在尚有二事大家各宜注意：一、國民黨員受共產之催眠。二、共產黨之煽惑。因共產黨口號，專打西山會議派，謂該派同志，與軍閥無異。……」⑥蔡的講話雖然側重點不同，事情經過的敘述是一致的。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寧滬漢的分裂局面正式結束。據《中華民國史實紀要》記載，在當天的成立大會上作出七項決議，第五項是：「推譚延闓、于右任、張人傑、李烈鈞、張

繼、謝持、李宗仁、白崇禧、程潛、楊樹莊十一委員共同協商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人選。」

由汪兆銘、蔡元培、謝持起草，並經三方面通過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宣言》在九月十七日發表，這應當是全黨、全國所期望的大會，主要部份如下：宣言回顧了從興中會、同盟會以來的歷史，提到自容共以來國民黨分裂成三派，都是共產黨引起的：「中國共產黨加入本黨，亦曾鄭重聲明：只以各個人之資格，服從國民黨之主義，故皆信之不疑。不意總理竟於十四年三月棄我等全體黨員而溘世，中國共產黨黨員遂乘此機會，漸試其篡黨之手腕。是時有一部份這一執行委員已窺破彼等之伎倆，協謀加以制裁，爰是年十一月在北京西山總理殯舍前，為清黨之會議；而留粵諸同志以篤信總理容共政策之故，對於提議制裁之諸同志，不能採取其意見；於是此一派反共之同志，不得已而在上海召集代表大會，別舉執監委員，組織中央黨部。此粵、滬兩黨部對立的原因，全起於容共反共之不同者也。既而北伐進展，粵方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隨北伐之勝利而第次北遷，先抵南昌，次蒞武漢。當是時也，共產黨陰謀利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之掩護，包辦民衆運動，勾結地痞流氓，激起各地之騷擾。多數監察委員認為黨國危機，間不容髮，爰警告各地忠實同志之執行委員，請以非常手段制止共產黨餘附共者破壞國民革命行動。於是粵、閩、江、浙諸省同時清黨，本總理遺志建立中央黨部於南京。此寧、漢兩方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對立的原因，亦全起於容共與反共意見上有不同者也。未幾，武漢諸同志發現共產黨消滅部黨同志之陰謀，認為與總理容共政策已根本不相容，遂於七月十五日在湘、鄂、贛三省厲行清黨。於是吾中國國民黨一致採取反共政策，別無何等不同之意見，當然無復有同等機關對立的必要。於是乃約集三方同志，推誠協商，而有組織特別委員會之建議，並定於南京各開中央執監委員會臨時會議以決定之。今臨時會已一致可決，推出委員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行中央執監委員會職權，改組國民

政府，並於三個月內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而從前峙立之三黨部均不復行使職權，從前三方面互相攻擊之言論，皆成陳蹟，不得復引爲口實。本會受任以後，誓恪遵總理遺訓，服從全黨公意，一方面繼續清黨，不使全黨中有一不忠實之黨員得側身其中；一方面繼續北伐，期於最短期間完成中國之統一，以求三民主義之實現，拯全國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全吾黨之天責。謹此宣言，尚希公鑒。」⑦

九月十七日，特別委員會舉行第二次會議，確定國民政府委員及常務委員。鄒魯著的《回顧錄》中記述道：「當特別委員會成立之前，滬方同志曾發表宣言，表明只辦黨而不問政府的態度；所以國民政府成立之初，滬方同志都不願加入。後來程潛先生不贊成這種狹隘的主張，並且說：『若不參加政府而只參加黨務，還不能表示吾黨的大團結。』同時大家也勸滬方同志加入國民政府。滬方同志覺得再堅持下去，反流痕跡，所以居正、覃振、許崇智諸先生和我四人，便被推爲國府委員。至於政府各部會和機關，滬方同志還是一律沒有參加。」⑧國民政府的常務委員五人是汪兆銘、胡漢民、李烈鈞、蔡元培、譚延闓。西山會議諸人也沒有參加。

關於汪兆銘對特別委員會中的贊成態度，鄒魯在《西山會議》一文中記述道：「孫科同志提出特別委員會之前，在武定路張人傑同志家中，還有一段談話商量統一黨的辦法，汪精衛同志是一致的，孫科同志不過將這次談話寫出來罷了。十一日第一次談話，孫科同志提出來，大家討論了幾個鐘頭，汪精衛同志發言最多，並沒有爲特別委員會『氣極』、來『退席』，更沒有『離開了上海』。第二十日仍然出席，漢方提出特別委員譚延闓、孫科、何香凝、朱培德、程潛、于右任六人，候補委員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三人，清清楚楚由汪精衛同志親手交出所寫的名單。聞說孫科同志等並沒有事前曉得。這樣說來，特別委員是汪精衛同志確確實實贊成的，進一步來說，是汪精衛同志主張的。據李宗仁同志發表談話說：『當時我（李宗仁自稱）對於特別委員會之產生，非常懷疑，因恐以後黨中以此爲藉口，乘機加

以攻擊。在武宅談話會我問汪氏，假使有人反對特委會，我們如何對付之？汪氏即爲我解釋，現在特別環境之下，可少顧法律，促進事實。現在寧漢由破裂而合作，同時西山會議諸同志反共最先，寧次之，武漢同志檢出共產黨陰謀證據後，始行清黨。三方目的可謂一致，現在聯合，可用特別委員會辦法以聯結之。……特別委員會之產生，有前例可據，廖仲愷被難時，亦曾組織特委會，以行使中央職權，有三月之久。現既在特殊環境之下，特委會之產生，當然無可疑義。」⑨

特別委員會的出現是眾望所歸，是自下而上的統一運動，和上層滬、寧、漢三方面的領袖們平和的協商所至。當時除了團結統一之外，實在不可能有其它的任何代替者。崔書琴評論道：「三天會議出席人員的陣營，除胡漢民、蔣中正未預會外，所有國民黨資歷較深、名望較著的人物，可說都已聚齊，其未到會的文武要員，亦皆推任爲特別委員了。再看其黨政問題的決議案，落落大方，平允通達，完全是以大團結爲主旨的。在第一次談話會中，且規定不用投票或舉手表決方式，遇事須得全體一致同意，如有一人發生異議，應再討論，必須毫無反對者，始成定案，以免有多數壓迫少數之嫌，辦法殊爲民主。」⑩國民黨史專家李雲漢評論道：「中央特別委員會的成立與國民政府的改組，表面上結束了自民國十四年底以來之分裂狀況，使寧滬漢三方面集合組織此一新的領導機關，藉以消除各方面的歧見，使能在安定的狀況下過渡到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產生新的中央執監委員會，倡議者的用意固非不善，但由於特別委員會本身存在着無法克服的困難，因此無法達成黨務的統一與團結的任務。」⑪這些無法克服的困難是甚麼？

一、這是北洋軍閥的末日已經到了，取代者當然是國民黨的基本環境。底層的國民黨員仍然保持着純潔的實現三民主義的理想，這是他們推動統一運動的原因；但是上層的國民黨的領袖人物，在即將執政的環境中，其中的部份已經開始被權利所腐蝕，他們追逐的是國家的權利，是「皇帝」夢，手中的一

切一切都是爲了奪取權利的需要的利用，包括他們叫得響亮的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所謂特別委員會的法統有問題，不過是權利爭鬥的藉口而已。

二、如李雲漢所說：「未能獲得寧方實力委員與元老委員的諒解與支撐」，這實力委員是蔣介石，元老委員是胡漢民。蔣介石是在滬寧兩個中央黨部的協商有成果的時候，在八月十三日發表長篇通電宣佈辭職；九月二十二日，自寧波到達上海，胡漢民、吳敬恒、何應欽的先後勸阻無效，於九月二十八日離開上海，並於次日到達日本長崎，聲稱要作一年以上的世界之旅行。他雖然下野，黃埔系的何應欽仍然掌握重兵，與他同進退的政治人物仍然保持着極大的政治影響力。特別委員會是在九月十六日宣佈成立的，上海、南京與寧波相隔咫尺，蔣介石這位最有勢力的人物顯然故意置身特別委員會之外。

當蔣介石宣佈下野的時候，寧方最重要的人物胡漢民、吳敬恒、張人傑、李石曾、蔡元培宣佈與蔣介石同退，但是寧方的代表蔡元培、李石曾仍然參加了特別委員會的重要領導工作。胡漢民則是討厭汪兆銘而拒絕支持特別委員會。《李烈鈞評傳》的作者寫道：孫科、譚延闓等「九月五日乃前往上海，請胡參加十五日南京大會。胡指責武漢容共賣黨，無資格參與全會，彼此不歡而散。不久，汪兆銘等人也抵達南京，聞孫等在滬疏通無功，決定親自訪胡。十日，烈鈞等人同去，胡閉門謝客。寧、滬、漢三派在上海連開三天的談話會，以消泯黨中現有派系，而代以新的機構。」^①胡漢民的原則性強，並且保持着革命時代的高尚政治品德，但是在此時，爲了全部國民黨的大團結，是否應該有更多的包容做法，值得研究。因爲如果胡漢民支持的話，特別委員會的前途也許不同。蔣和胡都從寧方退出，寧方代表的權威性就大大減少，特別委員會的權威性也就受到了影響，就禁不住有勢力的汪的大力反對了。

汪兆銘等反對破壞，是特別委員會不得不結束的主要原因。因爲汪不是孤家寡人，擁有重兵的唐生智和張發奎，是汪的重要支持者，使得他可以呼風喚雨，可以掀波湧瀾。在即將變成中國的執政者的國

民黨的面前，在即將到手的權利面前，權利的爭奪成了政治的實質內容，因此在特別委員會的聯合而又爭奪的本身，就是勢力的較量。真正有本錢進行較量的，只有擁有軍隊的蔣介石和汪兆銘。汪在特別委員會期間，除了拜訪胡漢民被拒外，寧方的委員也給他冷遇，使得他根本不可能像在廣州和武漢那樣，能夠佔據國民政府主席的高位。

特別委員會和國民政府，都沒有設立主席的位置。特別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會由漢、寧、滬三方組成：汪兆銘、蔡元培、謝持；國民政府由寧漢兩方的五個常務委員組成：胡漢民、汪兆銘、李烈鈞、蔡元培、譚延闓。汪擔任了兩個常務委員職務，但是汪不能滿足。另外在實際上，以上的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之中，胡漢民沒有參加，其他的李、譚都只在軍、政界有經驗和基礎，蔡一直在教育界，汪本來可以有作為；在特別委員會的常務委員中，則不一樣。謝持除了在孫先生的非常大總統期間曾經擔任過秘書長外，從中國國民黨成立起到改組，都是專門的黨務部長直到改組，在一九二三年還擔任過大半年的代理總理職務，黨內的根基是汪所不能比的。並且由三方面八個人所組成的組織委員會中（汪兆銘、吳敬恒、王崑崙、茅祖權、潘雲超、景定成、陳樹人、謝持），謝持被公推為組織委員會主任，這就更使汪大大失望。汪在武漢就兼任組織部長、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

由汪親自書寫宣言的墨跡未乾，汪兆銘立即舉起了反對特別委員會的大旗。「武器是甚麼？是所謂特別委員會的合法與否的問題。」汪在寧方的反對下，在談話會上曾經取消了召開四中全會的主張，可是一到武漢，又堅持召開四中全會，並且用來代替特別委員會。因為武漢的三中全會是以他來主導的，他想要繼續扮演這一角色。但是他的所謂法統問題根本是站不住腳的。

根據陳公博著《苦笑錄》，在第二次談話會結束的當天晚上，他反覆向汪兆銘陳述特別委員會的不是之處。次日漢方在宋子文寓所商議，主張成立特別委員會的譚延闓、孫科與汪、陳等爭論激烈，不歡

而散（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汪於是立即與陳、顧一道離開上海。汪在離開上海以前，發表了聲明，稱「自疚對餘共產黨，防制過遲……幸各方同志，共圖建設，庶幾破碎之局，可歸於完整。正宜及時隱退，聽候處分。」說出這番動聽的話以後，即往廬山休息。但是他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和他一同離開上海的陳公博即往廣州，運動張發奎反對特別委員會；顧孟餘則往武漢和唐生智洽商，成立武漢政治分會，發出聲討特別委員會的護黨通電。崔書琴評論道：「唐生智是在民國十五年春才加入國民黨的，黨齡不到三年，居然捐起『護黨』的旗號，指斥由多數同盟會老黨人聯合組織的特別委員會為『篡黨』，不僅是開黨爭的惡例，亦復滑稽可哂。」汪兆銘在廬山期間，特別委員會爲了合作，派出重要人物許崇智、居正、伍朝樞、孫科、譚延闓到廬山勸說他，還到武漢訪晤唐生智。居正《梅川譜偈》記述：「七月間，偕許汝爲、伍梯雲至廬山，晤汪精衛，漢口唐生智。」李雲漢根據當時文件記載，在武漢的會晤達成了多項協議，汪也準備返寧。但是由於南京已經決定討唐，於是汪赴粵，依靠張發奎，與陳公博、何香凝舉起反對特別委員會的旗幟。

對於汪的反覆無常，鄒魯有生動的敘述：「特別委員會成立的時候，在南京看見汪精衛一電，大意是說『破碎之黨，歸於完整，他隱退了』，當時我還覺得平平的。忽而聽見汪精衛到了廬山，忽而聽見顧孟餘到了武漢，忽然聽見陳公博、甘乃光到了廣東；顧孟餘到了武漢後，忽而聽見武漢突然成立政治分會，忽而聽見武漢反對特別委員會，忽而聽見汪精衛到武漢，解釋特別委員會是有先例的，忽而聽見汪精衛提出開所謂第四次全體執行委員會，來追認特別委員會；陳公博、甘乃光到廣東，忽而盤桓閩、浙邊境的葉挺、賀龍到了潮汕，忽而奉命追擊葉、賀共軍之張發奎、黃琪翔，由韶關到了廣州；忽而廣州擁護特別委員會民衆大會奉命從緩舉行；忽而廣州盛唱打倒特別委員會，忽而汪精衛由武漢到了上海，忽而汪精衛由上海到廣州，主張開所謂第四次全體執行委員會，取消特別委員會，忽而聽見汪、蔣

合作，忽然聽見汪精衛偕李濟琛來上海，忽而聽見張發奎、黃琪翔襲擊黃紹雄、黃埔軍官學校，乃各機關等，佔領廣州；忽而聽見廣州爲共產軍佔領，宣佈共產；忽而聽見張發奎、黃琪翔打退共軍，復佔廣州。事實離奇，就是看影戲亦看不到這樣變化。綜算起來，自然以汪精衛爲主角……。他們對於特別委員會，初說『完整黨務』，繼說『從前有先例』，再說『要開所謂第四次全體會議來追認』，四說『要開所謂第四次全體會議，取消特別委員會』。……特別委員會成了萬惡。特別委員會所以成如此萬惡，輕輕的又移到西山會議派身上，說是西山會議把持特別委員會，西山會議腐化特別委員會，又要拿來做廣告，真像萬惡似的。』

孫先生在世之時，就從來受到北洋和桂系軍閥的壓迫，又受到陳炯明的壓迫，只有鄧鏗和粵軍總司令許崇智聽命於他；他去世以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立即面對的仍然是軍人干政：汪兆銘——中共能夠在組織上打擊西山會議，就是由於有軍人蔣介石的支持；中山艦事變後，汪被趕走到法國，也是軍人蔣介石所爲；如今汪能夠反對特別委員會，還是軍人唐生智、張發奎根據汪之命興風作浪。由三方中央執行委員會所組成的最高權力機關特別委員會，在軍人的反對下，也就困難重重了。從西山會議召開的時候起，就是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到了特別委員會，本來以爲可以恢復黨的最高權力機關的權力了，又出現政客操縱軍人反對。

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舞台，實際上的主角都是軍人：袁世凱、北洋軍閥、蔣介石、毛澤東。這是中國社會的魔影，是中國政治的悲劇。

在汪兆銘依靠唐生智、張發奎這些軍人反對特別委員會，重新造成了國民黨的分裂的時候，寧方的勢力人物蔣介石忽然於十一月十日由日本回到上海。蔣介石一到上海就發表聲明，希望與汪兆銘合作，他根本不提及特別委員會，也不提及西山會議的諸位元老；當天還致電汪兆銘，邀請他赴滬商談黨務；

汪立即表示放棄在廣州舉行四中全會的主張，並派代表赴滬。蔣介石的表態，為處於困境的特別委員會雪上加霜。

蔣、汪是在一九二五年一同被鮑羅廷——中共扶植上台的，他們的地位一同在由鮑羅廷——中共主導的廣州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獲得肯定和合法化，所以他們有共同的「黨統」，在對付西山會議的反共活動方面從來是一致的；他們雖然有時候為了權利而爭鬥，但是共同獲得權利的背景使他們之間有一種默契，有一種理解，一種在權利面前互相妥協分贓習慣。正如居正在《我黨的統一運動》中指出：「汪精衛……私衷狹隘，我見太深，……不能退個人私慾，為所欲為，擁共產黨徒以自封，力排異己。」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上海之間的中心人物，亦只有此數，而南京力以吸收武漢中央為唯一企圖。」居正的以上文章，是在武漢清黨以前，但是對照大聯合以後，仍然如此，這是整個中國國民黨的不幸。實踐證明，汪、蔣都缺乏革命起碼的為公的內在修養，這修養表現為以國民革命和國民黨的整體利益為出發點，這整體利益是高於個人的權益的，由此而有衡量事情和處理問題的是非觀。從廖仲愷事件開始的汪、蔣合流，是這種「天下為公」的革命精神的喪失；從汪兆銘與中共聯合召集國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以來，從他與鮑羅廷共同製造武漢的赤色政權以來，從他慫恿和支持武裝反對特別委員會的唐生智、張發奎以來，汪都是為個人的政治權益而跳上跳下，帶給國民黨的損失已經無以計算；在反對特別委員會方面，蔣介石與汪的再次合作，破壞難得的大團結，也是為了他們共同的權益。表面上雖然得逞，但是損傷中華民國的後果是巨大的，以後幾年的政治風雲，都是汪、蔣破壞特別委員會的結果。

蔣介石到達上海的一週，即十一月十七日，爆發了汪的支持者張發奎、黃琪翔為禍首的第一次廣州事變，汪受到眾人的譴責。同一天，共產黨員彭湃在廣東的海陸豐，組織蘇維埃政府，大肆殺戮無辜；十一月十九日，汪兆銘抵上海，與蔣介石會談黨務；接着，張發奎部隊中的葉挺等中共黨員，在十二月

十一日組織了聲名狼藉的廣州暴動，燒殺搶掠幾天，僅僅被燒殺死的屍體就超過一千六百多具，廣州繁華街區成爲焦土，這是張、黃包庇中共軍人所造成的（李濟琛公開揭露，在中共南昌暴動被救平以後，張發奎曾經以七百萬元給葉挺，以便召集殘部），因此汪被國民政府通緝，不得不於十二月十七日赴法國。但是汪在走以前，由汪的全部人馬簽字的文件中，以「四中全會預備會議」的名義提請蔣介石復職，簽名的人是「汪兆銘、何香凝、王法勤、王樂平、陳樹人、朱霽清、陳壁君、潘雲超、甘乃光、丁維汾、顧孟餘」（有關汪兆銘在這期間的有關通電言論，都出自《革命文獻》第十六輯、十七輯，不另外加註釋）。以後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以上這些簽名者大多數，是出賣中華民國和損傷國民黨的人。

以汪、蔣兩派人馬合作召開的所謂四中全會預備會，也就在十二月十日在上海召開，通過了汪系人馬提出的《促請蔣總司令復職函》。汪兆銘在同一天向報界發表的託病退休的聲明中，對蔣介石也倍加推崇，其實幾個月以前在武漢時，對蔣介石還責罵有加，專門召開三中全會，把蔣介石開除黨籍，以唐生智的東征逼迫蔣介石下野。汪的擁蔣，是出於從唐生智、張發奎爲後盾的一系列反對特別委員會的失敗而聲名狼藉的時候。汪推崇蔣介石道：「我認爲黨內必須有中堅幹部，而這中堅幹部內，又必須有一中心人物。今日論中心人物，就只有蔣同志一人，所以，今後我依然要幫助他。假使某些同志認爲我幫助蔣同志，反而給他增加煩惱，那我就以消極方法來幫助他亦是一樣的。我之聲明隱退，是爲要促成預備會議有結果，以夭折特別委員會，進行第四次中全會議，準備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計劃，先將黨權由特別委員會手中取還於四中全會。現在預備會已經一致決議，請蔣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從此一般武裝同志得所聽命。」（轉引自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第二二二頁）汪在國民黨內外一致聲討中出國，但是離開以前加緊倡導和蔣介石合作，爲歸來以後的政治出路作好了準備。

與此相對應的是，蔣介石出面爲已經非常狼狽的汪辯護。因爲在十二月十一日就爆發了中共領導的

廣州暴動，汪兆銘、張發奎難咎其辭。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蔣介石在上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他說：「幾位中央監察委員對汪同志不能諒解，他們對我說，並非對汪個人，實在是爲黨爲國；他們認定汪與粵變有關係。我對汪同志說，舊同志總要諒解，要互信，否則不能團結。」蔣介石在爲反對汪的監察委員之間調和，爲的是召開寧漢兩方的四中全會：「現在要希望革命迅速成功，並須由本黨從速制訂適宜的政策和制度，但此非待第四次全體會議來討論決定不可。所以第四次全體會議實在有迅速開成的必要。」蔣介石和汪兆銘有共同的起家經歷，他們共同利益在這裏。

但是，所謂四中全會以法統爲名來推倒特別委員會，是站不住腳的。爲此，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謝持、張繼、居正、許崇智、鄒魯、傅汝霖聯合發表《爲參加中央特別委員會告同志書》說道：「自南京清黨而有滬寧兩方合作之進行，寧滬因互認其法統也；自武漢清黨而有漢寧滬三方合作之進行，漢寧滬亦互認其法統也。各方互認其法統，在更加以痛定思痛之餘，互相退讓，互謀補救，所以九月上海集漢寧滬三方同志協商統一之事。其時列席者……是中央特別委員會之產生，由於漢寧滬三方中央黨部正式之決議，法統至爲明顯也。故除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外，中央特別委員會斷不能以一方之意思變動之，亦不能以多方之意思變動之，其於事理亦至明也。乃當黨務與政事軍事進行之時，而開一方第四次全體執行委員會之說突起，初以其爲一方內部之手續問題，爲之容忍；今忽愈唱愈奇，且高談法統，爲取消中央特別委員會之說，是烏乎可。且就一方之第四次執行會而論，須根據第三次執委會而發生。查南京方面因無所謂第三次執行委員之開會，查漢口所開之第三次執行委員會，又完全爲共產黨所操縱，爲南京方面所不承認者。是一方之第四次全體執行委員，本身法統已乏健全，若以一方不健全之法統，而欲凌駕三方成立之中央特別委員會，豈有一毫容許之理由。況中央特別委員會本係統一黨務之臨時過渡機關，黨之根本大計，胥待決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故行使其職權，爲時至暫……。」

鄒魯在《黨統問題》中，詳細列舉了武漢中央的三中全會開除蔣介石的原文：蔣介石在南京清黨之後，「蔣介石在南京另立粵二屆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武漢之粵二屆中央監察委員會，乃提案議，分別處分蔣介石等。其處分案如左：

「……最近且故違章，通電在寧召開全體會議，背叛黨國，逆跡昭著。本會爲維持黨紀起見，應加以嚴重懲戒以壓亂源。議決取消蔣中正、張靜江在黨內一切職權，開除蔣中正二人黨籍；陳果夫、古應芬予以開除黨籍處分；蔡元培、吳稚暉予以停止職權三個月處分；勸勉李石曾同志，訓令國民政府，明令撤銷蔣中正、張靜江本兼各職。訓令被張、蔣脅迫之各黨員宣佈張、蔣罪惡，並勗以效忠黨國大義，一致聲討。」

「在武漢之粵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從開其第三次執行委員會會議，議決處分南京之粵二屆之中央執監，計開除黨籍、停止職權，或予通緝及警告者，有蔣中正、胡漢民、戴傳賢、李濟琛、甘乃光、張人傑、陳果夫、古應芬、吳敬恒、蔡元培、李石曾等。同時南京之粵二屆中央執監委員會及南京政府亦亟謀對付，並否認漢口之粵二屆中央。茲錄其國民政府之通電知左：

「『案奉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諮開：據中央監察委員會諮，民國十六年四月二日，召集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緊急會議，議決建議案一件等因，本政府僅予接受。查原諮內建議分別兩點（一）……（二）所有漢口聯席會議及第二次、第三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皆徐謙、鄧演達、顧孟餘等受俄國顧問鮑羅廷之指揮所顛倒，所有由該會產生之機關，其所發命令，本會亦認爲會發生疑問。……查此項決議案，既經議決，由本政府接受。……關於該案第二點，而有聯席會議中央執行委員會所產生之機關所發命令，一律否認。……』

「自是漢口之粵二屆三次全體執行委員會，處分在寧之粵二屆執監；南京之粵二屆執監及政府，則

否認之如右電；至南京之粵二屆，則始終未開第三次全體執行委員會也。」^⑫

在特別委員會成立以前，開第一次談話會的時候，汪精衛正式提議，請寧方委員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赴南京參加四中全會，他們一致拒絕。汪問其緣故，他們說他們根本不承認武漢三中全會，故不參加沒有根據的四中全會。汪又說如果不同意三中全會的決議，盡可於四中全會提出修改，他們仍不同意，且根本不願意討論這個問題^⑬。上海報紙也登載了鄧澤如、古應芬的通電，和胡漢民的同樣觀點的談話。

以上的宣言和原始文件證明：蔣介石已經被武漢三中全會開除了黨籍，他怎麼能夠承認武漢三中全會，推翻他自己的南京監察委員會的決議，繼承武漢法統，召集四中全會呢？

而汪兆銘，也沒有資格召集四中全會。這時候擔任外交部長的原粵方中央執行委員伍朝樞說：「考之國民黨總章規定，中央執行監察委員任期一年，又規定代表大會每年開一次，執監由其選舉，如因事故，可延期一年，但不得超過一年等語。我們是十五年元旦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選舉之執監委員，十六年元旦已經滿任，縱延期一年，亦不過十七年元旦而止，過此以往，則我們第二屆執監委員，仍為普通黨員而已，所以十七年元旦以後，開全體會議，不過是一群前任之委員開會耳，以嚴格之法律論之，亦不合法也。」（見《中華民國史實紀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的記載）

總之，南京的所謂二屆四中全會是汪、蔣根據共同的反對特別委員會的政治需要，以力量强行製造的。正如鄒魯評論那時候的政治現象說道：「豈出諸有槍者則合法，出諸無槍者則非法乎？在此點言，以云合法，則皆合法；以云非法，則皆非法。」這是對有力量者的霸道政治的深刻揭露。

但是由於過去歷史條件的限制，反對特別委員會的主要人物，只提及汪兆銘，而很少提到蔣介石。其實在最後給特別委員會致命打擊的，是蔣介石。蔣介石回國表示對特別委員會不支持以後，由蔣介石

控制的浙江省、江蘇省黨部成爲了反對特別委員會的主力，而製造事端者，則是蔣介石任校長的南京中央黨務學校。

浙江省是蔣介石的家鄉，這裏的黨務通過張靜江和邵元沖建立和控制。邵元沖的日記記載，在佔領上海以前，何應欽告訴抵達杭州的邵元沖：「對於黨務問題，敬之等意須介石能拿出主張來，一切始有辦法，且謂介屢次遊移，且事後每由他人受過，故現在不敢十分自己表示主張云云。」浙江省黨部在四月十六日接收，其政治分會成員在四月二十日發表，有張靜江、蔣介石、何應欽、蔡元培、邵元沖等十人，邵任秘書長兼任杭州市長。蔣介石絕對掌控無疑。

江蘇省也是由蔣介石的親信組成。上海剛剛清黨以後幾天，四月十六日，鈕永建爲江蘇省政府委員會主席兼民政廳長，本來三月攻克南京以後，鈕由中央政治委員會任命爲江蘇省政務委員會委員，同時鈕又是國民政府秘書長，是寧方負責江蘇的主要人物；葉楚傖掌建設廳，他在廣州擔任以蔣介石爲中央常委主席的中國國民黨廣州中央黨部秘書長，他所主持的上海《民國日報》立即改變方向。翻閱四月的上海《民國日報》，有大幅向蔣介石致敬的標語；何應欽爲軍事廳長，何是黃埔的一根柱子；汪系人馬甘乃光爲農工廳長，等等。

真正在南京給特別委員會以致命打擊的，是中央黨務學校。蔣介石在抵定江南以後，在南京的總司令行轅，由寧方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及部長聯席會，在五月六日決定成立中央黨務學校，由葉楚傖、陳銘樞等五人擔任籌備委員會委員；五月二十日，仍然由寧方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由蔣介石擔任校長，籌備委員中增加戴傳賢、丁維汾兩人爲委員；五月二十四日，中央常會決定由戴傳賢任教務主任，丁維汾爲訓育主任，谷正綱爲副主任，陳果夫爲總務主任；蔣介石在六月八日就校長職。

汪兆銘雖然反對特別委員會，但是他的勢力是在武漢和廣州，只能在那裏興風作浪。況且唐生智已

經被平定，廣州的張發奎由於中共廣州暴動已經難以立足，汪兆銘的基本勢力已經不存在。這時候反對特別委員會的，只有蔣介石了，除了他躲在江蘇、浙江兩黨部後面作幕後人物以外，在蔣介石回國表態與汪兆銘合作共同召開四中全會是關鍵，黨務學校立即成為反對特別委員會的大本營。

蔣介石除了在回國當天就表示願意與汪合作，汪也立即表示放棄在粵開會的主張作為回報以外，十一月十六日，上海的國民黨人舉行歡迎蔣介石的大會，大會上蔣介石發表演說，號召與汪團結，他說：「國內同志也函電紛馳催促中正回國，阻止我到歐美去，汪精衛同志也時常來電，希望我立即回國，仍照十三年、十四年在廣州那樣通力合作，我接到同志們這樣懇切的函電，再不能不回國了。回來以後，我不僅要與汪同志負責，並要大家擔負起責任來……。」蔣介石還自稱自己為晚輩，要敬重前輩，而前輩，他只提到漢方和寧方的汪、胡、吳三個人，而沒有一個西山的元老；他只提到粵方的中央委員會不團結，今後要加強，實際就是只要漢、寧兩方的團結，而不要與上海中央的團結；他主要談團結的演講，沒有一個字提到滬寧漢三方聯合的正在執政的特別委員會^⑭。

蔣介石的這個演講，等於是一個總司令、勢力人物的動員令，要他的追隨者們推倒特別委員會。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南京市黨部召開黨員大會，特別委員會常委、國民政府常委蔡元培發表演講，講述了寧漢滬三方面聯合的經過，希望努力團結挽回大局。並且決定擁護中央特別委員會，會上擁護者與反對者發生衝突，反對者高呼「打倒特別委員會」、「打倒國民政府」，並且罵擁護者是「西山會議派的走狗」。最後，有四人被扭送南京市公安局，其中有一人是黨務學校的學生。次日，黨務學校的學生遊行到國民政府請願，由國民政府常委李烈鈞解決，被扭送者當晚獲釋。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京各界召開討伐唐生智勝利大會，唐是反對特別委員會最烈者。國民政府和南京市黨部代表演說，希望加強團結等等。最後由黨務學校的訓育副主任谷正綱和全國學生總會代表演

說，他們卻與會議的主旨相反，煽動反對特別委員會和所謂西山會議派，與台下的黨務學校的學生的互相呼應，居然通過了取消特別委員會的決議。會後，遊行隊伍以黨務學校的學生居首，高呼反對特別委員會的口號。走到接近秀山公園附近，軍警開槍，造成五人死亡，七十多人受傷的慘劇。關於開槍，當時南京國民政府的實際主持者李烈鈞的自請處分的報告說：「遊行開始之時，有穿西裝者，在復成橋放槍數響，因此秩序稍亂，士兵亦朝天放槍數響，以壓制之。」^⑮

南京在二十六日成立了「一一·二二慘案後援會」；二十八日，黨務學校學生抬着被打死的一名袁姓學生屍體，遊行到國民政府請願。國民政府平日由譚延闓、蔡元培、李烈鈞三位常務委員主持，前兩位恰恰都不在南京，「由烈鈞接見，言慘案係黨爭所致，旋有人高聲質問黨爭是甚麼意思？袁非共黨，然則打袁者何人何黨？烈鈞以隱衷難言，只得承認說錯，其後，更以慘案罹難者不死於帝國主義及軍閥官僚之手，而死傷於青天白日之下，與譚、蔡聯名發表負疚待罪宣言……。烈鈞認為慘案肇禍於黨爭，此黨爭非國共之爭，實國民黨內不滿特委會之爭。當時聞知國府秘書處職員陳海澄涉案，極為憤怒，主張嚴辦，擬予槍決，因譚延闓力主送法院而作罷。國府改組後，陳悠然回原單位復職，而烈鈞宦途日走下坡。」^⑯當時所謂「黨爭」的三方就是寧漢兩方面的反特委，漢方的唐生智、張發奎都已經完全失敗，汪聲名狼藉，只有蔣介石的追隨者在鼓動風潮。辦事正派的李烈鈞欲處置的陳姓職員反而日後高升的細節，正說明反對者的來頭。

儘管國民政府的主持人譚延闓、蔡元培、李烈鈞都表示願意承擔責任，但是，風潮卻並不對準他們，而且鄒魯、謝持、覃振、傅汝霖等被指為幕後主使者，居正、潘宜之等被指為兇手。

事件發生的時候，從來未主持實際工作的居正在上海，開大會的時候，鄒魯、謝持正在南京的燕子磯遊覽，並且世人都知道主持實際工作的是譚、蔡、李三個國民政府常委，矛頭卻對着他們，打倒西山

會議的標語鋪天蓋地而來。居正《梅川譜偈》說：「九日中旬，出席特別委員會成立典禮，濫竽國民政府委員。不到二月，若有視余爲強者，非打倒不可。只以不在南京，又不問事，無暇可指……。」後來抗戰發生，聯合一致對外，對於這些黨內爭執都一筆帶過，所以謝持在《六十自述》中也是這樣說的：「十六年，南京政府從事清黨；秋，漢口政府亦實行清黨，遂由汪精衛、孫哲生來滬接洽，亦遂由滬寧漢三部會商，開會三日，決定滬寧漢三部合作，成立特別委員會。……數月亂作，全黨又分。斯時黨員門戶之見未除，竟有不惜犧牲人命以快一自之大慾者。退居上海，所不能忘者黨事耳！而南京大張標語，打倒謝持，提案中央組織慘案委員會，各種印刷刊物，風起雲湧。」

事件發生當天謝持的日記記載，鼓動和造成這此事件的，除了黨務學校這些蔣介石的門徒之外，還有黃埔學生四十幾人專門從上海來，其後台是十分清楚的，其日記如下：「南京由市黨部發起，在公共體育場開慶祝西征軍討唐之勝利。有反對特別委員會之人口喊取消中央特別委員會等口號，黨務學校教職員學生及黃埔軍官學生由上海來京四十餘人實鼓煽之。將散會，槍聲忽作，聞死傷不少。其時我與海濱適遊燕子磯、三台洞，還蘭居京寓，忽得此消息，大驚悼，以爲死傷者可哀，而黨國之不祥也。」無一兵一卒，並且根本没有主持國民政府日常工作的他們，成爲打擊對象，他們因此無法在南京立足，等他們都離開了特別委員會，並且堅決要求調查和懲辦兇手的時候，此案卻不了了之。鄒魯在《西山會議》一文中有比較詳盡的評述，在所謂「腐化」一處，則是明顯地揭露和反擊汪、蔣的攻擊，但是在現今流行的《西山會議》一文中，已經沒有這些精彩的片斷：

「拿西山會議來打倒特委會的，一說是特委會爲西山會議把持。好笑了，特別委員三十二人，與西山會議有關係的，不過謝持、林森、張繼、居正、許崇智、覃振、鄒魯、吳稚暉八人，恰恰四分之一，把持甚麼呢？就是各部委員，統計亦不過三分之一，把持甚麼呢？……每次特委開會，西山會議有關係

的人，亦不過三分之一，則又把持甚麼呢？又有人說，特別委員會爲西山會議腐化了。腐化二字，只能對人對事說，不能對人說。……若說西山會議腐化的話，西山會議有關係的，不過……八人，吹一吹牛，都是跟總理二十年以上，向革命前途奮鬥的。若說以向左轉爲不腐化，翻雲覆雨爲不腐化，稱兵作亂爲不腐化，勾結共產黨爲不腐化，利用共產黨爲不腐化，右手拿住共產黨、左手拿住中國國民黨、而發中國革命領袖的迷夢的爲不腐化，破壞本黨統一，運用甚麼全體會議來爭他個人地位的爲不腐化，則西山會議的人，誠有愧色。即使住必洋樓，出必汽車，一茶會花去數千元，一旅行花去數十萬，則西山會議的人，亦只有敬謝不敏。若說西山會議肅清共產黨，變更聯俄容共政策，開除汪精衛黨籍，解僱鮑羅廷顧問爲腐化，則今日全黨皆先後一致跟着來做，豈曲突徙薪的是腐化，焦頭爛額的才不算腐化，那西山會議，應任其咎了。」操縱左右而做領袖迷夢的，當然是蔣介石，而且是一連串的揭露批評，與之汪的吹捧成爲對比。北京的《文史資料選集》中記載，潘宜之在多年以後問蔣介石，這「一一·一二事件是怎麼回事」？蔣回答：「此事不必再提，那是我一時的策略運用。」

謝持在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日記，感嘆政治的骯髒齷齪和國民黨的墮落：「標語傳單滿坑滿谷，今日且明白涉及我與海濱、覺生、理鳴、沐波諸人。午後更藉前日公共體育場開槍案羅織異己，而謂我和海濱、理鳴、覺生爲主使殺人，沐波、昆侖及張幹之、潘宜之、金嘉斐、任西萍、葛建時等爲實際殺人，且具呈國民政府正式控訴而請願矣。政治果齷齪之事耶！不幸吾黨內部也墮落至此，可嘆息也。」次日的日記記載，謝持等要求主政者迅速處理，國民政府的委員之間竟然「相視無所決，遂散會，可謂大奇！」並且謝持還發現「肇禍者已藉案張網肆行羅織，而政府猶延擱不定辦法」，於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返回上海。肇禍者是黨務學校的教職員和上海來的黃埔軍校學生，而主張懲罰的也是他們，誰又敢懲辦他們呢？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先有袁世凱擁軍橫行，繼續者是北洋軍閥和南方的武人當道，使得孫先

生苦鬥一生而沒有成功；孫先生去世以後，從廖仲愷被刺事件開始，仍然是軍人主持一切。「理」和「力」相衝突之時，力可以橫蠻地取勝，這就決定了特別委員會的結局；但是，「力」不能長久，歷史已經證明。

十一月二十九日，謝持、張繼、居正、許崇智、鄒魯、傅汝霖六人聯名發表《告同志書》，闡述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的經過及其職能。

十二月三日，寧、漢兩派重新合作召開所謂二屆四中全會第一次預備會，決議的第四項的第二條是：「民衆所指控之居正、謝持等十人先監視，聽候法庭檢舉傳訊。」

十二月五日，上海《民國日報》發表居正、鄒魯、謝持向國民政府提出的議案，請求對南京事件查明真相，從速討論，迅速辦理，實錄了南京中央黨務學校的谷正綱的製造混亂的情況，主要部份如下：「討唐大計係由中央特別委員會決定，令國民政府辦理，則此大會尤不應有反對中央特別委員會之舉動。今竟於中央特別委員會所在及其所產生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在之首都地方，尤其是在討唐勝利大會之民衆聚集地方，有人公然爲反對中央特別委員會之舉，傳單、口號、標語、演說極其煽動能事，又復有人向群眾開槍。事之駭怪，無逾於此。又查反對中央舉動，大半出於中央所辦之黨務學校，當日會場中尤以該校訓育主任谷正綱之演說煽動最爲劇烈。本黨自遭共產黨破壞，數年來分裂之狀，不可諱言，至今幸勉強統一。所有關於統一辦法及黨務進行事宜，黨員中如有認爲不盡適當者盡可以提出主張，正常討論。今在首都之黨員，尤其是黨務學校爲主任及學生之黨員，偏不從正當辦法着手，必取破壞黨紀之軌外行動。此既於十一月十九日南京市黨員大會時，反對掩護中央特別委員會之口號，致起糾紛；又於二十一人該校學生結隊用汽車貼反對中央特別委員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標語，高呼口號，遊行市中，打毀市黨部牌額，而猶未足，乃於討唐勝利大會時，利用群眾，極力鼓煽，成此慘禍

……。推彼輩用心，無非志在擴大範圍，破壞黨國大計……。若不迅速辦理，使主使者無所逃罪，使國人皆知此案真相，一般奸黨可以任意造亂而無所忌。死者不瞑，生者不安，人民日日在驚濤駭浪之中，甚非黨國前途之福。爲此具案，提出國民政府會議，請大會即付討論……。」

同一天，謝持在上海寓所接見記者，指出「所謂第四次全體會議，余等不承認；……彼預備會用何職權，能停我輩之職，及監視我等。不過預備會中，有非推倒特別委員會不可者，用此藉屍圖賴之法，以打擊特別委員會。」

十二月六日，謝持、鄒魯、居正等再發表長篇《告同志書》，敘述特別委員會成立的經過，「希望黨事之是非或能大明」。事實上，從此開始的以「力」主導的國民黨，許多的是非從來未明。這正是中國國民黨執政失敗的悲劇根源。

在該事件一週月的時候，鄒魯、謝持等聯名致函國民政府常委譚延闓、蔡元培、李烈鈞，催促辦理南京慘案。函中透露說，蔣介石命令不必查了，按照民衆所指出的十人辦理即是；並且蔣介石、丁維汾、陳果夫致電黨務學校，對他們的行爲加以表揚；謝持、鄒魯還說：「查十五日國府會議，譚常委委員適自滬返京主持，持、魯等力主拿辦此案兇犯及煽亂之人，譚委員乃言『若單純共產黨暴動，悉行拿捕，自屬易辦。此事發動，上海有人主持，實黨內之爭，爲人所乘，愈捕愈加糾紛』，因而擱置，未及迅速解決辦法。」上海的主持人是誰呢？連譚延闓、李烈鈞都不能去辦，當然地位與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地位相當，或更有力量者。最後此案不了了之。如果真的是西山會議諸人有罪，一定會查到底，乘此將他們搞臭，置他們於死地；不查，不敢查，當然那命令不必查者就是上海的幕後「主持人」，就是慘案的製造者。

幾十年以後的《李宗仁回憶錄》評述這一歷史時期說道：「特委會的成立，就是論事，本是最適當

的過渡時期的辦法，暫使各方有一團結的中心，以待三大大會的召集。所以我當時對特別委員會甚為掩護。在構成特委會的分子中，特別值得提一提的便是所謂『西山會議派』一群元老，如張繼、林森、鄒魯、謝持、鄧澤如、蕭佛成等，這些都是總理同盟會時代的老同志，辛亥革命的元勳，在民國初年便享盛名。如張繼在民國元年間便任國會議長，名滿全國。這批元老因不滿容共政策，在中央頗受左傾分子的排擠。到總理逝世後，黨權入於汪、蔣二人手中，彼二人藉國際共產之足，對這批元老排斥尤力。張繼等乃在北京碧雲寺總理靈前集議，自成組織，以與廣州的汪蔣對抗。是為『西山會議派』的由來。他們與汪、蔣表面所爭執的，是共產黨問題，西山派堅決反共，而蔣、汪則實行容共。到寧、漢分裂後，寧方亦反共，唯蔣總司令對西山派公開詆毀攻訐，猶如往昔。有時候在總理紀念週上，他簡直把西山派罵得狗血噴頭……。此次在上海，我第一次與『西山派』人士晤面，我發現他們都是一批年高德劭的老同志，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較澹泊，頗有令人尊敬之處……。因特委會的組織，表面上是清黨後國民黨各派大團結，西山派以其在黨內的歷史與資望，必然要取得重要位置。而汪、蔣二人原是西山派的死敵，今西山派藉清黨之機捲土重來，則汪、蔣均不能坐視，自是必然的道理……。原先便反對西山派的親汪、親蔣各省黨部，也紛紛聲言反對特委會。特委會的前途荆棘，也就不言可知了。」

謝持日記記載，在他被迫返回上海以後，在十二月二十七日：「訪哲生、德鄰，詢其對黨之觀察。午子超召飯功德林，晚壽錫卿於功德林。過汝為，約鐵城共赴汝為家。得馬彬書。」林森請吃飯，有志同道合者安慰的意義。

特別委員會結束了，慘案不了了之了，卻還留下尾巴。根據謝持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的日記，蔣介石託人問候他，聲稱不知道被誣告的人中有他：「吳稚暉將赴南京為蔣介石盡力，大抵明於議人者皆黯於處己耶！錫卿來商川事，謂蔣介石託渠致意於我。介石自言不知南京慘案誣指之主使人中有我名，介

石情見乎詞矣。」錫卿就是盧師諦，作爲川人代表，是參與李烈鈞主持的解決川事的主要人物之一，在同盟會時代，就與謝持過往甚密。蔣介石明明公開說應該辦理民衆所指的十人，他會不知道其中有謝持嗎？隨便的拿辦其他人，不造成冤案嗎？顯然是對西山會議打擊以後，進行的個人拉攏。剛好二十天以後，蔣介石又送錢給謝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記如下：「贛同志鄧榮惠、張抱芝、涂明揚自南昌逃來報告黨務，朱丹父自南京來報告黨務，皆勸其暫息，靜觀介石之作爲；但當研究本黨組織方法之應改進者，本黨民衆運動方法之應改進者，及吾人最近之將來應付之方法。蓋介石等能鞏固黨基，吾人當希望之，並樂觀其成。然觀其作爲，必無成功。……高建勳來言川事，朱鐸民（鏡宇）來，代介石致餽五百金。以介石無書來，卻之。鐸民固請受，遂允暫存而認爲朱氏之存金，待介石書致再定辭受。」二月二日的日記記載：「介石無一字來，而鐸民亦似交到了事，卻之有重禍之虞（伯農言），受之於余心有不安。非傷廉也，介石曾託錫卿致意，表歉然之意於我，而今餽金。其一時所贈者，我與子超、溥泉三人，故非不可受，所以不安者，政治關係立於相對也。至今日將金交易通公司存之。」正是因爲政治關係的對立，蔣介石才在整體打擊西山會議中央之後，私下企圖以金錢交易利益。在此時上台的中國國民黨的最高領袖都如此，國民黨還會不墮落嗎？國民黨的理想、主義、原則、是非到哪裏去了？

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汪兆銘居於少數的時候，少數委員在蔣介石這位勢力人物的支持下，就製造一個國民黨的廣州「二大」，再在「二大」上製造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同樣，蔣介石在特別委員會中遠遠沒有絕對控制的力量，不能做當然領袖，於是，根本不顧黨統、法統，強行召集南京的四中全會，再製造一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製造一個聽命的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形成他的法統，使其合法化。

西山會議的中央黨部在特別委員會成立的時候已經自動撤銷，西山會議隨着特別委員會的終止而結

束了。開始的，是蔣介石以「力量」治天下的時代。

註釋：

① 《革命文獻》第十六輯第九〇至九二頁。

② 《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蔣永敬編著，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中華民國七十年，台北。

③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桂崇基著，台灣中華書局發行，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台北。

④ 《革命文獻》第十六輯第五二至五三頁。

⑤ 《革命文獻》第十六輯

⑥ 《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第九〇九頁，國史館印行，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台北。

⑦ 《革命文獻》第十六輯

⑧ 《回顧錄》，鄒魯著。

⑨ 《西山會議》

⑩ 《三十年動亂中國》第九九頁，雷嘯岑著。

⑪ 《李烈鈞評傳》第二五一頁，瞿韶華著，國史館印行，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台北。

⑫ 《鄒魯文存·黨統問題》第三集第一〇二至一〇三頁，鄒魯著。

⑬ 《從容共到清黨》（下）第七七三頁，李雲漢著。

⑭ 《中華民國史實紀要》中華民國十六年七至十二月，第八三六頁。

⑮ 同註釋⑭，第八九六頁。

⑯ 《李烈鈞評傳》第二五七至二五八頁，瞿韶華著。

二十八、餘波蕩漾

一九二八年，應當是中國國民黨內部表面平靜的一年。這一年東北張學良易幟，北伐完成；而西山會議諸公雖然被蔣介石、汪兆銘聯合趕下政壇，則仍然在觀察蔣介石的作爲，看他能不能擔當起領導中華民國走上康莊大道。蔣介石雖然以勢力召開了第四次中央全會，但是只是一部份人的聚合而已，危機仍然潛伏着。

清黨的目的達到，中央特別委員會成立，上海中央黨部撤銷，可是西山會議諸公仍然沒有完全放下他們的責任重擔。因爲他們跟隨孫先生創立的中國國民黨，在權利的腐蝕之下，利害的爭奪已經成爲內部生活的主題。謝持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結束不久，在胡漢民家裏飲酒的時候告訴胡漢民，國民黨即將敗亡，而胡漢民並不如此看（據謝持日記）。這些元老，他們甘心他們一輩子的精力、心血和生命都奉獻給的事業，在蔣介石的治理下敗亡嗎？他們容許蔣介石完全以個人的好惡來代替原則、信念和主義嗎？

他們對蔣介石抱着懷疑而又期待的態度，即慎重觀察蔣介石的作爲，然後再下結論。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蔣介石再次製造分裂，主張召開只有寧漢兩方的中央全會，謝持十分失望和憤慨，其日記寫道：「蔣介石置敵不顧，一意內訌，美其詞先清內部，實爲己耳。嗟夫！中國國民黨自此名存而實亡，彼共產黨竊笑其計售矣，於共產黨夫何尤！」這種憂憤之情，在次日蔣介石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職務時再次表現，不過謝持仍然予以期待：「介石受國民政府之命復任總司令職，殆不義不信之尤也！是

非不顧也，先後言論行動之矛盾不顧也，出爾反爾之不顧也，唯權位是重。雖然，吾姑視介石今日以後之行爲如何，吾不欲苛責。」以上幾點，是對蔣介石的言論行爲的總括，但謝持仍然欲「視之今日以後之行爲如何」，不苛責他，再次期待他。這態度在謝持收到蔣介石的贈金當天記載是一樣的：「蔣介石等能鞏固黨基，吾人當希望之，並樂觀其成。」西山會議諸公並沒有因為受到打擊，並未因為蔣介石「唯權是重」，而立即在政治上組成反對的陣營，而是觀察之。

於是，以在野身份，許崇智、居正、鄒魯都出國考察，謝持則留在上海就近觀察，林森以超然態度參加中山陵的修建工作，只有張繼的政治態度有大的轉變①。

根據謝持的日記，許崇智、鄒魯、居正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離開上海出國，謝持沒有去送行，心中不樂。居正《梅川譜偈》記述道：「許崇智、鄒魯奉派出使歐美，約余送至日本，就近訪朝野朋友。」居正的六女瀛玖自幼由日本友人萱野撫養，乘在野之機，到日本探視。從日本歸國以後，居正繼續到上海郊區楊行耕作。抗戰以後曾經作司法行政部長的謝冠生，記述那稍後他在楊行碰見居正的情狀說道：「先生起自田間，保持故習，終生不廢，中年築室吳淞楊行，四面曠野，馬君武先生爲其唯一之鄰居，故不常至，二十二年春，吾因事赴滬謁候，先生方簑衣戴笠，手持耕具，赤足行泥塗中，驟遇之，幾不相識，比相將入室，留食縱談，耳目所接，彷彿置身別一天地也。」①不過居正仍然關注國民黨的事情，他主持《江南晚報》，成爲與南京國民政府觀點有不同之處的重要言論機關。可惜海外無《江南晚報》，大陸存該報的圖書館又不能借閱。

許崇智出國歸來後，過着引退的生活，而從他處得到兵權的蔣介石，已經是「一國之君」。這期間許崇智的生活恬淡，崇尚老莊，居正稱讚道：「急流勇退，老莊之說有如斯。……泰伯三以天下讓，而周以興，可謂至德也矣，民無得而稱焉。故君子之用心，明德之所行，非以管窺天之所能測，抑非以挺

撞鐘之所得聞。先生淡泊明志，和光同塵，寧靜致遠，抱璞含真，隱居以求其志。」②

鄒魯考察歐美，將近一年，作《二十九國遊記》，在美國，著《留別西美同志書》，對海外國民黨的工作提出建議；當時正逢蔣、汪召開第四次全體會議，於是鄒魯向僑胞闡述特別委員會的始末，以及第四次全體會議缺乏法理依據等等情況。一九二八年十月返國以後，致書海外諸黨部表示：「歷考各國，無有善於吾黨總理所造之三民主義；而措施之序，目前宜實行訓政，督自治之完成。而入手要端，首在裁兵，即以所裁之兵費辦教育、辦建設，則三民主義始可實現。」③那是在編遣會議的召開前夕，故鄒魯對寄於厚望，事實上裁兵問題是民國史發展的關鍵，所以鄒魯期望裁兵能有成就，以便按照孫先生的《建國大綱》實行地方自治和訓政。

在西山會議召開的時候，曾經出過大力的孫科，雖然經蘇俄上海領事館拉過去，參加了廣州「二大」，並且和蘇俄——中共緊密合作，在武漢國民政府擔任委員和政治分會主席團成員。但是，在特別委員會開始，他成為特別委員會的重要支持者。特別委員會被强行結束以後，他懇切寫信給蔣介石，主張大團結，可是蔣介石聽不進去。孫科認為當前的形勢是「危機四伏，中樞空虛」，他提出以團結來解決問題，他說道：「竊謂今日危局，欲謀根本解決之方，則道理與事實須特加注意，而法統與個人，則須在其次。必本此精神，始足以奠黨國基礎於永固，否則治絲益棼，亦徒自擾而已。」孫科以為他所提的是根本，不然無以治理。他在回顧國民黨的分裂經過以後說道：「自去年寧漢分裂，所謂法統，實以蕩然無存，嗣以共產黨陰謀繼續顯露，武漢亦進行清黨，於是法統之說益不可通，而統一合作之議應時以起。此去年九月，所以為寧漢合作，更進一步為寧、漢、滬三方黨部合作，而有中央特委會之成立也。夫法統從道理而生，理從事實而出。當九月間滬上談話會諸同志之意見，固曾深長之考慮，反覆之辯難，非偶然也。使大家均以黨國前途為重，個人利益為輕，則黨政既經統一，內部糾紛不生，各省黨部

得以從容整頓，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今已爲開會之期矣。不謂少數無行，既經同意於先，忽持異議於後，藉法統之說，掩其攘權之私，覆雨翻雲，興風作浪，遂使兩湖北粵，重罹浩劫；漫不加者，以爲法統之爭，而明眼人觀之，則天下汹汹，爲此三三人爭權位爭意氣而已。」以上談的是汪兆銘爲一己私利破壞黨的難得的大團結，孫科繼續說道：「目下時局之艱危，彷彿去年之九月，而興繁之異論，亦無異於彼時，先生究採何宗旨以解決國事，安危繫於此矣。以科愚見，先生果欲拯黨國於危難，則此次會議，當仍本忠實同志大團結之精神，集中黨中全體領袖，以建造統一而有能力之中央幹部，或幸種種葛籐，能從此永斷，若猶泥於法統之說，不顧事實，不言正宜，則時至今日，所謂法統已不能自定其說。黨章規定任職之期限，且已逾越，其他一一吹索，何止千瘡百孔，亦終陷僵局而已。」眼見目前國民黨又分裂，所以孫科提出「集中全體領袖」的建議，並且說根本已經不存在汪、蔣所說的法統。以下則針對蔣介石說道：「吾黨自總理逝世，黨中即不能再以個人代表全黨，故中央委員之權能與責任，實均爲平等。黨事之能得良好解決，唯在徵求衆意，無所軒輊。苟任何人欲以黨爲工具，以成就其個人功業，結果無不失敗者，此尤冀我中央諸同志之自覺，而無再貽黨國與個人以不幸之收場也。」④孫科主張如像特別委員會一樣，集中全黨領袖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集體領導，蔣介石仍然聽不進去，歷史已經證明蔣介石追求的是他個人的獨斷領導，從他趕走許崇智奪得兵權起，到慫恿黨務學校製造「一一·二二」事變，都是爲了他個人對中國的權力獨佔，他怎麼會按照國民獨斷利益，把權力又交給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集體呢？

由於衆人反對，汪兆銘不得不出國，可是蔣介石把汪系的人馬何香凝、陳樹人、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塞入四中全會，讓這些候補委員成爲正式委員，以湊合法定數。以便爲蔣汪的國民政府奠定基礎。

孫科於是在一月二十四日，與胡漢民等出國考察，不參與蔣介石的運作；李宗仁、白崇禧也拒不參加四中全会。

過去胡漢民不參加特別委員會，拒絕了汪兆銘的造訪；之後又以討厭汪的反覆無常，再次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拒絕汪的上門拜訪，並且拒絕參加在十二月上旬召開的四中全會預備會；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拒絕蔣介石邀請赴南京，聲稱要研究主義；一月二十四日，爲了拒絕出席蔣介石强行召開的四中全會，在開會前幾天，與二位不滿意蔣介石一系列做法的孫科、伍朝樞一道去歐洲訪問，一去就是大半年，到次年九月才返國。

李烈鈞主持特別委員會最出力，因爲不滿汪的跳來跳去的做法，抵制四中全會預備會；四中全會上李烈鈞雖然被任命爲國民政府常務委員，但是拒絕擔任蔣介石的北伐軍參謀總長（李烈鈞曾經爲了與蔣介石配合，被武漢政府從江西省長位置上趕下台，但是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夏天辭職居然沒有事先告訴他，與蔣的關係就開始淡薄下來）；雖然坐陣南京，在北伐中協調各方有大功，但是在治國理念方面，不主張一黨治國，與胡漢民、蔣介石都不合，所以在一九二八年秋的五中全會上，連國民政府委員的資格都被取消。（詳見《李烈鈞評傳》，洪喜美著）

留在上海的謝持，爲居正主持的《江南晚報》擴張籌款，以及居正主編的《清黨實錄》付印籌款；在六月去廣州，受到廣州黨人的盛大而熱烈的歡迎，廣州的國民黨員甚至把清黨的主要功勞歸之於他。根據謝持的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的日記：「二時赴廣州同志歡迎會（在西濠酒店之天台），同志皆溢美於我，我甚不安。我略舉吾黨的病根兩事：一、黨無是非；二、黨員多抱個人權利。準此立說遭嫉妒否，非所計矣。……」這指出了蔣介石當政以來的根本毛病。一個政黨沒有了是非，只是誰有勢力，有權位，誰就正確的，造成中國國民黨內聚集一批抱個人利益的爲私利者。在此期間，謝持在上海關心川

事；三次拒絕了蔣介石請戴傳賢上門做說客，要他做監察院長的邀請，表示「除非有全黨團結，決不作個人之遊」。（《謝慧生先生事跡紀傳》）

鄒魯考察回國以後，著《二十九國遊記》，息影上海，著力於編寫《中國國民黨史稿》……，杜門謝客，終告成功。「……十八年秋，東渡日本，卜居香根，寫蘭寫竹寫菊，讀書作詩爬山，想做一個隱者。」（《鄒魯研究初集》第七頁，陳哲三著，華世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台北）

國民黨的領袖人物之中，只有幾個原來的無政府主義者吳敬恒、張靜江、李石曾幾乎無條件支持蔣介石，再加上蔣介石的難兄難弟戴傳賢，以及順風倒的譚延闓；不滿意蔣介石的國民黨人，卻大多數在黨內有根基。在一九二八年的秋天以前，這些不滿意者都在國內外對蔣介石進行觀察，直到一九二八年的九月，才發生變化。

胡漢民在九月回國以後，在十八日赴南京，立即被推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在國民黨內缺乏根基的蔣介石，因而獲得了最重要的支持。品格正派的胡漢民，之所以擁護蔣介石，據其年譜作者說，是着眼於統一不易，北洋的餘孽未出，而決定輔助之。

十月，根據在八月舉行的五中全會設立五院的建議，國民政府改組，譚延闓擔任行政院長，胡漢民擔任立法院長。引人注目的是，西山會議的元老林森擔任立法院副院長，張繼擔任司法副院長。

林森向來以溫良恭儉讓，寬大仁慈，和藹可親，為各方接受著稱。他加入南京國民政府以後，並不混跡於官場，只是專心致力於修建南京中山陵的工作，即實際上只兢兢業業於「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主任」的職務，靜居城外陵園管理委員會，監督工程的進行，連選擇木材、僱傭石工工人等細節，都親自過問。作為孫先生的好友，以此盡心。他從此超出了國民黨內的一切是非爭論，直到胡漢民被扣留事件發生，才仗義執言，與監察委員一起彈劾蔣介石。

張繼是一個遇事敢於挺身而出，但又立場多變的複雜人物。在同盟會時代，在東京時，激烈的他曾把痰盂扣在保皇黨人的頭上；他因為信仰無政府主義的關係，曾經在東京與章炳麟、劉師培、陶成章一起，極力想把孫先生搞臭，成為反孫的主角；他最初是把中共的主要領袖李大釗、張國燾等介紹加入國民黨的人，但是他又與謝持、鄧澤如提出彈劾案；爲了反對中共，他敢於正面頂撞孫先生，但是在西山會議的中央黨部最艱難的時候，他宣佈脫離政治，把全家搬到大連；他站在西山會議立場，卻很少參加具體工作；他個性最剛烈，但是在上海中央黨部被查封後不久，特別委員會又被蔣介石羞辱解散，在南京的「一一·二二事件」過後一星期，他卻與蔣介石第一個合作；謝持等闡述特委會的《告同志書》他還參與，再過一星期，即十二月六日的敘述特委會成立經過的《再告同志書》，卻不見了張繼的名字，根據他的《回憶錄》，他居然與何應欽一起，到蔣介石故鄉去邀請蔣介石出山^⑤；張是西山會議的重要人物，但是張繼以後多次講到清黨的歷史，卻小心避開，不提一句西山會議，卻像他平日的演講一樣，只是歌頌「總裁」的功績，長期與蔣介石保持着良好合作。難怪居正在一九五〇年到台灣以後的日記記載，居正告訴訪者說，「張溥泉在民國十六年背叛了西山會議」。但是在胡漢民因爲被扣留而離開立法院長職位以後，任命張繼爲新的立法院長，張繼卻堅決拒絕，後來只擔任國史館長職。政治人物做出的選擇，原因是很複雜的。

編遣會議的失敗，導致了處於觀察狀態的西山會議上海中央黨部的三個具體主持者，投入了反蔣陣營。

經過多年戰亂以後，北伐成功，全國統一，人心思定，裁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當時軍隊人數在二百五十萬以上，軍費支出佔全國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八，所以沒有甚麼人能夠出來反對裁軍；並且當時還有另外一些有利條件，即最重要的軍人都已經在中央任職：閻錫山爲內政部長、馮玉祥爲軍政部長，

李宗仁爲軍事參議院院長，雖然軍人們不願意，大勢所趨，裁軍還是可能取得成績的。可惜錯過了這次良機，引起的紛爭一發不可收拾，其禍無窮。

參加裁軍的軍人們都看着擁兵最多的蔣介石，毫無疑問，蔣介石剛剛收編的北洋十幾萬軍隊應當帶頭解散。但是蔣介石的代表何應欽在會上閃爍其詞，不着實際問題，引起了本來就有機心的軍人的疑慮。馮玉祥裝病，乘此潛出南京，編遣會議失敗。

蔣介石迷信武力，沒有是非，只知道和投機取巧的汪兆銘合作，弄垮了大團結的特委會，打擊西山會議諸公，挑起內訌，又用小恩小惠私下收買。這根本不是一個以德望團結全部國民黨的領袖的做法，他連像西山會議諸公這樣的忠貞國民黨員都不能團結，又怎麼能夠團結擁有勢力的軍人呢？已經取得國家最高權利的蔣介石，繼續用「力」，用強制手段對待老黨人，而不是用「德」，怎樣可以使天下人心歸順？孫先生在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演講之中非常深刻地說：「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夠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有了很好的道德，國家才能長治久安。」可惜蔣介石在取得政權以後，作爲一個軍人，沒有深刻的思想，繼續憑藉力量運作，再次造成國民黨的分裂，然後在軍人中，錯過編遣會議的良機，造成國家再次墮入戰爭的苦難。其他軍人們固然難咎其詞，執掌大權的軍人蔣介石應該負主要責任。

各個軍人紛紛起兵反抗南京，剛剛平靜一瞬間的中國，又陷入烽火硝煙之中。

鄒魯、居正、許崇智、覃振、謝持等西山會議多數元老，從一九二九年南京召開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從觀察走入了反抗蔣介石獨裁的階段。有人說西山會議諸公一手反共，一手反蔣。反共，是反對階級鬥爭和蘇俄對中國的侵略；反蔣，是反對獨裁，具有爭取民主的性質，太原約法可以證之。這

兩點恰恰是西山會議的歷史價值。

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本來又是一次團結的機會，但是事實相反，加深了分裂。

關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幾十年以後，沈雲龍在台灣出版的《傳記文學》第三十三卷中說：「追是年三月十五日，中國國民黨於南京召開第三屆全國代表大會，會期兩週。開幕前數日，汪兆銘等粵二屆中委十三人即聯名發佈反對宣言，指摘出席代表經由選舉產生者僅八十人，圈定或指定者三百零三人，其包辦程度高達百分之七十九。即三全會產生的代表，亦認為圈定或指定方式的不當，曾一度引起退席風波，然與汪之反對無關。」這指定代表中，有林森、張繼、謝持，但是沒有許崇智、居正、鄒魯、覃振。這顯然是分化伎倆，以便將蔣介石的一系列的作法——弄垮特別委員會、強行召集四中全會、分裂了國民黨，再召集片面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都合法化，再以官爵堵塞反對者的口。

蔣介石在開幕詞中說，中國國民黨的分裂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厲害。可這分裂是如何造成的呢？難道不始於「廖案」發生以後，中共——汪——蔣聯合排出忠貞國民黨人？難道不繼續於在武漢中共——汪排擠蔣介石？難道不繼續於汪——蔣聯合搞垮特別委員會？難道不繼續於無法無統的粵方二屆四中全會的召開？難道不繼續於沒有代表性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通過這次代表大會，蔣介石建立了以他為中心的政權，這政權由二陳主黨，由黃埔主軍，由政學系主政。這已經是清清楚楚的過去了的歷史。中國國民黨的分裂，是蔣介石一手所為。

謝持拒絕出席，雖然有南京當政的胡漢民、李石曾、張靜江等的私下勸說。謝持的家書寫道：「南京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其中指派我為川省代表之一，共派九人……我置之不理。因我在黨務的關係，應自尊我人格。非全黨統一，我寧吃苦，不願不講是非，只圖個人地位權勢，故拒絕不理。但從私人關係上講，則在南京之在位者，如胡漢民、張靜江、李石曾諸人替我打算，本可感劬，所惜不由其道

也。」（見《謝慧生先生事跡紀傳》）

西山會議諸公由此正式走上了爭取民主法制、反對蔣介石獨裁的道路。他們已經經過了那麼多的暴風雨，他們不可能容許國民黨變成私家的黨。

五月，居正、許崇智秘密赴香港，聯絡李宗仁等。

七月，蔣介石在講話中說，西山會議和帝國主義、軍閥、共產黨一樣。

九月，一批老資格的國民黨人發表反蔣聲明，他們是馬君武、鄧澤如、黃復生、熊克武、田桐、趙恒惕、茅祖權、居正、鄒魯、謝持、許崇智、覃振等八十四人；鄒魯、覃振、傅汝林、謝持等紛紛到達北平，參加反蔣活動。

十月，馮玉祥所屬的將領宣佈蔣介石六條罪狀，通電打倒；蔣介石在次日宣佈馮罪狀，開始討伐馮。

十二月四日，中原各將領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十二月，許崇智、鄒魯、居正、謝持被開除黨籍和被通緝，他們則在次日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二十二日，居正被上海警備司令熊式暉誘捕，之後戴腳鐐長達八個月，監禁近三年。二十六日，跟隨孫先生南征北伐的資深將領李烈鈞、李福林、許崇智等八十餘人勸告蔣介石下野。

一九三〇年四月，閻錫山通電就海陸空軍總司令職；馮玉祥、李宗仁分別在潼關、桂平就副總司令職。

以李宗仁、白崇禧率領的第一方面軍，五月底從廣西攻入湖南，六月上旬迅速佔領衡陽、長沙、岳陽，形成南北夾擊之勢，南京震動。由於李濟琛被扣南京湯山，廣東軍人不滿，但是因為胡漢民的影響和籠絡，廣東的粵軍從後面襲擊桂軍，六月十五日奪回岳陽，十七日攻克長沙，夾擊的危險局面解除。

北方的中原大戰在五月十一日開始，馮玉祥的第二方面軍向河南進攻，閻錫山則坐鎮河北、山東，互有勝負。由於原來保持中立的張學良大軍入關，給予背後一擊，反蔣軍隊迅速潰敗。

與此同時，在北平的擴大會議在八月七日開幕。這是爲了反對蔣介石，與爭權失利的汪兆銘不得不有的短暫聯盟，成立宣言中說：「本黨組織爲民主集權制，某則變爲個人獨裁，僞三全代表大會指派圈定之代表，數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黨政治，在扶植民主政治，某則託名訓政，以行專制，人民公私權利，剝奪無餘……。」⑥在軍事失利的時候，大家坐在太原制訂「約法」，該約法在十月二十七日全部完成；十一月十二日，擴大會議發表宣言，宣佈結束。雖然擴大會議煙消雲散，但是制訂的約法得到社會的好評，並且影響深遠。

自始至終作爲約法起草委員的鄒魯，在《回顧錄》中說：「此次草擬約法時，有一部份人因爲軍事不利，就未免灰心；有一部份人對於約法，本來就沒有多大興趣，所以此次約法之成，自始至終，我是最努力的人。及至前方軍事失利，閻錫山先生表示再無法維持，擴大會無形解散，大家離開山西，我才和謝持先生同道共到天津。……施行法制，向來是我的主張；草擬約法，以完成訓政，則是我的願望。」⑦過去西山會議反對蘇俄——中共，根本上是反對蘇俄對中國的侵略和煽動階級鬥爭；如今全國統一，中共已經奄奄一息，鄒魯透露出來的信息則是反對獨裁，爭取民主，建立一個法制的社會。這反映出來的治國理念，是西山會議主張的重要組成部份。

歷史學家評論這部太原約法，超過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四個憲法版本。就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制訂的《中華民國憲法》，有的地方也仍然不能好過這部《太原約法》。以下關於第二章的《人民之自由權利義務》部份，更是中共統治大陸以後的任何憲法所無法比擬：

「第二十七條 人民於法律上，一律平等，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分。」

「第二十九條 人民非有犯罪嫌疑及證據，不得逮捕、拘留、審問或處罰。」

「第三十條 人民有犯罪嫌疑，除有確實被害人之告訴人外，如被官署逮捕拘留，經法院決定免訴或宣告無罪時，其拘留期間，應由國家照本人身份，酌給相當之賠償，其詳以法律定之。」

「第三十一條 人民之財產，除因犯罪所得，或供犯罪使用者，不得沒收。」

「第三十二條 人民之財產所有權不受侵犯，但因公益上的需要，得以相當價格徵收之。私有土地，依大綱第一條的規定。」

「第三十六條 人民有結社之權，非有犯罪嫌疑或證據，經該官署查明時，不得封閉。」⑧

那時最有影響的《大公報》評論太原約法有五大優點，其頭三點是：「一、第三十條規定，對犯罪嫌疑人之國家賠償法，採各國最新法例，極合人權法理，唯其範圍尚嫌過狹耳。二、一切關於人民自由權利義務之規定，比較任何國家現行憲法為周密、苟能實施，誠為民衆生活安全之保障。三、中央與地方之權限，中央用列舉法，地方取概括主義，並依建國大綱，許省制省憲，足為集權分權之政爭消彌不少禍源。」⑨

主要起草者鄒魯說明道：「草案全部，以《建國大綱》為綱領，而根據以定條目。《建國大綱》着重於滿足人民之需要，訓導人民之智識能力，使之能自決自治。故草案對人民之自由權利與義務一章，詳為保障與規定，使能自動完成個人之人格，而擔當國民之大任。《建國大綱》注重於以縣為自治單位，及中央與省之權限，採均權制度。故草案對於國權及中央制度、地方制度諸章，悉準此以為釐定，務期掃蕩十九年來軍人主政與割據地方之惡習，及使人民得有行使直接民權之根據。」鄒魯這裏點出，保障民權，是針對軍人當政的惡習。制訂此約法之前，居正在上海主持的《江南晚報》，僅僅因為觀點和南京不一樣，就只能託庇上海的租界，還要被通緝（這通緝令的原件至今猶存南京第二檔案館），主持

人居正還坐牢。那時候，在反對中國共產黨而卓有功績的中國青年黨，按照南京國民政府「黨外無黨」的原則被撤銷，幾乎因此走入地下。制訂此約法的人，也正在被通緝之中，他們是有切膚之感而制訂的。

鄒魯著在《約法說明》中道：「本約法對於人民之自由，均取直接『約法』保障主義，而不取法律之間接保障主義。後者僅對於行政而保障，前者並對於立法而保障也。舉例言之，則以前之根本法，關於人民自由之規定，不曰『非法律不得侵害某種自由』，即『於法律範圍內，得有某種自由』，是根本法上，有保障自由之名，一切仍付之法律也。假定國家定『報律』，則人民之言論自由受其限制矣。此種法律間接之保障主義，效力至微。本約法有鑒於此，故取約法直接之保障主義，凡應加入之條件，約法上明白規定，除此以外，不受其法律之侵害或限制。例如第三十一條：『人民之財產，除因犯罪所得，或供犯罪使用者外，不得沒收』。則人民之財產，除『因犯罪所得』、或『供犯罪使用者』外，得完全保障矣……」⑩這直接民權主張，凝聚着西山會議諸公治國的民主理念。

這裏要說明，與西山會議諸公在反共問題上一致的胡漢民，在治國的理念上卻分道揚鑣，而且幾乎走上政治的對立面，直到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胡被蔣介石軟禁在南京湯山爲止。胡漢民從國外歸來後，到達南京輔佐蔣介石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制訂《訓政綱領》，共六條，其基本精神和邏輯程序是：

- 一、在「訓政期間，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
- 二、平日，「以政權付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
- 三、依照建國大綱訓練國民，「以立憲政之基礎」。
- 四、將五權付託給國民政府。
- 五、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指導監督國民政府重大國務之施行」。

六、由這政治會議修正及解釋國民政府組織法。⑪

這樣，在訓政的特殊時代，全體國民的權力，通過以上這一套公式的邏輯推演，一下就集中到政治會議，再自然集中到政治會議的主持者蔣介石。這樣就沒有其它政黨的生存空間，黨內也不允許不同意見存在，這是胡漢民「黨外無黨」思想的具體化。只要對比一下前面引述的鄒魯所出力最多的《太原約法》，基本精神相差甚遠。《太原約法》注重基層的自治和人民的具體自由權利，而胡漢民主導的《訓政綱領》注重權力的集中。只要翻閱一下孫先生的《建國大綱》，訓政的基本要求是自下而上的基層政權自治，而不是中央集權。

在具體措施上，由於胡漢民幫助，使得南京國民政府蒙上了中國國民黨正統的色彩，不然蔣介石可能早已淹沒在反對者的浪潮之中。如果沒有胡漢民對廣東將領陳濟堂、蔡廷鍔的指導命令，廣東部隊不會從後面襲擊桂軍，使得桂軍退回廣西，南北夾擊南京國民政府的計劃失敗；稍後沒有廣東部隊打下濟南，使得達到了張學良入關支持南京的條件，中原大戰和擴大會議的結局還難以預料。

但是，蔣介石在取得了中原大戰的勝利以後才幾個月，胡漢民就被軟禁在湯山。因為抗戰爆發，胡漢民被釋放先到達上海，在上海剛剛看見從天津南下的謝持的時候，淚流滿面，昔日的老黨人都被蔣介石害苦了。胡漢民被囚禁的原因，都按照蔣介石的宣傳部門的說法，是反對約法的制訂，認為建國大綱已經足夠完備。就算有這分歧，哪裏作為行政機關的國民政府的主席蔣介石，就有理由拘留國會議長的道理呢？完全是軍人霸道橫行。而胡漢民的真正反對意見是甚麼呢？胡漢民清楚地說：「所欲問者，即在今日軍權高於一切之現狀下，政治盡為軍閥所掌握，人民憔悴於軍閥之虐政，此所謂『憲法初稿』者，果否可以臻中國於憲法之治？……二十餘年來在內政上的最大之要求，厥為推翻軍權統治而建立一三民主義之中國，故中國之立憲之對象，厥為消滅此反動之軍權統治，以解放此為軍閥所摧殘壓迫之國

民。今軍權統治之鞏固猶昔，橫暴猶昔，而謂可以憲政之實現，其誰信之？」^⑫在軍權人物當道的時候，哪裏有民主憲政可言？胡漢民兢兢業業支持蔣介石，三年多未離開過南京一步，最後嘗到了軍人橫行之苦，才說出以上深刻的話。但是爲時已晚，因爲「九·一八」事變爆發，國家需要軍人領導抗戰，蔣介石成了最恰當的人選。

胡漢民之言不假。就在幾個月後，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三民主義力行社、中華復興社在南京成立，社員多爲黃埔軍校畢業生，由蔣介石任社長（大家不稱社長，稱爲領袖）。該社受到意大利法西斯思想的影響，提倡鐵血救國，以鞏固領袖地位爲首要任務。其誓詞如下：「余誓以至誠，復興中國革命，力行三民主義，效忠領袖，服從組織，嚴守機密，爲達成使命，甘任勞怨，不辭犧牲，如違誓言，願受最嚴厲的制裁。宣誓人、監督人。」^⑬蔣介石奪取和維持政權的三根支柱之首，就是黃埔系軍隊，所以他對軍隊的控制是絕對的。這說明國家民主的現實，和西山會議諸公，包括胡漢民等人的畢生奮鬥的民主主義理想，相隔是多麼的遙遠。

謝持從一九三一年五月就半身癱瘓，重病多年，不問政事。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家中人得悉，在上海法租界白賽仲路（現在改名復興西路）的弄堂門口，有蔣介石的特務機關派駐的兩名特務，長期地監視；居正日記記載，一九五〇年，蔣介石丟掉中國大陸，有些落寞的蔣在台北首次和居正碰頭，居正感覺到，蔣介石第一次以平等之身份見他。

蔣介石的統治，在抗戰爆發前十年，在建設和準備抗戰方面，都有相當的成績；尤其他領導抗戰，表現了大無畏的堅強不屈的民族精神，將永垂史冊。但是始終是軍人的他，在內政上没有擺脫「霸道」的影子，始終没有足夠的德望，没有以「王道」治天下；没有重視民間的凝聚着傳統文化精神的反共力量；没有對農村問題有起碼的關注，雖然客觀上有國際的原因，有中共自身的戰略策略成功等原因。但

是從蔣介石扶植中共起，他就有着不可推卸的主觀責任。

孔子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朱熹的註釋爲「無爲而天下歸之」，被學術界所公認。徐復觀解釋道：「所謂無爲而治，如後所述，乃是不以自己的私意治人民，不以強制的手段治人民；而是要在自己良好的影響之下，鼓勵人民『自爲』；鼓勵人民自爲，並不是一事不作，這是兩千多年來的共同認定。」^⑭中國傳統文化形成的社會文化心理是，當政者必須要有德，才能凝聚自己週圍的政治人物，才能獲取民心。在廣大百姓還沒有像西方具有民主的普遍要求的時候，在中國的文化環境中，最高當局的是否實行德治，就有着成敗的關鍵意義。

西山會議諸公老矣！他們的艱難奮鬥歷程，他們的價值追求，他們的貢獻，已經鐫刻在史書之中。

註釋：

- ① 《居覺生先生全集》
- ② 《居覺生先生全集》
- ③ 《鄒魯文存》第三集第一四五頁。
- ④ 《中華民國史實紀要》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六日，孫科電文。
- ⑤ 《張溥泉先生全集》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頁，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中華民國四十年，台北。
- ⑥ 《護黨救國集》。
- ⑦ 《謝慧生先生事跡紀傳》第三五七頁。
- ⑧ 轉引自《三十年動亂中國》第一七二至一七三頁。
- ⑨ 天津《大公報》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一日社論。

⑩ 《回顧錄》

⑪ 《民國胡展堂先生漢民年譜》第四三二至四三三頁。

⑫ 《胡漢民先生政論選編》第二輯，廣州先導出版社，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⑬ 《中華民國史實紀要》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一日。

⑭ 《徐復觀集》第一八二頁，群言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

二十九、結語：歷史價值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西山會議在北京開幕；二十六年後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居正在台北逝世。如此的巧合的原因，只有去追問冥冥蒼天了，蒼天當然不語；而人類引以自傲的邏輯推理的認識方法，又無能為力。

謝持在九年重病後，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十六日去世於成都市；林森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去世於重慶市；張繼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去世於南京市；鄒魯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三日，去世於台北市。

在居正去世的當天，也就是西山會議二十六週年的時候，居正和鄒魯——西山會議僅剩的兩位老人——談論的內容，是當年碧雲寺的西山會議；談論的環境，是二十幾年的國共角逐，以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丟掉中國大陸告終，而蜷縮苟存於台灣。鄒魯在悼念文章中說：「先生作古之夕，傍晚，余在其家談及共匪，因溯及民國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北京碧雲寺總理靈前開西山會議事，相與太息當年已料及共匪之必禍中國，並談到當日西山會議的主張：

- 一、取消共產黨在本黨黨籍，並開除共產派各中委。
- 二、解僱顧問鮑羅廷。
- 三、開除汪精衛黨籍。
- 四、決定本黨此後對蘇俄之態度。
- 五、取消政治委員會。

六、移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上海。

先生並促將當年所著西山會議一文重印，因文中叙共黨當日囂張情形甚詳。俾閱者知當年共產黨之陰謀竊據中國，由來已久，益加強國人及本黨同志及對共匪之深刻認識。余甚贊成其

議。①

兩位老人在垂老之年，遭遇到他們跟隨孫先生親手創立的中華民國幾乎亡國的時候；他們遭遇到中華民國全面失敗給他們畢生所反對的中國共產黨的時候；他們遭遇到中華民國幾乎亡在蔣介石以力治國的方針，而他們又完全無能為力的時候……。抗戰勝利不久，鄒魯在中央常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向蔣介石提醒共產黨問題的嚴重性（見即將出版的居正日記），被蔣介石大罵，鄒魯憤而欲提出辭職，是居正等老朋友一再地勸告，爲了大局，才留下來……。

在一九四九年，在中華民國的軍隊將要撤出廣州的時候，鄒魯堅決不走，打算長眠在這難以離開的故土上，是家人的懇求，才最後離開赴香港……；而居正，竟然以七十五歲高齡，接受李宗仁代總統的任行政院長之請，打算與共產黨作最後地拚搏。現在公佈的史料表明，是在台灣的蔣介石擔心，居正「一旦當選，李居二人必然攜手合作，對台灣局面勢必非常不利」，也許這一番抗擊中共的成績，而不利於蔣介石個人對台灣局面的控制，所以特派人立即赴廣州，「星夜挨家挨戶的去敲門，找到他們要找的立委後，就籲請他們第二天必須對居正投不同意票」②。最後居正以一票之差在立法院落選。已經亡國在旦夕，蔣介石仍然把他的個人利益，置於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之上，多麼可悲。居正在那前後的日記中，卻對蔣介石的個人企圖心，沒有絲毫的防範。

西山會議諸位元老雖然齎志而歿，但是由於他們政治上的高瞻遠矚和對共產黨文化的深刻透視，他們對於民族和社會的責任心和他們孜孜不倦的奮鬥精神，給我們留下了有價值的歷史遺產。

西山會議的主張，不僅僅實際指導過上海、南京、武漢的清黨，還影響着以後中華民國長期的反共鬥爭，只要看一看蔣介石在清黨前後的講話，關於共產黨和鮑羅廷的部份，完全是西山會議主張的繼續；作爲一種信念、一種反映中華文化精神價值觀的追求，隨着日後中華民國歷史發展時而更顯得有價值——中國國民黨在那以後的長期成敗歷史，都與中國共產黨有不解之緣；並且西山會議所一再反對和批判的階級鬥爭理論，正是毛澤東奪取政權以後的基本指導思想，這思想指導着從暴力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好幾千萬中國人死在運動之中……。在國民黨丟失中國大陸的前夕，在南京的居正碰見原來是上海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的中央委員的年輕人張星舟，已經改名叫張厲生，擔任着行政院的副院長的重任，居正在路上拉住他，要他繼承西山會議的衣鉢（收錄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將出版的居正日記之中）。這不可能是繼承其它，而是一種神聖的信念和責任的繼承。居正不服輸，這時候居正的日記中記載，居正認爲對於共產黨的失敗，不是主義的失敗，而是國民黨的失敗，即蔣介石的失敗。這時候西山會議的老人，只有居正和鄒魯兩人還活着，他們不甘心……。

歷史學家唐德剛指出：「『西山會議派』實在是中國國民黨中以反共爲號召而組織的第一個派系，其組成分子中的領袖人物，可以說是集早期國民黨人才之大成；他們所以組織號召的理論體系，說是孫文主義的正宗，也不算過譽。照常理來推測，西山派在近四十年來的中國政壇上，尤其在國民黨的反共鬥爭中，似應發揮高度的領導作用。孰知它自始至終一直被黨中的當權派說成是『反動的集團』。」③

西山會議的歷史價值，在於高舉了三民主義的旗幟，反對在中國社會搞階級鬥爭，反對蘇俄對中國的控制，反對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強加於中國，而主張發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固有價值，這是他們的主

要成就。他們在擴大會議中，主張把中國建立在由法制保障的民主軌道上，是他們另外的成就。居正任十六年的司法院長任內，為推行中華民國走上法制軌道，在可能的條件下，取得了不錯的成就。

西山會議的主要貢獻如下：

首先，第一個高舉了孫中山先生反對階級鬥爭的旗幟。孫先生在民主主義第二講中說：「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是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以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不能說是社會生理學家。」孫先生指出民生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不是階級戰爭；社會的進步不是靠鬥爭，而是靠協作。並且批判馬克思的研究結論是倒因為果，與各國發生的事情不符合。

西山會議的重要文件《為取消共產派在本黨的黨籍告同志書》，是第一個在中國歷史上全面批判共產主義的文件。在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境界上，孫先生曾經談到兩種主義的相同。實際上，各種主義的理想境界幾乎都是美好的，提出者都盡情加以想像，關鍵在於如何實現。正是在施行的方法上，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張暴力革命，並且在理論上認定階級鬥爭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正是在方法上，孫先生主張和平地改進，在理論上，則批判階級鬥爭學說，主張階級協調和全民革命。所以在《告同志書》中，在有關階級鬥爭部份說：「孫先生為要實現三民主義而革命，當然是全國民眾的革命——國民革命，不是階級革命，或其他非全民的革命，那末本黨不容許黨員有違背本黨的主張鼓吹階級革命，更不容共產黨利用本黨的招牌來鼓吹階級革命，是可斷然決定的。……如有人在本黨力求實現孫先生三民主義的進程中，來鼓吹中國的階級革命，或其它非全民的革命，我們應當向他勸告以至警告。」西山會議召開以前，鄒魯、張繼、林森、謝持等九人聯名致函汪兆銘、譚延闓、蔣介石等的信中，也顯示出對

階級鬥爭在中國可能帶來的禍害的擔憂：「共產黨『有己無人』，日以階級鬥爭相號召，資產階級固認為敵矣，而同是工人，非彼重者，彼又號為資產階級之走狗，稚暉謂『共產黨視外人為贅人，得取而盡坑之最妙，留其餘喘，以終飢寒之天年，實其厚惠。』此語最能道其心事，故一翻蘇俄之歷史，無非殘殺異黨之歷史，今則向吾黨殘殺矣。夫人類本非性善，中國向來革命，以仁義相號召，歐美近世革命，以平等、自由、博愛、人道相號召，尚未免於殺戮恐怖，況以鬥爭相號召者，欲人類不供其犧牲者幾何。故共產黨階級鬥爭之號召，實人類前途之大憂，故不僅吾黨國已也。總理謂『馬克思只可以說是一個病理學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實即在此。綜上所言，是共產黨之加入吾黨，實欲奪吾黨之軀殼，而換其骨，因此不惜破壞吾黨團結及吾黨同志感情以達其目的。」（以上兩段引文都出自《清黨實錄》，不另外加註釋。）對於階級鬥爭可能禍及中國的擔憂，以及對階級鬥爭的批判，在中國的歷史上，西山會議諸公是第一批先覺者。

著名學者馬叙倫曾經短期參加過西山會議的活動，後來依附於有權勢的張靜江。他在一九四六年的自傳中，談到西山會議時，認為反共和反對階級鬥爭是西山會議的主題：「這時，北京的國民黨部已分成兩個，一個是西山派，由林森、鄒魯、張繼、謝持一輩領導的，他們害怕國民黨被共產黨篡竊了，他們反對階級鬥爭，他們主張國共仍就分開；但是，他們是孤立的。我呢？雖然信仰社會主義，卻不贊成暴動政策。」④他因為反對階級鬥爭而短暫加入了西山會議的行列。

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在一九四九年執政以後，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裏加以實踐，直到鄧小平上台才加以停止。其造成的損失沒有必要在這裏敘述。這裏只是引述在階級鬥爭實踐高潮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發表的講話。在天安門上，在中共國慶典禮上，林彪說道：「毛主席早就指出，在整個社會主義的歷史時期，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

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這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新階段。」也就是說，從中共建國起，就天天鬥、月月鬥、年年鬥，要鬥到遙不可及的共產主義為止，這都是用血流成河都不足以形容的苦難日子。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接見紅衛兵時又說：「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證明，沒有進行這樣徹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實現這樣的大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就會削弱，就會變質，資本主義就要採取各種形式復辟，剝削階級就會重新騎在人民頭上。」⑤這是宣揚恐怖來製造出施行恐怖的理由。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文件的中共中央《紅旗》雜誌社的第十三期社論，認為中共的一切成績都是階級鬥爭取得的：「我們十七年的成就是怎樣取得的呢？把我們的基本經驗歸結到一點，就是毛主席所說的，緊緊抓住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這個綱。我們的勝利，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的勝利，是社會主義道路對資本主義道路鬥爭的勝利。」如今讀到這樣的號召性的權威文章，真是令人不寒而慄。

將中共的文件對比西山會議的各種文件，證明西山會議諸公對共產主義可能在中國造成的惡果是洞察得清清楚楚。可惜他們的聲音沒有引起社會的足夠重視，也沒有被迷信武力的國民政府的當權者充分採納，難怪居正、鄒魯兩位元老在最後日子對西山會議念念不忘。

西山會議的歷史價值的第二點是，站在全民族的立場，反對了蘇俄帝國主義征服中國的企圖。

自從西方爲了其殖民主義利益，在一八四〇年打開中國的大門以來，危機頻傳。特別在二十世紀日本、蘇俄的兩次侵略，幾乎完全滅亡中國。

日本赤裸裸的土匪強盜行爲是公開的，引起了全民族的反抗，至今仍然受到海內外中國人的譴責。但是蘇俄的侵略是深深地掩藏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外衣下。中共出於現實利益的考慮，對早期的歷史仍然繼續遮掩，國民黨雖然進行宣傳揭露，但是缺乏足夠的證據。如今蘇聯解體，不少檔案第一次向全

世界公開，清楚地顯示出那時候中華民族是多麼的危險，苦難是多麼的深重，也顯示出西山會議將蘇俄和西方帝國主義一樣看待，是何等地深刻正確。

沙皇俄國從彼得大帝以來，就成功地進行了兩百多年的擴張。無論是北歐的瑞典、芬蘭，波羅的海諸小國，東歐的波蘭等國，南面的土耳其，東面的中國，土地都被侵佔，都飽受其害。十月革命以後，蘇俄繼續着侵略的傳統，但是都以援助的名義，以推行共產主義的藉口進行着實質的侵略。同樣，周圍的鄰國，芬蘭、波蘭、羅馬尼亞、中國的土地都繼續被侵佔，波羅的海三個小國居然被滅亡，直到蘇聯帝國解體，才重新獲得獨立；在東面，外蒙古也被蘇俄出兵佔領以後，以民族自決的名義從中國硬分裂出去，連文字都改成俄文。這已經是存在的歷史。

蘇共中央的檔案證明，在一九二〇年代，影響極為深遠的孫先生的全部聯俄容共政策，是建立在受蘇俄欺騙的基礎之上；而中共在這時期之中，不管其黨員們的動機是如何善良，在實際上只是充當了外國侵略中國的代理人而已。西山會議的文件中，第一次把蘇俄稱作帝國主義，正確無誤地抓住了問題的實質；西山會議反對聯俄容共政策的本身，具有反抗侵略的民族主義性質。

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代表蘇俄政府前後發表了兩次聲明，宣佈放棄一切在華特權，廢除過去沙皇時期強加給中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這在亡國危機重重的時代，對中國人的影響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有些關心國家民族的熱血青年因此加入了中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孫先生在西方的拒絕和反對下，把蘇俄當作了唯一的友邦。蘇共中央檔案記載，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六日，孫先生致函列寧說：「前次貴國對中國的聲明，給中國人民帶來很大的希望並爭取了中國民心，使人們把俄國看作中國的朋友，他能保證中國擺脫帝國主義列強而得到民族解放。」蘇俄雖然說得很娓娓動聽，但是在實際上完全兩樣：一九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由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決定給越飛發電報，命令他對中國的談判，不

能以那兩次對華聲明爲基礎（蘇共中央檔案第三十號）；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致越飛的信中，明確中東鐵路是蘇俄的財產，並說「爲甚麼放棄帝國主義政策要以放棄我們的所有權爲前提」⑥（第五十八號文件）？但是越飛爲了欺騙孫先生和所有中國人，在一九二三年一月與孫先生發表歷史性的聯合聲明中，第一點就是蘇俄願意放棄帝俄時代對華的一切條約和權利；第二點是不在中國施行共產主義；第三點是中東鐵路，第四點是外蒙古不脫離中國。以後的事實證明了蘇俄甚麼權利都不放棄，立即在中國推行共產主義，外蒙古從中國脫離。所以整個聯俄容共時代，是建立在蘇俄對中國進行新的侵略的基礎上的。

歷史已經證明最早發現和反對蘇俄侵略者，正是西山會議諸公。孫先生在世的時候，蘇俄——中共的陰謀還沒有完全暴露，並且因爲孫先生個人的地位、能力、威望完全能夠控制局面，所以那時候的二中全會處理《彈劾共產黨案》，大家仍然以孫先生的主張爲依歸，沒有分裂。張繼晚年回憶道：「七月，余偕慧生赴廣州，與鄧澤如檢舉本黨之共產分子。……與總理談及此事，甚不悅。唯總理目已發紅，久不退，余已不忍多辯，不久返滬。」⑦但是在孫先生去世以後，特別是廖案發生以後，蘇俄——中共更加肆無忌憚。其陰謀已經暴露無遺，挺身與之抗爭者，是西山會議諸公。

蘇俄的危險性，特別表現在有中共作爲代理人方面，而且這代理人又鑽入了國民黨內。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宗教性、世界性，聲稱將解決人類終極的幸福問題，所以中國有不少急於求成的年輕人相信它，並且願意爲它獻身，這些人往往就不自覺地成爲了蘇俄利益在中國的代理人；作爲一個政黨的中共，居然成爲第三國際在中國的一個支部，而第三國際又受到蘇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俄羅斯的傳統的民族主義，恰恰又被蘇共中央改頭換面的繼承着。於是，在中國就有了俄羅斯人的「第五縱隊」，這縱隊經蘇俄訓練、給經費和操縱。乘孫先生和有的善良的中國人被欺騙的機會，在鮑羅廷的指揮下，進行着篡奪國民革命領導權的活動。最早識破蘇俄的機心，並且與蘇俄及其代理人進行頑強抗爭的，正是西山

會議諸公，他們把蘇俄當作新的帝國主義國家對待。西山會議所進行的這場抗爭，應當是中國近代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一部份。

前面所引用的《爲取消共產派在本黨的黨籍告同志書》中莊嚴地宣佈：「在國際上互以平等相待的國家，當然和他攜手，但是所謂攜手並不是賣身投靠式的，是以對等的地位相互協助。如果蘇俄以平等待我，那麼本黨當然遵照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積極與蘇俄聯合；若是蘇俄採用帝國主義的手段，那當然是本黨的敵人。」於是結尾處喊出口號：「打倒任何屬性的帝國主義！」當時外有幹練的中共黨員，國民黨內有汪兆銘、蔣介石等以孫先生的聯俄容共爲名控制着大權，西山會議能夠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對蘇俄的口號，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西山會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致函蘇俄駐中國大使加拉罕：「加拉罕大使閣下：貴國覺悟民衆於列寧先生指導之下，完成革命，以扶助弱小民族、打倒帝國主義昭示世界，並本平等互助之原則，與我國講信修睦，自動取消帝政時代所攘奪之權利。故本黨認貴國爲國際間唯一的良友，深願以至誠相結合，與帝國主義之列強奮鬥。乃近年以來，經事實之證明，貴國對於敝國所取之政策，已有效法英、日之趨勢，故敝國民衆日滋疑慮。……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緊接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也有更詳細的揭露和批判，此不再引用。

鄒魯針對那時候蘇俄欲通過外蒙古進一步侵略新疆，以尖銳的筆調揭露道：「蘇俄素以扶助弱小民族號召，故其侵略雖本於國性民性，毫不變更俄皇政策，但其手段卻變強暴而出於陰柔，幾如狐之媚人，雖死而猶不明其奸者。是以在國內則設學校招收各民族、各國家之青年學生，施以麻醉品，使之回國供其使用；對各民族各國家，則多派人前往，謂爲扶助革命，扶助獨立，使之扶助之國各權悉歸其手，一任其玩弄，歸爲版圖而後已。」對於中共受莫斯科指揮，鄒魯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評論道：「中國

所謂共產主義者，在第三國際指揮之下，即在蘇俄指揮之下，受其盧布，作其鷹犬，陰謀將民國隸屬於蘇俄。明眼人早已看透，其始不過取總理民族自決四字，將外蒙斷送與蘇俄；今則益明目張膽，欲將中國整個斷送。……其所假之口實，則為世界主義。因此共產黨最忌人言國。國家主義，原本在國民革命進行中，不特不相妨，或能相助。乃共產黨望文生懼，非摧殘之不可。推其忌國家之心，必致力將民國觀念破滅為先……」⑧事後來看，一切似乎都清楚，但是在那時候，蘇俄以支持中國反帝反軍閥為名，而中共又挾着時髦的社會主義思潮。能夠從根本上洞悉蘇俄——中共者，是極少數。這先覺者就是西山會議諸公，這是他們捍衛國家民族的歷史功績。

武漢政權，就是由蘇俄通過鮑羅廷——中共操縱的政權，就是滅亡中國和中國國民黨的重要的一步。汪第一次在這時將中國出賣給蘇俄，十幾年以後再出賣給日本。李雲漢分析武漢政權道：「被選擇為左派的領袖汪兆銘，在當選名單中居於特別顯耀的地位，他身兼中央常務委員、組織部長、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委員、軍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暨國民政府委員等五要職，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可是汪此時尚未返國，代理其職務的在黨內為吳玉章、在政為徐謙，徐是左派，這足可以證明抬高汪的身價是鮑羅廷要的要頭，目的僅在安撫左派，使左派同意與共黨在黨政大權上平分秋色。汪兆銘、吳玉章、徐謙之外，次一權力人物為譚平山……。他同時是共產黨在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內的總代表。在汪兆銘未去武漢前，武漢政權的權力人物是徐謙、吳玉章，汪既去武漢以後，徐謙失勢，大權遂為兩個共黨吳玉章、譚平山所掌握。」⑨

本世紀，在中國的土地上，按照外國人的旨意而建立為外國謀利的中央政府，只有武漢政權，和日本人統治下汪兆銘的南京政權，以及東北的滿洲國，但是武漢政權是首創；再對比一下其時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張作霖、與英國人有關係的吳佩孚，這兩個軍閥也有愛國的一面，張作霖對蘇俄、後來對日本

的堅決抵制，吳佩孚一再要武力收復外蒙古，並且死不做日本漢奸，等等；而中共和那時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人一樣，把蘇俄當作他們的祖國，李大釗主張送給蘇俄外蒙古，以便感謝蘇俄給中國送來精神。相比之下，中共的領袖們在愛護和保護國家民族上，與張作霖、吳佩孚差之甚遠。

西山會議的各項文件所顯示的對蘇俄——中共的深刻認識，在國民黨內還有長遠的影響。在寧漢分裂以後，只要將蔣介石、吳敬恒在上海清黨前後發表過的一些講話稍微讀一讀，就可以發現在批判蘇俄和中共方面，完全是繼承西山會議的主張，他們的反共活動是西山會議的繼續。

西山會議的歷史價值，還體現在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價值方面：一方面反對蘇俄文化取代中國傳統文化，另一方面是，西山會議諸公以他們凝聚着固有道德的高尚人格，在重重的壓力下巍然不動，體現着孟子的浩然之氣和大丈夫精神。

孫先生晚年在有關民族主義的演講之中，主張發揚中國固有的道德，說治理天下不靠武力，靠道德；並且說明中國歷史上的盛世，一定是有很高的道德；這道德的內容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他說自己領導的國民革命，就是繼承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正統。戴傳賢的《民生主義系統表》和《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對這方面有突出的發揮，批判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

其實，被共產黨人當作宗教信仰，認為放至四海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只是一種西方的文化現象。馬克思的原始共產主義經過階級社會以後，再回到共產主義的三段式，實際來自黑格爾；物質在人類社會演進過程的絕對重要性，也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的變種；費爾巴哈粗糙的唯物主義，則與十八世紀自然科學水準，和牛頓力學相關，唯物主義的粗糙認識論，就是基於牛頓的力學；李嘉圖和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是為英國和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服務的。列寧的加強專政和建立嚴密黨的組織的理論，則繼承了沒有經過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薰陶的俄國文化，是列寧、斯大林的暴力革命需要。整個的

共產主義文化，是西方部份文化的變形扭曲的表現，也可以說是西方文化的糟粕匯聚而成。全世界的共產黨人經過大半個世紀的努力，企圖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共產主義王國，最後失敗了。這也是一種文化的失敗。

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上，西山會議的文件中，第一個將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對待，提出這種文化不適宜於中國。這樣的宏觀歷史高度，對於批判今天的殘破萬般的中國共產主義，仍然有相當的價值。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專門有文化部份：「關於中國文化：何謂文化？於互相的道德見之，於經濟、政治之發展更顯見之。仁愛為吾民族文化之結晶，亦即革命之基念也。舉語言、風俗、習慣、信仰、職業、國籍各不相同之人類世界，捨仁愛之外，更無足以為統一中心而立世界大同之基礎者。吾人唯一之目的，固在求國家之自由平等，而最終之目的，則在促人群之進化，以人類共同之能力，創造和平世界也。……中國既有這創造文化之嘯力，則毋專事模仿他人。乃共產黨幼稚之故，盲目模仿蘇俄；並自己民族具有絕大之潛伏的創造力亦不敢自信。且因憎惡一切舊習慣舊勢力之故，視中國文化如敝屣，而專奉其模仿者為至高無上之準則。此不規則的快牛破車之傾勢，其震盪愈大，則將來之回復力愈強。故吾人之期望於共產黨人者，猶之盼亡子之歸來，於我復興文化不無裨益也。」仁愛是中國文化的結晶，而中共所信奉的蘇俄文化，則是以鬥爭哲學為基本，二者是根本不同的。將蘇俄文化作為至高無上的準則極力模仿，必定像快跑的牛拖破車，非常危險。這話說出以後的二十多年，中共以階級鬥爭為綱治國，其害無窮，這預言已經被證實。雖然經過鄧小平的改革，中共至今已經在實際生活中取消了階級鬥爭為綱的做法，但是從文化的角度證實仁愛哲學和鬥爭哲學的不相容，馬克思列寧主義不適合中國的國情等，仍然是禁忌的。鄧小平的改革，是為了解救中共政權，這改革的本身，也就說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失敗，說明共產主義文化不適合中國。只有在經濟上效法資本主義，

重新提倡以儒家爲中心的中國仁愛文化，才有出路。任何當政者如果不提倡和發揚仁愛，不去節制人的私慾，一定會帶來災難，一定會行不通。這也說明了西山會議文化理論的價值。

一九三六年，新的世界大戰的危機已經威脅到人類，鄒魯在德國出席世界大學會議及海德堡大學五百五十週年的時候，提出應該以孔子的仁愛哲學爲基礎，以便維護世界和平。西方的宗教提倡的博愛，類似中國古代的墨子，是愛無差等，在沒有宗教激情的中國，比較難以施行。而儒家的仁愛，是愛有差等，是先愛親人，再以將心比己的體驗，推及他人，施行起來要容易得多。

西山會議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即在抗戰以前，這些人始終在野，始終受壓抑，哪怕他們的主張是孫文主義的正宗，哪怕主張部份被當權者公開採納，哪怕他們的組成人員是孫先生的左右助手。他們始終的逆境遭遇，就要求他們要有一個不屈不撓的整體人格。只有共同主張而在人格修養上略差者，在艱難的半途已經退出。《論語》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朱熹註釋：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任何能夠持之以恆地擔負重任者，必然有長期的內在的人格修養，即是孟子所謂的養「浩然之氣」。有此修養，再加上認定反對階級鬥爭、認定反對蘇俄對中國的控制的正確無誤，認定反對共產主義本身是一場嚴重的捍衛民族文化的戰鬥，認定中國需要民主和法制，所以在壓力面前能夠無所畏懼，在利益的引誘面前能夠不動心，這就是孟子所謂的大丈夫性格。

這就是凝聚着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西山會議的整體人格，這就是洞察蘇俄——中共各種企圖心的智慧，這就是敢於面對強者的大無畏勇氣，孫先生提的「智仁勇」是也。

任何民族如果失去其民族精神，就是空空的軀殼。而民族的文化精神，只能夠體現在具體的人的身上，首先要體現在社會的精英的身上。孫先生的一生，在政治上經歷了一再的失敗，那時要謀私利，就

只有去北京當官。能夠跟隨孫先生不捨者，都是受到他的主義的吸引，也受到他的人格感召的人，這點在孫先生剛剛去世的時候的各種悼念文章中，包括他的敵人，都是共同肯定的。所以他的周圍，大多數是有相當人格修養的仁人志士。汪兆銘之流，以清高爲名，常在法國與吳敬恒等在一起，沒有參加艱苦的奮鬥，他是在改組以後才參加國民黨的高層運作。西山會議諸公，正是辛亥革命精神的繼續，國民黨的黨格的體現。

居正在台灣去世以後，中國文化思想家徐復觀寫悼念文章說：「由覺老之死，而感到辛亥革命精神的墜失。」另一位文化大師牟宗三說：「我第一次印象，便覺此老不同凡響，一無官氣，二無黨氣，而正面的意思，便是覺得有一老居士在眼前，有一革命老元勳在眼前，當年風雲際會，意氣縱橫，出生入死，以與滿清作殊死鬥，在當時眼前已成陳跡，而覺老身上並未有留戀過去慨嘆以往之痕跡，一切都化掉，只是平平的……，身居廊廟，而遊山林，此是英雄本色，亦謂有真豪傑始能有此境界，此非刻意尚行境界，亦非一切散文式的事業家、學問家所能有此。」^⑩居正身上所表現出的人生修養境界，正是中國悠久文化歷史精神的凝聚，是西山會議的群體人格的體現。

鄒魯自幼受到母親、父親忠厚待人的言教和身教，儒家的聖賢豪傑成爲他處生歷世的榜樣；在艱難環境中成長，使他繼承了客家人的奮鬥不息的精神；他最初的學校教育，都是儒家的《四書》、《禮記》、《春秋》、《史記》、《資治通鑑》等經典著作；在廣州法政學堂的三年期間，同學和老師中不乏有名的革命黨人，新的環境和潮流使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從內心蓬勃，變成了追求革命的行動。一旦鄒魯看準了利國利民的目標，就終身爲之奮鬥，不爲艱難險阻和利益所動。在國會中，他敢於同袁世凱、段祺瑞正面抗爭；他又能夠爲了國民革命的前途，斷然同他的同學和友人陳炯明決裂，在討陳中立功；他在鮑羅廷——汪兆銘氣燄高漲之時，敢於反對，而不計較個人的損失；他在堅持西山會議的各項主張

中，在各種利誘下，不曾有過一絲一毫的動搖。這一切，固然有他對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的理
解和信念，但是鄒魯的人生和政治道路的選擇，和他的孜孜不倦的實踐過程，離不開他自幼所受影響
的儒家哲學。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在鄒魯身上的凝聚，構成了他在新時代的人生道路。

謝持著的《天風海濤館六十自述》一開頭就是儒家知識分子的本色：「余生近六十年，學問事功，
無所成就，修身養性，更屬旁皇，自視蓋赧然矣。慨自有生以來，父母之愛也教也，師友之誨也督也，
既已受之獨異於人；而涉世以致於今，可爲之時非不多，可退之機非不熟，所遭際追隨晨夕與共者又非
不賢且達也；然宛然一身，踟躕故我，國則日損，行則日荒；早夜思之，誠如臨深而履薄矣。」謝持一
生反抗過滿清王朝、袁世凱和北洋軍閥政府，反抗過蘇俄——中共——汪兆銘，反抗過大權在手的蔣介石；
辛亥前他剛剛有革命思想的時候，他的老師周善培主持廣州將弁學堂，出於善意，要他爲岑春萱服務，
但是謝持選擇了有殺頭之險的同盟會道路；民國初年當上了收入頗豐的參議員，卻敢於冒險去炸想當皇
帝的袁世凱；在孫先生最失敗的時候，他是孫先生少數最忠實的追隨者，而每時每刻的生活費用，卻是
告貸於人；他在孫先生去世以後，拒絕了國民政府第一任監察院長的高位，而走上反抗蘇俄——中共——汪
兆銘的道路；蔣介石剛剛登位，又要他去擔任監察院長，以便爲軍人政權裝璜門面，謝持再次加以拒
絕，再走上反蔣道路。這既是他對三民主義的篤信，也是儒家修身哲學對他的深刻影響。他去世以後，
在國葬墓園祭堂中，掛着友人贈送的匾額，上書「今之完人」，這首先是對他的人生修養的肯定。

西山會議在政治上反對蘇俄——中共——汪兆銘，又反對爲了權利而不惜犧牲中國國民黨的整體利益的
蔣介石，但是在抗戰爆發以後，西山會議諸公全部都能夠拋棄前嫌，掩護蔣介石領導抗戰，促進了大團
結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是政治上的重要特點；在更高的文化層次，西山會議的諸位前輩就
是體現着中國文化精神，體現「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性格，是一個文化群

體。

對比一下毛澤東時代及毛周圍的江青、康生、林彪之流，都是整人、害人、阿諛奉承的群體，這群體掌握着幾億人的命運，難道不是中國文化墜落的證明，不是中國人的悲哀嗎？西山會議諸公，除了他們的政治追求將在史冊上有一席之地以外，他們身上體現的中國文化優良傳統精神，正是後世應當加以復興重建的。因為中國文化被中共摧殘破壞的程度，歷史上從來不曾有過，這是中華民族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而一般的中國人都只是在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之中，還沒有感受到民族精神受到重創的嚴重性。

共產主義在二十世紀興起又滅亡，其滅亡的基本原因是，這種以暴力為基礎的階級鬥爭統治原則，自上而下對人的行為思想無所不控制的社會，不適合人類的生存。人類曾經有四分之一深受其禍，而中國人是受禍最多最深者。西山會議第一個在中國舉起了反對共產主義的旗幟，從理論上到行動上，與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僅僅憑這一點，就將永垂史冊。

雖然西山會議的吶喊在先，共產主義仍然在中國得到了推廣實踐的機會，付出的是以數千萬中國人的生命。雖然鄧小平進行了改革，但是造成這一空前民族悲劇的原因並沒有完全消失，甚至連起碼探討、總結這一悲劇的努力仍然被壓抑着；或者有的年輕人在尋求中國出路的時候，因為長期受到唯物主義的歷史教育而不知中國文化之長，又提出不可能全盤西化，重新回到五四時期陳獨秀的起點。西山會議的文化主張，體現了他的深思熟慮的理性意義。

這說明，西山會議的意義不僅僅是歷史的，還有它若干的現實意義。就憑這一點，西山會議諸公，可以為他們的中國社會歷史的巨大貢獻而安息於泉下。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天道神秘難知，人道變化難測。但願中國人在未來多多總結歷史的

經驗教訓，付出最少的代價，探索出最好的文化生存方式，幸福久遠。

賢哲們：保佑中國人吧！

註釋：

- ① 《居覺生先生全集》（下），居正著，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台北。
- ② 《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三期第四十頁，王任遠文《陳立夫回憶錄讀後感與質疑》，台北。
- ③ 《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三期。
- ④ 《我在六十歲以前》第九四頁，馬叙倫著。
- ⑤ 《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四日。
- ⑥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一二九頁，第五十號檔案。
- ⑦ 《張浦泉先生全集》，張繼著，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中華民國四十年，台北。
- ⑧ 《鄒魯文存》第三集第二七至三〇頁。
- ⑨ 《從容共到清黨》第五五一至五五二頁，李雲漢著。
- ⑩ 《居覺生先生哀思錄》第三六頁。

一個國民黨共產黨都刻意隱瞞和歪曲的史實；

七十五年前一個能匡扶國運的會議，

被淹沒在偽造的史籍中。

共產黨怎樣開始？

國民黨如何分裂？

蔣介石如何上台？

七十五年後真相展示在世人面前，

本書絕非天馬行空、胡亂編造，

全書內容均以蘇聯、國民黨、共產黨的檔案資料為根據，

首次披露，不可錯過。

封面人物：（從上至下）林森、居正、謝持、張繼、鄧魯

ISBN 962-86043-6-8



9 789628 604364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上下兩冊 港元 150 美元 20